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五卷

严如平 宗志文 主编
李 新 校阅

中华书局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五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严如平 主编
宗志文

李 新 校阅

中 华 书 局

1986年·北京

责任编辑：何双生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五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严如平 主编
宗志文

李 新 校阅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12 3/8 印张·248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500册

统一书号：11018·1346 定价：2.05元

前 言

一九七二年八月，我们接受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当即召开座谈会研究。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根据这一认识，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初步设想：

一、编写《中华民国史》，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绝不能因袭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修史方法。

二、写一部书，定名为《中华民国史》，拟分三编：

第一编 中华民国的创立（1905—1912年）

第二编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7年）

第三编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27—1949年）

三、编三种资料：

第一种 《中华民国大事记》

第二种 《中华民国人物志》

第三种 《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

关于人物志，需要写传记的约一千人；列入人名辞典的约四千人；另外还拟编制若干人物表。

如何写传记，我们毫无经验，只预先提出了几点要求：

一、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一个人写传记，必须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只有对这个人的一生有了总的概念、对他的主要言行有了具体的判断、并且自信这个概念和这些判断是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然后才可以下笔。

二、要求用记叙文，不要写成评传。要通过具体的事实把正确的观点表现出来。不要离开事实材料，作过多的评论。对事实的取舍、详略以至措辞用字，都必须仔细斟酌，务求妥贴。

三、要求真实可信。传记中所写的事实，要经过反复核对，有的还要经过调查研究，务求做到确实无误。凡是有疑问而又查不清的，宁可写或存疑，不要以讹传讹。

四、要求反映一个人全貌的同时又有重点。一个人的传记，要把他的家庭情况、上学情况、主要的经历和言行，总而言之，要把他的生平事迹如实地反映出来。但又不要写成流水帐或年谱。要把最能反映本质的事情，选其中最重要的一两件写得详细、生动些，其余的不妨简略。

五、要求用白话文写，文字要力求简练。没有必要就不要用引文，引文要注明出处。每篇以二、三千字为准，不要写得太长。

六、初稿后面，要附主要参考资料目录。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编写《中华民国史》，非全国大协作不能成功。即以写人物传记而论，哪个行业的人由哪个行业的人来写最好，哪个地方的人由哪个地方的人来写最好。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我们希望这批初稿，能引起各方面和全国各地方的兴趣，大家都来写，尤其

是熟悉情况的人动手写，那么《中华民国史》就不难完成了。我们还希望从事史学工作的同志，不但自己动手写，而且要把有关这方面的组织工作承担起来。

（一九八〇年五月修改）

目 录

宋庆龄.....	宗志文 李静之	(1)
陆皓东.....	江绍贞	(14)
杨振鸿.....	高光汉	(18)
龙鸣剑.....	曾绍敏	(25)
王金铭.....	梁旭毅	(30)
罗福星.....	林其泉	(36)
陈楚楠.....	陈 民	(42)
黄明堂.....	邢凤麟	(47)
吴兆麟.....	闻少华	(53)
樊钟秀.....	胡金福	(58)
陈友仁.....	陈 民	(64)
杨 杰.....	陈 崧	(69)
彭泽民.....	周天度	(77)
张治中.....	余湛邦	(84)
章伯钧.....	周天度	(92)
邓初民.....	江绍贞	(100)
江 庸.....	汪仁泽 陈光贻	(107)

徐 谦	蔡静仪	(112)
邱菽园	陈 民	(118)
侯西反	陈 民	(121)
杨希闵	吴显明	(124)
王家烈	周春元 林国忠	(130)
何成浚	江绍贞	(135)
蒋梦麟	宗志文	(142)
罗家伦	宗志文	(149)
朱家宝	黄有成	(156)
卢兴邦	陈孝华	(160)
李士群	黄美真 石源华	(166)
罗君强	黄美真 张 云	(173)
陈春圃	黄美真 张 云	(179)
许鼎霖	熊尚厚	(183)
孙多森 孙多钰	熊尚厚	(189)
吴懋鼎	熊尚厚	(195)
胡文虎	陈 民	(199)
刘国钧	史全生	(203)
包达三	汪仁泽	(210)
梁墨缘	伍 锦 张鸣皋	(214)
魏 如	李新辉	(220)

李康年.....	汪仁泽 (225)
余芝卿.....	汪仁泽 (229)
汤子敬.....	李本哲 (233)
曾俊臣.....	曾万石 (238)
老舍.....	王行之 (242)
郁达夫.....	马蹄疾 (250)
郑振铎.....	陈福康 (257)
王统照.....	鲁海 (265)
黎烈文.....	任嘉尧 (271)
周瘦鹃.....	史全生 (276)
黄远庸.....	钟碧容 (281)
严宝礼.....	徐铸成 (285)
费 玶.....	玉 如 正 棠 (290)
王亚南.....	林其泉 (295)
刘仙洲.....	黄延复 (301)
刘文典.....	张文勋 (308)
罗常培.....	白吉庵 (313)
蒋维乔.....	陈秉仁 (317)
俞庆棠.....	郭 熔 (324)
孙本文.....	马先阵 (330)
杜定友.....	张 洁 (336)
傅抱石.....	倪 波 沈道初 (340)
刘天华.....	严如平 (344)

谭鑫培.....	白吉庵	(350)
阿炳.....	倪波 沈道初 沈祖方	(356)
王少堂.....	倪波 沈道初	(360)
林可胜.....	陈民	(363)
伍连德.....	陈民	(366)

附录：《中华民国人物志》中的《民国人物传》

选录草案	(370)
《民国人物传》第一至五卷目录索引	(373)

宋 庆 龄

宗志文 李静之

宋庆龄，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人。1893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出生于上海。她的父亲宋嘉树，十三岁时随舅父到美国，在丝茶行当学徒，后入基督教，经人资助入大学研习神学。1886年回国，在上海一所教会中学里任教，兼作地区传教士。1892年他辞去教会职务，经营印刷业，逐渐发展成富有的资本家。他跟孙中山是朋友，同情并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曾帮助孙中山印刷革命宣传品，并一度追随孙中山一起工作。

宋庆龄七岁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那时，孙中山常常到她家跟她父亲议论国家大事，讨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府的问题。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意志，曾给予少年时代的宋庆龄以深刻的影响。

1908年宋庆龄到美国佐治亚州梅肯的威斯理安女子大学（Wesleyan college）学习。她好学深思，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扬。她关心祖国的命运，经常翻阅报纸，从中了解国内的情况。她还大胆地在校刊上发表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主张推翻清朝专制政体，建立民主政府。辛亥革命胜利后，她立刻把宿舍里悬挂的清朝龙旗取下扔在地上，换上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不久她在校刊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盛

赞辛亥革命的胜利，并说：“革命已经使得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但是，还要争取博爱”^①。这时，她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1913年8月，宋庆龄从威斯理安大学毕业后回国，途经日本，到那里看望双亲。她的父母是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一起流亡日本的，父亲正在为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满怀革命理想的宋庆龄到日本后，也决定献身于中国革命运动。不久，她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帮助他处理机密信件和起草文件。经过孙的帮助，她对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认识上有了很大提高。1914年，孙中山聚集革命力量，组成中华革命党，准备再举革命。宋庆龄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宋庆龄在日本随孙中山工作了将近一年后，向她的父母提出要和孙中山结婚。她的父母不同意。为了不与家庭决裂，她等了差不多一年。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与孙中山在东京结婚。

护国战争爆发后，1916年5月宋庆龄随孙中山回到上海。6月袁世凯死去，掌权的北洋军阀继续破坏临时约法，拒绝恢复国会。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宋庆龄随往。1918年8月，孙被桂系军阀和政学系政客排挤，辞去军政府元帅职。宋随同他回到上海。孙在上海从事革命理论的创作，继续撰写《建国方略》，创办《建设杂志》，以启发民众，“唤醒社会”。宋除照料孙的生活外，并和他一起研讨三民主义诸问题，帮助查阅资料，誊写文稿。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时，宋庆龄

和孙中山一样，非常兴奋，十分向往，希望从中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此后，孙中山和列宁之间开始有函电来往。孙致列宁的函电，有些是宋起草的。五四运动时，许多爱国学生被反动政府逮捕。孙为营救被捕学生而发出的“爱国无罪”的电报，也是宋起草的。

1920年8月桂系势力被逐出广东。11月，宋庆龄随孙中山重返广州。次年6月，孙决定进军广西。宋庆龄同何香凝一起，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到前线慰问。不久广西平定，孙中山赴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宋随同前往，常常陪同孙视察军务。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反对北伐，于1922年6月16日在广州公开叛变，指挥叛军包围并炮轰总统府，形势十分危急。孙中山催促宋庆龄一起撤离，宋担心自己同行会影响孙的脱险，对孙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②她坚持让孙首先撤离了险境，然后才在卫士掩护下，历尽艰险，突破火线，辗转到达永丰舰，与孙相见。她因这次历险，健康受到摧残，遂先行离粤到上海。

同年8月，孙中山回到上海。两次护法失败，使他认识到革命不能依靠军阀，必须另找新的力量。宋庆龄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早在1921年底，孙中山就和张太雷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密谈过多次。这次到上海后，他又几次和陈独秀、李大钊讨论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进行这些活动时，宋都在场，从而她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不久，列宁派出的代表越飞在李大钊陪同下，与孙中山就当时远东局势和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商讨。宋一直在

座。这为她以后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接着，孙着手进行国民党改组的工作，宋亦参与其事。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宋庆龄是积极支持者。

同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阀的统治垮台。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商讨国是，宋庆龄偕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宋庆龄极为哀痛。但是她没有消沉，决心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投身于中国人民大革命。她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遗嘱，解释他的新三民主义。4月，她从北京回到上海。不久，“五卅”惨案发生，宋向记者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的暴行，赞誉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6年1月，宋庆龄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举为主席团七成员之一。她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共产党紧密合作，义正词严地谴责国民党右派集团背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次会上，她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她投身于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同年7月，北伐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0月攻克武昌。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宋庆龄与先遣人员于11月到达武汉。12月13日，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之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宋庆龄每天都到联席会议办公室去办公，还时常参加民众大会，发表演说，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7年2月，她在汉口办了一所妇女政治训练班，培养妇女干部，动员她们参加国民革命。她在开学典礼上说：“国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

当先努力于这个大家庭的革命工作，然后才有小家庭存在的希望。只知道做贤母良妻，不去尽国民革命天职的妇女，结果必定做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奴才的奴才’。”^③

正当大革命顺利向前发展的时候，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为了篡夺领导权，坚持要迁都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一致反对，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的决议坚持了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并改选了党政军领导机关，抑制了蒋介石的独裁。宋庆龄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她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共产党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7月14日，隐藏在武汉政府中的假左派汪精卫秘密召集“分共”会议，提出要同共产党决裂。宋没有参加会议，请陈友仁代表她发言，坚决反对“分共”，说“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④。同日，她又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和孙中山事业的叛徒决裂。《声明》明确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⑤。宋庆龄表示绝不同流合污，决定“暂时引退”，和蒋、汪之流控制的国民党断绝关系。她表示“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

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⑥。8月1日，由宋庆龄领衔的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发表宣言，严正地揭露和谴责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同日爆发南昌起义。宋当时虽然不在南昌，仍被推选为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七人主席团成员。她随后高度评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革命暴动，说“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保证了表面混乱的目前阶段将要过去，中国将要得到自由”^⑦。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8月下旬，她赴莫斯科。行前发表声明，说“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他们必然失败，走上以前企图以同样方式来统治人民的那些人的道路”^⑧。

宋庆龄在莫斯科发表了一系列的声明和论文。同年11月1日，她和邓演达、陈友仁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斥责蒋介石、汪精卫窃取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号，表示要与新旧军阀作坚决的斗争，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12月18日，她通电斥责蒋介石与苏联绝交的“自杀行为”。不久，她出席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并被选为会议名誉主席。以后，她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行前发表声明说：“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⑨她拒绝了戴季陶请她住到南京去的游说，坚持住

在上海。1930年又动身去欧洲。

1931年6月宋庆龄回国。她拒绝了国民党集团给她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中的要职，指出：“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并表示“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⑩。“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坚决反对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政策。同时她又指责国民党内当时正在争吵的宁粤两派“都以军阀为靠山，都在力争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欢心，而且都背叛并屠杀中国人民大众”^⑪。次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她热烈支持十九路军英勇抗日，与何香凝等设立国民伤兵医院，救治治疗受伤的士兵，并予以精神上的安慰与鼓励。这年12月，她联合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亲自担任同盟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同盟”以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为主要任务，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进行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1933年3月下旬，上海公安局勾结租界巡捕房逮捕了罗登贤、陈赓、廖承志等五人。宋庆龄积极组织营救，并于4月1日发表《告中国人民》一文，反对国民党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迫害反帝抗日战士，号召“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她与杨杏佛、沈钧儒等人亲赴南京，要求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废止滥刑，改良狱中待遇。她并亲自往卫戍司令部监狱探望罗登贤等人，给他们以极大鼓舞。她还以国际主义精

神，亲自出面援救被国民党政府扣押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帮助照顾他们的孩子。宋庆龄的这些活动，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极为恼火。特务们一直严密监视她的行动，多次向她投寄恫吓信。6月18日又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妄图以此来吓倒她。但她却发表声明说：“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即杨杏佛）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定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②

同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发表演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民族革命战争。她谴责国民党政府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赞扬工农红军愿与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宣言。她带头签名于中国共产党1934年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1935年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多年，她不但有许多共产党朋友，并与中共中央有直接联系。“一二九”前后，她曾帮助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同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③。1936年1月，她应中共中央的要求，设法安排护送美籍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到陕北^④。

“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潮流在全国高涨。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红军议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宋庆龄当选为该会的执行委员。国民党当局威胁要解散“救国联合会”。11月22日又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位“救国联合会”领导

人。宋立即抗议说：“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被逮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⑮第二年6月，她与何香凝等为了营救沈钧儒等七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7月法院审讯“七君子”时，宋亲自带人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

西安事变时，宋庆龄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出发，主张释放蒋介石。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为了团结抗日，出席了这次会议。她与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三人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并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孙中山的遗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改变其错误的政策。

芦沟桥事变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面对亡国论者散布的“中国必败”的悲观论调，宋庆龄于8月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她分析了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指出它“不够坚实，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土地广大，资源富有，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⑯。11月，她又发表《国共合作的声明》，赞同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团结御敌。

同年底，宋庆龄去香港。1938年6月，她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抗日战争的宣传和医药供应等工作。同盟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保卫中国同盟》双周刊，向全世界宣传抗日，介绍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

地，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援。同盟为抗日前线募集急需的医疗器械、药品和其他物资。宋庆龄以她崇高的声望和杰出的才智，几次在香港发起大规模的募集基金运动，争取到很多的同情者。她冲破国民党集团的封锁和阻挠，通过各种渠道把物资输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前线去，还组织和安排医疗队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救护工作。在她的不断援助下，马海德、白求恩、柯棣华等许多外国医生，先后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十一所国际和平医院、四十二个前方流动医疗队、八所医科学学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香港。宋庆龄转移到重庆，在那里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举行大规模募捐活动。她在重庆仍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但她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照样公开活动。她联络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并肩战斗。她争取到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的支持和帮助，由他派美国军用飞机运送急救物资到延安和其他根据地，从美军军用仓库里拨送医药用品给八路军、新四军，并派去美国军医。在她的影响下，“美国援华会”、“英国联合援华会”等外国友好团体，也都通过“保卫中国同盟”给抗日根据地一些援助。

抗日战争结束后，宋庆龄回到上海。1946年7月23日她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阻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她在上海组织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它的前身即“保卫中国同盟”，1950年8月改名“中国福利会”），开展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重点是儿童福利工作。她亲手创办儿童福利

站，给穷苦孩子治病、发放衣物和食品。并创办儿童剧团，给孩子们以精神食粮，使他们看到未来。为了救济解放区的儿童，“中国福利基金会”还设立了一个“中国儿童义养会”，专门为解放区的儿童筹募物资。

在解放战争期间，宋庆龄“千方百计地力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活动资金，支援民主运动，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募集药品和物资，支援解放战争”^⑭。她亲自出面，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其他半官方团体所提供的国际救济资金和物资中，为在抗日战争中出力最大、损失也最大的解放区，争取它们应得的一份。在运输条件十分困难，国民党特务肆意捣乱的情况下，她想尽一切办法，把救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区。

为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48年1月，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以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为首，在香港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被邀请担任名誉主席。

1949年5月，宋庆龄十分兴奋地迎接了上海的解放。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她发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欢呼“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⑮。9月，她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⑯。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先后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且担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会长，“中国福利会”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会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她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多次出国访问，参加国际活动。1950年宋庆龄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她把十万卢布的奖金全部献出，作为发展我国儿童和妇女福利事业之用。“中国福利会”1952年1月在北京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向世界介绍今日中国情况。她定期把《中国建设》寄给海外的朋友。三十年来，她为这个杂志撰写了三十多篇文章，其中六篇是介绍新中国的全面成就的。1953年，她的论文、演讲集《为新中国奋斗》出版。1957年11月，她随毛泽东等一道去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收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九岁。

注：

- ① 转引自路易·艾黎《回忆宋庆龄》。《中国建设》纪念宋庆龄特刊，1981年8月。
- ② 转引自邓小平同志在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人民日报》1981年6月4日。

- ③ 宋庆龄：《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页。
- ④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
- ⑤ 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同③，第11—21页。
- ⑥ 同③，第22页。
- ⑦ 宋庆龄：《中国目前的形势》。同③，第36—37页。
- ⑧ 宋庆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同③，第27页。
- ⑨ 宋庆龄：《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同③，第42页。
- ⑩ 宋庆龄：《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同③，第51—53页。
- ⑪ 同③，第52页。
- ⑫ 宋庆龄：《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同③，第79页。
- ⑬ 曹靖华：《点滴忆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
- ⑭ 石肖岩：《一份宝贵的资料》。《中国青年报》1981年6月4日。
- ⑮ 宋庆龄：《为沈钧儒等人被捕而发表的声明》。同③，第98页。
- ⑯ 宋庆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同③，第120页。
- ⑰ 张执一：《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人民日报》1981年6月5日。
- ⑱ 宋庆龄：《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同③，第185页。
- ⑲ 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同③，第190—192页。

陆 皓 东

江绍贞

陆皓东名中桂，字献香，号皓东，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1868年9月30日（清同治七年八月十五日）生。他父亲陆晓帆一向在上海经商。

陆皓东与孙中山是同乡，两家相距不远，两人年龄相若，从小交好。陆八岁入乡间私塾读书，因喜爱图画，遭到塾师责备，他理直气壮地反问说：“图画也是读书的事，为何禁止？”^①塾师无词以对。表现了他从小就能明辨事理和刚强的性格。

1883年秋，孙中山由檀香山回国返里，陆皓东与孙的交往更加密切。他从孙中山那里接受了许多欧美科学文化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孙在家乡宣传政治改革，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和社会风俗的不良，也使陆十分赞佩。一天，他俩为破除迷信，将村庙北极殿中的神像砸毁，为豪绅地主所不容，于是年11月被迫离开家乡，避往香港。

陆皓东与孙中山到香港后不久，一起加入基督教。之后，孙留在香港读书，陆到上海，入上海电报学堂学习。毕业后在上海电报局任译电员，后升任领班。

1890年，陆皓东由上海回籍完婚。其时，孙中山正在香港、广州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探求革命救国的途径，陆皓东遂留下参加他们的活动。1893年冬，孙中山召集陆皓东、尤

列、郑士良、程奎光、程璧光等人在广州广雅书局抗风轩开会，筹划创设革命组织，决定以“驱逐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因人数不多，没有形成具体组织。

此时，陆皓东与孙中山等人虽然开始筹建革命组织，准备实行反清革命，但仍未放弃和平改良的希望。1894年初，陆随同孙回到故里，帮助孙草拟上李鸿章书稿，要求学习西方，改革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以求国家富强。2月，他随同孙中山一道北上投书。到达天津后，虽多方奔走，未得到李鸿章的接见，上书也未被理睬。他俩快快而返，从此放弃和平改良的幻想，一心从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是年冬，孙中山往檀香山创建兴中会，陆皓东留在香港，与陈少白等人从事革命联络工作。

陆皓东等人在香港的工作为建立革命组织创造了条件，孙中山于1895年1月底回到香港，筹建兴中会总部。2月，兴中会总部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正式成立，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该会制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把革命斗争的锋芒明确指向腐朽的清王朝政府，并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因此，香港兴中会总部一成立，立即策划武装起义。3月，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战败求和，民情激愤，兴中会总部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发动武装起义，袭取广州做革命根据地。陆皓东首倡绘制青天白日旗做为起义的军旗。

起义方针既定，陆皓东与郑士良等随同孙中山到广州筹备，在双门底的王家祠设立革命总机关，对外用“农学会”名义作掩护，由陆负责主持这个机关。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联络了三

元里的团防，北江、西江、汕头、香山、顺德一带的会党，以及城内外防营、水师的部分官兵。至8月底，起义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遂择定10月26日（旧历九月初九）起事。他们想利用重九这天回乡群众结队祭扫祖墓的风俗，乘机运械聚合。革命总机关决定：由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协助孙中山在广州指挥调度；杨衢云在香港集合会党充当突击队，于起义当日清晨进攻广州城内各重要官署；其他各路分途响应。

10月26日清晨，各路首领均往总机关领取命令口号，唯独充当主力的香港队伍未到。等了两个小时，始得香港队伍不能按时出发的电告，起义计划被全盘打乱。孙中山考虑到既失误了约定的日期，难免走漏风声，除通知香港队伍停止出发外，并命各路队伍回去候命。第二天，起义事机果然泄漏，两广总督谭钟麟急调兵千余名回城加强防卫，并派大批军警四出搜捕党人。陆皓东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安排机关的人员转移。他自己最后离开机关，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党员名册不知是否已由经管同志带走，决定返回察看处理。同行的同志以形势危险，极力劝阻。他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着名册株连，我党岂尚有余类。我个人冒生命危险去保全多数同志，实分内事。”^②言毕毅然返回。到机关后，军警果然接踵而至，将机关严密包围。陆皓东迅速紧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烧毁，待军警破门而入时，名册已成灰烬，陆则从容就捕。

陆皓东被捕后，清吏对他严刑审讯，妄图从他口中得知同党名单。他坚贞不屈，当庭直书，痛斥“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贪官污吏，劣绅腐儒，腴颜鲜耻，甘心事仇”；复慷慨陈辞：“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

尽杀!”^③清吏气急败坏，对他施以钉手足、凿牙齿等种种酷刑。他多次死而复苏，始终不屈，并严厉诃斥清吏：“你们可以严刑加我，但我肉痛而心不痛，其奈我何！”^④11月7日陆皓东被杀害。

陆皓东为了推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孙中山后来称誉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的第一人”^⑤。

注：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编：《革命先烈传记》第162页。

② 同①，第168页。

③ 邹鲁：《乙未广州之役》。《辛亥革命》（一），第229页。

④ 同①，第170页。

⑤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3—194页。

杨 振 鸿

高光汉

杨振鸿，字秋帆，笔名志复、福升。1874年11月2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生于云南昆明东郊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在家参加生产劳动。他富于反抗精神，言词锋利，常常据理反对地主和官吏的无端敲榨勒索，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也招致官府的迫害。在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官府曾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逮捕监禁。在狱中，他坚持不屈，同时以极大的毅力自学文化，知识大增。因为没有治罪的证据，官府不得不将他释放。杨振鸿出狱以后继续刻苦自学，不久就取得了县学生员的资格。^①

年轻的杨振鸿目睹清政府的腐朽、卖国，以及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立志要为救国救民而献身，正如他这一时期写的一首《述怀》诗中所说：“欲起神州文弱病，拼将颈血溅泥沙。头颅断送等闲事，一点泪痕一树花。”^②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时，云南也传出法国侵略者阴谋伏兵昆明，一举夺取云南的消息。云南人民无比愤慨，昆明汇合了一千多人的群众队伍，捣毁了平政街等处的法国天主教堂。全省许多州县也纷纷打毁教堂，驱逐教士。杨振鸿带领群众积极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的斗争。后来他于1907年3月在《云南杂志》发表的《法国窥伺云南之渐》一文中，回

述这次斗争“是吾人之将亡复存将死复生之一大关头”。对于腐败的清政府屈服于法国压力，反以“赔偿教堂损失”十五万两来了结此案，他愤怒地斥责说：“世界何有公理，黑铁赤血而已！”又说：“凡我滇人，此后宜群策群力，万众一心，及时谋防御之策，救卫之方。”否则，一千多万云南人民就将“狂呼哀号于法人之刀头马蹄，求生而不得”^③。他还指出，国家之所以“被外人分攘割据者，非外人能为之，乃官吏之卖我以为之也”。他认为：“欲御外寇，先杀内奸。”^④

1903年，杨振鸿赴日本留学，先考入振武学校学习军事，1905年毕业后又考入日本陆军测量部学校继续深造。在此期间，他一面学习军事科学，一面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同盟会筹建期间，杨振鸿受孙中山接见，聆听了孙中山关于建立革命组织的计划。之后，他常与孙中山、黄兴等人来往，积极参与建立同盟会的工作。在杨振鸿及其他同志的带动下，东京首批加入同盟会的云南籍会员就有五十多人，为辛亥云南起义初步奠定了干部基础。^⑤

1905年，杨振鸿在东京写了《敬告滇中父老兄弟书》寄回云南，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号召人们同心协力，奋起救国。他还不断寄回《民报》、《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革命书刊，传播革命思想。经过杨振鸿及其他同志的宣传鼓动，在昆明的一些爱国青年先后建立了“兴汉会”、“滇学会”、“誓死会”等组织，并分赴云南各地，宣传革命。

1906年1月，孙中山和黄兴邀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赵仲和罗佩金五人商谈筹办《云南杂志》。经过大家努力，4

月,《云南杂志》社正式成立。自1906年至1911年,共刊行二十三期,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发动起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杨振鸿为《云南杂志》写了大量文章。云南曾有人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题名《暮鼓晨钟》翻印散发,广为宣传,又选载于《滇事危言》等书里,以期唤醒云南人民。

1906年3月,杨振鸿受同盟会派遣回国建立云南分会,任主盟人。他考察法国对云南的侵略情况,从河口到昆明,对滇越铁路沿线作了详细调查,写出《滇越边务及铁道之实况》的调查报告,深刻揭露法国的侵略罪行,号召云南人民奋起斗争,以避免当亡国奴的危险。

是年夏天,杨振鸿回到昆明,见到云贵总督丁振铎。他对丁讲述了英、法两国侵略云南的严重性,提出整顿军备、加强边防的建议,并要求分配他去军队工作。丁振铎未予置理。不久,他打算趁丁振铎参加云南清军阅操之机刺丁,举行起义。由于清军戒备森严,计划未能实行。6月,他在昆明创办体操专修学校,从全省招收青年三百人入学,暗中培养革命骨干。他亲自讲课,对学生灌输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每天清早还亲自带操,和学生打成一片,深受青年学生的敬仰。

9月,杨振鸿在昆明创设“公学会”,又在云南一些州县设立分会,以“开拓社会文明”、“增进国民幸福”和“拯救本省危局”为宗旨,并要求清政府拒绝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无理要求。^⑥为了启发群众觉悟,他亲自到昆明街头讲演,痛陈云南丧失路矿权益的情况,声泪俱下,听众无不为之感动。因此,他的名声更大,威信更高,同时也就更加引起清政府对他的注意,丁振铎派亲信对他进行监视盯梢。为了回击敌人,他策动

留日学生和旅日同乡会揭发丁振铎在云南的罪恶，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将丁调离云南。丁振铎为了遏阻革命和打击杨振鸿，赶在去职前把杨调出体操专修学校，派往腾越厅（今腾冲县）任巡防营管带。当时许多人劝杨不要去，可是他执意要去。他认为保卫边防是自己的职责，而且此去远离省城，少受牵制，正好发展革命的力量。他带着体操学校学生董鸿勋等人，于是年冬赶往腾越厅上任。

杨振鸿到巡防营上任不久，就发展了张文光等一批青年加入同盟会，使革命势力扩展到滇缅边界一带和旅缅华侨中；同时抓紧整顿边防，严肃纪律，加强练兵，打击英国对我边疆地区的侵略破坏活动，保卫边境安宁。

其时，腾越厅属盏达（今盈江县莲山镇）土司刀思必治死亡不久，腾越镇总兵李宝书和迤西道台关以镛收受贿赂，武装支持不得人心的刀思鸿祺强行继位，遭人民反对。事件发生后，李、关命杨振鸿带兵镇压。杨竭力反对。他在取得腾越厅同知龙文的支持后，只身前往盏达，首先宣布刀思鸿祺继承无效，然后与当地人士充分协商，切实尊重民意，让群众另行公举有威信的刀思必发继承土司职，完满地解决了土司承袭问题，加强了民族团结和统一，使贪官污吏的屠杀计划和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未能得逞，也为日后在这一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奠定群众基础。^⑦

不久，杨振鸿拟定了一个起义计划，准备于1907年6月在腾越起义，得手后攻取永昌府城（今保山），再进图大理与昆明。这时，反动官吏及土豪劣绅为土司承袭事件而迁怒于杨，一面散布匿名信件诬杨“将武装叛变”，一面又勾结英国领事

电告督署，诬杨“破坏邦交”。督署接电，即刻撤掉杨振鸿的职务，表面上命他回昆明“候委”，暗地里却密令就地处决他。杨得到消息，取消原拟起义计划，一面致电督署批驳敌人的诬陷，并假报回省日期，一面立即取道缅甸，脱离险境。当局得知他已离腾赴缅，便急令通缉，派人四出堵截，并请英国领事致电英缅政府帮助缉捕。由于他勇敢机智，又得同志多方帮助，终于使敌人的捕杀计划完全破产。^⑧他经由缅甸到达日本，参加同盟会云南分会的领导工作。

1908年4月，孙中山、黄兴发动云南河口起义。消息传到日本，杨振鸿等急谋回滇参加战斗。接着又传来清政府向法国借兵镇压起义的消息。杨立即在东京主持召开有七千多人参加的“云南独立大会”，并发表激昂的演说，痛斥清政府的暴行，宣布他和云南全省人民同清王朝断绝关系，表示要同敌人奋战到底。会后，杨带领一批革命青年启程回国，准备投入河口起义军。不料，他们抵达香港时，闻悉河口起义已经失败。他们当即改变计划，一面派人返回日本，建议同盟会云南分会开办“速成军事讲习会”，培养军事干部；而杨振鸿等则转赴缅甸仰光，在旅缅侨胞中发展革命力量。

杨振鸿到达仰光后，除了积极发展同盟会会员以壮大革命组织外，还同居正、吕志伊等人创办《光华日报》，大力开展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

是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亡。杨振鸿认为这是武装起义的好时机，便立即回到云南干崖（今盈江县城），与黄毓英等革命者筹划起义。消息传到昆明，云贵总督锡良悬赏五万两捕拿杨振鸿。杨不顾个人安危，仍然日以继夜地进行

工作。他这时身患疟疾，但仍抱病跋涉于滇西峡谷和怒江两岸，发动群众，组织起义。他们计划先以农民组成“敢死队”攻下永昌府，然后扩大三军，一军回攻腾越，巩固后方基地；一军取大理攻打昆明；一军出顺宁（今凤庆）、云州（今云县），进军滇南；待全省光复后，再出师川、黔，进图中原。方针既定，他和何畏、黄毓英等各自分头准备。

12月31日，杨振鸿到达永昌府城外的马岭寨。入夜，起义战斗打响，杨亲自登城指挥。由于起义军纯系农民临时组合，未加训练，人数又少，武器弹药缺乏，很快就失败了。杨振鸿等人退回马岭寨，以图再举。但喘息未定，敌军追到，形势十分危急。杨于忧急之下，病势加重，吐了很多鲜血，不得已连夜率同何畏、何兴、杨毓铨、彭冀等多人离开马岭寨。第二天到达何家寨，住何兴家调养医治。但终因操劳过度，缺医少药，于1909年1月2日去世。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他为“左将军”。

注：

- ① 杨振鸿被捕和出狱，以及取得县学生员资格的确切时间，现有史料难以确定。根据李根源、吕志伊等的回忆文章，结合当时云南斗争形势，初步判断他被捕的时间大约在他二十岁左右，即甲午中日战争到义和团运动之前这段时间。至于取得县学生员资格的时间，当在出狱一段时间后至1903年考取官费留学生之前。
- ② 《秋帆遗诗》。《杨振鸿张文光合刊》。
- ③ 《法人窥伺云南之渐》。《云南杂志》五号，1907年3月。
- ④ 《滇官吏媚外之丑状》。《云南杂志》九号，1907年9月。
- ⑤ 张天放、于乃仁：《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的杨振鸿》（未刊稿）。
- ⑥ 《公学会之成立》。《云南杂志》六号，1907年7月。

- ⑦ 《办理盖达案件述略》。《云南杂志》十一号，1907年12月。
- ⑧ 《杨振鸿被诬始末记》。《云南杂志》七号，1907年7月；《腾越之镇道因办理盖达土司承袭案诬陷杨振鸿》。《云南杂志》十一号，1907年12月。

龙 鸣 剑

曾绍敏

龙鸣剑原名骨珊，字顾三（顾山），号雪眉，四川荣县人，生于1877年5月14日（清光绪三年四月初二）。父龙章又名得江，在本县五宝镇经营油坊。龙鸣剑九岁丧父。其四伯龙沛然出仕云南，官至知府，是龙鸣剑入校读书的资助人。

龙鸣剑幼年在本地读私塾，学习勤奋，深得塾师嘉许和学友的钦佩。后游学嘉定（今乐山），年十九举秀才。1905年，龙鸣剑进入成都优级师范学堂读书。在这里，他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思想日趋激进，因抨击时政，被学堂当局斥退。龙鸣剑愤然离开学堂，剪掉发辫，决心向旧势力挑战。

1906年，龙鸣剑去北京考察政俗，对清政府的腐败深有感触，亲书北京现象为“高墙丰上激下，水潦一至，倾败随之”^①。旋即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他发奋钻研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学说，对革命的信念与日俱增，曾愤慨地说：“吾国不革命，不可与新命！”^②随即加入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

1907年，同盟会东京本部发生分裂，会员刘师培妄图夺取干事职权，竟然诬陷孙中山，欲排斥孙，改组同盟会本部。龙鸣剑得知，怒不可遏，首揭其奸，指出：“大行不顾细检，此本

奸谋，旦夕当暴露”^③，积极维护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领袖地位。

同年，川籍同盟会员王仰思、秦彝鼎等人回云南发动革命，四川革命同志于东京锦江春饭店为他们饯行。席间，龙鸣剑引吭高歌，慷慨悲壮，满座为之感动。事后王仰思写信给吴玉章说：“锦江春之宴大有‘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振’之概，毕生难忘。”^④

年末，《四川》杂志在东京创刊，它以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为宗旨，是当时深受人们欢迎的刊物。龙鸣剑为《四川》杂志撰写《党祸论》一文，达七千余言，申革命大义，切中时弊。

1908年3月，河口起义失败后，龙鸣剑奉命回国开展革命工作。他远涉南洋，途经越南，于这年冬天进入云南。在归国途中书写“粗识轩辕奏乐章，九死南荒吾不恨”^⑤的诗句，表达了他愿为革命献身的精神。龙到云南后，奔波于滇南的盘山小路上，备尝艰辛。1909年春，离滇回川，在成都以创办法政学堂为掩护，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所法政学堂实际上是当时四川同盟会的秘密机关，是革命者和爱国人士聚会的一个重要据点。10月，四川谘议局成立，龙鸣剑被推选为谘议局议员。他和程莹度等同盟会员“奉有使命暗中活动，乘机在谘议局内鼓动甚力”^⑥。清政府铁路国有的“上谕”传到四川，全川人民愤慨异常，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龙鸣剑利用谘议局议员的合法地位，激烈地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立宪党人邓孝可为迎合清廷，力主铁路国有，在一次会上演说：“川民程度远不如湘鄂，湘鄂争可也，川人争不可也。”龙鸣剑驳斥说：“一般人民程度本不相远，蜀人能争与否，此视提倡者

能力如何。吾蜀固亦人也。”^⑦语毕，赞成之声满座。

龙鸣剑与同盟会员王天杰等人密切注视保路运动的发展，“知此事非文电所能争也”，采取了与立宪派“明同暗斗”策略，“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⑧，主张将运动导致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龙鸣剑和其他革命党人，一面动员群众进行公开的合法斗争，一面联络会党，组织群众准备武装起义。龙鸣剑接受成都同盟会会员的委托，于1911年8月4日（农历闰六月初十）同王天杰、秦载赓等人在资州罗泉井召集会议，商定武装起义方略，决定派人到各地去进行发动和组织，并决议在农历七月间各地同时或前后起义。罗泉井会议结束后，龙鸣剑回成都，在四圣祠召开秘密会议，亲自作报告。又冒着盛暑，奔走四川各地，作武装起义的动员组织工作。他在起义前写了一幅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⑨表达了他对反清斗争的必胜信念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同年9月初，四川保路风潮越来越大，形成“万众附和”的罢市、罢课群众运动，使清朝统治者预感到“现在事机万分危迫，民气甚固”，“大局尤不堪设想”^⑩。四川总督赵尔丰为了镇压群众运动，于9月7日逮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首领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九人，开枪屠杀和平请愿的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龙鸣剑认为革命时机已成熟，应立即进行武装起义。他四处奔走，驰檄飞笺，传递成都消息，号召各地起义。同时他急驰成都城南农事试验场，与同盟会员朱国琛、曹笃等人商议，裁木板数百块，在上面书写成都业已发难，望各地同志响应，速来救援的字样，涂以桐油，投入江中，人们称之

为“水电报”。“水电报”顺江而下，消息很快传遍沿江各州县，于是各地相继而起，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运动。

龙鸣剑发了“水电报”，就星夜兼程赶回荣县，数日内集结民军一千余人，同王天杰率民军北上攻打成都。临行，荣县人民张灯结彩，燃放鞭炮，热烈欢送这支反清义军。出荣县城北门时，龙鸣剑激昂慷慨，拔剑起誓：“此行不捷，吾不复入此门矣！”^⑪大大鼓舞了民军的斗志。义军启程后，沿途参加者甚多，行至荣县双古镇已达三千余人。龙鸣剑同王天杰在双古镇对民军进行了整编。随后与秦载赓率领的起义民军会师，组成东路民军总部，众推秦载赓任东路民军统领，王天杰任副统领，龙鸣剑任参谋长，继续向成都进发。队伍在中兴场、中和场、苏码头、铁庄堰、煎茶溪、秦皇寺等处，同清军进行了大小二十余次战斗。龙鸣剑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指挥作战，欲“拼一死以谢天下豪杰”^⑫。在他的带领下，广大民军莫不英勇杀敌。后因军粮告罄，装备悬殊，战斗失利。于是东路军乃决定分兵向各州县发展。

龙鸣剑和王天杰率兵转战嘉定、宜宾一带，议定龙在嘉定建厂制造枪炮炸药，王天杰回荣县整理民团。王天杰率部分民军回荣县，荣县知县李樂春闻风而逃。王天杰等人同吴玉章计议，决定建立革命政权，以瓦解清王朝的统治，于1911年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龙鸣剑在嘉定闻讯，非常高兴，飞马回荣县。是时端方已至资州（今资中），命叙府（今宜宾）巡防军攻荣县。龙鸣剑认为“自流井属叙（府），叙防（军）去（自流）井必空，捣叙，防军必还救，荣（县）围必解”^⑬。为了保卫荣

县独立，民军决定行“捣叙救荣之计”。这时，龙鸣剑在戎马征战中已积劳成疾，身染重病，但他在家只小住了几天，即带病冒险突围至宜宾地界，聚集民团数千人，分前后两路向叙府进发，龙鸣剑自督后路。当前路军将抵叙府时，龙鸣剑得知清军攻下离荣县城六十里的程家场的消息，甚为忧愤，吐血数次。随后病情更加恶化，于1911年11月26日在宜宾徐场杨湾赵家大院含恨而死。

龙鸣剑病危时，倚枕急书，表明自己“不愿苟生，愤而起与（清）政府宣战，理势迫之使然”^⑭。他临死的那天早晨，倚栏小望，涕泪如流，为王天杰规划了求贤、筹饷、练兵、造械、保民、慎行等六策。每条约三百余言，最后并书绝命诗一首。入葬那天，荣县、宜宾两地群众万余人自动前往悼念。

注：

- ① 范遇鸿：《先烈龙君鸣剑事略》。《雪眉诗集》第1页。
- ② 《荣县志》人士第八，第113页。
- ③ 同①，第2页。
- ④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44页。
- ⑤ 龙鸣剑手稿。
- ⑥ 唐宗尧：《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同志会发生始末的片断回忆》。未刊稿，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⑦ 同①，第3页。
- ⑧ 唐宗尧、胡恭先：《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02页。
- ⑨ 原件已佚，据吴伯良、龙仕信口述。
- ⑩ 《广益丛报》第九年十七期“纪闻”第13页。
- ⑪ 《荣县志》人士第八，113页。
- ⑫ 同①，第4页。
- ⑬ 同①，第5页。
- ⑭ 龙鸣剑：《最后家书》。同①，第34页。

王金铭

梁旭毅

王金铭，字子箴，1880年6月23日（清光绪六年五月十六日）生于山东武城县。他父亲王成耕种祖遗的七亩半地，不足赡养全家十一口的生活，以高利借来一点资本，作买卖土布的小本生意。

王金铭八岁入私塾读书，勤奋好学，喜爱阅读《说岳全传》、《三国演义》等小说，培植了他的民族意识。1896年十七岁时，进本地洪瑞钱庄当学徒，备受东家的苛待。

1898年，王金铭离开家乡，到天津小站投奔在新军中的大哥王金镜，旋应募加入北洋常备军左镇第三协第七标前营。王为人正直，不染恶习，不久即被提升为棚的副目。1900年随新军调往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后，被提升为左哨哨长。1905年，调任北洋第五镇第十八标一营前哨哨官，驻扎在济南千佛山下。1907年，升为第一混成协第七十九标第一营营副，队伍开到奉天，驻扎于新民府。

王金铭在军中常以岳飞的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则天下治矣”作为座右铭。这时候，同盟会员孙谏声、戴锡九等，已先后打入北洋新军任下级军官，在官兵中秘密散发革命书刊，传播革命思想，策动起义。由于王金铭品行端正，足智多谋^①，成为革命党人争取的对象。他阅读了《扬州十日

记》、《嘉定屠城记》等书刊，又结识了施从云、冯玉祥等倾向革命的下级军官。他们于1910年春发起组织“武学研究会”，以读书研究军事为名，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同年9月，王金铭所在的第一混成协与奉天巡防中路独立第一、二标合编为第二十镇，不久王升任管带。由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对革命持同情和赞助态度，参谋长刘一清是同盟会员，因而为武学研究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参加武学研究会的官兵愈来愈多，风声过大，受到该镇反动军官的疑忌。为了掩护革命活动，王金铭、孙谏声等山东籍的官兵，又发起组织“山东同乡会”，举第四十协统领潘渠楹任会长，以遮人耳目；王金铭为副会长，负实际责任。他们利用这种合法的组织形式，广泛开展革命活动，把外省籍的施从云、冯玉祥等人吸收为名誉会员，并把武学研究会的骨干分子全网罗到“山东同乡会”内。他们分赴奉天、北京、天津、唐山等地联络革命同志，在唐山设立“山东同乡会”暗作机关。

1911年9月，第二十镇的一个混成协奉命参加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秋操。队伍行抵昌黎县崔庄时，武昌革命爆发，清廷电令停止秋操，队伍暂驻滦州，旋又下令该镇赴武汉攻打民军。王金铭、冯玉祥、施从云及广大士兵获悉这一消息后，要求统制张绍曾率部起义，进攻北京，推翻清政府。张绍曾不敢接纳他们的要求，但也不愿去武汉攻打民军，决定拒绝受命，在滦州按兵不动，并联合蓝天蔚等人，向清廷提出十二条立宪政纲。清政府表面上接受他们的立宪要求，于11月3日颁布《重大信条十九条》，但接着于11月6日下令解除张绍曾第二十镇统制的职务，削去他的兵权。王金铭、施从云等

得知这个消息以后，立即在文庙召开七十多人的会议，挽留张绍曾，力请张率部起义。这时张看到与他联合起义的吴禄贞已被刺身亡，自己势孤力弱，乃借口养病，避往天津租界。

张绍曾去职以后，接任第二十镇统制的潘榘楹是一个反对革命的将领。他为了拆散革命力量，把全镇部队分散驻于葫芦岛、海阳镇、锦州、临榆等地，滦州只留驻第七十九标，而标统岳兆麟也是个反动军官。他们密布侦探，监视革命官兵，禁止自由往来。但王金铭和施从云、冯玉祥等继续领导革命官兵坚持斗争。王金铭密派郭凤山赴天津，与革命党人王葆真、孙谏声、董锡纯等酝酿滦州起义计划。其时，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学校一批师生已组成革命团体“共和会”，派凌钺、张良昆、于树德等人到滦州来运动新军。王金铭、施从云等乃与共和会会长白毓昆及凌钺、孙谏声等人秘密会见，商定了滦州起义计划。

12月下旬（夏历十一月初），王金铭潜赴海阳镇，把滦州和南方联络的情况以及白毓昆和王葆真的意见，告诉冯玉祥。他们认为京奉线一带革命实力单薄，主张密约烟台民军由海道自秦皇岛登陆，支援海阳镇和滦州的起义；又商议了配合民军登陆的起义计划，分头布置，只待民军登陆即行发动。

王金铭从海阳镇返回滦州时，白毓昆已先带着“中华民国军政府北军大都督之印”，率领二十多个敢死队员来到滦州，公开宣传起义，全城家喻户晓。王金铭一见大惊，因为烟台民军未到，还没有与各方联络妥善，起义日期也没有约好。可是起义已经公开宣布，无法挽回。他们便于12月30日在北关师范学堂营部召开会议，决定起义部署，并推举标统岳兆麟

为北军大都督。他们明知岳“反对革命甚力，借此饵而诱之也”^②，会后并把起义的全盘计划告诉了他。当天晚上，他们又以第四十协官长吕兵署名，发出主张共和的通电。

可是，岳兆麟并没有被王金铭、施从云说服，他于第二天早晨逃往开平，向通永镇守使王怀庆告发，把起义的计划全部泄露。王怀庆立即电请直隶总督陈夔龙转报袁世凯。袁采纳陈夔龙的献策：一面派王怀庆赴滦州“劝解抚慰”、“察其真象”；同时“收束兵队”、“密筹抵御”^③。1912年1月1日，王怀庆来到滦州，采取软硬兼施、威胁恐吓的手段，以求达到“顺机消弭”的企图。王金铭义正辞严地驳斥王怀庆说：“清廷误国殃民，罪已昭著，海内志士，同举义旗，凡有血气，皆当振臂兴起，光我民族，……我辈宣言独立，词义正大，心之所至，万死不辞。”^④同时立刻派人把王怀庆监视起来，并以大都督之职饵诱王怀庆参加起义。王假装接受，暗中却与第三营管带张建功勾结，1月2日早晨佯称入城就职，途中在张建功掩护下逃跑。

王怀庆逃走以后，王金铭、施从云等人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推举王金铭为北军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部长，孙谏声为军政部长，凌钺为外交部长兼敢死队长。^⑤当天王金铭宣誓就职，正式宣布“直省独立于滦州”^⑥。滦州全城张贴独立布告及“王大都督布告赏罚十六事”，以安民心，并通电全国宣布独立，发表对内对外宣言。

军政府原定独立的第二天即1月3日直取天津，由于接到王怀庆伪造的南军从秦皇岛发给王金铭的电报，决定暂缓

出兵，等待来援。等到1月4日还未见南军开来，才明白是中了敌人的诡计，乃于当日誓师，发出檄文。下午五时许，起义军正准备登车出发，张建功图穷匕首见，踞城叛变，射击第一、二营官兵。王金铭下令还击，双方相持约两个小时。王金铭等决定放弃滦州城，直取天津，乃率领第一、二营官兵及敢死队员共七百余人登车前进。当晚十二时许，火车行驶到雷庄附近，突然脱轨。原来，王怀庆已电请袁世凯调了第三镇第十二标增援，在雷庄设防，拆去一段铁轨，并布置炮队一营，截击起义军。王金铭指挥全军下车，与敌军激战约两小时。敌军鸣号停战，派人请王金铭、施从云到雷庄议和。他俩当即答应愿往，众官兵阻止，认为王怀庆诡计多端，恐遭毒手。王、施认为：“如果和议能成，双方免受无谓的牺牲，一直可攻京津；如出意外，以身殉志，求仁得仁，有何憾焉。”^⑦官兵纷纷报名同去，王、施率领一百多官兵到达雷庄，敌人伏兵四起，把他们包围逮捕。王怀庆致电袁世凯邀功，袁电令首先杀王金铭。王金铭临刑时挺身叉手，大义凛然。清廷统带汪学谦责备他说：“清朝待恩厚汝何故反耶？”王金铭怒斥说：“汝非黄帝之苗裔耶？胡为出此言也！满人以异族入主华夏垂三百年，宰割我土地，鱼肉我人民，凡有血性人人欲得而诛之，何反之有！”^⑧这时王金铭看见他的马弁刘荣在旁边，便对协统陈文运说：“若无罪，可纵之去。”刘荣说：“予随大都督上阵杀贼，今不幸被困，生死同也，都督死，吾何生为！”^⑨遂同时遇害。

王金铭死后，灵柩存于雷庄，一个月后，他的好友连之铎将其移到天津，后来他的胞弟王金钰又把灵柩移到山东，安葬于武城县。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后，于北京中

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为王金铭、施从云铸立了铜像,像的基石上刻有滦州起义始末及烈士殉难的经过。以后冯又在泰山为王、施建祠立碑。

注:

- ① 冯玉祥:《我的生活》。天津民国日报社1946年5月版,第一本第94页。
- ② 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46页。
- ③ 《直隶起义清方档案》。同②,第377页。
- ④ 同②,第348页。
- ⑤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册第972页。另见凌钺:《关于滦州起义史实之辨正代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台北版,第269页。
- ⑥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华书局1948年8月版,第152页。
- ⑦ 刘骥:《滦州起义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二期第59页。
- ⑧ 罗正纬编:《滦州革命先烈事略》。同②,第365页。
- ⑨ 同②,第365—366页。

附记:本文曾参考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有关资料。

罗福星

林其泉

罗福星，字东亚，号国权，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人，1884年2月25日（清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南洋爪哇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其祖父罗超六（耀南）为南洋华侨，曾在南洋和祖国台湾参加修筑铁路；其父罗经邦，自幼跟罗超六到南洋，因体弱多病，没有固定职业。罗福星刚周岁时跟随父母迁回广东老家，六岁启蒙，十岁跟祖父再去巴达维亚，入当地华侨办的中华学校就读，1902年7月毕业。次年跟随祖父来到台湾。

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领土台湾。罗福星到台后，在日本人办的学校里读书。他饱尝奴化教育的痛苦，目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暴虐，产生了反抗思想，萌发赶走日本侵略者收复国土台湾的志愿。由于不满日本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罗福星一家于1906年2月抛弃家产，内渡回广东。路经厦门时，罗福星遇见在巴达维亚中华学校读书时的老师和同学，由老师介绍参加了同盟会。

罗福星回到广东老家后，在小学当体育教员。此时，曾于1895年在台湾倡建“民主国”开展反割台斗争的台湾绅士丘逢甲，任广东全省学务公所参议，得知同乡晚辈从台湾回来，十分高兴，乃聘罗福星为广东视学兼广州府中学堂监督，并于

1906 年底 1907 年初派他到南洋爪哇等地考察华侨的教育工作。

罗福星到南洋,受到当地侨胞的欢迎,1908 年春被聘为新加坡华侨办的中华学校校长。罗在那里向华侨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华侨关心祖国革命事业。这期间,他以中华学校校长身份,经常来往于新加坡、缅甸和巴达维亚之间,并担任同盟会设在缅甸的“书报社”书记,从事革命党的宣传活动。

1910 年,罗福星从新加坡转到爪哇,担任巴达维亚华侨办的中华学校校长。那时候,孙中山、黄兴和胡汉民等曾先后到南洋一带发动华侨参加革命工作。罗同他们取得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指导。

1911 年春,同盟会组织领导广州起义。西荷印机关部集结十七人回国参加。罗福星毅然辞去中华学校校长职务,先到香港,后于 4 月 27 日上午潜回广州,参加这次起义。罗随黄兴袭击两广总督署衙门,奋勇杀敌。这次起义不幸失败,许多革命党人英勇牺牲。罗福星也为流弹所伤,后脱险潜离广州,经香港与胡汉民一起到暹罗,又去巴达维亚找黄兴,请求分配任务。

是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黄兴电嘱罗福星在南洋华侨中招募义军,作为革命后援力量。罗即在巴达维亚组织二千多华侨参加民军,启程回国。他们先到广州,向广东省都督胡汉民领取武器、弹药后,乘军舰北上,12 月经上海到苏州。后因南北和议已成,新政府又财源不足,民军不得不奉命于 1912 年 2 月解散,陆续踏上归程。罗福星于 3 月 6 日离开苏州,经上海回广东老家,任大地学校校长。

辛亥革命后，祖国大陆人民更加怀念和关注台湾同胞。许多人主张去台湾发动同胞赶走日本占领者，福建都督府也计划派人去台湾活动。罗福星自告奋勇，于1912年12月再度来到台湾。

到台之前，罗福星于5月中旬会见孙中山，表示自己的决心。孙中山鼓励他说，台湾是中国领土，要决心收复，但得讲求方法。到台后，罗注意贯彻孙中山的指示，打扮成商人模样，以台北大稻埕大瀛旅社等处为活动基地，寻访旧日同游，集结抗日同志，向他们介绍祖国大陆的革命情形，宣传革命道理。罗对他们说，日本在台湾“蔑视及虐待本岛人民，课重税，夺产业，使失生计之途”，本岛人民“今尚不觉醒，则前途将益形暗淡”。“台民系中国人，实无长久屈服于日本之理。应于岛内纠合同志，待机来临，蜂起于各地，杀退日人，驱逐于岛外，以脱离悲境”。^①

罗福星联络抗日爱国志士，组织同盟会支部，对外用“华民联络会馆”名义开展活动。他和刘士明、江亮能、彭云轩、邱维藩、林达荣等十二人被称为“十二志士”，在苗栗建立领导机关，以地势险要的大湖为根据地，并派出同志分赴南北各地，设立同盟会分部。他们还同当时在台组织“共和联络会馆”的吴颂贤等人密切配合，共谋大举。

在罗福星等人的努力下，台湾抗日斗争的形势发展很快。他们以同盟会为统摄，以华民会、三点会、革命会等组织为外围。为了避免引起日本统治者的注意，各地的组织都用神明会、观音会、父母会、兄弟会、老人会、同胞会等名义。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台北到台南有一千五百多人参加了同盟会及

其外围组织。同时，罗还派人同新竹的张火炉、台南的李阿齐、东势的赖来以及南投的陈阿荣等人领导的抗日组织取得联系，并同大陆沿海各省以及海外华侨中的同盟会组织联络，以争取他们的配合与支援。为了便于联络和传递消息，罗在同盟会会员和抗日同志之间使用了许多联络暗号，如以“君子”、“杂货”称十二志士，以“母氏”称孙中山，以“婶母”称黄兴等等。

1913年4月21日，罗福星等人在苗栗召开了台湾同盟会支部的代表大会，动员革命同志做好准备，迎接抗日起义。会后他们以十二志士的名义发表了《大革命宣言书》，列举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同胞血腥统治的各种事实，指出：“自日本亡我台湾以来，夺我财产，绝我生命，其苛暴恶政，无所不用其极。”“台湾人民，刻已翻然觉悟，均当以鲜血一洗前此之耻辱矣。”②《宣言书》特别提到，台湾同胞抗日复土的斗争，得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负责人的关怀，得到了大陆人民的支持与配合。《宣言书》秘密散发于台湾各地，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许多人捐资筹集起义经费，有些人组织了“决死队”。武装抗日起义的队伍逐步组织起来后，仿照祖国大陆革命党武装的组织形式，设旅长、团长、排长等职，旅长统率千人，团长统率百人，排长带领十人。十二志士之一的江亮能担任司令军长，具体指挥起义时的军事行动。

当时，广东都督府也派了革命党人吴觉民到台湾。吴会见罗福星后，决定互相配合共同斗争。是年7、8月间，黄兴先后两次派人到台湾，了解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情况，转达了革命党和祖国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的关怀和支持。

罗福星和台湾同胞的抗日活动日益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日本在台湾的统治者于10月开始，在台湾各地进行大规模的搜查，逮捕了大批同盟会成员和“可疑”的群众，对他们进行审讯和拷打。罗福星动员未遭逮捕的人继续进行抗日斗争。他认为，若停止活动，必致丧士气，乱人心，需要再接再厉，不屈不挠。10月22日晚，罗福星等人在旅馆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他表示：“男子以名为重”，“名誉者，吾人事业之支柱也”，“今余即令粉身碎骨，意志仍不屈也”；“若我不幸被捕，我必出以坚强之意志，断不泄漏机密。为革命献身，慰三百余万之同胞，以留功绩于我（中国）政府之历史中！”他一再表示，抱定坚强信念，为革命而献身。^③他给闽省都督孙道仁写报告，提出要在台湾组织临时联合会，以为大举之用；并请速出兵来台。

在这期间，罗福星加紧活动。他得知苗栗打入敌人机关中的革命同志全部被捕，立即冒险到台中、台南各地了解情况。敌人到处搜捕，一时无法开展工作，他又化装回到台北。12月间，罗在台北秘密召集同盟会成员会议，研究如何冲破敌人的恐怖，举行全岛起义。但这时敌人正在发动大检举，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起义计划无法付诸实行。罗为“暂避其锋”，转到淡水躲在一户农民家里，但终为敌人侦悉，于12月18日深夜被捕。这前后被捕的革命党人及抗日群众共达一千多人。

在敌人狱中和法庭上，罗福星严正斥责日本侵略者在我台湾的罪恶行径。他利用敌人让他写供状的机会，写了一篇“自白书”，分十一项，详细列举了日本官吏虐待我台湾同胞的

罪行。他还写下了许多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信念的诗词，如：“独飘彩色汉旗黄，十万横磨剑吐光，齐唱从军新乐府，战云开处阵堂堂。”“海外烟飞空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轻生爱自由。”“军乐扬扬列队过，天朗风清感慨多，男儿开口从军乐，同唱台疆报国歌。”他在《祝我民国词》中写道：“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孙真国手著初唐，逸乐中原久益彰，仙客早沽灵妙药，救人千病一身尚。”取首字寓意“中华民国，孙逸仙救”^④，表现出他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对孙中山的崇敬心情。

1913年底、1914年初，日本殖民统治者在苗栗设临时法庭，对罗福星和五百多位台湾抗日志士进行“审判”。3月3日，罗福星被处以绞刑，年仅三十。他视死如归，临刑前写了“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的字句，表现出他对祖国和台湾同胞的热爱。

注：

① 《罗福星革命案》。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篇第五册。

② 汉人：《台湾革命史》第十一章；彭子明：《台湾近世史》第九章。

③ 同①。

④ 罗福星的遗诗，流传的几种文本互有参差。本文引自罗秋昭：《罗福星传》。据王惟英记，此是经于右任校正过的（见台湾“党史会”编《革命先烈先进传》）。

陈 楚 楠

陈 民

陈楚楠原名连才，别号“思明州之少年”^①，1884年（清光绪十年）生于新加坡，是第一代侨生^②。他祖籍福建厦门，父亲陈泰早年到新加坡，开办“合春号”，经营木材和罐头、杂货。因主动把靠近新加坡河畔的房地产转让给当地政府建设码头、仓库，政府将该地区命名为“陈泰坊”以资纪念，现已成为新加坡市中心的繁华地区。

陈楚楠童年除进学校学习当地应用的英语与马来语外，还在家中补习中文，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二十一岁时，与兄陈连亩共同经营“合春园”种植橡胶，同林文庆的武林园、洛阳园、陈嘉庚的福山园齐名，成为早期推动新、马橡胶种植业的著名人物。由于他同新加坡维新派领袖邱菽园交往，得阅《清议报》、《新民丛报》、《开智录》等刊物，深受影响，一时对康有为颇为崇敬，并参加林文庆、邱菽园组织的“好学会”，声援康梁的保皇立宪活动。1900年，维新派的武装自立军以“勤王”为号召，预定8月9日在湘鄂皖起义。因康梁的汇款未到而改期，后被清吏发觉，致使起义失败。当时传闻康有为盗用华侨捐款，这使陈楚楠大为失望。从此，他的思想开始转向革命。促使其思想转变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苏报》、《革命军》、《黄帝魂》等革命书刊的影响。他经常与林义顺等人议论中国

政局及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逐步成为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1902年，新加坡华人牧师郑聘庭创办青年文化团体基督教青年会。陈楚楠加以赞助，并在青年会中增设书报社，陈列多种报刊，任人阅览；自己也经常到青年会去讲演，结合宣传革命思想。是为南洋革命党人办书报社之始。

1903年夏，上海发生“苏报案”，陈楚楠与张永福、林义顺等用“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英国驻上海领事，请援引保护国事犯条例，拒将章炳麟、邹容引渡给清政府，以重人权。不久，他们又集资翻印邹容的《革命军》数千册，改名《图存篇》，由黄乃裳携带回国，散发于闽南、粤东一带。

同年，陈楚楠通过《天南新报》编辑黄伯耀的介绍，与革命党人尤列交往。在尤的影响下，陈楚楠与张永福合资创办《图南日报》，自任报社经理，聘尤列为名誉编辑。创刊时尤列写发刊词，鼓吹反清革命，成为南洋华侨最早的革命喉舌。当时南洋革命风气未开，一般商人视革命为大逆不道，多禁止其子弟及店员阅读《图南日报》。因此，该报的长期订户只有三十几份，平日销售量也只剩一千份。为了打开局面，《图南日报》在迎接1905年元旦时，特印制精美月份牌分赠读者。月份牌上印有太平天国石达开写的：“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以及“文字收功日，全球革新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的对联，中间印有自由钟和独立旗。形式新颖，又富有爱国思想，颇受东南亚各地华侨工商界以及群众团体的欢迎，报纸的销售量也一度增至二千多份。这种月份牌流传到檀香山，孙中山见了大为赞赏，购买过不少，同时写信殷殷嘉勉，表示愿意与他们相会。

1905年6月,孙中山由欧洲取道新加坡赴日本,致电尤列约《图南日报》主持人相会。轮船停泊新加坡时,尤列便介绍陈楚楠、张永福等登船相见。当时因孙中山受当地政府限令离境五年的期限未满^③,经陈楚楠等往警厅担保,孙中山始得上岸聚会于小桃源俱乐部,商谈组织革命团体事宜。由于事前林文庆与黄乃裳的介绍,陈楚楠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已有初步了解,这次相会,对孙中山的革命气概和渊博学识,又获得深刻的印象,从而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心悦诚服地接受孙中山的领导。

同年8月,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于日本东京。第二年6月,孙中山再次来到新加坡,在“晚晴园”^④召开大会,组织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基本会员有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李竹痴、尤列等十四人,陈楚楠被推选为分会会长。以后陆续加入同盟会的有丘灿文、黄乃裳、许雪秋、陈武烈、林文庆、陈嘉庚等四百多人。同盟会还先后派员分赴英、荷两属各埠设立分会。陈楚楠也受孙中山委派,与林义顺、李竹痴等到马来亚北部的槟榔屿和缅甸的仰光等地,设立了同盟会分会,在华侨中播下革命的种子。

1907年8月,陈楚楠与张永福、林义顺筹办的南洋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日报》在新加坡发刊。不久,即与保皇党控制的《南洋总汇报》展开革命与君宪的大论战。翌年3月,孙中山自河内移居槟榔屿路过新加坡,东京《民报》记者也群集南洋,一起参加论战,痛斥保皇谬论。《中兴日报》发行量猛增至四千多份,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在华侨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在1907和1908这两年中,同盟会在广东、广西和云南三

省发动多次起义，陈楚楠遵照孙中山的函电，积极筹款助饷；黄冈起义首领余丑败退香港，被清吏诬告入狱，陈楚楠曾为之筹集诉讼费用，汇交香港《中国日报》，代聘律师为余辩护，后获胜出狱。云南河口之役失败，义军将士韦云卿等六百多人被越南政府遣送出境，前来新加坡。当地政府借口乱民入境有违殖民地禁例，不许登岸。几经交涉，由陈楚楠等出面担保，才得到入境许可。当时义军将士给养极为困难，根据孙中山的意见，陈楚楠在郊区蔡厝港开设“中兴石山”（采石厂）予以安置；有不愿在石山工作的，则分别介绍到槟榔屿、吉隆坡、吡叻（又称霹雳）各埠的工厂、农场、矿山去就业。

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陈楚楠欣喜不已。当时福建由于省库空虚，积欠军饷，地方不安，民心浮动，任福建筹饷局总办的同盟会员黄乃裳通电南洋要求支援。陈楚楠以新加坡同盟会老会长身份，和福建会馆共同召开大会，决议组织保安会，在一个月內筹得新币二十多万元，用保安会长陈嘉庚的名义汇回福建，安定危局。后陈回国，主持上海“华侨联合会”领导事宜，积极开展工作，开设华侨公寓，代办华侨所需事务，迎来送往，便利华侨归国探亲、扫墓；同时在《国民新闻》辟专栏，报道海外华侨动态，增进国内人民对海外侨胞的了解。

1917年，陈楚楠到广州谒见孙中山，受聘为军政府参议。1928年至1933年，陈任福建省政府委员，一度兼任实业厅长。他曾计划在闽创办银行，开发矿业和水产资源。但由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把福建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处处加以掣肘，使陈无法施展其抱负。陈于1933年返回新加坡，并从此退出政治舞台，息影家园，不闻外事。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新加坡老同盟会员张永福被拉下水，出任伪政权的“国府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并奉命出使南洋。张永福与陈楚楠本为知交，关系密切，想罗致陈去南京，以壮伪政权声势。但陈不为所动，并晓以民族大义。

1971年9月21日，陈楚楠因病在新加坡逝世。

注：

- ① 明末郑成功据守厦门反清，改厦门为“思明”，矢志光复明祚。据此，陈楚楠取别号“思明州之少年”。
- ② 习惯上华侨在南洋所生子女统称“侨生”。英殖民地政府根据出生地主义的国籍法规定：凡在当地出生的华侨子女(Straitsborn Chinese)即获得英国国籍，成为英籍华人。
- ③ 1900年6月，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由广州赴新加坡，拟说服康有为同孙中山合作。康党疑其受清吏指使谋刺康，控告于当地政府。宫崎遭逮捕。孙中山闻讯后，即从西贡赶到新加坡营救，也遭逮捕。幸赖旧友林文庆等营救，方获释，但孙被判出境五年，宫崎则被判永远出境。
- ④ 别墅“晚晴园”地处新加坡郊区，环境僻静，原为某富商所建，名曰“明珍园”，张永福买下后改名“晚晴园”，取“人间爱晚晴”的意思，供他的母亲晚年养老。1905年张永福闻讯孙中山即将来新加坡，特将该园修葺一新，用作招待孙中山及革命同志聚会的场所。陈楚楠著有《晚晴园与革命史略》，传诵一时，为南洋同盟会的早期文献。

黄 明 堂

邢凤麟

黄明堂，字德新，广东钦州（现属广西）人，壮族，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于小康农家。年轻时怀大志，慨然以救国为己任，常与人议论时弊，抨击权贵，为当地政府所不容，遂逃往越南图谋生路。

黄明堂到越南后，加入洪门，纠集健儿，组织义军，活动于滇桂与越南边境，长期坚持反清斗争。清边防大臣束手无策。黄还常袭击侵越法军，法驻越总督也甚为头痛。

1907年3月孙中山到河内设立领导西南武装起义的总机关，策划粤桂滇等省的起义，派人联络黄明堂。黄遂加入同盟会，在越南太原府左州设立机关，集合革命志士。

同年10月，孙中山委任黄明堂为中华革命军镇南关（今友谊关）都督，并从海外爱国华侨募集捐款购买数十支驳壳枪，给黄组织一支手枪小分队。12月2日黄奉命带领一百多人从左州拔队入关，另有越南革命党人数十人、越南华侨革命党人数十人、筑路工友数十人、会党游勇约百人、内地前来者十余人，共约三百人，由他指挥，星夜绕道镇南关背后，疾趋石山顶炮台。当时清道台龙济光驻龙州，统领陆荣廷、营务陈炳焜扼凭祥隘口，帮带黄福廷守镇南关，哨长李福南带一排人凭险守石山顶炮台，镇南关及附近清兵共计数千人。李福南原

为会党首领梁兰泉的部属，梁加入同盟会后，李已被梁策动反正。此时，李敞开山门竖起革命旗帜，黄明堂长驱直入，部分清兵稍事反抗即溃散，黄占领石山顶三座炮台，缴获大小火炮十四门、步枪数百支。次日，孙中山偕黄兴赶来炮台祝捷和犒赏革命军，当地各民族群众也挑水送饭前来慰劳。这时，龙济光、陆荣廷统辖数千清兵，从青山炮台南关闸、磨沙、南关口左辅山和四方岭等四路合围革命军。孙中山命黄明堂坚守炮台五日，自己赶回河内筹募饷械接应。黄指挥革命军多次击退来犯清军。经七昼夜激战，革命军牺牲十余人、伤三十多人，清兵伤亡数百人，帮带黄福廷大腿被打断。由于孙中山接济的饷械不能如期运抵镇南关，黄明堂粮尽援绝，只得退入越南文渊，进驻燕子大山待命。镇南关起义虽然失败，孙中山及广大同盟会员看到人心向着革命，清廷的垮台不可避免，革命的信心更足了。

1908年4月29日，黄明堂奉孙中山之命，率革命党一百多人，发动云南河口起义。河口为边防重地，清边防督办带兵驻守。黄派关仁甫率领部分队伍由越南老街进攻河口左侧的万侯，河口清军防营响应起义，迎接革命军入境。黄明堂亲督革命军主力猛攻清军汛营，清河口督办王玉藩负隅顽抗，为守备熊通击毙。汛营管带黄元桢在革命军政治攻势之下首先反正，清军六营六百余人相继投降。黄率革命军迅速占领河口。随即扩编队伍，拟乘胜挥师北上，占昆明、出四川、控制长江上游。清云贵总督锡良忙派道员方宏纶、提督白全柱指挥十余营清兵反扑，并通电贵州、四川、广西三省派兵赴援，一时西南数省为之震动。孙中山急电黄兴赶赴河口指挥，声威更壮。由

于战事意外迅速发展，弹药顿感缺乏。黄兴急返河内筹取接济，途经老街时遭法军警官无理扣留，被逐出境。黄明堂后援不继，指挥乏人。而清军四面包围河口，革命军前锋相继失利败退。黄困守河内经月，浴血苦战，终于寡不敌众，率革命军六百多人退走越南。旋因法国殖民当局迫害，黄退走新加坡，受到当地华侨的欢迎。

1910年冬，黄明堂在新加坡接到孙中山的电报，要他到香港同盟会支部工作。黄花岗起义时，黄负责秘密运送军火入内地。辛亥武昌起义，四方响应。黄与党人潜入新会，以当地会党、绿林、游勇为基本力量，成立“明字顺军”，自任本军大都督（统制），队伍约六七百人。又派其妻欧阳丽文到阳春，运动防军统领黄辅文起义。然后黄明堂亲至黄辅文军队指挥作战，次第光复恩平、开平、台山、新会等地，于11月16日进驻江门，向三水推进，以期会师广州。适值两广总督张鸣岐挂印逃走，广东独立，由胡汉民任都督。胡委派黄明堂为琼崖宣抚使，率所部二千余人移驻海南岛。黄在海南整顿治安，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后，因感袁世凯反动逆流泛滥，萌发隐退的念头，将所部交给统领姚章甫指挥，携眷回乡省亲后闲居广州。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派龙济光率所部入粤。龙曾邀请黄明堂任参议，黄不肯附逆，出走澳门，从事倒袁活动。1914年秋，龙济光侦知黄明堂在澳门的活动，诬为匪首，勾结葡萄牙殖民当局将黄逮捕，欲引渡回广州杀害。黄被监禁一年多，经两广都司令部出面与葡萄牙殖民当局交涉，始获释出狱。黄至肇庆见护国军两广都司令岑春煊，被委任为讨贼军司令。他收编民军，会同桂军林虎、滇军李烈钧等

分路讨伐龙济光。黄所部主攻广州北面鸦髻岭，与龙部展开激烈战斗，夺取石井兵工厂，攻入广州。龙济光撤退至雷州，黄又率部收复雷州。龙败走琼崖。

1918年3月段祺瑞政府任命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龙由琼崖派军扰粤桂边境。11月，黄明堂与桂军沈鸿英配合出兵琼崖，一举打败龙济光，收缴龙部枪支人马。沈被广州军政府任为琼崖镇守使，黄任琼崖道尹，驻防海南。不久，桂系军阀陆荣廷统治广东，排斥异己，免去黄明堂本兼各职。黄离琼崖到福建漳州，依陈炯明。1920年8月孙中山命陈炯明率粤军入广东，驱逐桂系势力。黄明堂参加讨伐桂系军阀莫荣新的战争。10月，桂军被逐出广东。

1921年6月桂军分三路攻粤。陈炯明督粤军击退桂军并追入广西。黄明堂任西南路司令，由钦州发兵直薄龙州，大获全胜，被任为边防督办，驻防龙州。同年秋，粤军班师回粤，黄奉命移驻钦廉。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后驻辟永丰舰指挥讨贼，分别委任许崇智、刘震寰、周之贞和黄明堂为东、西、中、南路的讨贼军司令。前此，陈炯明曾派其谊母黎金庭携带巨款十五万元及钦廉绥靖处处长的印信收买黄明堂，被黄严词拒绝。此时，黄奉命讨贼，挺进廉江，生擒陈炯明部下的支队司令邹武，晓以大义，仍委邹武为南路讨贼军支队司令，随征陈炯明。黄明堂军次电白时，得悉孙中山安抵上海，便率部撤回廉江。途中，邹武叛变，陈炯明又派邓本殷、冯铭锬、黄业兴等部截击黄明堂。黄与之对峙月余，为保存实力，退往广西邕宁五塘，派员向广西自治军总司令林俊廷请援

粮械。林表面答允，暗中进行收编黄部工作。正当黄部岌岌可危之际，其妻欧阳丽文从上海持孙中山的手札到香港找孙科、刘纪文，领得港币五万元回来，黄即分发军饷，偿还赊欠商户帐目，宣告立即出师讨贼。黄部五千人在五塘虽被桂系军阀包围，但黄明堂指挥若定，率部突围出灵山。同年12月黄部收复廉州（今合浦）北海，在廉州城内设立司令部，一直坚持斗争。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以黄部为革命基本力量之一，增拨军费。并对黄明堂予以嘉奖，亲书“礼义廉耻”等条幅赠黄。

1924年初，桂军邓本殷等部围攻廉州阅月，黄明堂弹尽粮断，旅长杨壁臣投敌，形势逆转。幸得孙中山所派永丰舰到北海接应，方获解围。黄乘永丰舰前往琼崖驻防，因风大不能登陆，旋回安铺集中，经廉江、化州、电白、阳江到达台山。这时，黄的南路讨贼军奉令改为中央直辖第二军，不久又改为建国第二军，黄仍任军长，黄妻欧阳丽文任该军第三旅旅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为扩充自己的实力，收编阳江陈章甫部为第二师，开往罗定围攻黄明堂。黄猝不及防，败走连滩，被陈部包围缴械。从此黄发誓不与蒋合作，其子女十多人没有一个人依附蒋介石的。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黄不但长期在野，连孙中山规定发给黄每月六百元的生活费也被取消了。陈济棠统治广东时，为了表示奉行“国父遗教”，笼络人心，聘请黄明堂为参议，每月发生活费六百元。

黄明堂晚年闲居广州。抗战爆发后，1938年10月日本侵占广州，黄夫妇避难回钦州大寺。此时，黄虽已年逾古稀，但

他招集爱国志士，仍欲请缨抗战。惟因颈背两次重伤，加之年老体衰，出师未捷，旧伤复发，返回大寺时，半身不遂，忧愤卧病两个多月，于1939年逝世。弥留之际，仍频呼杀敌救国，浩气凛然。黄妻欧阳丽文在全国解放后，历任广西政协委员，1973年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郑惠琪等：《镇南关起义见闻》。《辛亥革命在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上册第1—10页。

邹鲁：《黄明堂传》。《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台湾版，第一编第十三集第334—336页。

唐颂南：《我所知道的黄明堂》。《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罗绶章：《黄明堂革命事略》（未刊稿）。

欧阳丽文：《回忆黄明堂》（未刊稿）。

黄明堂女儿黄曼薇访问记。

吴 兆 麟

闻少华

吴兆麟，字畏三，湖北鄂城县人，1882年2月28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十一日）生。他的父亲是个菜农，为供给他上学，“耕耘纺织，勉备束脩”。1899年吴兆麟考入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随营学堂，在将校讲习所肄业。次年考入工程专门学校，1906年毕业。旋考入参谋学堂，以“名列前茅，提充领班”^①。吴在提高军事技能的同时，又逐渐吸收了西方的科学知识。1906和1908年河南彰德、安徽太湖两次秋操后，吴编写彰德、太湖秋操纪事及战术实施参谋旅行兵术等书^②，曾被印发各军参阅。

1904年，吕大森、张难先、刘静庵等在武昌建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他们确认“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③，乃分别投入工程营和马队，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1905年春，刘静庵等又组织起革命团体“日知会”^④，吴兆麟积极参与。他后来记叙日知会成立的经过说：“陈天华所著《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秘运到鄂，梁启超之饮冰室及《新民丛报》，孙文、章太炎、汪精卫等之《民报》渐次输入国内，军学界同人阅之极为心服。民智大开，金谓中国之所以不能图强，实由于满汉界限所致，……于是军学界同人秘谋组合，利用武昌高家巷圣公会设立‘日知会’。”^⑤

日知会一成立，吴兆麟即以工程营代表和日知会干事身份参加工作。他收会费、募捐款，印刷《猛回头》、《警世钟》等宣传品，在各营目兵及青年学生中秘密散发。同盟会曾与日知会有所联系，并将革命战略问题寄交日知会讨论。在湖北军界同志讨论会上，吴兆麟说，汉阳有兵工厂，汉口是大商埠，武昌拥有大工厂，军队最要紧的弹药、粮秣、被服均不成问题；而且湖北居扬子江中心，因此，“革命战略要以湖北为根据地，竭力联络扬子江上下游各省同志，待时机一至，则由湖北首义，然后向北发展，以北京为作战目标”^⑥。

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日知会组织因受牵连，也遭到严重破坏，刘静庵、殷子衡、张难先等人被捕入狱。湖广总督张之洞怕激起事变，不欲多事株连，因此军学界的同志得以潜伏下来。日知会被破坏后，吴兆麟一度表现消沉。但他的军事知识丰富，在士兵中很有威信。

1911年9月，湖北革命党人准备发动起义。10月9日，孙武等在汉口制造炸弹，不慎失事，起义计划暴露，领导人大批被捕或逃走。10日，总督瑞澂杀害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党人，并欲按名册大肆搜捕革命者。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决心反抗。当晚七时左右，城外第二十一营辎重队、工程队和炮队起义，向城内进发。城内工程第八营响起了第一枪。“共进会”工程营代表熊炳坤很快聚集士兵扑向楚望台军械库。这时人数约四百人。吴兆麟时任工程营左队队官，当晚正好在楚望台值班。由于他在士兵中颇有威信，起义士兵遂公推他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分析当时的形势，作了进攻督署的部署，要求起义群众：“严守纪律，服从命令，违者必绳以军

法。”^⑦。

当晚十一时左右，起义队伍已汇集三千多人，吴兆麟下令由邝杰、马荣、熊秉坤各率一队分三路进攻督署，惜未得手。十二时后发动第二次进攻。炮队在蛇山占领了阵地，但夜间目标不清。第三次进攻时，吴派人于督署后侧纵火，炮队遂集中火力轰击，督署火起，总督瑞澂仓皇逃到楚豫兵舰躲藏，统制张彪亦逃至汉口刘家庙车站。“黎元洪等又皆已潜匿，而未响应之各营，又因电话不通，内外隔绝，均按兵不动。”^⑧由于起义士兵的勇敢作战，加上吴兆麟指挥得当，到11日上午，武昌完全为起义军占领。

武昌首义成功后，因“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蒋翊武、刘公、孙武等均不在武昌，同盟会首脑人物又远在外地，一时陷于无人领导的局面。11日上午，革命党人聚集在谘议局开会，商议建立军政机构。会上讨论都督人选时，“各军领袖，金以资望浅，谦让未遑”^⑨，结果就推了黎元洪。黎元洪被推任都督后，不肯负责，革命党人不能不继续领导革命。他们先组织谋略处，作为筹划和决定军政大事的机关。吴兆麟被推任谋略之一。后谋略处改为参谋、军务等部，吴兆麟任参谋部副部长，旋改任部长。军政府扩充军队，编步兵为八协，吴兆麟任第一协统领。军政府还将武汉划为四个防守区域，吴兆麟负责第一区，防守汉阳。不久革命军在汉口战役中失利，吴兆麟与蔡济民等曾先后渡江督战。

10月28日，黄兴偕宋教仁等来鄂，黎元洪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所有湖北军队及各省援军，均归黄节制调遣。黄即偕吴兆麟、蔡济民等往汉口前线视察。11月1日汉口失守，吴兆

麟及参谋部全体人员主张全力固守汉阳待援。在汉阳防御战中,参谋长李书城因不熟悉鄂军情况,又不明武汉地形,欲借用吴兆麟,几经磋商,都督府派吴率参谋数人到汉阳布置防务。吴“即派参谋姚金镛、宾士礼、蔡济民、徐达明、吴醒汉、夏维善等,同往汉阳总司令部帮同办理军中一切事”^⑩。27日汉阳失守,黄兴乘轮东下赴上海。经吴兆麟建议,黎元洪委蒋翊武为护理战时总司令。

12月17日,黎元洪被举为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大元帅,扩编陆军为八师,吴兆麟兼第五师师长。12月南北议和期间,吴兆麟继黄兴、蒋翊武之后担任民军战时总司令官。他为坚守武昌作出了贡献。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黎元洪为副总统兼海陆军大元帅,吴兆麟任大元帅府参谋总长。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黎元洪按照袁世凯的意旨,将吴兆麟等首义军官调出湖北前往北京。吴兆麟被晋升为陆军上将,授勋二位,并先后获大绶嘉禾章、文虎章,列名将军府将军。此后,他由于对袁政府反感,对革命党人也丧失信心,转而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1922年秋,章太炎发起辛亥首义同志会,举吴兆麟为武昌首义理事会主席。吴倡议修武昌首义公园,为革命残废军人征集资金等。同年,吴兆麟任樊口堤工总理,亲自督率工人筑坝、建闸、修港。1924年工程全部完竣,鄂城樊口一带万顷良田在每年春夏之交不再有被江水灌入淹没之虞。

吴兆麟晚年“皈依佛法,茹素诵经,不轻出门”^⑪,一直靠领退役金生活。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攻占武汉。既得知吴兆麟仍在

武汉，乃以伪湖北省政府首席参议及“和平救国军”总司令等头衔，诱其投敌。吴以生病为由住进医院，实为拒绝。他目睹沦陷区惨痛景象，精神苦闷，于1942年10月17日怀忧病逝。1943年7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抗战胜利后，1947年公葬于武昌卓刀泉。

注：

- ① 《吴兆麟行述》。《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首义始末记》(附录)，《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78页。
- ② 同①。
- ③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55页。
- ④ 居正《梅川日记》作乙巳三月，又乙巳春夏之交有武昌“日知会”干部摄影留念(载《武昌革命真史》)，则该会成立不应早于1905年春。
- ⑤ 吴兆麟：《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首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57页。
- ⑥ 同⑤，第59页。
- ⑦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
- ⑧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9页。
- ⑨ 同③，第266页。
- ⑩ 同⑧，第230页。
- ⑪ 同①，第80页。

樊 钟 秀

胡金福

樊钟秀，字醒民，河南宝丰县人，生于1888年5月22日（清光绪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其父樊道隆是清末庠生，在农村教过私塾，当过医生。樊钟秀自幼随父耕读，喜欢看小说。十三岁到登封县少林寺拜恒林和尚为师，苦学三年拳棒，练就一身武功。

1912年，樊家为豫西土匪所迫，逃往陕西宜川县霍家沟开荒种地。但当时宜川一带也是土匪横行。1914年，风传占据“黄龙山”为王的土匪头子黄某要强娶樊钟秀的妹妹为妻。樊忍无可忍，伙同乡亲数人，杀死匪首黄某及其党羽，得长短快枪十余支，子弹数千发。樊钟秀受到陕北客户敬佩，被推组织武装自卫。但也因此引起当地官绅的敌视，谣传客户要造反。樊眼看父母弟妹在宜川住不下去，便将他们送回河南老家，自己只身返回陕北，聚众二百余人，以抗官匪、保地方为号召。他当众宣布三项禁令：不准奸淫妇女；不准抢劫良民财物；不分主户客户一律平等看待。从此，声势日渐浩大。

1915年，樊钟秀被陕西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兼陕北镇守使陈树藩收编，先后任骑兵连长、营长等职。1916年5月，陈树藩任陕西督军，在民党的压力下，宣布陕西独立。不久，袁世凯死，陈宣布撤销独立，并表示一切悉听北京政府处分^①。

因此引起关中民党公愤，纷纷表示“反段讨陈”。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后，陈树藩部民党高峻、郭坚、胡景翼、曹世英等，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先后树起“靖国军”旗帜，起兵讨陈。时樊率部驻扎西安西南之鱼化寨一带，在民党影响下，于1918年2月脱离陈树藩，至蓝田易帜归靖国军。3月，樊钟秀率所部抄小道突袭潼关陈树藩部，击溃其新兵一旅，得步枪数百支，子弹百万发，实力大增。后退至商县、雒南（今洛南）一带整顿。

靖国军起义后，胡景翼、曹世英等先后派人赴粤，请孙中山派人入陕领导。同年6月，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入陕，被起义各军共推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钫为副司令，统领各军。樊钟秀受任靖国军第二路司令。樊率部离雒南进至蓝田，轻骑跃兵灞上，伏击东下之陈树藩军。旋又围攻刘镇华之镇嵩军于零口，转战临潼、渭南之间，截断陈军东路。后转师西进，攻占盩厔（今周至）等地。时段祺瑞调奉军许兰洲为援陕总司令，陈树藩及所谓八省援军，对靖国军各路同时进攻。樊坚守盩厔五十日，后因外无援军，内无粮草，于1919年1月13日突围退至凤翔。这时奉、直酝酿联合反对皖系段祺瑞，许兰洲对靖国军采取分化政策，靖国军也有“联许倒陈”之意。因此，同年3月，樊征得于右任和张钫的同意，暂附奉许。樊部被许收编为第一支队，樊任司令。

1920年4、5月间，直皖战云密布，许部向河南移动，以策应直军。樊钟秀率部随许回到豫西。樊回河南后，一面招选家乡子弟，扩充军额；一面托人向寓居上海的孙中山代陈仰慕之忱。不久许师北调，樊部留豫，被编为豫督赵倜“宏威军”的

一个团，驻防豫西。

1921年7月，湘鄂战争爆发，吴佩孚调宏威军“援鄂”，樊团与湘军激战于咸宁、岳阳等地。湘鄂战争结束，樊部调归河南后，扩编成旅，属河南暂编第一师，驻防豫东。

1922年4月，吴佩孚为阻止孙中山北伐，配合陈炯明颠覆广州政府，派蔡成勋为“援赣”总司令，率所部第一师及河南暂编第一师开往江西，樊旅驻防吉安。1923年2月，孙中山再次回广州任海陆军大元帅，继续倡导北伐。这时樊旅已进驻赣州，密派李肖亨去广州谒见孙中山，表示北伐时愿效前驱。同年4月，桂系军阀沈鸿英进攻广州失败，吴佩孚调赣南镇守使方本仁、南雄镇守使邓如琢及樊钟秀部援沈。樊乃乘机由赣州向广东北江移动，秘密与孙中山取得联系。8月，樊钟秀行至江西大庾时，通电就任孙中山委任的豫军讨贼军总司令职。接着击败方本仁，率部七千余人进入北江。恰在这时陈炯明叛军倾巢而出，企图夺取广州。樊受孙中山之命由北江驰援广州。樊军11月12日抵广州时，陈炯明叛军已占石龙、石滩等地，截断广九铁路，并由白云山瘦狗岭炮击士敏土厂大元帅府，形势非常危急。樊部将士一下火车就投入激烈的战斗，迅速击溃进入郊区之敌，乘胜收复九龙车站，迫敌放弃石滩、石龙等地，败退惠州，使广州转危为安。孙中山在《勉樊钟秀讨贼电》中嘉许道：“豫军讨贼军总司令樊钟秀，精诚爱国，首义赣南，诸部将官士卒，俱能深明大义，戮力同心，摠览敷陈，至堪嘉许！”^②并命他整练部队，准备北伐。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樊钟秀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同年9月，江浙战起，

孙中山一方面令许崇智等率粤、滇各军肃清东江；一方面令谭延闿、樊钟秀等率湘、豫各军取道江西北伐，以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接着下令北伐军一律改称“建国军”，并委任樊钟秀为“建国豫军总司令”。11月，谭延闿至赣州后，因受方本仁和陈炯明夹击，退回广州。这时曹锟、吴佩孚已倒，孙中山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并应邀北上商讨时局。樊钟秀决定北返，号召地方武装听从孙中山的指挥，以增强北伐力量。12月，樊率部由赣经鄂入豫，长驱数千里，几经艰难险阻，到达潢川、商城一带。这时吴佩孚正逃匿于鸡公山。孙中山从北京向樊钟秀发出电令，命他派兵上山，“歼此渠魁”^③，以免留为后患。但这时吴佩孚已经离山南逃。

樊钟秀回到河南以后，以孙中山命名的建国豫军为号召，地方团队、绿林豪杰纷纷携械来投，不过数月，发展到三、四万人。时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胡景翼任河南督办兼省长，对樊部回豫极表欢迎，指定豫西南各县为樊部防地。

1925年2、3月间，陕西督办刘镇华率憨玉琨部攻豫，胡景翼军迎击于巩县、偃师一带。樊钟秀部则由禹县、登封出洛水南岸，协助国民二军侧击憨玉琨。憨军战败，樊部进驻洛阳。“胡憨之战”结束后，胡景翼病死，岳维峻接任国民第二军军长，出任豫督，收编河南境内的杂牌军，唯建国豫军例外。樊钟秀常说：“建国豫军是孙大元帅委派的，谁敢更换我的旗帜！”

1926年2月，吴佩孚和奉系军阀联合，分三路出兵河南，进攻国民二军。吴军相继攻占了开封、郑州等地，在陕县、灵宝一带将国民二军击溃，再次控制河南。樊率部退守豫西南

山区。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9月攻克汉阳、汉口，追敌至武胜关，吴佩孚率残部退至信阳。早已与北伐军取得联系的樊钟秀部奋勇袭击，吴站不住脚，狼狈逃到郑州。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派唐生智率部沿京汉线继续北伐，同时派人与樊钟秀联系，拟委以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但樊仍以孙中山命名的建国豫军为旗号，发动旧部参加北伐。6月，樊追击吴佩孚残部于南阳、邓县一带。

吴佩孚在河南失败以后，冯玉祥先后收编了吴的残部和刘镇华的镇嵩军，并派人与樊钟秀联络。蒋介石也派人来豫见樊，意在收编。樊对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背叛孙中山遗嘱极为不满，对冯玉祥支持蒋介石也很不以为然，仍坚持建国豫军的旗帜不改。这样，他从各方面都得不到军饷和装备的接济，并不断与冯军磨擦。1928年冬，樊被迫通电下野，旅居上海。

1929年6月，孙中山的遗体由北平运往南京紫金山安葬时，寓居上海的樊钟秀因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通知，甚为愤慨，不邀而至，反蒋情绪溢于言表。时汪精卫等人秘密进行反蒋活动，樊曾与之联系。1930年初，阎锡山、冯玉祥正在酝酿发动反蒋大战之际，樊钟秀回到河南，召集旧部孙世贵等人重整队伍，曾被蒋介石收编的第十二军军长任应岐亦自蚌埠率部来归。樊以孙世贵、任应岐为军长，自任总司令。4月，阎锡山、冯玉祥通电反蒋，派邓宝珊与樊联络。邓、樊相见后一言而定，樊即宣言反蒋，设司令部于许昌。

蒋、冯、阎大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欲拉樊钟秀抄冯军后路，曾派张继到许昌见樊，并以重金收买，要樊让出许昌，以便蒋

军通过平汉线直取郑州的冯军大本营。樊坚决拒绝，并印发告官兵书，历数蒋背叛革命的罪行，表示反蒋决心。5月25日下午，樊视察阵地返回司令部时，行至许吕南门外吊桥，适逢蒋军飞机低空侦察。随从人员劝他快步避入城门洞中，他反而立定桥头，仰首大骂。飞机恰在这时投弹，樊受重伤，当晚死去。遗体运到北平，葬于西山。

注：

- ① 转引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三册第11页。
- ② 黄季陆主编：《总理全集·电文》第129页。
- ③ 同①，第七册第125页。

陈 友 仁

陈 民

陈友仁，英文名Eugene Chen，1878年（清光绪四年）出生于中美洲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祖籍广东兴梅地区。父亲陈阿金^①早年曾参加太平军，太平天国失败后流亡海外，辗转至英属西印度群岛，先是当剃头匠，后开杂货铺，成为小康之家。陈友仁从小在特立尼达受英国教育，毕业于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

1899年，二十一岁的陈友仁开始从事律师工作，成为当地第一个华人律师。因得到华侨和印度侨民的信任，律师业务进展顺利，不久便自设律师事务所。由于收入丰厚，他曾投资于可可种植园和油田，但仍以律师工作为主。他业余多在家中读书、写文章，常向当地报纸投稿。平日颇为关心国际政治和中国局势，曾研读有关日俄战争史料。他虽然只受过西方教育，不懂中文，也不会说中国话，但民族意识强烈。辛亥革命发生时，他正在英国度假，激于爱国热情，毅然与马来亚华侨伍连德（1879—1960，著名防疫专家）等结伴回国。

1912年春，陈友仁回到北京，被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施肇基聘为交通部法律顾问。不久施卸任，由于赏识陈的英文水平，转介绍他担任新创办的英文《京报》（Peking Gazette）总编辑。1915年，袁世凯图谋帝制，梁启超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

文，反对袁氏称帝。当时各报不敢登载，唯有《京报》独家刊登，轰动一时，陈友仁的胆识也为人们所称道。1917年5月，他因撰写《出卖中国》一文，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商议借款一万元的密约，以“妨害公务”罪被捕下狱，判处徒刑四个月。虽不久便获释，但《京报》被封闭。陈友仁遂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成为孙中山的一名亲密助手。1919年，陈参加出席巴黎和会的南方政府代表团，并游历西欧各国。第二年夏天回国，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在上海创办英文《上海时报》(Shanghai Gazette)，继承《京报》敢于批评时政的传统。不久，为筹措办报经费，他出国到伦敦，嘱其夫人^②专程回特立尼达变卖其全部产业，倾囊办报。

1922至1923年间，陈友仁任孙中山的外事顾问，并参加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会谈后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表明了孙中山开始放弃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和寻求国际革命力量援助的愿望。这次会谈对陈的政治思想，也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4年11月，孙中山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共商国是，陈友仁作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随同北上。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逝世的前一天，陈在孙的病榻前，代为起草《致苏联遗书》，重申国民党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解放，以及中苏两国友好合作的政策；阐明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决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③。

孙中山逝世后，陈友仁一度留在北京，担任冯玉祥创办的

中英文对照的《民报》(People Tribune)主编。由于刊载了不利于张作霖的消息，陈于1925年8月又被捕解送天津监禁，至当年12月冯部进驻天津时才获释。陈随即南下广东，参加新组成的国民政府。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2月，他继胡汉民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年底，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国民政府迁移武汉，他与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贯彻反帝反殖的外交方针，在大革命高潮中，先后主持收回汉口与九江的英国租界，开国民外交的新纪元。陈友仁以精通西方法典及坚持反帝革命立场而著称，被时人誉为革命外交家，并称赞其铁腕外交。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成立蒋记国民政府。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分共、清共，宁汉趋于合流。在14日汪精卫召开的“分共会议”上，陈友仁极力反对“分共”，并代表宋庆龄发言，指出“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④。因反对无效，他便以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为名，离开武汉至上海，与宋庆龄等同乘苏联轮船至海参崴，转乘苏联政府特派列车抵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时，陈友仁的名字同宋庆龄、邓演达一起，被列于革命委员会名单。这年冬天，他和宋庆龄、邓演达在莫斯科联名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行径，倡议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斗争。

1931年2月，陈友仁游历欧洲后回到香港。5月，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陈济棠等人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并另组

“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陈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议和于上海，陈友仁与汪精卫、孙科等作为粤方代表出席会议。同年12月，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陈任外交部部长。但不到一个月，由于其对日外交方针得不到南京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支持，便辞职赴上海。

1933年底，陈友仁支持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的联共反蒋的福建事变，并出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事变失败后，陈因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国外，定居法国。此后，他虽身居巴黎，仍继续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独立而积极活动，通过他的儿子陈丕士同国内多方联系，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赞助建立统一战线，团结抗日。

1938年春天，陈友仁离开巴黎，准备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同年10月，他在香港与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建议四项抗战方针：（一）加强中枢政治机构；（二）遵守总理所定外交政策；（三）发动全国民众力量；（四）迅速起用知兵宿将，保卫广东。^⑤由于蒋介石的忌恨，陈终于未能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工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后，陈友仁被拘捕并转押至上海。日方曾多次劝诱他参加南京汪伪政权，都遭到他断然拒绝；他还严正地斥责汪精卫的“和平政策”为傀儡的和平。从此，他被软禁在上海。

1944年5月20日，陈友仁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特将陈友仁遗骸移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以示尊崇。

注:

- ① 据陈友仁之子陈丕士在其所著《中国召唤我》(CHINA CALLED ME)一书中说,其祖父阿金系移民时所用名,真名已不得而知。(见该书第3—4页)
- ② 陈友仁之原配梁玛丽,祖籍广东宝安县,1926年5月病故。1930年,陈与张静江之女张嘉英在巴黎结婚。
- ③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11月第一版,第922页。
- ④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
- ⑤ 香港《大公报》1938年10月28日。

杨 杰

陈 崧

杨杰，字耿光，1889年1月25日（清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生于云南大理。祖父是裁缝，父杨汉章业医。杨杰幼年在大理读私塾。十六岁考入昆明云南陆军小学堂，因学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保定北洋军官学堂深造。后又被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炮兵科学习。在日本期间，杨杰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同盟会。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杨杰和许多爱国同学一起回国参加革命。到武昌后，经同学推荐任北伐联军总务部次长。

杨杰与唐继尧是同乡，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先后同学，1912年初他回到云南参加了唐继尧的军队，任武卫军步兵第十团团长。不久，唐继尧督黔，原黔督杨蔭诚联络旧部陈开钊、徐正铭率军由湘边大举入黔，分两路向铜仁和大鱼塘一带进兵。杨杰这时任贵州第一骑兵团团长，奉派率部前往镇远防堵，经过两个月的战斗，打败了人数众多的陈、徐部队，取得了铜仁大捷，被当时滇军誉为“奇勋”^①。不久杨杰升任滇军第九旅旅长，率部会合援川滇军前往四川。旋任重庆卫戍司令官，兼四川政务厅长、重庆警察厅长。1914年春，唐继尧由贵州回到云南，杨杰也被调至云南，任弥勒县长。

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杨

杰任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为唐继尧）第三梯团第五混成支队支队长^②。后来这个梯团扩充为第四军，杨杰升任军参谋长兼第一纵队司令，曾转战川东，屡立战功。讨袁结束后，杨杰升为陆军中将，获三等文虎章。

1917年杨杰回昆明，任督军唐继尧的顾问，旋任云南讲武堂教官，讲授防空学。1921年杨杰再次赴日本深造。他一面担任云南留日士官学生监督，一面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这期间，杨杰闭户苦读，进一步深入钻研古今中外战争史及有关历史、地理与战略战术书籍，毕业时荣获第一名。

1924年杨杰毕业回国，各方争相罗致。他先到沈阳张作霖处任上校参谋，不得志。12月又接受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邀请，担任该军参谋长。次年，随孙赴河南，9月转任河南陆军训练处教育长。

1926年5月，杨杰参加国民革命军，担任第六军军长程潜的总参议，协助程制定作战计划，并随军北伐。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在南京成立政府，宁汉分裂。第六军军长程潜率一个精锐师返武汉，第六军驻南京的第十九师受李宗仁的军队监视，未能返汉，被改编为“暂编第六军”，杨杰任军长，被派指挥第一军的一、三两师和第六军北上作战^③。8月5日，蒋介石策定淮河防御方案，又任命杨杰为总司令部淮南行营主任兼总预备队指挥官。13日，蒋介石通电下野，国民党军退守长江南岸，第六军番号改为第十八军，杨杰任军长。8月下旬龙潭战役发生，孙传芳军溃败后，杨杰受命为右翼追击指挥官，率第十八军、十四军和三十一军渡江追击。第十八军迅速攻克扬州后，杨又立即布置趁势穷追，连克宝应、淮阴等

地^④。这一追击战的胜利,对整个战局发生了重大影响。9月20日,南京政府任命杨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任命杨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4月7日又任命杨杰兼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6月蒋介石占领北京,不久,杨杰被任命为北平宪兵学校校长。

1929年3月,杨杰出席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初唐生智举兵反蒋,6日,杨杰同王均、王金钰等联名通电谴责唐生智^⑤。11日,蒋介石派杨杰指挥豫西各军,攻唐侧面。次日又任命杨杰为洛阳行营主任兼第十军军长。蒋唐战争结束后,1930年2月,杨杰被蒋介石任命为长江要塞总司令,负责指挥镇江、吴淞、江宁、江阴、镇海五区要塞的防务及新建工作。

同年5月,蒋、冯、阎大战爆发。杨杰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炮兵集团指挥官,统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野炮兵一团及教导第一师炮兵队,随同第二军团刘峙在陇海线作战。5月12日,杨率部配合第三师击破马牧集冯阎军阵地,17日又轰击归德取胜。连续打了几次胜仗后,杨杰被提升为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杨帮助蒋介石制定以陇海线为主战场的大兵团作战计划,并亲临前线指挥。8月17日攻克济南后,蒋军和平汉、陇海两面作战,杨杰指挥第二炮兵集团协助攻坚。杨因在这次战争中为蒋立下功劳,深得蒋介石的器重。

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1月被任命为陆军大学校长。其后,蒋介石自兼陆大校长,杨改任教育长。1933年初,日本帝

国主义侵入华北，进犯长城一带，杨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长，负责指挥作战。由于同北平分会会长何应钦意见分歧，杨不久即辞职。

杨杰为人比较爽朗，但有些过于自信，自视甚高，不肯曲意迎合，往往当面指责别人，对于蒋介石左右的权贵也常加以冷嘲热讽，因此在蒋介石的军队系统内逐渐陷于孤立。1933年9月蒋介石派杨杰出国考察欧洲军事。他率领考察团先后到了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苏联、奥地利、捷克、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等国。1934年秋回国，写成《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一书，向蒋介石提出学习西方国家的军事技术和关于国防建设、培养兵工人才的建议，并拟定了《兵工业根本建设之计划》。他对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做了比较客观的考察，赞扬苏联社会“无失业者”，“妇女与男子平等劳动”，“军事教育极为完满”。报告呈送蒋介石后，蒋以“一日万机，无暇细阅此繁冗长文”为由，批付存档。

杨杰回国后，继续在南京任陆军大学教育长。这期间，他埋头钻研军事理论，将在陆大讲稿整理撰写成《保留城垣意见书》、《战争抉要》、《总司令学》、《孙子浅释》等书。1935年12月18日，杨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代理总长），兼任陆大教育长、防空委员会主任等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杰多次向蒋介石提出抗日作战计划，均未被采纳。是年秋，蒋介石派杨率领实业考察团赴苏联，负责组织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军火物资运华工作。由于工作努力，曾荣获斯大林颁发的勋章。1938年5月，杨杰被任命为驻苏大使。他在苏联经常参观集体农庄和工厂，研究苏

联政治、经济制度和外交政策，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有了进一步认识，政治见解开始有了转变，遂为蒋介石所不容。1940年4月，杨杰被免去大使职务。回国后，在中央训练团担任“国防讲话”、“国家总动员”两课程的教员。他曾做过题为“苏联的国防政策”的长篇演说，对苏联的国防建设评价很高。他希望蒋介石能实行中苏友好政策，改革内政。蒋介石对杨杰很不满意，仅让他担任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职，留居重庆。杨利用闲居的机会，经常讲学和演说，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每逢国内或国际间发生重大变故时，重庆各报的记者们便赶赴杨杰寓所，向他请教，而他也总是不厌其烦地开怀畅论。这期间，他还系统地研究了军事国防问题，著述甚多，先后出版了《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苏联的国防政策》、《国防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国民军事必读》等书。他的书爱国热情洋溢。他在《国防新论》自序中说：“五年来的艰苦抗战，中华民族觉醒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脑膜上都被敌人的刺刀雕刻着殷红的字迹：‘国家’，‘民族’……战争把全国同胞的心熔结成一个，把全国同胞的生命熔结成一个，把全国同胞的希望熔结成一个。”他尤其注意国防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他认为：“全体性国防和人民战争”，已是“时代和历史演进的结果”。因此他主张把国防问题的研究，从少数军事专家垄断的专门学问，变为全国同胞的普通常识。他还主张国防建设的基础应建立在农业机械化和工业电气化上。

1944年国民党政府组织国际考察团，杨杰被派率领军事代表团，赴美英等国考察。年底回国后住在昆明。这时，杨杰已逐渐放弃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的拥蒋立场，转而赞成

联苏和联共、联合各民主党派一致抗日，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深为不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杨杰由于不满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托病住在重庆。蒋介石开始派人监视他的行动。杨杰不予理睬，却与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共同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推动国民党民主派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卖国的活动。杨负责民联西南执行部的工作。他参与各种集会，经常在文章、讲演中分析国外政治形势^⑥。由于他在民主运动中旗帜鲜明，蒋介石企图暗内害他，甚至派人买通他的姨太太偷窃他的机密文件。杨被迫借口养病，由重庆赴昆明。此时昆明的民主运动正蓬勃开展，杨暗中联络张天放、杨春洲等民联会员，进行反内战、反独裁的活动。杨经常出席昆明的民主人士组织的“星期五聚餐会”和“丙戌聚餐会”，作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宣传^⑦。

1946年秋，杨杰曾派人到四川、贵州、西康等地联络反蒋的国民党军事将领，鼓动他们举行武装起义。1947年底，他联络国民党驻云南的二十六军军长万保邦，并派人到香港同蔡廷锴联系，商讨在云南组织武装反蒋的问题。

1948年1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组织联合，在香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西南地区民革的工作。不久，民革中央派人同杨杰、万保邦联系，请杨指导筹组成立云南人民自卫军，以配合人民解放军滇桂边纵队进行战斗。1949年初，人民自卫军发动了进攻蒙自的武装起义。由于国民党反动武装的镇压，起义失败，转入游击战。夏天，这支起义武装编入人

民解放军滇桂边区纵队。

杨杰还经常向当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卢汉宣传反蒋主张，常常被卢汉接到家里谈至深夜。杨帮助卢汉认清形势，解除卢对共产党的某些疑虑，从而直接影响了卢汉的思想转变^⑧。

由于杨杰进行反蒋宣传以及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策反工作，蒋介石视之为眼中钉，决定要除掉他。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的特务严密监视他的行动。一些进步朋友担心他的安全，劝他迅速离开云南经香港到解放区。中共中央于1949年6月曾通知杨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杨认为云南已处于半解放状态，蒋介石无力顾及，不致于谋杀他，同时他在西南的军事策反工作已有相当进展，一时离不开，因此迟迟没有成行。8月1日，杨应昆明新闻界的邀请，作了题为《国内外时事分析》的演说，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9月初，蒋介石下令云南进行“整肃”。9月9日，国民党特务、警宪在昆明大批出动，计划中第一个逮捕的就是杨杰。杨杰得到消息较早，于搜捕前夕秘密飞往香港。蒋介石对没有抓到杨杰极不甘心，指使其在港的特务，于9月19日将杨杰暗杀于香港寓所。9月22日，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谴责了蒋介石杀害人民政协代表杨杰的罪行。1952年，杨杰的骨灰从香港运回云南，安葬于昆明西山墓地。

注:

- ① 李佩珩:《随唐继尧入黔忆事五则》。《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3—404页。
- ② 《护国军纪事》,中华新报馆编印,1916年版,第三期第31页。
- ③ 《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0年版,上册第465页。
- ④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见《革命文献》第十六辑,第846—856页。
- ⑤ 《申报》1929年12月9日。
- ⑥ 杨春洲:《杨杰被害前的反蒋活动》。《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74页。
- ⑦ 同⑥。
- ⑧ 杨肇骧:《解放前夕的滇局风云》。《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第216页。

彭 泽 民

周天度

彭泽民字锦泉，号铺希，1877年11月7日（清光绪三年十月初三）出生于广东四会。父亲彭明翰，在佛山靠糊纸盒为生，家庭十分贫苦。彭泽民幼年入塾受教，断续七年，并曾跟随伯父学习中医。后因父亲病故，生活无着，1902年被迫离乡前往南洋马来亚谋生。起初在吉隆坡郊区当塾师，后在一个锡矿场任文书。

彭泽民到吉隆坡后，常去兴中会在吉隆坡创设的“中和讲堂”听讲，受到革命思想启蒙，倾向革命。1906年吉隆坡同盟会支部成立，有会员十余人，彭泽民是发起人之一，被推为书记。因英国殖民当局监视甚严，不能公开活动，同盟会托名“中国青年益赛会”，利用基督教宣道堂内座为机关。青年益赛会不久即成为马来亚雪兰峨邦的革命中心，影响日益扩大。1911年初，孙中山、黄兴策划广州起义，彭泽民积极动员华侨捐款，鼓励华侨回国参加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李晚和罗成，就是吉隆坡同盟会支部成员。

广州起义失败后，吉隆坡当局认青年益赛会为暗杀机关，下令停止活动。辛亥革命后，吉隆坡同盟会组织由地下转为公开，青年益赛会得以恢复，会员增至数千人，彭泽民先后任副会长、会长四年。1915年9月，彭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

党雪兰峨副支部长。袁世凯称帝时，他在华侨中为中华革命党筹集讨袁军饷，并组织华侨讨逆军，入广东东江参加讨伐龙济光。

彭泽民初到南洋时，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清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急需橡胶，殖民当局招垦橡胶园，彭领到橡胶园一处，并得到锡矿场工人的帮助，建木屋数间，全家悉力以赴经营橡胶园，生活有所改善。

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国民党，彭泽民参与国民党芙蓉总支部工作，发起创办吉隆坡《益群日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益群日报》受到侨胞欢迎，畅销南洋各地。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国共合作，彭泽民积极拥护和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次年“五卅”惨案发生，他因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在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回到广州。随后，他被芙蓉总支部推选为代表，参加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又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及国民政府委员。同年5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上，提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彭泽民和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起来反对。整理党务案被通过后，彭曾到孙中山遗像前痛哭^①。

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决议，1927年1月彭泽民由广州到达武汉。这时，蒋介石擅自决定迁都南昌。彭在武汉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中央发动的反对独裁、恢复党权的反蒋运动。他和宋庆龄、何香凝、邓演

达等国民党左派一道，在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主张发展工农运动，以抵抗蒋介石的反动。在这次会议上，他继续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彭泽民和其他一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的反革命罪行。他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的讨蒋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蒋介石竟勾结帝国主义；我们要解放农工，蒋介石竟摧残农工。我们要革命，要拥护总理的政策，我们非打倒蒋介石不可。”②

继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武汉汪精卫集团又公开背叛革命。彭泽民与宋庆龄、邓演达等竭力反对。事先，他曾向汪精卫指陈利害，规劝汪坚守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改变反革命立场，汪精卫不听，反而指责他“叛党亲共”。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会散后深夜十二时，彭泽民赶至林伯渠家中，将会议情况告诉了林伯渠和吴玉章，使他们能及时脱险。接着，彭泽民随第四集团军的第二方面军离开汉口。

7月底，彭泽民到达南昌。8月1日，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被推为革命委员会委员。他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名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声讨了蒋介石、汪精卫、何键等国民党新军阀背叛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屠杀人民的罪行，并号召革命同志团结一致，“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③。8月5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彭随部队南下。当时气候酷热，加上敌人的不断袭击，行军十分艰苦。他与共产党人一道，不畏艰难险阻，在行军途中对部队进行革命宣传，为战士看病，

表现了坚强的革命毅力。起义部队到达广东汕头后，他在彭湃的帮助下，取道陆丰到汕头，乘渔船到达香港，从此开始了他在香港二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由于彭泽民坚持反帝反封建和反蒋的爱国革命立场，1928年国民党中央将他开除党籍，并予以通缉。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在莫斯科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宋庆龄、邓演达写信给彭泽民，邀他共同发起。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路过香港时，与彭一起商讨反蒋问题。随后，邓演达在上海将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脱党分子组成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彭泽民列名为中央负责人之一。彭在香港组织了南方干事会，负责会务工作。但不久邓演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行动委员会的反蒋活动失败。1933年冬，彭泽民到福州参加了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的“福建事变”。不久，彭认为不可能成功，即离闽回港。

彭泽民流亡香港期间，受到国民党特务和英国殖民政府的监视，生活异常艰苦，但他操守不移。为了维持生活，他经友人介绍向香港名医陈伯坛学习中医六年，随后在香港挂牌行医。他对贫苦的劳动人民充满同情，经常赠医赠药，因而深得人们的赞誉。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11月1日，彭泽民和章伯钧等在香港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代表会议，鉴于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改名为中华民族

解放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主张团结全国力量对日抗战，反对蒋介石的官僚独裁统治。《纲领》还指出：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④，要求恢复大革命时期联俄、联共政策。彭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抗战前夕，彭泽民发表《告全国各界领袖书》，要求国民党刷新政治，顺从民意，迅速实行民主政治，各党派平等合作，共赴国难^⑤。“七七”事变后，他和章伯钧于7月10日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全国上下一致遵守的政治纲领，实现民主政治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他还主张予华侨以参加祖国政治的机会，鼓励他们成立各地抗敌后援会，动员华侨参加抗日战争^⑥。他在香港创办了《抗战华侨》杂志，积极向海外侨胞进行团结抗日的爱国宣传。

皖南事变后，彭泽民和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于1941年1月20日联名发表给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公开信，谴责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要求“撤销剿共部队，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力量，保障各种抗日党派”^⑦。是年3月，各抗日民主党派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是发起单位之一，彭泽民因此也参加了同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彭泽民在香港两次被日本侵略者拘捕入狱，备尝艰辛，但他凛然不屈。抗战胜利后，他呼吁和平团结，反对内战，是南方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1946年9月，他写了《孙夫人〈对时局主张〉代表了全中国人》一文，表示完全赞同宋庆龄于7月22日发表的《对时局主张》所阐明的立场，要求国民党立即接受她的主张，与共产党实行停战，恢复

政治协商会议，进而组成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并认定这是实现“人民权利的起点”^⑧。

1947年1月31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代表会议，鉴于抗日民族解放的任务已经完成，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实现人民民主，决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4月，国民党为了和缓人民对其一党专政的强烈不满，宣布“改组政府”。彭和农工民主党留港中委郭冠杰、李伯球等发表《对改组政府的意见》，指出：“国民党临到政治完全破产，人心尽去的今日，竟来一套‘改组政府’，以图挽救危机”，完全“违反人民的要求，徒增人民的痛苦”^⑨。这时，彭泽民被推为设在香港的民盟南方总支部主任委员。他连续发表文章和宣言，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国民党与人民为敌，摧残民主运动的反动行径。

1948年5月，彭泽民代表农工民主党与其他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并在香港开展了新政协运动。这时，他已是香港的名医，生活优裕，但他不顾一切，应毛泽东的邀请，毅然离港，于12月26日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途中曾赋七绝一首：“廿年空有还乡梦，此日公车入国门。几经羁縻终解脱，布衣今日也称尊。”表现了无比兴奋的心情。

1949年2月，彭泽民到达北平，9月，代表农工民主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等职务。他继续用自己的精湛医术替人民看病，

为社会主义服务。1951年他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10月18日,他在北京逝世,受到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深切哀悼。

注:

- ① 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香港明阳出版社1973年版,第21页。
- ②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 ③ 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见《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 ④ 《中华论坛》第1卷10—11期合刊。
- ⑤ 同④。
- ⑥ 彭泽民:《怎样动员华侨》,《抗战行动》第1期。
- ⑦ 《新中华报》,1941年2月9日。
- ⑧ 《中华论坛》第2卷第2期。
- ⑨ 香港《华商报》,1947年4月24日。

张 治 中

余湛邦

张治中，原名本尧，曾字警魄，后改文白，安徽巢县人，生于1890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四日）。他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手工业者。他六岁入塾，读了十年书，应过童子试，没有考中。1906年离家外出，先后到安庆、扬州等地，当过杂货店学徒、缉私营候补兵、警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随后到上海参加学生军。1912年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1916年毕业，分配到安徽“安武军”倪嗣冲部见习。北洋军阀的腐败，使年青的张治中不堪忍受，他决心另谋出路。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张治中毅然离开“安武军”，到广州追随孙中山。在驻粤滇军中担任过连长、营长，还在驻粤桂军总部中担任过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大队长等职。并一度到四川任川军独立旅参谋长。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张治中是拥护三大政策的。同时，孙中山决定筹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张治中参加了建校工作。6月黄埔军校开学，他任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嗣后在第三期任学生总队代总队长，第四期任步兵一团（即入伍生团）团长，后调任军官团团长。在

此期间，他与在军校工作的周恩来、邓演达、恽代英等往来密切。当时，军校学生中有两个组织，一为“青年军人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为“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两派斗争很激烈。张治中“站在中间偏左”^①。1925年夏，他的言论和态度逐渐左倾，右派看不惯，称之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并把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他诬为“黄埔四凶”。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张治中由于公开表示不同意蒋介石反共的做法，几乎遭到逮捕。后来他渐渐得到蒋的信任。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蒋派张任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随军北伐。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又派为学兵团团长。不久黄埔军校改组为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在武汉成立分校，张治中被派兼任分校教育长。这时，蒋介石反共面目日益暴露。共产党人恽代英和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等极力争取张治中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张说：“我可以打电报劝蒋，但要我反蒋是做不到的。”^②与此同时，蒋也竭力争取张。“四一二”前夕，蒋曾命张率武汉分校学兵团赴江西。张感到进退两难：既不愿反对共产党，又不愿反对蒋介石。他决定辞职不干。“四一二”后他到上海，向蒋介石要求到国外学习，蒋不同意，要他到南京去负责筹备一个掌管全军训练的训练处。张把训练处组成后，已到8月，蒋介石正宣布下野。张乘机出国到欧美进行考察。行前，到浙江奉化溪口去见蒋，建议保持国共两党的合作，不要分裂。

1928年7月，张治中奉蒋介石之命回国，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不久，他要求调任军事教育工作，意图

“躲避两党斗争的风暴”^③，被派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1929年和1930年新军阀混战中，他先后以武汉行营主任和教导二师师长身份，站在蒋介石方面，对冯玉祥、阎锡山作战。1932年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军以沉重打击。1933年12月，任国民党政府第四路军总指挥，参与围攻福建人民政府。每次战事结束后，他仍回军校任职。

1936年西安事变时，张治中为了营救蒋介石，极力主张和平解决，反对“讨伐”。蒋被释放后，张多次在军校演讲《蒋介石的人格和修养》、《拥护领袖之真谛》等，抬高蒋介石。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之役，曾予日军以痛击。11月调任湖南省主席。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代表是徐特立，周恩来、叶剑英也常到长沙去，张与他们的关系都很融洽。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张治中担心长沙不保，一度打算长沙失守即进行敌后游击战，并请叶剑英任省府高级顾问，以指导游击战。后来他离开湖南，这些打算也随之作罢。当时江渭清在湖南组织抗日游击队，曾得到过他的资助。11月，张执行蒋介石“焦土抗战”的指示，引起13日长沙大火，延烧三天三夜，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蒋为推卸罪责，给张以革职留任处分。

次年2月，张治中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对内联系各部、会，对外联络各战区，参与机要。1940年9月调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他在政治部设置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安置了一批左派文化人。当时四川綦江有一所国民党特务建立的集中营，关押杀害了不少爱国青年，受到社

会舆论的谴责。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蒋介石派张治中去处理。张释放了一批无辜青年，撤销了这个集中营。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后，张治中对蒋介石一再破坏国共合作的局面，心情十分沉重。4月3日他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力陈对中国共产党问题处理失策，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产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④。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于1942年和1944年两次派代表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张治中都参与其事。他和当时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经常保持接触，极力从中斡旋，终因双方观点相去太远，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孔氏家族大量倒卖黄金美钞，在社会上臭名远扬。1943年秋，张治中在重庆秘密发起倒孔（祥熙）。一时，各地纷纷出现三青团参加的倒孔运动。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张治中率领三青团代表联名向大会提出《改革政治方案》，主张“真正以工农为本党组织之社会基础”，“彻底实行民主集权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城市土地和大工业都收归国有”，“举行党团员财产登记，每人不得超过十万元，超额者捐献，拒绝者一律开除党团籍”等等。这反映了张治中要改造国民党的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张治中继续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和平磋商。在各方面的促进下，蒋介石电请毛泽东到重庆会商国是。张治中和美国总统代表赫尔利一起到延安迎接毛泽东。8月28日毛泽东到

重庆后，张将自己的住宅腾出来供使用，并为毛泽东举办欢迎会，邀请各方面的代表和毛晤面。经过反复谈判后，国共两党终于签订了《双十协定》。之后，张治中又亲自送毛泽东返回延安。但是国民党并没有遵守协定的诚意，10月13日又密颁“剿匪手本”，并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12月马歇尔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分来华调停，张治中和周恩来、马歇尔进行了商谈。1946年2月，他们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研究军队整编统编问题，25日就《整军方案》达成协议。为了贯彻《整军方案》，月底，张治中和周恩来、马歇尔一起到各地进行了一次检查。到延安时，共产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张在晚会上发表讲演，末后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⑤ 3月27日，双方又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

这时，张治中被调任西北行营主任（后改称行辕主任，再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兼新疆省主席。4月赴任时，周恩来嘱托他把在新疆被盛世才囚禁的共产党人员全部释放。他到新疆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6月10日派八辆大汽车，由专人护送全体一百三十一人回到延安。

同年7月，蒋介石撕毁一切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10月占领张家口后，立即下令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关系完全破裂。这时，张治中心情十分懊丧，但仍然希望为国内和平贡献力量。1947年1月他回南京，坚决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争端，遭到不少顽固分子的冷嘲热讽。3月上旬，他“带着极其忧虑烦闷的心情，再飞迪化（即乌鲁木齐）”^⑥。行前，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分析了国民党党政军种种弱

点,建议“对外联苏,对内和共”^⑦。7月,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发“戡乱”令。但是,张还想为“恢复国内和平再尽一点力量”。9月11日,他又飞回南京,第二天早上就去见蒋,重申前说,仍不为蒋采纳。张内心十分苦闷,乃到苏州、杭州、上海、台湾等地游览,寻求排遣。在台湾曾对张学良作第三次访问(第一次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在宋子文家里;第二次是1938年在湖南沅陵)。他们谈得很多。临别时,张学良还赠了张治中一首诗:“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⑧张治中11月回到南京,12月写了一个建议给蒋介石,主张派遣特使赴苏,打开中苏僵局,并觅取解决国内问题的途径,其中“分析利害,至为详尽”。

1948年6月,在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的形势下,蒋介石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约张治中谈话。张再一次劝蒋改变对苏联和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对苏外交要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对共产党要主动放弃“戡乱”,停止战争。12月平津战役打响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会后约张治中谈话,问他对局势的看法,有什么意见。张说:“现在的局势已经比我们6月在西安时差得太多,这个仗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⑨蒋问张是否愿意担任行政院长?张表示,如果“戡乱”政策不变,绝对没法担任。蒋又问张是否愿意担任国防部长?张说,绝不能担当这个任务!但表示,如果蒋希望和平,他愿为和平奔走。谈话无结果而终。几天后蒋在一次讲演中斥责主和者,说要将“戡乱剿匪”方针全力贯彻到底。张更感失望。

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遭到惨败,1948年底,白崇禧忽然发出主和的电报,并宣称非蒋介石下野不能谈和。电报是通过

张治中、张群转给蒋介石的。两张约同吴忠信研究后，认为蒋介石非下野不可。三人拿了白的电报见蒋，委婉陈词，一连谈了多次，最后蒋同意“引退”。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表面上下野离开了南京，事实上还在溪口指挥一切。张治中见此情况，便想劝蒋出国，放手让李宗仁去促进和平，认为这样对蒋个人也有利。他于3月3日到溪口，住了八天，对蒋把“一切的问题差不多都谈过了”。关于蒋出国的问题，“第一天见蒋便被他发了一顿脾气”^⑩，以后转弯抹角地说，也未说通。后来张到北平参加和谈，又写信劝蒋，说出国“有百利而无一害”。

4月1日，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行前于3月29日到溪口去看蒋，想听取他对于和谈的意见。到北平后，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双方达成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4月15日，共产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提交对方，20日被国民党政府拒绝。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李宗仁、何应钦电促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返回，周恩来劝代表团留下。张治中一度“心情处于极度苦闷与矛盾中”^⑪。周恩来劝他说：“将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仍有签订和平协定的可能。”还说，西安事变后，未能阻止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致使其遭幽禁，至今引为憾事，倘张治中此时回去，恐要遭到与张学良同样待遇。“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⑫毛泽东也亲往张的住处慰问，多方劝导。至此，他的“思想乃初步搞通，内心亦渐次宽解”。6月15日、20日、22日，国民党中央社连发三

个电讯,对张治中进行攻击和诽谤。26日,张发表对时局声明,表示为中国的解放感到欣喜安慰,号召国民党军政官员“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⑬。

9月8日,张治中致电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促进了新疆的和平解放。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张治中参加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12月,张治中偕同彭德怀赴新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以后,张治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

注:

- ①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30年版,第1页。
- ② 同①,第4页。
- ③ 同①,第6页。
- ④ 同①,第21页。
- ⑤ 张治中:《六十岁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第114页。
- ⑥ 同⑤,第98页。
- ⑦ 同①,第91页。
- ⑧ 同①,第49页。
- ⑨ 同①,第117页。
- ⑩ 同①,第124—126页。
- ⑪ 同⑤,第99页。
- ⑫ 同①,第184页。
- ⑬ 同⑤,第115页。

章 伯 钧

周天度

章伯钧，1895年11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一）出生于安徽桐城。父章扬清，薄有田产。章伯钧七岁丧父，其母变卖田产供他上学。

章伯钧幼年入私塾，继入桐城中学，1916年考入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1920年毕业，回到安徽任宣城师范学校校长，因聘请了恽代英等任教员，思想倾向进步，一年后即被解除校长职务。1921年章伯钧到北京投考庚款留美，未被录取。当时许世英任安徽省教育厅长，对章颇器重，给以公费派赴德国留学。次年由上海启程，与朱德、孙炳文等同轮前往柏林。

章伯钧到德国后，入柏林大学学习，攻黑格尔哲学。他在柏林大学三年，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1925年邓演达到柏林，章伯钧结识了他。邓的政治主张，对章后来有一定的影响。

1926年春，章伯钧回国到达广州。当时郭沫若在广东大学（7月改称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经孙炳文介绍，章被聘为广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不久，广东国民政府北伐，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章伯钧从广东到达武汉，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3月，

邓演达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章被任为农民部设立的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他积极支持农民运动，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

同年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清党”“分共”，大革命失败。邓演达离开武汉前往苏联；章伯钧则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并被起义后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章随军南下。部队进入广东后，与国民党军队交战失利，他经潮州乘船到香港，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28年，章伯钧从香港到上海，与谭平山等发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又不同意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表示要恢复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继续民族民主革命。他们与在国外的邓演达取得联系，得到邓的支持。人们从此把这个介乎国共两党之间的小政治派别称之为第三党。

1930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党全国干部会议^①，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他起草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举了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为总干事，章伯钧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推翻南京反动政府，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1931年8月17日，国民党特务将邓演达逮捕，随即予以杀害。章伯钧和黄琪翔、彭泽民、季方等列名负责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工作。

1933年9月，章伯钧和黄琪翔到香港，随后去福州，参与

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发动的联共、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他任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所属的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在“闽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声明脱离国民党，参加陈铭枢组织的生产人民党，章伯钧和黄琪翔等也参加了该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这时不得不宣布解散。由于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福建人民政府不到两个月即宣告失败。1934年春，章伯钧从香港流亡到日本。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章伯钧由日本返回香港，和彭泽民积极准备复党的工作。是年11月1日，他们在香港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鉴于反抗日本侵略，实现民族解放，已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将该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日本侵略华北，目的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便是立刻发动民族革命的战争，以求完全的解放”；认为民族革命战争没有广大的农民参加，便无胜利的希望，因此，“土地革命与反日战争是不可分离的”^②。要求一切革命的党派，“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挥机关”^③。《纲领》还认为：“中国现有苏维埃的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要求恢复联俄、联共政策。这次会议选举了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等十九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章伯钧成为临时中央的实际主要领导人。

1937年7月10日，章伯钧和彭泽民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共同遵守的纲领，实现民主政治，改善劳动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成立人民武装指导机关，组织抗日志愿军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④，但为蒋介石所拒绝。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电邀海外爱国人士回国，共赴国难，章伯钧随即回到南京，参与抗日活动。由于国民党歧视和排挤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当时设立的国防参议会，没有邀请章参加。

1938年3月1日，章伯钧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次代表会议，通过《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作政治上的大改革，“整个地扫除官僚主义的毒害，切实实行民主政治”^⑤。章伯钧说：“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增加抗战力量，保证抗战胜利。”^⑥他主张建立民意机关，使人民有参政的机会。同年6月，他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不久，他和其他国民参政员一同去重庆。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将它的政策重点逐渐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1939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上，共产党和其他各抗日党派的参政员掀起了宪政运动，章伯钧与张君勱、左舜生联名提案，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宪政，全国政治上彻底开放，各党各派一律公开活动，以增加抗战力量。这些要求在参政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引起“非常激烈的辩论”^⑦，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反对。11月下旬，章伯钧与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勱、乡村建设学会的

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要求成立宪政政府。由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持团结抗战，主张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在1941年3月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时，章伯钧被国民党除名。其后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也没有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皖南事变后，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各党派负责人为了加强团结合作，争取民主，调解国共冲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特园秘密召开成立会，章伯钧被推为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集体参加了同盟。1944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章伯钧继续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并任民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

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创办《中华论坛》杂志，章伯钧任主编。他积极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以代替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建议。他驳斥了蒋介石指摘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是“分赃”的说法。他说：“党派会议或联合政府是合理的，是团结全国打开时局的第一步骤”^⑧。7月，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章伯钧的国民参政员得到恢复。为了促进国共团结，他和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冷遹、傅斯年等参政员于7月1日一同赴延安访问，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商恢复国共和谈问题，5日返回重庆。

抗战胜利后，章伯钧积极主张全国各党派共同和平建国，实现民主，反对内战。9月15日，他发表时局谈话，指出：解放区的军队及政权，“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

度”^⑩。他还指出，内战不得人心，“是招致灭亡自杀的途径”^⑪。

1946年1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政协宪草审议会和宪法小组的工作。在出席会议的民盟和无党派代表中，他同沈钧儒、郭沫若、张申府被认为是能和共产党密切合作的四名左派人士。5月，章由重庆到上海。12月，他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他说：中国固然需要宪法，但目前更需要的是民主、和平和统一。“有了这三个事实，宪法才有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就是曹锟的宪法。”^⑫

1947年1月31日，章伯钧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鉴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后，面临的任务是争取实现人民民主，决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决定以1930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为基本纲领。章在这次会上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国共和谈破裂以后，国民党政府厉行白色恐怖，加紧镇压民主运动，于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中央部分负责人被迫宣布解散民盟总部，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章伯钧和沈钧儒反对解散民盟，相继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1948年1月5日至18日，他们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发表声明，否认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反动措施，不接受民盟总部在南京政府威胁劫持下的总辞职和解散总部以及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的声明。会议通过宣言和政治报告两个文件，鲜明地提出了反蒋、反美和

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装斗争，拥护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张，并且宣布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转向同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这样，三中全会就成为民盟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决定沈钧儒和章伯钧以中央常委名义，负责领导全盟盟务。

同年5月，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与在香港的其他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随后在香港参与开展新政协运动。9月1日，章伯钧和沈钧儒离开香港，乘海轮前往东北解放区，代表民盟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9月29日到达哈尔滨。11月26日，他们发表时局声明，提出：第一，民主的新中国，只有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的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第二，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扫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第三，统一的新中国，只有在消灭统一障碍的反动独裁集团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①。

1949年2月，章伯钧由哈尔滨到达北平。6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民盟筹办的《光明日报》创刊时，他任社长。9月下旬，章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协常务委员，并被任命为交通部长。

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患胃癌在北京逝世。

注：

① 该党以后把这次会议看作是第一次全国临时代表会议。

② 《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

- ③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存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资料委员会。
- ④ 《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
- ⑤ 《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
- ⑥ 章伯钧：《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抗战行动》第6期。
- ⑦ 邹韬奋：《抗战以来》。《韬奋文集》第三卷第230页。
- ⑧ 章伯钧：《纪念国父》。《中华论坛》第3期。
- ⑨ 《章伯钧先生对时局谈话》。《中华论坛》第9期。
- ⑩ 章伯钧：《谈内战问题》。《中华论坛》第10—11期。
- ⑪ 《文汇报》1946年12月15日。
- ⑫ 《民盟文献》，中国民主同盟总部1948年编印，第98—99页。

邓 初 民

江绍贞

邓初民原名经喜，字昌权，1889年10月20日（清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北石首县。祖父为佃农，父亲教村塾兼行中医。

邓初民五岁时就在他父亲的私塾里受启蒙教育。他对古代历史故事很感兴趣，仰慕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献身精神，投考石首县高等小学时，便改名希禹。辛亥革命前他入荆南中学读书，耳闻目睹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下穷苦农民的悲惨遭遇，产生了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1910年，他和同学们一起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开始向往革命。

1911年武昌起义后，邓初民“曾得到一时的振奋，认为国家可望从此好起来”^①，便离乡到武汉，考入江汉大学。当时校内有同学宣传社会主义，他看到了讲社会发展史的书籍，“很希望做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社会的人”^②，便又改名初民。

随着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夺，对革命曾经满怀希望的邓初民陷入了失望之中。他为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由亲友资助，于1913年5月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其时，日本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在帝大讲授《资本论》，邓初民前往听课，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开始接触到

马克思主义学说。

1915年，袁世凯为恢复帝制，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中国留日学生无比愤慨，在东京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开展反袁斗争。邓初民担任总会评议会会长，兼任会刊《民彝》的编辑。

1917年邓初民由日本毕业回国到武汉，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自己连职业也找不到，在苦闷、彷徨中回到石首老家。1919年6月，应友人的邀请去太原法政专门学校教书。到太原后，教职因故未成，他在进退维谷之中写了一篇《旅晋一星期有感》的短文，发表在《山西日报》上。山西督军阎锡山看上了他的文采，留他为自己写参加辛亥革命的回忆录；后来又许他官职，但他没有接受，宁愿到进山中学当一名教员。此时，“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已进入新的阶段，他阅读了《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思想大为开阔，从中挑选一些文章作语文教材，很受学生欢迎。他还与几位老师合办工人夜校和《新觉悟》杂志，宣传进步思想。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邓初民感到很兴奋。他应湖北法政大学之聘离晋到汉，任该校教务长。其时，董必武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负责人。经董介绍，邓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邓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以后又兼任湖北省党部青年部长及宣传部长，在宣传新三民主义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邓初民担任湖北省临时政务委员会（后改为省政府）委员，先后在湖北党务训练班、文官养成所以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课，还亲身参加民众运

动。他还与孔文轩等为湖北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拟订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并担任审判委员会审判长，亲自审处了一些土豪劣绅。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革命队伍里制造分裂。邓初民坚定地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北伐军攻克南昌不久，他率湖北各界慰问江西军民代表团前往南昌，在蒋主持的招待会上呼吁团结对敌，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也于7月宣布“分共”“清党”，与蒋介石合流。湖北省政府的权力被右派篡夺，邓初民的省府委员职务被解除，他在武汉难以立足，于年底到上海。

邓初民在上海，除先后在暨南大学、艺术大学、中国公学等校任教外，还和李达、许德珩、黄松龄等组织了以不忘本、不作损害共产党的事为宗旨的“本社”。随后，他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并担任主席，通过出版刊物，组织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小组等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在此期间，邓开始系统地学习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政治科学大纲》和《政治学》两本著作，是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撰写的新型政治学的代表作。

“九一八”事变后，邓初民到处演讲，唤起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方针，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1933年暑假，他被暨南大学解聘，不得已，从上海到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他仍然利用讲坛及其他各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和全民抗日的主张。1935

年“一二九”运动爆发，邓初民与爱国学生一起参加示威游行。后因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被迫离穗到香港暂避。

1936年2月，邓初民任教于广西大学。6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广东陈济棠联合，以抗日为名，筹划出兵倒蒋。邓初民由李、白派往山西，动员阎锡山参与支持。阎未作肯定的回答。邓返回广西时，李、白已与蒋介石妥协，并对真诚抗日的人加以排挤打击。1937年，广西大学停止了她的教职。这件事使他对桂系的所谓“抗日”、“开明”有了清醒的认识。正当他处境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张云逸与他取得联系，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使他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1937年9月，邓初民离开广西到武汉，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他联络孔庚、马哲民、孟宪章等几位老友，创办了《民族战线》周刊。随后组织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1938年春他到沙市，任朝阳学院（原北平朝阳大学）政治系主任，与马哲民、黄松龄等人一起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是年夏，邓初民随朝阳学院迁往成都。他一面利用讲坛宣传抗日，一面与马哲民、黄松龄用“邓马黄”笔名合写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方针和根据地的民主政治，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一时，“邓马黄”之名在成都很有影响。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对他们的活动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经车的安排，邓初民还对川康地方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做了大量团结抗日的工作。后来由于成都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车耀先等被捕。1940年底，邓被迫离开

成都到重庆。

邓初民在重庆得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从事政治活动的积极性更高了。1941年他与王昆仑、许宝驹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③，还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他是积极活动者之一。1944年10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他以个人身份加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这段时间里，他主要作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团结国民党爱国将领及文化教育界人士坚持抗战。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时，接见了邓初民，并向他讲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使他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更加坚定，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他以顾问的身份参加民盟代表团的工作。当时青年党追随国民党攻击共产党拥有地方政权和武装，邓立即撰文予以驳斥，指出：“解放区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解放区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保护人民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④为促进政协会议成功，壮大和平民主力量，他与文化界进步人士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文化界协进会，被推为理事。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他和文化界人士一百五十余人签名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揭露反动派破坏民主运动的罪行。国民党反动派于7月间公然在昆明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并放出空气，要在上海暗杀沈钧儒、陶行知，在重庆暗杀邓初民。他听到这个消息，毫不畏缩，毅然在重庆参加筹备和出席李、闻追悼大会，并在大会上演说，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邓初民在重庆的几年中，除经常给《新华日报》写文章，呼

吁实行民主政治，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外，还任民盟重庆市支部机关报《民主星期刊》和《唯民周刊》的主编，进行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等方面的宣传。他还撰写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世界民主运动新趋势》等著作，提出“新型的民主政治”的论点。

1947年1月，邓初民因参加民盟二中全会到了上海。他不顾白色恐怖，仍然利用各种机会进行争民主、反独裁、反内战的宣传活动。在纪念“一二八”十五周年的群众大会上，他慷慨激昂地发表反内战演说，田汉当场赋诗，把他喻作“铁人”。他还深入到永安公司、劝工大楼以及各大学，向职工、学生作宣传。2月，蒋介石彻底破坏和谈，限令中共驻上海、南京代表团撤走。邓初民于3月中旬出走香港。

邓初民到港后，任教于达德学院。同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总部解散，许多领导人先后到港。邓积极参加沈钧儒等人在香港重建民盟领导机构的活动。1948年1月在港召开的民盟三中全会，公开声明要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为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而奋斗。邓初民对那些企图寻找第三条道路的人给予了有力的批判。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并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委。5月1日，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商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邓与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通电拥护，中共中央立即回电表示欢迎。是年底，邓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他庆幸“一个崭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⑤。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邓初民由沈阳到平，4月往

布拉格出席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邓初民先后担任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山西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以及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等职务。他还先后写了《阶级、阶级斗争概论》、《怎样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等著作。1962年，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1年2月4日，邓初民在北京病逝。

注：

- ① 邓初民：《九十述感》。《湖北文史资料》第三辑。
- ② 邓初民：《沧桑九十年》。《战地》1980年第4期。
- ③ 成立时名“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民革”。后来为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简称相区别，通称为“小民革”。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的秘密政治团体，1949年9月解散。
- ④ 史良：《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人民日报》1981年3月20日。
- ⑤ 同①。

江 庸

汪仁泽 陈光贻

江庸，字翊云，号澹翁，福建长汀县人。1878年4月29日（清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生于四川璧山县。祖父江怀廷，咸丰时进士，以知县分发四川，卒于南充任内。父江瀚，曾任北京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文科学长和学部参事，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山西大学教授等职。江庸幼承家教，学有渊源，具有国学基础。二十一岁时入成都中西学堂学习英文。

1900年江庸进京应科举考试，适遇义和团反帝运动，遂经大同、西安折返四川。翌年，川督迭派留学生赴日，江入选东渡，进日本成城学校普通科，两年后毕业，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师范部法制经济科，毕业前曾兼管法政大学中国学生速成班学务，并充任翻译、助教等职。1906年，清廷派遣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学务，江被派充照料员。留学期间，他结识了秋瑾、蔡锷、梁启超、蒋方震等人。是年毕业回国，被直隶总督袁世凯聘为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总教习，未到任即改由学部调普通司任职，兼京师法政学堂总教习。不久修律大臣沈家本聘江为修订法律馆专任纂修、法律学堂教习。1907年又经大理院调任详谳处推事。次年应学部考试，成绩优等，奖给法政科举人。1909年参加归国留学生考试，以一等第四名，授大理院正六品推事^①，兼任京师法律学堂监督。

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是年12月，唐绍仪充当袁内阁全权代表，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谈判南北议和。江庸为随员，偕赴上海。

1912年民国成立，江庸留任大理院推事；9月，简任高等审判厅厅长。次年熊希龄组阁，梁启超长司法，江任司法部次长。1915年冬，江自东北考察司法回京，进见总统袁世凯，时袁图谋帝制自为甚急，江对时政颇多评议，袁深感不悦。江退出后即呈一辞职书，语甚激切，抨击袁摧残民国。袁大怒，拟立免江职，袁的秘书长张一麐向袁进言：“江的辞职乃是负气，自总统就任以来，无敢非议时政的，现在有个江庸，岂非好事？何不温语慰留，以示宽容虚怀。”袁怒稍息，着张拟一批令留之；但正色对幕僚王式通说：“你去告诉江庸，以后但做官，少说话。”^②江仍坚辞而去。1917年5月，北洋政府李经羲继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李发表阁员名单，任命江庸为司法总长，江坚辞不就，避往汤山。7月张勋复辟时，江避至天津。11月，王士珍组阁，江庸再度出长司法。不久江因拒绝在赦免复辟要犯张镇芳的文件上副署，发生齟齬，愤而辞职，受到舆论的赞许。江在出长司法任内，曾创立京师第一模范监狱，实行较人道的管理制度，附设监狱工厂，由犯人参加劳动，想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创造条件^③。

1918年4月，我国留日学生因要求发给归国旅费的借款及增加官费，与驻日公使馆官员发生冲突，数人遭拘押。广大留日学生抗议使馆的无理行径，事态扩大。公使章宗祥无法应付，各省所派监督亦多逃匿。江庸在教育总长傅增湘坚请下，出任日本留学生总监督。赴日后，保释被捕学生，按月发放

官费生学费，事遂平息^④。1920年辞职回国，任法律编查馆总裁，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此后又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等职。

1923年10月贿选总统曹锟上台后，江庸辞去所任职务，在北京设立律师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并创办《法律评论》周刊，任法律评论社社长、尚志学会会长。江于1924年曾赴广东晋谒孙中山于广州士敏土厂，孙“嘱留广东八月为之帮忙”^⑤，江婉辞。旋北返，受聘任国立法政大学校长；1927年起任朝阳大学校长。江历次办学，皆亲自执教，为培养我国司法人才出力甚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成立伪满洲国。江庸著文登报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并指名斥责其学生、出任伪职的赵欣伯叛国投敌、为虎作伥，声明脱离师生关系。1936年江庸受聘任南京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6月，代表中国律师协会，出席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律师协会世界会议。10月途经苏联莫斯科回国。此时日本侵略势力已逐渐威胁平津一带，江庸径赴上海，全家从北平迁沪定居。

“七七”抗战爆发，不久江浙沦陷，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在筹组伪政权时，汉奸温宗尧拟拉江庸出任伪职，江拒绝。不久，日军将领畑俊六携台湾人许丙（1929年江为西北地区大旱灾赴台募赈款时所识）来沪诱劝，复予严拒。1938年7月，江庸赴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后去重庆，在渝执行律师业务。1943年江被推为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抗战胜利后，1946年江携眷返沪，继续执行律师业务。1948年国民党政府提名江庸为“国大代表”候选人，江拒不参加竞选。不久国民

党政府公布“宪法”，宣布江庸为大法官，江力辞不就。自抗战军兴直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多次邀江出任行政职务，皆为江所固辞。他自号澹翁，以“澹荡阁”名其居所，以示澹荡明志之意。在执行律师业务期间，曾于1935年为历史学家侯外庐在北平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事辩护；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中，江亦曾为被捕诸人义务出庭辩护。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李宗仁上台，江庸应李宗仁之邀，与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赴北平试探求和。2月14日江等北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22日在石家庄接见，表示：“你们为寻求和平途径，远道前来，共产党是爱和平的，可以商量，只是地点、时间、人选尚须考虑。”^⑥并曾问到：“你们看蒋介石为何失败？”江答：“我以为主要是不能用人，只能用奴才，不能用人材。”临行并抄赠毛泽东诗数首^⑦。江庸返抵南京后，与国民党当局晤谈，确知蒋介石集团对议和并无诚意，遂向李宗仁坚辞，不愿再北上和谈。是年秋，江庸得毛泽东手书邀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特邀代表，并被选为全国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庸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副馆长、馆长。江还先后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市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1960年2月9日，因病在沪逝世。

江庸生平著作除随笔、日记《趋庭随笔》、《沪滨避兵记》外，多游记，已出版的有《欧航琐记》、《斐律滨游记》、《台湾半月记》等；诗集有《百花山诗草》、《南游诗草》、《甦生诗稿》、《积

跬步斋诗稿》、《澹荡阁诗集》等多种；法律著述散见《法律评论》及其他杂志。解放后曾编撰《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浅说》、《惩治反革命条例解说》、《劳动保险条例图说》等小册子多种。

注：

- ① 《民国长汀县志》卷十四《选举志》“留学生考试”条。
- ② 江庸：《趋庭随笔》。（又据《江庸自传》中称：此段经过，1939年在重庆时始闻知于张一鹗。）
- ③ 江庸在《撤废领事裁判权问题》中称：“各国既与我国订有俟司法改良即行撤废领事裁判权，……必先自审司法改良之成绩何。”而“监狱之改良”亦属司法改良内容之一。
- ④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一期第66—71页。
- ⑤ 《江庸自传》中称：“赴广东游历，谒中山先生于士敏土厂，先生嘱留广东八月为之帮忙，因北京尚有要事婉辞，究未知所嘱何事，故以八个月为期。当时北返，后在京晤中山先生，亦竟未问及也。”
- ⑥ 江庸：《和谈回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三辑第132页。
- ⑦ 江靖：《和谈余闻》。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三辑第134页。江庸在赠诗中有“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两句。1957年5月8日陈毅病中致江庸函中曾提及：“先生诗留集太少，又宣言不复作诗，弟以为过矣。可否采纳弟之两项建议：将千篇大部或全部刊行；宜破戒多作诗，以反映人民新时代，大集中如：‘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此等奇句，何可以不作耶？”

徐 谦

蔡静仪

徐谦，字季龙，教名乔治，晚年自署黄山樵客，安徽歙县人。1871年6月15日（清同治十年四月二十八日）生。他的家庭是当地的望族，所谓世代书香之家。他四岁丧父，在母亲抚育下成人。从小刻苦习读经史，兼涉西学。1902年乡试中举，1904年中进士，入译学馆攻读。1905年译学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他在仕学馆学法律、政治。1907年任翰林院编修，旋任法部参事，主持制定法律，曾拟订司法制度改革条例。1908年任京师审判厅长，一年中处理积案千余件，深得好评，升任京师高等检察长。1910年，他和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许世英代表中国去华盛顿出席改良监狱的第八届国际会议，赴美途中曾到莫斯科、柏林、罗马、巴黎、伦敦考察各国司法制度。

1911年徐谦回国时，武昌起义已爆发，他辞去京师高等检察长职。同年底他和许世英等发起组织国民共进会，以该会名义发表《共和联邦折中制商榷书》，主张在中国成立“联邦共和国”，立法司法集中于中央，行政分权于地方。1912年3月，徐谦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司法部次长。6月，由于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颁布命令须经内阁副署的规定，唐绍仪愤然去职，徐亦与其他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8月，国民共进会与同盟会及其他几个小团体联合组成国民党，徐谦被举

为党本部参议。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徐谦于4月27日在《民权报》上发表《布告国民》一文，号召武装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意志消沉，回上海当律师。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9月，徐谦到北京任段祺瑞内阁司法部次长，并于此时在基督教圣公会受洗入教。他说自己入教是为了救国，后来曾发起建立全国基督教救国会。

1917年7月，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南下广州，徐谦偕同前往，为大元帅府秘书长。1918年4月，孙中山为旧桂系军阀排挤，离粤赴沪，委派徐谦为代表，参加军政府政务会议，被桂系控制的军政府任命为司法部长。1919年1月，孙中山派徐谦和陈友仁以南方代表顾问身分出席巴黎和会。他们反对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不同意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徐谦回国后，因对把持军政府的岑春煊不满而未回广州，去天津任天主教创办的《益世报》主编。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夕，北洋政府十六混成旅旅长兼湘西镇守使冯玉祥率部队由湖南常德进驻汉口，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呼吁南北“早息内争”。孙中山命徐谦和钮永建去汉口和冯玉祥会晤，争取冯一致行动。据冯说，此次会见使他很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嗣后，徐谦成为孙、冯之间的联络人，常常往来于冯玉祥军中。

1921年4月，广州国会开非常会议，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徐谦任大理院院长。1922年8月，由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离广州赴上海，徐谦也随去。1923年2月，陈炯明兵败下台，孙中山再回广州组织大元帅大本营，命徐谦、胡汉民、汪精卫等为驻沪代表，参加南北和议。议和失败后，徐谦回广州，

任岭南大学文学系主任。这一年，徐多次奉孙中山之命，与冯玉祥洽商联络反直。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徐谦表示积极赞成。同年10月，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是。徐谦曾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赞扬冯“见义勇为”，主张解散非法国会，召集和平会议，从各省农工商学团体及全国孚重望而有功于民国的人士中遴选委员，并认为“前清废帝乃系民国乱犯，应治以国法”^①。10月26日，冯玉祥邀请徐谦到北京，参加国事会议。旋被任为俄文法政学校校长^②及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当时，李大钊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主持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徐谦在李大钊领导下，积极参加1925年的国民会议运动及“五卅”反帝运动。他还帮助冯玉祥在北京创办今是学校，收容因参加“五卅”运动而被开除的大中学生，并从中选拔学生到冯玉祥的部队中去建立国民军政治部。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徐谦被选为政府委员，兼管司法行政。他去广州前，参加7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国民大会，反对英日等帝国主义屠杀我国人民，被大会推举为执行主席之一。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徐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又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任。在京津一带的反日示威运动大会上，他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援助张作霖进攻国民军的行为。同年3月18

日，他主持北京各界在天安门召开的国民大会，反对日舰进攻大沽口，驳斥八国最后通牒。段祺瑞一手制造了大规模枪杀请愿群众的“三一八”流血惨案，并下令通缉李大钊、徐谦等人，诬说他们“假借共产学说，煽聚群众，屡肇事端”^③。这时，冯玉祥因遭奉直联合反对而下野，启程去苏联考察。徐谦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为了争取冯玉祥，与其同行，途中一再劝说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冯受徐谦及其他各方面影响，于4月底由徐介绍加入国民党。8月，徐回广州，当时北伐已开始，他正式担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职。10月，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委员和各省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国民政府政纲及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事宜，徐谦为会议主席团五成员之一。

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鲍罗廷、徐谦及一部分国民政府委员先去武汉，筹备迁都事宜。然而，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在那里安下北伐军总司令部，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相对抗。他为了独揽党政军大权，执意迁都南昌，于是发生了迁都问题的争执。12月13日，武汉组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徐谦被推为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开展了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登陆，我国群众起而抗击，声势极大。徐谦前往发表演说，支持我国人民争取收回租界的正义要求。3月10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二届三次全体会议，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制止蒋介石独裁的决议，徐谦被选为国民党中央

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常委。4月2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张静江等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紧急会议，通过“清查共产党呈文”，徐谦被列入看管监视的名单之中。

4月19日，武汉政府出师河南，继续北伐，6月1日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郑州。6月10日至13日，徐谦和汪精卫、孙科、顾孟余等武汉政府领导人到郑州和冯玉祥会谈，决定将河南全省及陕甘两省让作冯军防地，任冯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并组织开封政治分会，由冯玉祥任主席，而徐谦为委员，负责党务。

徐谦对工农运动的看法，早在武汉政府初建时期就同共产党人及其他国民党左派发生过分歧。他反对分配土地和惩治反革命，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并从而开始对共产党、鲍罗廷产生不满。郑州会议期间，他又对冯玉祥指陈共产党“残暴”、鲍罗廷“专横”、武汉“秩序混乱”等等，建议冯出面要求驱逐鲍罗廷。这对冯起了一定的作用，使他终于通电武汉国民政府立促鲍罗廷回国。郑州会议后，徐谦借口筹备开封政治分会及河南省立大学而不再回武汉了。7月初，武汉街头曾出现“徐谦右倾”等标语。7月以后，冯玉祥在其军中及他所控制的地区逐步进行“清党”，“清党章程”是由徐谦手订的。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宁汉趋向合流。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召开的临时会议上，徐谦竟意外地被认为有“附共嫌疑”。一时报刊均对他进行指责和评论。他由河南鸡公山跑到上海，11月17日公开声明退出政治活动。不久他迁往香港，定居九龙。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组织福建人民政府，主张反蒋抗日，徐谦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筹备会议，并赴闽参加了在福州召开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当选为委员。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被任为最高法院院长。次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他又去香港。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徐谦从香港到南京，后到武汉、重庆，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但这是一个闲职。1939年10月，他去香港治病，于1940年9月26日在那里病逝。

徐谦的著作有《民约总论》、《刑法丛编》、《劳资合一》、《诗词学》、《笔法荟谈》、《徐季龙先生遗诗》。

注：

- ① 《申报》1924年10月26日。
- ② 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于1925年3月7日改名为中俄大学，徐谦任校长。
- ③ 《政府公报》。第3570号。

主要参考资料：

- 戴季陶：《共和联邦折中制商榷书》。
- 《冯玉祥日记》。
- 《徐季龙先生哀荣录》。
-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邱 菽 园

陈 民

邱菽园原名德馨，自号“星洲寓公”，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生于福建海澄（今龙海）县。父亲邱正中于1840年到新加坡当劳工，后经商致富，成为新加坡著名米商。邱菽园六岁出国至新加坡，由父亲聘家庭教师讲授中文典籍，后回国继续深造。二十岁参加乡试，中举。1895年赴京会试，不第。时值甲午战败，我国割让台湾，他参加上书反对割台，不获报。失望之余，绝意仕途，返回新加坡。这时他的父亲已故，他与弟邱德祥继承遗产，各得七十多万元，成为巨富。

邱菽园工诗词，为人豪放，倜傥不羁，日以诗酒与南来名士交游，对公益事业莫不慷慨解囊，有“小孟尝君”之称。林文庆等倡办中华女校时，他捐三千元作建校基金，表示对女子教育的支持。他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与林文庆同为当时南洋著名的维新派领袖。他们合作组织了“好学会”等社团，开设中国古典文学讲座，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陈楚楠、张永福等，就是受了他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1898年，邱菽园独资创办《天南新报》，鼓吹维新救国，得到林文庆的支持，林出任该报英文编辑。

1900年2月，邱菽园邀约康有为到新加坡，随后被康有为推举为南洋英属各邦保皇会分会会长。同年7月，唐才常在

汉口组织自立会，图谋东南大举，邱菽园捐饷二十五万元。由于各种原因，再加上康有为扣压华侨捐款，起义数次改期而失败。事后，秦力山、朱菱溪等陆续来到南洋，向康有为清算。邱菽园才知道康有为骗款卖友的实情，大为震怒，在《天南新报》发表《论康有为》，揭露康借维新救国之名，到处捐钱，从中作弊。邱在文中质问：捐了许多款，究竟做出什么事来？有一笔明白的账开给大家看吗？此外，仅就康有为保皇党的立场来说，他说有光绪皇帝的御书和衣带诏存在他那里，他总是自己吹嘘，却从来没有给人看过，我相信这是骗人的，假如是真的话，为什么同党极亲密的人都不能看到呢？康有为以后不要再骗人了！^①邱并声明从此与康断绝一切关系。邱菽园这一揭露，影响很大，许多投身保皇党或受过康、梁蒙骗的人，如马来亚的郑螺生、李源水等人，也都先后与保皇党断绝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后来成为同盟会南洋分会的早期会员。

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之役，使清政府开始注意到邱菽园、林文庆等南洋华侨富商的活动，遂通过驻新加坡总领事对邱、林等人支持“叛乱”加以警告，还逮捕了邱菽园在国内的亲戚。邱菽园被迫花一千两银子，向清廷捐了个“道台”，以示对清政府“效忠”。

1905年，邱菽园由于投资土地买卖而亏蚀一空，他的弟弟邱德祥也经营失败，兄弟两人不得不宣告破产，向法院报穷。不少人为之惋惜，但邱菽园却不以为意，身居陋巷而孜孜不倦于新小说之阅读与欣赏，并仿效锺嵘《诗品》体例，作《新小说百品》，后又著《客云庐小说话》^②。

民国成立后，军阀割据，战祸连绵，邱菽园愤懑不已，曾在自己承办的《振南日报》上著文抨击。1929年胡文虎创办《星洲日报》，聘请邱菽园任该报副刊主任。但他上任一年，便以老病辞职。从此谢绝应酬，以诗酒自娱。晚年笃信佛教，为居士，终日蛰居于“觉觉经舍”。

1941年11月30日，邱菽园病故于新加坡。

邱的主要诗作有《啸虹生诗钞》，康有为曾为其作序，认为其诗“滂博天葩，雄奇俊迈”，“或与黄公度京卿骖靳联镳焉”^③。此外，还著有《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麈》、《挥麈拾遗》等诗文集。

注：

- ① 胡汉民述，张振之记：《南洋与中国革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一册，台北正中书局1966年版，第478页。
- ② 邱菽园上述二文，于1907年先后发表于香港《新小说丛》第一期及第二、三期。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377至426页。
- ③ 康有为：《邱菽园诗集叙》。《啸虹生诗钞》，1922年线装本第1—2页。

侯 西 反

陈 民

侯西反，福建南安县人，生于1882年8月20日（清光绪八年七月初七）。童年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二十六岁南渡新加坡，在商界当职员。由于早年辍学，入商界后深感文化水平低，常以报纸为课本自学，遇到佳句或新知识，随即写入笔记本，暇时经常温习，学识渐进。他工作勤勉，生活节俭。后稍有积蓄，与友人合资创办“振美树胶公司”，在当时同业中，有相当地位。但不久，因胶业不景气而歇业。他的为人和才干，深为陈嘉庚所赏识，遂委他负责处理陈嘉庚树胶品制造公司业务收束工作，并兼任《南洋商报》总经理。他不辞劳苦，力任艰巨。1936年经陈嘉庚引荐，又出任亚洲保险公司副经理。历任同济医院总理、新加坡福建会馆执委主任、中华总商会董事等职。

侯西反为人直率，热心公益事业，陈嘉庚曾称誉他“身健口利，忠勇勤劳，排难解纷为其特长”^①。他了解工人，同情其疾苦，也颇得工人的信任，因此每遇劳资纠纷，常被请作调解人。他与陈嘉庚是同乡，又是同业，后又共事，情好素密，对陈倾资兴学及其一贯的爱国立场，极为钦佩，凡陈有所事于国家社会，他必竭尽其力，为之奔走呼号。特别是在祖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侯更成为陈在南侨筹赈总会的得力助手。他“熟悉诸

侨商吝嗇慷慨，殷裕困穷，视力劝募，应付咸宜”，“为筹赈会最重要之职员”^②。此外，如对二十年代陈嘉庚领导山东惨祸筹赈会^③，三十年代推销救国公债，遣送南洋华侨汽车司机服务于滇缅公路等活动，侯无不积极参与，协助做好工作。他五十岁时，因感开展社会活动的需要，还利用留声机唱片学习普通话，孜孜不倦，几不知老之将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南洋的爱国华侨纷纷抵制日货，有些人对于私贩日货的奸商甚为痛恨，或浇沥青，或割其耳朵，以示惩戒。侯西反久为好商所怀恨，被他们寻机诬告于英殖民当局。^④新加坡总督以侯有反英嫌疑及暗助非法社团之罪名，^⑤于1939年12月28日限令他三天出境，并不得重返新加坡。陈嘉庚出面交涉无效。30日，侯原定上午乘飞机往仰光转重庆，有亲友及工人数千人为其送行。他们不顾军事当局的戒严令，愤怒冲进机场，几至发生流血事件。为了顾全大局，不影响南侨筹赈总会今后的活动，陈嘉庚与侯西反商量，改于当晚乘火车去槟榔屿，转乘飞机回国。行期虽然保密，但火车到达槟榔屿时，仍有华侨及当地各界人士二、三千人到车站迎送，盛况空前。

侯西反回国后，孑然一身，但仍倾心于抗日救国，风尘仆仆于重庆、昆明之间。他在昆明组织华侨互助会，救济华侨司机；创办华光学校，培养归国华侨子弟。1940年春，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慰问团回国进行慰问活动，侯陪同视察十余省，历时十个月。当陈嘉庚从延安回到重庆时，行动受监视，言论受箝制。侯以“国民外交协会”^⑥常务委员身份，邀请陈到该会作《西北之观感》的演讲，宣传了延安及边区公务人员廉洁

奉公、军民团结一致抗日的真象，引起蒋介石国民党的极大不满。他陪同陈嘉庚视察福建古田县时，在欢迎大会上历数省主席陈仪祸闽苛政。到漳州时，又在各界欢迎会上慷慨激昂地宣称：“凡贪官污吏，害民惨苦者，立当驱逐出去！”^⑦

侯西反在重庆历任国民党海外部青年团联系委员会委员、青年团海外团务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名誉顾问、赈济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谘议，并任福建省政府参议等职。

1944年11月10日，侯西反从成都飞昆明，因飞机失事，在昆明郊区遇难。

注：

- ①、②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怡和轩出版，1946年第3版，第91页。
- ③ “山东惨祸”即“五三惨案”。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兵侵占我山东济南，先后杀害我外交官蔡公时及军民五千多人。新加坡华侨发起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举陈嘉庚为主席，积极募捐救济济南受难者。
- ④ 当时南洋华侨多以为此项惩戒奸商的活动为“筹赈会”所组织，据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所说，“此则别有组织机关，暗中有他人主持，与侯（西反）君绝无关系”。陈嘉庚本人也不赞成这类个人恐怖手段。
- ⑤ 当时新加坡各报均登载英殖民政府情报局关于侯西反出境命令，略谓：“非法社团‘先锋队’及‘抗敌后援会’，假借爱国名义，作非法之活动。总督经慎密之调查后，认为使星华筹赈会与上述非法社团发生关系之责任，实在于侯西反君，以侯君亲自赞助及怂恿该社团之存在及活动……又‘抗敌后援会’原存在于星洲及马来亚各地，亦系马来亚共产党之机关，该党本身即系危险之组织，目的在于用公开革命推翻政府。”见《南洋商报》1939年12月29日。
- ⑥ 国民外交协会系抗战期间设在重庆的群众性组织，主席为陈铭枢。
- ⑦ 同①，第260页。

杨 希 闵

吴显明

杨希闵，字绍基，云南宾川县人。1886年10月（清光绪十二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入塾，1909年入云南讲武堂学习。1911年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后分配到云南第一梯团参加援川战役。1912年初入江西讲武堂学习。1913年分配在江西步兵第三旅任上尉参谋，参加“二次革命”湖口之役，事败后回滇任云南步兵一团连长。1915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杨随蔡锷第一军出兵四川，于一次战役中立有战功，升为营长。

1920年川滇战争爆发，滇军军长顾品珍率军回滇，驱逐唐继尧，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控制云南。杨希闵随顾返滇，他这时已升为第一梯团长。1922年春，唐继尧向顾品珍发动突然袭击，顾兵败身死，残部由副总司令张开儒统率退往贵州境内。6月，张向孙中山发电表示“愿为北伐前驱”。同时重新整编军队，将全军编为五个旅，杨希闵任第三旅旅长。张计划率部经黔南趋桂林，与孙中山会合。张军未抵桂林，陈炯明阴谋叛变，孙中山电滇军急赴广州讨陈。张开儒于是兵分两路：右翼军归杨希闵指挥，左翼军由第八旅旅长范石生指挥。滇军在广西经过多次战斗后，进至桂平。

这时，护国军黔军总司令、广西人卢焘请滇军协助收拾桂

局。滇军中范石生、杨如轩等多数将领同意其请，但认为张开儒年纪大，不能率领全军，乃推卢为滇桂联军总司令。后因多数官兵不愿屯兵广西，仍然决定东下讨陈，遂抛弃卢焘，推杨希闵为代理滇军总司令。

杨希闵就职后，一面与驻桂林的广西自治军首领林俊廷协商，请其通知各自治军将领，不要阻止滇军前进；一面派第一旅第一团团副那博夫去上海向孙中山请示机宜。孙委杨希闵为西路讨逆军滇军总司令，并筹款十五万元供作军队开拔之用。

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派廖湘芸、何民魂等到梧州，邀滇、桂、粤军将领开秘密会议，以孙中山大元帅名义，委杨希闵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11月孙中山函促杨希闵把握时机，迅速出兵讨伐陈炯明。12月上旬，杨希闵和桂军将领沈鸿英、刘震寰等，各派代表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白马庙举行会议（即“白马会盟”），会商讨伐陈炯明的战略和合作条件。会议公举杨希闵为西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其部署是：以刘震寰和范石生部沿西江右岸东下向都城、广州之敌进攻；以沈鸿英一部由怀集向清远、花县方面进攻敌之侧背，沈部主力和滇军主力沿西江左岸东下，向肇庆、三水、广州之敌进攻。

白马会盟后，杨希闵、沈鸿英、刘震寰各军同时开始行动。12月27日，驻梧州的陈炯明军指挥部及守军两团撤往肇庆。12月28日，陈部莫雄率粤军第四师第二团及杨胜广的补充团在梧州起义，滇桂军兵不血刃进入梧州。从此滇桂军士气大振，跟踪追到封川、德庆，歼敌陈修爵部一个团。陈部粤军第一师陈济棠团及师部工兵营长邓演达等与滇桂军早有联系，纷纷

阵前起义。陈军林虎部被击溃。滇桂军乘胜进逼三水。陈军守将杨坤如等凭河死守。滇桂军在马房徒涉强渡，猛扑敌阵，陈军全线崩溃。1923年1月10日滇桂军克三水，直捣珠江南岸。粤军第三师亦从梧州河右岸向陈军攻击前进。陈军士无斗志，全部溃窜东江潮梅一带。滇桂军于1月16日进入广州。

讨伐陈炯明的各军到达广州后，杨希闵率滇军驻扎三水、佛山、广州市中心至西关一带，在富庶地区包烟（鸦片）包赌，对于陈炯明残部不再追歼。军官忙于敛财，士兵到处滋事，军纪败坏达于极点。杨复乘机扩充队伍，将滇军改编为三个军：第一军军长由杨自兼，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第三军军长蒋光亮。

这时广州既有滇军，又有桂军各占一方，群龙无首，杨希闵遂派人迎接孙中山回粤主持大计。孙中山于2月21日由香港抵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就大元帅职。从23日起，连下六道嘉奖令，表彰滇、桂、粤军及海军讨陈功绩。

正当广州军民庆祝胜利的时候，北洋政府任命沈鸿英为广东督理。4月16日沈鸿英发动叛乱，所部由白云山进窥广州城。孙中山亲自督师，偕杨希闵率滇军进剿。滇军奋力激战，两日内即将沈军逐出广州，向北追至英德。复与吴佩孚由赣南调来援沈的方本仁第九师遭遇。滇军乘其立足未定，连夜出击。方、沈军溃败，退至韶关。滇军继续作战，迫使方、沈两部退入江西境内。杨希闵留第一师赵成梁部驻守韶关、南雄一带，防止敌军南下。

6月4日，沈鸿英在北洋军阀邓如琢第三师的配合下，分三路攻占韶关。沈军复沿铁路进攻，在火车头上架机关枪冲

锋，滇军在军田车站及其附近阻击，伤亡较大，但终于打退了这次进攻。接着，沈鸿英再次勾结方本仁师第二次进犯广州，双方激战于英德。杨希闵亲到高塘指挥，孙中山亦亲临前线。滇军事先在英德破坏了铁路，把路基挖空，使沈军无法再使用火车头冲锋。杨并以第一军挡正面，第二军打右翼，第三军胡思舜旅从左侧截断沈军后路。桂军刘玉山、粤军李福林部亦同时抄击。沈、方两部狼狈北逃，遁入赣境。

11月，陈炯明部又分四路猛攻省城。孙中山亲自指挥各军奋勇抵御，取得广州防卫战胜利。当时，云集广东的各省军队中，滇军是较有战斗力的，孙中山颇为倚重。但以杨希闵为首的军官，并不真正拥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而是想借孙中山的革命威望，争夺地盘和权位。他们视广东为征服地，骄横恣肆，漫无法纪。滇军总部设在广州长堤大庙内，院内插着一杆黄绸黑字大旗，旗上绣有一个很大的“杨”字，类似古时的军营。孙中山召见杨希闵，他不愿去。他对下不顾士兵生活，薪饷常不能按时发给。孙中山多次要滇军攻打东江，消灭陈炯明残部，可是他们不愿出力，久攻惠州而不下，养寇自重，战事一直没有进展。孙中山要统一广东财政，杨希闵等人更是阳奉阴违。孙中山曾在大元帅府一次旅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斥责说：“你们各位纷纷联名电请我返粤主持国家大计，如今你们只知向我要钱要弹，却不愿东出消灭敌人。你们叫我孙某一个人怎么办呢？老实说，我回广东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来的。如果你们不愿意跟我革命的话，随你们造反我也不怕的。”^①滇军将领充耳不闻，依然如故。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

助下，积极着手筹建黄埔军官学校。杨希闵、刘震寰认为这同他们的私人利益不相容，多方阻挠破坏。其后又看到苏援枪械只发给黄埔军校，不发给滇桂军，更为不满，处处与军政府为难，拒绝执行东征的命令。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唐继尧以副元帅名义，认可段祺瑞委任杨希闵为广东军务督办兼省长。

5月3日，杨希闵一面与粤军将领联名通电驳斥唐继尧就副元帅职，一面却伙同刘震寰暗地策应唐继尧的入粤计划。5月中旬，杨希闵、刘震寰在香港召开会议，唐继尧、段祺瑞、陈炯明、邓本殷、陈廉伯和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均派有代表参加。会议商定叛乱计划，企图推翻革命政府。会后，杨希闵加紧叛乱部署，把驻韶关的赵成梁师调广九铁路线布防，驻佛山的胡思清师调广州白云山一带驻防，驻广州市区的廖行超师扩展到郊区布防。

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阴谋很快暴露。6月3日，胡汉民代表大元帅府向他们提出：一、服从政府；二、所占防地一律交出，由政府指驻；三、交还所占财政各机关。当晚，滇桂军将领举行联席会议，对二、三两项拒绝接受。6月5日，胡汉民以代帅名义，下令免去建国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建国桂军总司令刘震寰职务，并任命朱培德为建国滇军总司令。杨、刘遂公开叛乱。是日上午十一时，滇军占领省长公署及粤军总司令部，下午占领财政厅、公安局、电报局、车站等处。大本营调集了黄埔学生军、建国第一、二军及粤军陈济棠、徐汉臣等部平定叛乱。广九、广三、粤汉三铁路工人实行罢工，拒绝为滇桂军队运兵运械，迟滞叛军的行动。省城东西北三江的交通完

全断绝。6月11日,革命军各部对杨、刘所部发起总攻。滇军全线溃败,退入市区。经过激烈巷战,溃败的士兵纷纷缴械投降。杨希闵和一些高级军官,早已逃往香港。12日下午,大本营各军收复广州市。所有被俘滇军官兵,除编了一个教导第四团外,其余数千人都编入了朱培德军。杨希闵从此结束了在广东的活动。

杨希闵在香港住了一个时期,就连同眷属迁居浙江绍兴。抗日战争爆发后,绍兴沦陷,杨迁居昆明。从1937年至1949年,他既未附日,也未附蒋,过着很少与外界接触的寓公生活。解放后,1955年召开云南省政协第一届会议时,杨被邀为省政协委员。1956年杨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67年1月17日杨希闵因病在昆明去世。

注:

- ① 莫雄:《白马会盟与滇桂粤联军讨伐陈炯明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第245页。

主要参考资料:

- 莫雄:《“白马会盟”前后回忆》。《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刘少伯:《滇军杨希闵部入粤见闻》。《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王 家 烈

周春元 林国忠

王家烈，字绍武，贵州桐梓县人，1893年7月10日（清光绪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生。其父王大章，在乡村教私塾十多年，后任保正，常以调解为名向乡民勒索“规矩费”（即讼费）。

王家烈七岁读书，1909年考入桐梓县高等小学堂，1911年因经济困难而辍学，翌年去遵义，以教私塾为生。

1914年，王家烈认为教书前途暗淡，乃投笔从戎，入贵州陆军步兵六团，先后为列兵、下士、副班长。次年8月，进黔军贵阳模范营学习。1916年回原部参加护国战争，编入陆军第一混成旅步兵二团二营五连，为少尉排长。年底随护国军右翼总司令戴戡进驻成都。次年春返贵州，入贵阳讲武学校肄业。1918年4月，回部队任中尉排长，驻营铜仁。6月入湘，参加护法战争。1920年4月回黔。这时，第一混成旅十团二营营长周西成培植个人势力，大力提拔桐梓同乡，王被提升该营连长，驻防黎平、永从。翌年春，孙中山命黔军援桂，王随周部入驻广西柳州，不久，又离桂返黔，驻铜仁。

1922年春，袁祖铭取得贵州统治权。时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的周西成不愿附袁，率部入川投靠川军石青阳部。王家烈随往，在石部任营长。6月，王经石介绍，加入国民党。以后，王家烈协助周西成在涪陵收编从重庆东下鄂西的杨森

军千余人，被提升为团长。1923年初，进兵遵义，又协助周收编了两个团，再次为周扩充了实力。周擢升师长后，王被提为旅长。同年4月，王在江津将北洋军、川军两营多兵力缴械，第三次为周扩充了实力。嗣后，周令其移驻叙永，养精蓄锐，历时两年。

1926年6月，周西成担任贵州省长。王家烈随之返黔，继续为周效力。因职位在周的妹夫、师长毛光翔之下，王不服，要求周“合理”调整职务，结果被周撤职。1927年春，被重新录用为团长，驻铜仁。不久，周西成为了准备“讨共”，又将王提为师长。9月湖南爆发秋收起义，蒋介石急电贵州出兵。王受周西成命，率兵一师，抵湖南沅陵。但因与湘系军阀熊震、陈汉章等争夺地盘，一再失利，而且孤军深入，难以持久，旋奉令回黔，仍驻铜仁。1928年春，王被周委为第九路军前敌总指挥，驻四川綦江、东溪，帮助川黔边防军赖心辉、郭汝栋部，防备川军刘湘移黔。这时，蒋介石图谋统一贵州，施展“以毒攻毒”之计，暗中指使驻鄂西的黔军李燊（四十三军军长）率部返黔。11月周西成、李燊之战爆发。王被周委为酉阳、秀山前敌总指挥，与李军激战于龙潭、秀山、铜仁、松桃等地。混战持续到年底，周败，王亦受伤。1929年5月，周西成死，6月王家烈进占贵阳。

这时，毛光翔任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常在人前贬低王家烈，又不公开发表王的军职。王心怀不满，渐与毛分裂，投靠了蒋介石。是年冬，张发奎、李宗仁联合反蒋，王受蒋介石委派，出兵黔桂边境，牵制李宗仁、白崇禧后方，接着又占据黔东南一带。1930年4月，毛光翔欲夺王兵权，诡称滇军袭

黔，急电王“轻骑来省，指挥作战”^①。王不从，且攻占铜仁、松桃以及黔东北一带，扩大自己的地盘。7月，蒋介石令王家烈出兵湘西，攻打工农红军。王因“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任命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驻洪江。1931年7月，王又出师湘西南的靖州、绥宁，与湘军章亮基等联合，“清剿”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红七军李明瑞、张云逸部，蒋介石给以枪一千支、子弹二十万发。11月王出席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当面夸奖他“剿匪很有成绩”^②，拨给迫击炮十六门、子弹二十万发。

1932年1月，王家烈决心夺取贵州政权。他以毛光翔要其回省参加“整编会议”为名，率主力返黔。由于蒋介石、何应钦的支持，他被任命为二十五军军长。毛光翔自知实力不足，被迫表示“欢迎”，“推荐”王当贵州省主席。不久，王又兼任国民党省党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掌握了全省党政军大权。

是年冬，被赶下台的毛光翔联络王家烈部属蒋在珍、犹国材、车鸣翼等密谋反王。王率部与战，先坐镇贵阳，指挥失利，被迫退至榕江。1933年1月，王率兵五团反攻，夺回贵阳，恢复统治。这场军阀混战，一直延至1934年春。王家烈统治贵州后，贪恋酒色，尽情享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他妻子万淑芬干预军政，握兵八团，乘飞机纵横捭阖于南京、两广之间，大量安插万氏家族和铜仁同乡，形成铜仁派。铜仁派与桐梓派争权夺利，人民怨声载道，有人曾作对联称：“王纲堕地，万恶滔天。”^③

从1934年下半年起，王家烈接受蒋介石命令，多次参与阻击长征过黔的工农红军。他先派旅长李成章率兵三团，在思

南一带追击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9月,在黄平一带,他亲自追击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12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王又亲自率部进行防堵,并设军部行营于遵义、镇远,使用兵力二十一个团。次年初,蒋介石委王为“剿共”第二路第四纵队指挥。他以侯之担师六个团固守遵义,以柏辉章师开赴遵义、刀靶水之间,据守乌江渡。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攻克遵义,8、9日连占娄山关、桐梓。王被迫返回贵阳,继续指挥黔军尾追红军。同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再入贵州,王部又尾追红军至遵义北郊董公祠、飞来石等地。红军将其击败,再克遵义城。王狼狈逃至金沙、黔西。由于接连丧城失地,受到蒋介石的电报训斥。

蒋介石早认为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极不利于他的独裁统治。在红军进入黔边时,他即下决心“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④。王家烈部在西南军阀中力量较弱,蒋乃乘其新败,派薛岳于3月30日用武力控制贵阳,吞并了王部侯之担师。4月,红军主力入滇,黔境战事已近尾声,蒋又逼王于军政二职中辞去一职。王无可奈何,辞去省主席职。接着,蒋又派人煽动王的部属闹饷,同时密以巨款收买师长何知重、柏辉章,逼王下野。王无法,只好辞去军长职务,后被委以“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闲职,于5月3日离黔去武汉。

同年11月,蒋介石让王家烈入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1938年8月,日军进攻广州、武汉,蒋介石派王至鄂南,任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军团长是汤恩伯)。不久,又调他到重庆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闲职。1942年,改为军政部参事。1946年5月,王被强迫退役,回遵义闲居。王因有社会声望,1947年被

桐梓县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7月，王去贵阳治病，被当时省主席谷正伦委以绥靖公署副主任职。王未到任，贵阳即告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王家烈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贵州省人民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8月11日病逝于贵阳。

注：

- ① 王家烈：《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25、28、33页。
- ② 同①。
- ③ 同①。王指王家烈，万指万淑芬。
- ④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第15页。

何 成 浚

江绍贞

何成浚，字雪竹，湖北随县人，1882年6月20日（清光绪八年五月初五）生，家庭“薄有资产，自幼生活裕如”^①。何五岁延师就读，十四岁时赴武昌投考武备学堂，因年小体弱未被录取。十九岁时，参加县学考试，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受到湖北学政蒋式棻的赏识，被保送到武昌经心书院学习（不久经心书院合并于两湖书院，后改称两湖高等学堂）。时黄兴从日本回国，在武昌学生中宣传反清革命，何受其影响，倾向革命。

1904年3月，何成浚得官费赴日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翌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何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1907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1909年毕业回国，初在湖北督练公所任职，年余后在陆军部军制司任科员。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陆军大臣蔭昌率军南下镇压革命，何成浚被任为一等参谋，率领第一镇第一标及第六镇第二十四标先行，屯驻湖北祁家湾。湖广总督瑞澂令其自阳逻渡江进攻武昌，何为暗助起义军，以受蔭昌节制为词拒绝；后又因私释被清军逮捕的农民，引起蔭昌对他的怀疑。不久，袁世凯取代蔭昌，何返北京。旋离京到沪投奔黄兴，被派往南京进行建立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黄兴出任陆军总长，何充任陆军部副官长。4月，

临时政府北迁，黄兴任南京留守府留守，何任留守府总务厅长。11月，黄兴受任汉粤川铁路督办，何担任黄兴驻北京代表。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事件发生后，何觉得北京“非革命党人可以安居之处”^②，离京到沪，帮助黄兴作“二次革命”的发动工作，在沪、宁间进行联络，并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不久“二次革命”失败，何随孙中山、黄兴流亡日本。

1914年夏，何成浚奉黄兴之命改名换姓潜回上海，作再次讨袁的准备。他通过与陈其美的交往，结识了一些帮会人物，学会了与各方面人物打交道的本领。1916年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邀黄兴至京共商大计，何受黄派遣先行到北京察看形势。在京二月余，“目睹大权操在军阀，约法等于废纸，知不可为”^③，即离京南下。不久黄兴病逝于上海，何转而追随孙中山。

1917年，何成浚随孙中山由沪到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旋奉命回湖北联络军队。何到沙市策动驻军石星川师独立，但为鄂督王占元派兵夹击，石弃部逃走，队伍溃散。何将溃兵收集率往湖南常德，编成两团，以夏斗寅、张笃伦分任团长，交湘西督办、革命党人李书城接管，何自任高等顾问襄助。翌年3月，北洋军进逼岳阳，何受湘西军总司令程潜吁请，率夏、张两团驰援。初期在汨罗江设防守御，但在北洋军张敬尧部攻击下，败退长沙、永丰，后在乐亭又陷重围。何率部趁大雨突围脱险，在郴县将残部略加整理后交李书城，只身往广州。旋赴上海谒孙中山。

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广州再组军政府，何成浚由孙派赴湖南，兼负联络川鄂两省之责。他动员湖南督军、湘军总司令

谭延闿支持护法，旋因湘军内争，谭被迫辞职，何不得已回沪。翌年夏，复到湖南参加赵恒惕、李书城援鄂驱逐王占元的战争，虽然驱王目的达到，却被吴佩孚收了渔人之利，何仍不能回湖北活动。这时，孙中山派何成浚往云南游说唐继尧拥护军政府，何虽与唐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在滇三月之久，费尽唇舌也未能取得唐的支持。回沪时，闻陈炯明公然叛变，立即到广州谒孙中山于永丰舰。当时许崇智由江西回师靖难遇挫，退向闽边，处境十分困难。何奉孙中山之命往福建游说延平镇守使王永泉。何与王是旧友，经何劝说并许以高官，王不仅供给许部以军火，并于10月间共同攻克福州，王担任了福建总抚，何亦膺任兴泉永前敌总指挥，在福建取得了一席之地。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复任大元帅，命许崇智回师广东，何成浚仍留守闽南，改任中央直辖福建各军总指挥。是年夏，何受命放弃闽南，率部夹击潮汕陈炯明叛部，屡战不利，孤军难支，退回闽省时王永泉又倒戈相向，不得已转进厦门。1924年5月遵孙中山之命由汀州绕赣边回粤。10月由孙中山任命为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随总司令谭延闿入赣北伐。但进占吉安后，左右翼皆失利，全部退返广东。何因屡次战败，所部损伤过重，遵命将所辖部队交出整理，本人解甲回沪休养。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于1925年9月出任东征军总指挥，起用何成浚为东征军总部总参议。从此以后，何紧紧追随蒋介石。

1926年7月北伐开始，何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蒋介石利用他擅与军阀打交道以及与孙传芳在日本同学的关系

系，派为驻沪代表，竭力游说孙传芳与北伐军一致进攻吴佩孚，但没有达到目的。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何受蒋命赴湖北，任鄂北绥靖主任。蒋介石原本指望他到湖北操纵领导权，以对付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但在武汉革命声势的压力下，他难以施展其伎俩。不久，何便跑到南昌，参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

1927年4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何成浚被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国民革命军高等顾问。他继续充当蒋介石的说客，赴山西拉拢阎锡山，向阎转达蒋决心反共的意旨。

1928年初新旧军阀之间的战争开始，何成浚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兼徐州行营主任。“五三”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派何与日军师团长福田交涉解决办法。在日军淫威下，他不肯屈服，拒绝在福田提交的屈辱条款上签字。后蒋介石改道北进。何先往京津游说奉军东撤，由阎锡山部接收北京各机关并维持治安；后又留驻北京作一些善后工作，收编了张宗昌直鲁联军徐源泉部和孙传芳的残部郑俊彦等部。10月，蒋介石改组国民党政府，任主席，何被任为参军长。此后，何成浚追随蒋介石，在新军阀混战中不断效力。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之先，何被蒋派为北平行营主任，取代桂系白崇禧；何取得唐生智合作，由唐接收了刘兴、龚浩、廖磊等部，拔掉了桂系在北方的据点。3月蒋桂战争爆发不久，桂系便失败了。5月，何被蒋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由于国民党新军阀相互间的争权夺利，蒋介石在北方的权势仍然受到威胁，何成浚没有立即到湖北上任，而继续衔蒋之命往山西拉拢阎锡山。10月，蒋冯（玉祥）战争爆发，何奉蒋

命率第九军攻冯。12月，唐生智讨蒋。何在鄂被任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并奉命入晋襄助阎锡山，到郑州对徐源泉、王金钰等作争取工作，瓦解了唐生智的后路。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何成浚奉蒋命兼任第三军团总指挥，率九、十两军在平汉线许昌各地布防，阻冯军南下。这一线虽然不是大战的主要战场，何统率的徐源泉、杨虎城、王金钰、夏斗寅各部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他们的向背对全局关系重大。何施展手腕，加以金钱收买、权势利诱，把一批难以驾驭的杂牌军头目玩弄于股掌之上，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

正当新军阀混战的时候，在江西、鄂豫皖等苏区的红军迅猛发展。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即部署对红军的反革命“围剿”。何成浚奉命回任湖北省主席职，并兼任武汉行营主任，负责指挥对鄂豫皖地区的“围剿”。他调集九个多师的兵力参加第一次“围剿”，结果第三十四师全师覆灭，副师长岳维峻被俘。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中，何增加兵力达十一个师，结果六千余人被歼。第三次“围剿”开始后，蒋介石把主力置于江西中央苏区，对鄂豫皖暂取守势。各路红军威逼黄梅、武穴，向武汉包围。何急忙调海军舰艇巡逻长江，并派徐源泉第十军解武汉之围。在这次“围剿”中，何部又被红军歼灭七团之众。何成浚除在军事上疯狂“围剿”外，还在城市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1931年4月，由他安排红帮头目徐朗西、杨庆山配合C·C·系特务、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逮捕。顾被捕后叛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造成严重威胁，由于周恩来等人英明果断的处置，才避免了一次重大破坏。

何成浚专心反共，对湖北省政漠不关心，1931年夏武汉大水，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1932年3月何卸湖北省府主席职。6月，蒋介石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派何兼任左路军司令官，负责湘鄂西地区的“围剿”。1935年红军长征后，何还随蒋介石到重庆参加对红军的追击。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何成浚于11月再次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但仅半年即被陈诚取而代之。1938年武汉会战前何到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任职期间，他看到国民党军队扰害民众，高级将领骄横跋扈，贪污舞弊，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黑暗，古今中外绝未闻有如今日之甚者”，发出了“不胜为中华民国危惧”^④的感慨。他在处理一些案件时，感到各级官吏“皆有特别背景，不问如何作奸犯科，中央因多所顾虑，不能予以相当制裁”，他也就“置若罔闻，以不了了之”^⑤。

何成浚自1929年3月担任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以来，以后第四、五届继续连任，1945年5月又当选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抗战胜利后，军法执行总监部撤销，何成浚在失意中回到武汉，凭借他多年在湖北的旧关系，当上了省参议会议长。他俨然以“湖北家长”自居，不仅对党、政、军各部门均插手过问，而且先后在一些银行、商号、报社当上了董事长。这年年底，他趁汉口第一纱厂董事们争权夺利之机，坐收渔利，当上了该厂的董事长。从此“一纱”成为他进行经济活动和巧取豪夺的重要基地。

何成浚在湖北最后三年的统治，遭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

对,成为众矢之的,以至他感叹“备位三载,历尽酸辛”^⑥。1949年春何逃往香港。1951年春去台湾,担任过伪“总统府”国策顾问、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等名义职务。1961年5月7日死于台北。

注:

- ①②③ 何成浚:《八十回忆》。《革命人物志》第八集,台湾1971年版。
- ④ 《何成浚将军战时日记》。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二期。
- ⑤ 《何成浚将军战时日记》。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六期。
- ⑥ 同①。

蒋 梦 麟

宗志文

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生于1886年1月20日（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他的祖父和父亲在上海经营钱庄，乡间有几百亩良田^①，家境富裕。他六岁入塾，十岁到绍兴进中西学堂。时蔡元培任该校监督，故二人有师生之谊。

1899年，蒋梦麟全家迁居上海，他进入一所教会学堂学习英语。1900年全家迁回余姚。次年他到杭州，先入一所教会学校，1902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1903年曾回绍兴参加院试，考取秀才。1904年暑假到上海考入南洋公学，“为去美国上大学作准备”^②。1908年春，他考公费留美落选，暑假后自费到美国留学。他在美国先入旧金山加州大学农学院，半年后转入该校社会科学学院，以学教育为主，旁及历史与哲学。这时，同盟会在旧金山办有《大同日报》，刘成禺任该报主笔。他约蒋梦麟为该报工作。二人轮流撰写社论，宣传反清革命思想。1910年2月孙中山抵旧金山，蒋曾随刘前往谒见。

1912年夏天蒋梦麟在加州大学毕业，获教育学士学位。不久到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研究教育，是杜威的学生。1917年6月，他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不久回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次年6月辞职，旋帮助

孙中山校订《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的英文原稿,搜集资料,核对数据等。这时他还是江苏省教育会理事。

1919年初,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五个单位共同组成“新教育共进社”,目的是直接输入东西洋学术。该社出版《新教育》月刊,蒋梦麟任主编。该刊论述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理论,评介欧美(主要是美国)教育思想和制度,翻译欧美教育家的著作,报道欧美各国教育情况,不遗余力。还辟有“亚东问题”、“世界知识”、“世界大事”、“世界新知”专栏,议论国内外政治问题。同年4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三期是杜威专号,系统介绍了杜威的教育思想。蒋梦麟写《杜威之伦理学》一文,介绍杜威的伦理学和道德教育。《新教育》销行全国,每期达一万份。蒋任主编直至1921年11月。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蒋梦麟开始是支持的。他参加过6月16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支持学生运动,但要求学生服从学校领导。不久他写了《改变人生的态度》一文,将“五四”运动比作欧洲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说:“‘五四’学生运动,就是这解放的起点。改变你做人的态度,造成中国的文运复兴;解放感情,解放思想,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③

“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满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采取镇压态度,于5月10日离京赴杭州,北大学生不断南下挽留。7月中旬,蔡委托三十三岁的蒋梦麟代表他到北京大学代理校务。23日他在北大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讲演,

说“今天反对这个，明天反对那个”，不是根本办法。又说青年若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只有研究学术，提高文化，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他代理校务后，采取种种措施，恢复北大原有的秩序，力图把学生拉到“一心尽瘁学术”上面来。9月蔡元培回北大主持校务后，蒋任北大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1920年“五四”一周年纪念时，蒋梦麟与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诱导学生脱离政治运动，说：“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从今以后要注重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效的学生运动”^④。9月在北大开学式上，蒋引胡适的话指责学生，说“现在的青年连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飞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他要青年“此后，总要立定志向，切实读书”^⑤。

这年10月，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再委托蒋梦麟代理北大校务。12月北大二十二周年校庆时，蒋发表演说，提出北大师生今后努力的三个方向：第一是要研究西学；第二是要整理国故；第三是要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但是，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腐败不堪，学校连经费都难以为继，他提出的三个努力方向，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1923年1月，蔡元培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非法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愤而辞职，蒋梦麟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1月，北京八所国立大专学校教职员因政府积欠学校经费九个月，成立索薪团，集体向政府索薪，遭军警武力压制，乃决议罢课对抗。蒋梦麟不同意罢课，北大在他主持下，仍勉强维持上课；他还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说知识界

的本职是发展学术、科学、思想，仍然不主张学生参加政治运动。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广大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不可遏止。蒋梦麟为了“维持北京大学生命不使中断”的原则，反对学生罢课，因而不断遭到学生反对。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蒋当时是北京八所国立大专学校校长联合会主席，他谴责“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支持各校师生的爱国行动，因而为段祺瑞政府和军阀所怀恨。4月26日，《京报》主编邵飘萍被奉军逮捕杀害。当晚蒋得悉他已被列入黑名单，立即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在那里呆了六个月，后来找到机会逃离北京，先到上海，随即转往杭州暂住。

1927年4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教育方面试行大学区制，任命蒋梦麟为第三中山大学（不久改为浙江大学）校长，主持浙江大学区，兼管浙江省教育行政事宜。次年10月，他继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旋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任部长。

蒋梦麟担任教育部长后，决心对因战乱遭到很大破坏的教育事业进行整顿。在他主持下，教育部设立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研究并提出了改进教育方案，还公布了《大学课程标准及设备标准起草委员会章程》，成立了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等。1930年11月，蒋辞教育部长职。据他自己说，“因为关于教育方针的问题与政界元老意见不一致，被迫辞职”^⑥。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

蒋梦麟1931年1月北上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此之前，北大因为经费困难，以致师资不足，图书缺乏，设备陈旧，学术

水平不高。蒋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当时胡适、丁文江、傅斯年都在北大任教，他们很支持蒋梦麟。经多方努力，北大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一百万元，很快设立了研究院，并增加设备，购置图书，后来又兴建了图书馆、地质馆和学生宿舍等。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形势日益恶化。蒋梦麟渴望有个和平的环境建设北大，不愿中日冲突扩大。1933年3月，长城抗战紧急。4月19日，蒋梦麟与胡适、丁文江一起会见何应钦，密商对日妥协问题，议定由蒋往见英国公使蓝浦生，请其斡旋中日停战。蒋曾多次与蓝浦生会见。

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蒋梦麟极力拉拢和威胁，蒋均未为所动。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蒋梦麟领衔发表了一个反对分裂中国领土的宣言。不久，他听说日本人已将他列入黑名单，随时可能被逮捕，但没有避走。29日，日本宪兵径至北京大学邀蒋到日本大使馆武官处谈话，蒋即前往。日本武官质问蒋为何反对“华北自治潮流”？为何纵容学生进行大规模反日宣传？他进行了辩解，该武官乃要他当晚赴大连，亲向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解释。蒋梦麟不愿去。他说：“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这样做。如果全世界，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就要成为笑柄了。”^①日本武官通过电话请示后，放他回家。不久，日本使馆又向北平当局提出，因蒋梦麟煽动学生抗日，要他们强迫蒋离开北平。北平当局劝蒋离北平，他没有同意，继续主

持北大校务。

1937年7月初，蒋梦麟应蒋介石之邀前往庐山参加谈话会。平津沦陷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为临时大学，迁往长沙；1938年1月又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与梅贻琦、张伯苓同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常委。

1941年7月，蒋梦麟兼任红十字会中国总会会长，往贵阳、桂林、衡阳等地视察红十字会及壮丁收容所的工作。他看到大批壮丁遭虐待而死亡的种种情况，上书蒋介石揭发说：“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踽踽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人嚼。……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五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

1945年6月宋子文就任行政院长后，蒋梦麟担任行政院秘书长。1947年3月宋子文辞职，他亦随之离去。不久，任国民政府委员及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处理联合国援助中国抗战后期所剩下来的款项和物资。1948年7月，蒋介石任他为中美共同组织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10月农复会迁台湾。蒋梦麟到台湾后，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1964年6月18日，蒋梦麟因病在台湾去世。

蒋梦麟著有《西潮》（英文版）和《新潮》行世。

注：

① 蒋梦麟：《新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30页。

- ② Chiang Monlin, «Tides from the wes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60.
- ③ 蒋梦麟:《改变人生的态度》。《新教育》第1卷第五期,1919年8月。
- ④ 蒋梦麟、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晨报副刊》,1920年5月4日。
- ⑤ 同②,第135页。
- ⑥ 同②,第204—205页。
- ⑦ 同①,第47—49页。

罗 家 伦

宗志文

罗家伦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生于1897年12月2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父罗传珍长期在江西做官，曾任进贤等县知县，同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罗家伦幼时受父母的启蒙教育，稍长入塾读书。1914年进上海复旦公学肄业，191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与同学傅斯年、段锡朋是莫逆之交。

罗家伦入北大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逐步高涨之际，学生的思想十分活跃。罗能言善辩，是出名的活跃人物。1919年1月，他与傅斯年、徐彦之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得到当时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和文科教授胡适的支持。校方也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并同意由学校出版部发行和负担盈亏。《新潮》编辑部由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组成，傅任主编。

《新潮》仿效《新青年》，鼓吹“伦理革命”，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宣扬文学革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李大钊和鲁迅都在《新潮》上发表过文章，也提供过意见。罗家伦在创刊号上写的《今日之世界新潮》中，热情赞扬十月革命，说：“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

命。”他在一卷二号上所写的《什么是文学》一文中，不仅反对封建文学的形式文言文，而且揭露封建文学的内容“只是摆出道学先生的面孔，代圣人立言”。但是《新潮》从创刊起，就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改良主义和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倾向。罗家伦在上述那篇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中，很害怕这个革命传到中国来。他说，这个潮流“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很；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知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名其妙的照他人榜样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

“五四”运动中，罗家伦是个活动分子。5月3日晚上，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大会，并约请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罗在大会上慷慨陈辞，反对巴黎和会。大会决定于翌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4日早晨，各校学生按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随即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至东交民巷口，要入内向各国使馆递送声明书，军警不许通行，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学生派代表四人往各使馆，罗家伦是代表之一。第二天，他又被派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各大学进行联络，曾在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新潮》因“五四”运动停刊。不久，傅斯年出国留学。10月《新潮》复刊，罗家伦任主编。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队伍中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这时，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展开，《新潮》在胡适引导下，改良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逐渐成了宣扬各色各样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讲坛。12月1日发刊的《新潮》二卷二号上，罗家伦发表《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

化》一文，公然否定自己以前对十月革命的赞扬，说：“我从前说法国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俄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错误的！”他混淆资本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区别，说法国革命“含有社会主义的精神”。

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时，罗家伦在《新潮》二卷四号上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根本否定“五四”运动的群众性革命风暴，说“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是“毁坏学者”。他非常懊悔不该参加学生运动，说：“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偶一回头，为之心酸。”他提出今后应当“以思想革命为一切革命的基础”。他所谓的“思想革命”，就是要“一本诚心去做学问”，“埋头用功”，不问政治。所以，他又提出“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此文发表后不久，他就出国留学，走“专门研究学问”的道路去了。

同年秋，罗家伦赴美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历史与哲学，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22年秋离开美国，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四年。留学期间，罗很注意搜集各国办大学的经验。

罗家伦于1926年回国后不久参加北伐。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参议，旋任总司令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他对蒋介石十分崇拜，加之会说善写，因此深得蒋的器重。当时蒋介石有关时局的大文章，不少是由罗家伦执笔写成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罗家伦是积极支持者，撰写

过一些宣扬反革命政变的文章。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决定创办中央党务学校，自任校长，由戴传贤、罗家伦任正副主任。8月初开学后不久，蒋被迫下野。下旬发生龙潭战役，孙传芳军渡江攻南京。罗家伦在师生中做了不少说服动员，才保住学校没有散伙。1928年1月蒋介石又上台，进行所谓“继续北伐”。3月总司令部设立战地政务委员会，罗家伦为委员之一，并兼任教育处处长，随军北进，6月到北平。

8月，国民党政府改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任命三十一岁的罗家伦为该校校长。清华学校是1911年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原由北洋政府外交部和教育部共管。学校的经费有专门设立的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委员会由外交部正副部长和美国驻华公使三人组成，基金完全操纵在外交部一些官僚手上，弊端甚多。罗担任校长后，多方活动，争取到清华基金转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并使清华脱离外交部，完全隶属教育部，改称国立清华大学。他还改变了过去清华毕业生全部派遣留美的办法，进行公开考试，选拔少数成绩优良的学生赴美留学。他曾提出：“要做到没有一个不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不经过严格考试，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①清华自罗任校长后，开始招收女生。

1930年5月“中原大战”揭幕后，清华大学出现“驱罗运动”，罗家伦被迫离开清华南下武汉，在武汉大学担任了几个月的教授。年底蒋介石到武汉巡视，亲自召见罗，把他调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担任代教育长。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属短期训练班的性质。罗到校后，建立了四

年制的大学部,招收高中毕业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卖国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学生亦起而反蒋。1932年6月中大被行政院下令解散,学生听候甄别。不久罗家伦被指定为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委员,8月被任命为该校校长。他到校后,极力把学生的反蒋抗日热情引导到所谓研究学问的道路上去,提出以“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中央大学的使命。他说:“人家骂我们为无组织的国家……但是我们所感觉的不仅是政治的无组织,乃是整个的社会无组织,尤其是文化也无组织,今后我们要使中国成为有组织的国家,便要赶快创立起有组织的民族文化,就是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来。”^②

罗家伦办大学有他的一套办法。他重视罗致人才,延聘一些专家学者到学校任教,曾说:“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③他还采取增加图书设备,加强基础课等一系列措施。中央大学原仅有学生一千人,罗任校长后,抗日战争前已发展到两千人。并于1937年5月在南京郊外动工兴建一所能容纳五千至一万名学生的新校舍,为日后发展作准备。

同年7月初,罗家伦应蒋介石之召往庐山参加谈话会。不久芦沟桥事变发生,他回南京作迁校布置,决定迁校重庆,并面蒋陈述意见,立刻得到蒋的同意。迁校计划顺利而迅速地进行,10月即大致就绪,11月初中央大学即在重庆沙坪坝正式上课。抗日战争期间,中大学生逐年增加,到1941年已增至三千余人。

罗家伦很注意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在重庆期间,

他定期向学生作演说。当时大后方反蒋运动高涨，他竭力引导学生闭门读书，故意把教育说成是超阶级的，说“教育最高的目的，是要造就好人，造就好的国民”。他一面“希望以后各党各派，不要以青年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说“这样不但是害了青年，而且是害了国家民族”；一面却“热忱的希望（三民主义）青年团能积极挽救现在青年体格和人格上的两种颓风”④。

1941年9月，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蒋介石先后委派他往西南、西北各地考察，一则视察边境各省情况，一则对各地军政人员进行游说。10月，罗任滇黔考察团团长，前往云南、贵州。当时蒋正组织远征军，准备开入滇缅边境，罗为蒋摸清了地方实力派的动态，宣扬了“中央德政”。1943年3月，罗又受任为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6月率各方面专家学者四十六人，组成包括铁路、公路、水利、农林、畜牧、垦殖、工矿、民族、教育、卫生等专家人员在内的考察团，先后往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进行考察。事毕草成大西北建设计划及报告多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家伦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张继）。1947年5月，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印度大使。1949年12月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罗家伦回到台北。旋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兼任台湾蒋政府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先后主持编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丛书》及部分《革命文献》。

1969年12月25日，罗家伦病死于台北。

罗家伦的主要著作有：《科学与玄学》、《中山先生伦敦蒙

难史料考订》、《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新民族观》、《逝者如斯集》等。

注：

- ①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文化教育与青年》，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96页。
- ② 罗家伦：《中央大学之使命》。同上书，第123页。
- ③ 《革命人物志》第十三集，台北版，第465页。
- ④ 罗家伦：《抗战的国力与文化的整个性》。《抗战与文化》，独立出版社1939年版，第37页。

朱家宝

黄有成

朱家宝，字经田，号墨农，云南华宁县人。1860年12月25日（清咸丰十年十一月十四日）生。其父朱学诗务农兼营杂货店。朱家宝五岁开蒙识字，十六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1892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朱家宝入翰林院不久，授礼部祠祭司^①司官。后历任直隶省平乡等县知县，保定知府，通永道道台，江苏按察使。1906年，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赏识和荐举，升任吉林省巡抚。1907年安徽巡抚恩铭被刺，朱转任安徽巡抚。他是一个“精于公牍”、办事认真的官僚，案上的座右铭是“官须自做，事必躬亲”。他恪守封建的君臣之道，认为“为仁臣者不当纳私”，并以此为由，拒绝过一些向他求官的亲友。

朱家宝主政安徽后，鉴于恩铭被徐锡麟刺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十分警惕。他侦知熊成基和第三十一混成协炮兵营管带倪映典谋在农历除夕于安庆再次起义，先将倪革职。1908年他率安徽新军三十一协前往太湖参加秋操时，得知熊成基等人计划在太湖秋操时发动起义，即对派赴秋操的士兵官佐严加挑选，阻止革命党人前去，破坏了起义计划。熊成基等随即改变计划，决定11月19日以马炮营为主力，在安庆首先发难。朱家宝抵太湖后，闻光绪帝和西太后先后死去，立即返回

安庆,加强对革命党人的防范。熊成基开始行动时,朱就得到了秘密报告,立即严令紧闭各城门,调重兵防守,并亲自率队督战。同时命令碇泊江中的清军舰发炮轰击,摧毁义军阵地。朱家宝继调援军进逼城郊,迫使义军突围出走。

朱家宝不仅严密防范革命党人,对民间聚事暴动也竭力镇压。1910年皖北各府迭遭水患,灾民众多,不断爆发起义,朱惊惶万状,连连派兵镇压。5月10日,镇压了蒙城、凤台两县交界的双涧集饥民暴动,起义领袖五人、骨干四人和十三个所谓“协从”的群众均被杀害。宿州板桥陈集地方,有千余饥民起义,也被朱“飞飭各营合力剿办”。6月初,宣城连续大雨,山洪爆发,东、西、北三乡大小数圩接连溃决,灾民不得食。7月6日,该县双桥镇饥民千余人要求救济,又被朱派巡防营弹压。朱家宝的镇压行径受到了清廷的表扬,说:“幸得立时殄灭”,“办理尚称妥速”^②,对他“加头品顶戴”,使其成为清廷宠臣。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安徽革命党人也密谋起义。朱家宝采取措施,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防范,先是抽调部分精锐,组成一个战时混成营,约八百余人,由其义子朱基为管带率领,开往皖鄂交界的英山县驻防,以图阻止武昌革命军入皖;同时电请两江总督张人骏派张勋所部江防营两营到安庆布防;三是拉拢新军,特意提前五天发饷,并每人发子弹五十粒。安庆革命党人知道这个消息后,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下旬,新军中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被朱侦悉。他先以“新军不可恃”为由,下令收缴了各军子弹;接着把江防营调进省城,并把兵舰也调到江面上威慑安庆。朱的行动激怒

了新军，纷纷采取抗议行动，携带被褥到城中各当铺典当，每件索价三元，各当铺穷于应付，拟闭门停业。朱见势不妙，便拨款帮助各当铺，以压制新军的抗议。10月31日夜，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驻皖新军六十二标及马炮营联合进攻省城。朱即令江防、巡防各营闭城死守。新军因无内应散去。朱乘势命令新军各营长官，按人发银六元，缴其军械，全部遣散。不久，九江独立，威逼安庆。11月15日，谘议局主张顺应潮流，响应起义，要求朱家宝出来担任临时都督，宣布安徽独立，静观待变。朱初以“忠臣不嗣二君”，不允所求。这时，苏、杭皆独立，警电纷驰，形势逼人。袁世凯密电朱家宝，要他“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成见，贻误大局”。谘议局联合商会等团体决定11月8日自行宣布独立，朱才决定随机应变，回答谘议局说：“军心如此，民心如此，各省踵蹶而行，我敢独异？请公策自保，吾遵奉施行耳。”^④11月8日谘议局出面宣布安徽独立，推朱家宝为都督，但遭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11月11日，革命党人召集军、学等界代表集会，自行宣布独立，推同盟会会员、革命党人王天培为都督，次日在督练公所成立都督府。朱以“事权不一”、“省垣秩序紊乱”为词，辞都督职，还印于谘议局，准备离皖。这时，王天培因推行改革措施过急，触怒了群众，加之资望浅，皖人不拥戴，被赶走。20日，安庆全城罢市，要求朱家宝复任都督。不久，革命党人吴旻谷请江西赣军黄焕章部来皖维持秩序。不料黄部抵皖大肆抢劫，并在城中索饷哗变。朱误以为赣、皖两军联合抓他，急从都督府东墙穴壁逃出，躲入天主教堂，后由天主教堂护送至天津，不久到北京。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对朱家宝十分信任。1913年1月，朱任参议院议员。1914年2月任直隶省民政长兼直隶都督。1916年曹錕任直隶督军，朱改任直隶省长。不久辞任。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前，朱家宝参加过策划复辟的徐州会议和其他一些活动。他在给张勋的信中，污蔑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是非淆乱，人心险诈”；宣称他自己“素性迂拙，岂能与为浮沉”，辩白他之所以当民国的“都督”、“省长”，是因为“元首一再慰留，不得不勉从公”^④。他与张勋心怀清室，沆瀣一气。张勋复辟时，朱家宝当上了“民政部尚书”，颇为得意。复辟失败，朱亡命日本。

翌年北京政府先赦洪宪和复辟帝制犯，又宣布张勋免于缉究。不久，朱家宝乃结束亡命生活，回到了天津，闲居贝子花园。

朱家宝善书法，习黄山谷体，笔力挺健、洒脱，颇为时人推许。他的著作有《海藏园序》、《廷尉天下之平论》、《审乐和政疏》等。

1923年9月5日，朱家宝在天津病死。

注：

- ① 祠祭司：始于南朝祠部，掌祭祠之事。后来变为礼部，而以祠祭司为礼部所属四司之一，明清改为祠祭司。
- ② 清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军机处电旨。
- ③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第242—245页。
- ④ 朱家宝给张勋的信。《张勋藏札》第57页。

卢 兴 邦

陈孝华

卢兴邦，原名良，号光国，福建尤溪县人，生于1880年10月16日（清光绪六年九月十三日），出身贫寒。

卢兴邦青年时以贩卖土纸为生。民国初年，因向本乡一家地主赎典竹林，与地主发生争吵，被指控通匪，遭官吏索捕。卢逃往德化，投奔土匪头目苏亿，并改名兴邦。后来他纠集卢兴明、卢兴荣等一伙，在德化、尤溪交界处打家劫舍，不到一二年就发展到数百人。1915年、1916年，福建督军李厚基先后派兵进驻尤溪，对卢兴邦剿抚兼施，都无法将其歼灭。

1918年，“援闽粤军”许崇智部攻克永安时，派孙本戎与卢兴邦联络，卢归附。许崇智委卢为粤军第三师第五旅第九团团长。当时许部与李厚基军队相持于沙县、永安一带，数月不能决胜负，因得卢兴邦的援助，得以击败李军，卢被擢升为第五旅旅长。

1922年秋，许崇智率北伐军由赣入闽，联合王永泉进攻福州李厚基时，委卢兴邦为讨贼闽军第三路司令。卢出兵葫芦山，进占樟湖坂等地，协助许崇智进攻水口，将李厚基的一个团击败缴械。10月，孙中山令在闽的北伐军改称东路讨贼军，许崇智以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任卢兴邦为东路讨贼军第一独立旅旅长。这时卢部地盘扩大到尤溪、大田、宁洋及永安四

县。1923年初，东路讨贼军回粤，卢改任东路讨贼军留闽第一师师长。

粤军回师广东之后，直系军阀孙传芳、周荫人相继率部入闽，卢兴邦与北军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1924年春，方声涛回闽联络各地民军，以卢兴邦部为基础，在大田成立闽军总司令部。卢趁机扩充实力，逼走方声涛，使这次对抗北洋军阀的计划受挫。

卢兴邦与盘踞沙县的民军郭凤鸣部常为争夺地盘而发生磨擦。1925年5月间，郭凤鸣得到福建督军周荫人的批准，由福州溯闽江北运一批枪械。卢兴邦获悉，派兵予以全部截劫。周荫人大为震怒，下令宣布卢兴邦罪状，撤职通缉，并大举进剿。卢部被迫退出尤溪县城，化整为零，除一部主力留在尤溪山村外，其余则分股流窜闽北各县。在这以前，卢部曾改称为建国军，但未公开；这时则正式宣布将所部一律改换建国军旗帜^①。10月，孙传芳调动军队向苏皖奉军进攻。周荫人为了支援孙军，把攻打尤溪的兵力全部调走。卢部乃于11月重新占据尤溪县城。后经樟湖坂基督教牧师吴奎仕出面调停，双方划界，互不侵犯，战事始息。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12月何应钦率东路军进入福建后，委卢兴邦为闽北指挥官兼福建政务委员会委员。卢部乘机进占南平，并在樟湖坂截击周荫人残部，缴获大批军火。他还派兵进攻沙县，把郭凤鸣残部卢新铭驱走。卢部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独立师，卢兴邦任师长兼闽北绥靖委员，设闽北绥靖公署于南平，从此闽北各县尽为卢所占领。卢部大为发展，分驻闽西北各县。北伐军离闽去浙时，何

应钦把从周荫人手中接收下来的洪山桥兵工厂和造币厂交给卢兴邦。卢把工厂的设备、人员都搬迁到尤溪去，大量制造枪械弹药，加强装备。

1927年7月，杨树庄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时，卢兴邦任省政府委员。他以师长兼省府委员身份，带兵数千到福州参加就职典礼。这是卢兴邦第一次到省城，他为了替自己制造舆论，捐助私立开智学校基金，捐款给私立协和大学盖“光国楼”等。卢在福州逗留十几天就回南平，自此便一直躲在山城，再没有到福州去了。1928年9月，福建省政府改组，卢兴邦未再列名于其中。12月，卢部缩编为陆军暂编第二师，辖两旅，卢兴邦为师长。

自1926年至1930年，卢兴邦盘踞闽北达五年之久，独揽辖区内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各县县长都由卢委任，成为闽北的土皇帝。他在尤溪口等处设立税卡，抽收木排捐、上下水船捐、百货捐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卢将掠得的银元运到尤溪，秘密改铸为成色低劣的双毫小洋，通令所辖各县通用，从中掠取高利。同时还滥发钞票，先后发行过“华通券”、“广裕券”^②，以此暴敛黄金与银元。另外，他还派人充当福建盐运使，控制重要的盐税收入。

这一时期，卢兴邦为了牟取更大发展，派部属杨愚谷等携巨款前往南京、上海一带，多方钻营；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笼络国民党政要。

卢兴邦胸无点墨，却故作风雅。1929年10月五十生日之际，在南平举行大规模寿庆，将收到的许多寿序、寿诗汇印成册，广为赠送。蒋介石从南京派专员前来祝寿，送他一幅

寿甌^③，卢引为无尚光荣。

到1930年，卢兴邦的军队除嫡系的卢兴明部、卢兴荣部外，还有归附他的闽西卢新铭、古田钱玉光、尤溪陈荣标等部，共达万人，管辖闽西北二十余县。卢兴邦欲凭此基础，进一步夺取全省权势。适阎锡山酝酿反蒋，卢派人潜往太原向阎输诚；同时派人赴南京探察情况，拟乘国民党政府内部派系斗争、政局动荡之际，推翻以杨树庄为主席的福建省政府。1月初，杨愚谷从南京打来电报说：“蒋倒可行”，意为“蒋若倒，事可行”^④。卢却以为蒋政权已经垮了，即下令于1月6日晚上在福州扣押省政府六名委员，送禁尤溪，造成轰动一时的“绑架六委事件”。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后，阎委卢兴邦为中华陆军第二十军军长，并允帮助卢扩充实力进攻福州，许卢事成后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卢兴邦大喜^⑤。蒋介石为解决福建问题，除派张群至福州进行调解外，并调刘和鼎的五十六师驻福州，下令讨伐卢兴邦。卢则响应阎冯进行反蒋，部署攻打福州。8月遂爆发了刘卢战争。由于卢部团长钱玉光被方声涛收买，杀死卢部旅长陈荣标，促使卢部迅速动摇。10月，卢兴邦战败求和，通电悔过，释放了被扣的省府委员，嗣后又用金钱央托陈肇英出面疏通。于是蒋介石取消了对卢兴邦的讨伐令，并把卢部改编为陆军第五十二师，仍以卢为师长。经过这场战争，卢的势力大为削弱，地盘也缩小了，只剩下沙县、永安、尤溪三县。同时卢部薪饷规定由南京政府统一发给，而地方各项税收则归省府掌握。称霸一方的卢兴邦，从此一蹶不振。接着，蒋介石驱使卢部参加“剿共”，委卢兴邦为“闽西剿匪指挥官”，令其所部开往闽西，分驻沙县、永安、宁化、清流、

归化各县。在永安、宁化等地，卢部时时挨红军攻打，损失实力不少。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反蒋前，为拉拢土著军队，曾与卢兴邦部联系过。卢派卢兴荣到福州会见蔡廷锴，商谈合作。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时，卢兴邦电贺蔡廷锴等就任新职，表示“谨率所部，抱橐负弩，静候指挥”；后卢又通电接受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委任，就人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职，并为十九路军提供一些蒋军情报^⑥。但与此同时，卢兴邦又派人去见蒋介石，接受讨伐十九路军、镇压“闽变”的任务。卢部为了阻止红军推进南平与十九路军联合，在沙县、尤溪死守两个星期，使入闽的蒋军能够迅速通过南平直驱福州，因而受到蒋介石嘉奖^⑦。卢部还为蒋军卫立煌部带路，直趋永泰，袭击十九路军。

1934年初，蒋介石在福建解决了十九路军后，即调动军队大举进攻闽西红军。卢兴邦的五十二师也被编入进攻序列。蒋军从南平、沙县向归化进攻，卢部则从永安向清流、归化推进，以牵制红军兵力。红军撤离闽西开始长征后，蒋军随即开进闽西地区，卢部也乘机进驻清流、归化一带。

这时，蒋介石乘势进而解决卢兴邦部。蒋以参加“会剿”为名，先把卢兴邦所有部队调离闽北老巢，开到龙岩地区，与蒋军混驻在一起；继而对卢部主要人事加以调整，改任卢兴荣为师长，派进黄埔系军人担任重要职务。1936年秋，卢部被全部调离福建，开往浙江。从此，卢兴邦蛰居尤溪。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命令卢部从浙江开往上海前线参加作战，结果卢部在上海退却时几乎全部覆

没。后卢虽在福建、安徽等地招募新兵，但经补充训练后又奉命开到安徽宁国，以连为单位被分别编入国民党第十八军的十一师、十三师。至此，卢兴邦的全部实力被蒋介石吞并了。

1945年10月29日，卢兴邦在尤溪病死^⑧。

注：

- ① 《奋兴报》1925年9月8日。
- ② 《江声报》1932年8月20日。
- ③ 《卢光国五十寿言汇刊》。
- ④ 许显时：《福建地方派系的倾轧与“一一六事件”始末》。《福建文史资料》第一辑第91页。
- ⑤ 杨立等：《关于卢兴邦部琐记》。《福建文史资料》第四辑第99页。
- ⑥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九辑第74页。
- ⑦ 钟大钧：《闽北卢兴邦史略》。《福建文史资料》第四辑第90页。
- ⑧ 《东南日报》1945年11月21日。

李 士 群

黄美真 石源华

李士群，浙江遂昌县人，生于1905年4月24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早年丧父，依靠母亲种田为生。少时在本乡读私塾，二十年代初到上海，先后入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读书。曾游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值国内北伐军兴，投袂回国”^①。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影响下，经上海大学同学方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李士群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曾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为避免巡捕房将他移交给国民党当局，即向青帮大流氓季云卿投了“门生”帖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1932年，李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即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并与另外两个叛徒丁默村、唐惠民在上海新光书局编《社会新闻》杂志，对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内反蒋派系进行诬蔑诋毁。

1933年，李士群在特务内部的争斗中，因参与谋杀上海工作区首任区长马绍武，被逮捕押解南京受审，饱尝酷刑，险些丧命。后由他的妻子、叛徒叶吉卿打通了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门路，李士群才获释，但仍不准擅离南京。此后，李先后被委为党务调查科编译员、南京区侦察员和国民党办的

“留俄同学会”理事、“留俄招待所”副主任，很不得志。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李士群与另外两个特务石林森、夏仲高奉命“潜伏”。此时，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已在上海设立特务机关，派一女特务到南京活动，并与李姘居。具有强烈领袖欲和政治野心的李士群感到自己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爬不上去，决心投靠日本侵略者。1938年夏秋之间，李士群趁“中统”委派他为“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的机会，席卷了全部特务经费，逃到香港，拜见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把他介绍给日本驻华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做情报工作。就这样，李士群由革命叛徒、“中统”特务又变为叛国投敌的汉奸，成为日本侵略者手下的鹰犬。以后，李常对人说：“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②活露出一副无耻汉奸的嘴脸。

李士群到上海后，为了站稳脚跟，首先把手伸向国民党市党部等机构，将“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章正范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刘坦公拉下水，一起搞情报。接着，又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杜月笙的“学生”汪曼云取得谅解，进而与当时已到香港的杜月笙接上关系。同年底，“军统”派上海区行动股长于松乔谋刺李士群，汪曼云将此消息透露给李，使他免于丧命。

随着李士群在上海情报活动的开展，日特机关对他越来越重视。1938年12月汪精卫逃离重庆，不久发表了投敌的“艳电”。日特机关示意李由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以便策应汪的“和平运动”。李深知自己在蒋党特务圈子里的声望不

足，于是便把原“军统”第三处处长丁默村从昆明邀来入伙，并允推戴他为首领。

1939年2月上旬，在清水董三的陪同下，李士群、丁默村拜见了土肥原贤二，表示：为了“收拾时局”，他们要“纠合国民党同志”“推进和平运动”，“希望取得日本方面的谅解”。并强调说：“为对付重庆的恐怖活动，我们也有必要建立特工组织。如有日军援助，我们俩人组织特工。”^③3月20日，日本参谋总长给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发出训令，决定“援助丁默村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上海恐怖活动的对策的一部分”^④。每月贷款三十万元，出借手枪五百支、子弹五万发以及炸药五百公斤。李士群当即开始在上海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一方面，通过季云卿收买了以吴四宝为首的大批地痞流氓和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兄弟”，作为特务打手；另一方面，利用丁默村过去的老关系，招纳了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党棍以及失意军人，作为特务骨干，初步形成了一支特工队伍。李士群和丁默村、唐惠明、茅子明、翦建午、叶耀先、章正范为核心人员，即所谓“七人委员会”，对外以“中华扬子轮船公司”为掩护。

为了在政治上进一步打开“局面”，李士群、丁默村在日特机关的授意下，开始投靠汪精卫集团。1939年4月，当汪精卫还在河内时，他们就派汪曼云在香港和周佛海接上关系，表示愿为汪的“和平运动”效忠。5月，汪精卫一伙抵达上海，进行建立伪政权的活动。经日特机关同意，李士群、丁默村一伙便划归汪精卫集团领导，并正式成立了“特工总部”，由丁默村任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任副主任。他们成立了警卫大队，负

责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汉奸头目的安全保卫，成为汪精卫集团进行叛国活动的第一支武装力量。8月底，汪精卫集团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士群被指定为“中央委员”。9月5日，汪记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任主任委员，丁默村、李士群任副主任委员；“特工总部”成为它的下属机构，仍由丁默村、李士群、唐惠民分任正副主任；李士群并兼“肃清委员会”副主任。

汪伪“特工总部”虽以丁默村为首，但实权却操在李士群之手，丁、李为了争夺这支特工队伍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1939年底，李赴东京，与日方进行更加紧密的勾结，取得了日本参谋本部对他的信任。同时，他又向汪伪集团内实力派周佛海靠拢，获得了周的支持。1939年底，他终于先将唐惠民调任“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使自己与丁默村并驾齐驱；继又架空了丁，独揽了“特工总部”的大权。

在日特机关的全力支持下，李士群的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他将“特工总部”的组织机构大加扩充，设立八处（第一处专管“军统”，第二处专管“中统”，附设“CP股”对付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第三处专管“忠义救国军”，第四处专管租界，另有机要、总务、电务、情报处）、四室（即督察、专员、审讯、化验室）、二所（招待、修械所）；又将特工武装队伍编组为一个行动总队（下辖六个行动大队）、一个警卫总队（下辖五个警卫大队）以及一些直属总部的警卫队、行动组；还建立了不少外围组织，如负责“学生运动”的“海社”，拉拢租界司法人员的“法院同仁会”，负责宣传舆论的“国民新闻社”，筹措特务经费的

“立泰银行”、“上海实业银行”等，并先后在南京、杭州、青岛、武汉以及其他沦陷区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组织完备、行动诡秘的特工机构，作为日本侵略者的凶恶鹰犬和汪伪政权的重要支柱。1940年3月，汪精卫集团成立伪“国民政府”时，李士群在周佛海的支持下，依靠手中的实力，将丁默村排挤出“特工总部”，自己出任汪伪政府警政部政务次长兼“特工总部”主任。同年12月，周佛海辞去警政部长职，李士群升任，权势更盛。

在李士群的直接指挥下，汪伪特务在上海制造了数不清的惨案。他们先后袭击了当时还保持抗日立场的《中美日报》、《大美晚报》等报馆，用浸过毒液的子弹暗杀了进行抗日义卖活动的“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负责人、共产党员茅丽英，还刺杀了不肯听命于汪伪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长郁华、“第一特区法院”刑庭长钱鸿业等。在大量血腥事件中，最为惨烈的要数“银行血案”。为了报复“军统”特务对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袭击，李士群不仅派特务炸了国民党中央银行驻在租界上的两个办事处，而且于1941年3月22日午夜，派遣大批特务包围了“中央银行别墅”，抓走中央银行职员一百九十余，人，并从中提出三人枪决（其中一人未死）。同一天深夜，李士群又派另一批特务包围了中国农民银行职员宿舍，用盒子枪扫射，致使六人死亡，五人重伤。至于绑票勒索，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如绑架杀害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勒索协大祥绸布店老板数十万元等均是。上海市民无不提心吊胆，不知何时横祸临头。沪西、南市一带的沦陷区，由汪伪特务开设的赌台、烟馆、妓院林立，其数量之多、规模之

大，创上海开埠以来的最高记录。总之，李士群指挥下的汪伪特务，依仗日本侵略者的势力，横行不法，无恶不作，把上海搅得腥风血雨，乌烟瘴气。“特工总部”所在地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臭名远扬，附近沪西一带，被称为“歹土”。

1941年春，日本侵略者为了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在华中占领区实行“清乡”。李士群掌握的特工力量，再次受到日本方面的重视，他被任命为汪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主持“清乡”工作。他将“警政部”、“特工总部”的大批特务、警察头目，以及亲信爪牙，安插进“清乡委员会”，控制了各部门。李先后与日方签订了关于苏州地区、苏北地区“清乡”协定，规定由日方担任“关于作战及封锁事项”，汪方担任“政治工作”；伪保安队和警察等“在清乡工作实施期间”，由日方指挥调遣等等^⑤。李士群利用“清乡”，从伪江苏省政府接管了“清乡区”的行政、赋税、教育、卫生等机构。

1941年8月，汪伪警政部与内政部合并成立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李士群任部长。12月李挤走了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自己继任。李一身兼任伪军委会部长、省政府主席、特工总部主任三要职，踌躇满志，频繁往返于上海、苏州、南京三地，权势发展到顶峰。但他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引起了日本侵华当局的疑虑和反感，与汪伪集团中其他人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同周佛海、罗君强、林柏生等都发生激烈的权力冲突，而“特工总部”的一批骨干如丁默村、苏成德、马啸天等也先后离他而去，有的甚至成了他的政敌。

1943年5月，蒋介石下达了除去李士群的命令，交周佛海执行。周“历四月之久，费了千多万”金钱^⑥，终于在9月4日

勾结日本驻上海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借口调解李士群与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的矛盾，由冈村出面邀李、熊两人至上海百老汇大楼（今上海大厦）赴宴。冈村妻子于食物中投下毒药，殷勤请李品尝。第二天，李士群回到苏州开始发病，挣扎至19日毙命。

注：

- ① 汪精卫：《李士群墓碑铭》。《中华日报》1943年10月14日。
- ② 马世淦：《我所知道的李士群》（未刊稿）。
- ③ 〔日〕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载《日中战争》（二）（《现代史资料》9），1965年版第196页。
- ④ 〔日〕益井康一：《汉奸裁判史》（1946—1948）。みすず书房1977年9月版，第200—201页。
- ⑤ 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第三辑第100册。
- ⑥ 周佛海：《简单的自白》（未刊）。

罗 君 强

黄美真 张 云

罗君强，谱名光治，别号庸生、竹侯等，曾化名刘健生、李景祁，湖南湘乡县入，1902年5月24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17年，罗君强入长沙青年会日学校读书，次年7月毕业后赴上海入大同学院。1919年1月因病辍学，同年8月赴法勤工俭学，旋因病回国，在湘乡陶龛小学任教。1920年8月，罗进长沙岳云中学读书，于1922年7月毕业。

罗君强在岳云中学读书期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22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主编《赤光周刊》，并兼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湖南分会书记。1922年夏，罗受湖南中国共产党组织委托，作为湘区及安源的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次年春，罗父去世，他在丧事上大肆铺张，受到党的批评，便在长沙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1924年初，罗到北京准备报考北京大学，经蔡和森的教育帮助，又恢复了共产党党籍，回湖南参加革命活动，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兼任中国共产党湖南训练委员会秘书。翌年春，罗患气管炎严重咯血，回湘乡家中休养，对革命丧失信心，意志消沉，终于第二次脱党。

1925年秋，罗君强再度赴沪，入大夏大学读书，旋即参加国民党。次年12月辍学到武汉，在张治中的学兵团任政治部上尉科员兼政治教官。不久即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政治部上尉科员，主编校内刊物《革命生活》。罗君强以同乡关系，与该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结交。罗在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先后任少校交际股员、中校公报股股长等职。1927年9月宁汉合流，罗被派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校政治教官。

1929年3月，蒋桂之战爆发。罗君强任陆军第六师政训处中校秘书，随军到汉，旋被“总司令行营政训部”主任周佛海推荐任该部秘书长。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开始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罗君强于1932年7月任蒋介石“武汉行营”秘书处上校秘书。在这期间，罗经常编印反共书刊、标语、图画，恶毒地诬蔑共产党，进行反共宣传^①。10月，调任浙江海宁县县长，抽调壮丁成立保安基干队，镇压人民。1933年11月，又被调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二厅（政务）第四课课长，兼第二组（财经）副组长及行营办公厅上校秘书。1935年春，南昌行营撤销，改设“重庆行营”，罗仍任行营上校秘书。在红军长征途中，罗君强参与追截红军及“肃清”所谓“收复地区”的共产党势力等反革命活动，并参与制订“剿匪时期惩治盗匪暂行条例”、“匪军投诚缴械给奖办法”等多种反动文件。

从1937年初开始，罗君强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少将秘书、办公厅秘书处少将处长、蒋介石侍从室上校秘书等职。“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之际，罗被日本帝国主义暂时的军事优势吓破了胆，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与周佛

海等人沆瀣一气，诬蔑人民的抗战呼声是“唱高调”，鼓吹“亡国论”，成为抗战初期所谓“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之一。1938年2月，罗参加周佛海、陶希圣主办的灰色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任该会秘书及总务组主任干事，出版拥蒋反共书刊，继续散布投降主义论调。

1938年12月，汪精卫、周佛海等逃出重庆，不久即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这时，罗君强由于生活糜烂、行为不检，被免去行政院简任秘书的职务，乃于1939年2月以“治病休养”为名，由重庆飞往昆明，再经河内转香港。周佛海约其加入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罗认为自己在蒋介石幕下长期任秘书工作，“除了当过一年海宁县长外，未曾正式捏过印把子”，这次“逆取顺守，乘时乘势，有权有势有伙伴”，“可能搞出一点名堂来”^②，于是满口答允，甘当汉奸。

罗君强是周佛海最亲信的助手，汪伪集团的重要骨干。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罗被指派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党部副秘书长。1940年初，汪伪组织“国府还都筹备委员会”，罗为该会委员兼布置组长。其后担任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进行所谓“以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树立南京新政权”的活动，及“整理中央政府必要之建筑物及其他用品与事务人员”等事项^③。3月底，汪伪政权在南京开场，汪精卫自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罗君强先后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清乡”委员会委员、“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他并任南京《中报》、上海《平报》社长，积极从事“和平反共”的反动宣传，竭力吹嘘汪伪的“和平运动”是“负荷世界战略的新使命”，

是“为了人类文明再造的种子”；诬蔑共产主义是“以思想理由杀人，以宗教情绪灭口者”，要坚决与之“反抗”^④。他大肆鼓吹与日本侵略者“携手共进”的所谓“东亚联盟”的“自觉运动的民族联盟”、“平衡发展的经济合作”、“除旧布新的军事同盟”、“亚洲中心的文化沟通”等四项卖国纲领，叫嚷中日两国要“声应气求”，要“与邻邦日本采取齐一的步调与共同的计划，自打破东亚的以至世界的旧秩序而建设新的秩序，自扫除欧美帝国主义留在东方的残余力量，以至杜绝赤化的根苗”，早日实现“东亚联盟”^⑤。

1942年至1943年冬，罗君强任汪伪司法行政部部长、法官训练所所长、中央税警总团中将总团长、财政部税警学校副校长（校长为周佛海）等职，大力强化司法手段，对沦陷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他曾率税警数百人配合日本侵略军，在常熟、江阴、南汇、慈溪、余姚、上海等县进行残酷的“清乡扫荡”，与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发生多次战斗，批准杀害被捕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多人。1944年1月，罗就任伪安徽省省长，兼任蚌埠“绥靖主任”及省党部主任委员。他实施“田赋征实”等反动政策，进行疯狂搜括，为日本侵略军“以战养战”政策效劳。罗还卖力推行毒化政策，抽鸦片亩捐税，收购烟浆，制造烟土毒害人民。

同年底，周佛海兼伪上海市市长，罗君强先后被任命为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代理警察局长、财政局长及市府公路委员会主席等职。他极力推行保甲法令，强化汪伪统治，同时增办新税，实行奴化教育，还为日本侵略军扩修公路桥梁，加修飞机场，以防御同盟军队在沿海登陆。他因此在日

本侵略者的心目中有着“良好印象和特殊声誉”^⑥。

罗君强善于进行政治投机。早在1941年，便随周佛海与重庆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相勾结。1945年5月，日本侵略军败局已定，罗在周的默许下，在上海秘密发起“建国社”，标榜其纲领为：“（一）绝对信仰三民主义；（二）绝对拥护蒋主席；（三）绝力保卫京沪苏浙地区的治安”^⑦。这一组织网罗了伪上海市军、政、警重要头目为干事，其成员遍布各警察分局、各保安队及税警总团，是罗准备投靠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同年7月，戴笠亲笔致函罗君强，指示他“联络各方有志之士，团结所能掌握的一切有用力量，适应时机，协同行动”，并委托他负责“此间（指上海）一切”^⑧。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罗君强以代理警察局长名义向全市发布警令，声称“决不使任何不合法的势力（按：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侵入市内”，“必保护上海全市的生命财产直至安全地奉还中央（指蒋介石政府）而后已”。扬言“最后虽剩一兵一卒，亦必周旋到底”^⑨，向重庆国民党政府大献殷勤。当时，蒋介石政府为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进入上海，在日本一宣布投降之时，即电令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这两个汉奸头子摇身一变，顿即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人。8月19日，罗发布紧急命令称：“所属官警及市区全体保甲人员，自应归顺中央，服从蒋委员长命令，并应听从上海行动总队司令部指挥”，“集中警力，强化治安”^⑩，为国民党“劫收”上海效力。罗君强本来罪大恶极，只因随周佛海搞“曲线救国”和反共有功，在蒋党包庇下得以一时逍遥法外。但在全国人民“严惩汉奸”的强烈呼

声面前，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9月30日将罗逮捕，并于1947年3月6日判以无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君强对蒋介石反动派“反攻大陆”抱有幻想，不承认自己的汉奸罪行。以后经过教育，态度才有所转变，承认自己“罪恶重大，几个头也都可杀，但共产党没有杀我”^⑩，表示愿意向人民认罪。1970年2月22日罗君强病死于上海市监狱。

注：

- ① 罗君强：《补充交代的几个问题》（1960年7月12日）。
- ②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的回忆纪实》（未刊）。
- ③ 《南京新报》1940年1月28日。
- ④ 罗君强：《和平反共建国的迁都一年》。《中报》1941年3月30日。
- ⑤ 罗君强：《欢迎日本众议院来华诸君》。见1940年度汪伪“国定教科书”初中国文第六册。
- ⑥ 罗君强亲笔供词。
- ⑦ 罗君强：《自白》（1946年9月18日）。
- ⑧ 戴笠致罗君强亲笔函（1945年7月29日）。
- ⑨ 同③。
- ⑩ 罗君强：《紧急命令》。《中华日报》1945年8月20日。
- ⑪ 《战争罪犯处理报告》（1959年9月11日）。

陈 春 圃

黄美真 张 云

陈春圃，1900年3月8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八）出生于广东新会，是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远房侄辈，家境清寒。青年时求学于广州圣心书院，1919年因病辍学。此后即投靠汪氏夫妇。1920年，汪精卫出任广东省教育会会长，陈任该会图书馆主任兼编辑主任。1923年由陈璧君推荐，任广东省长公署机要课主任，“自那时起才开始有了政治关系和活动”^①。

1924年初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陈春圃随任该部秘书。1925年冬，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华招生，陈由汪提名，成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保送的八名留学生之一，并被汪指定与林柏生同为国民党方面选派的留学生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络人。陈春圃于次年9月回国。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背叛革命后，宁汉分裂。汪精卫任武汉政府党、政、军要职，陈春圃即于5月至武汉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秘书。汪发动“七一五”政变后，宁汉趋于合流，陈赴粤就任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

宁汉合流不久，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因分赃不匀，又告分裂，1928年初汪精卫赴法。同年10月，陈春圃追随去法。旋应汪命去美国纽约创办《民气日报》，任总编辑，进行反蒋宣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打着“精诚团结、

共赴国难”的幌子重新合作。汪于1932年1月底出任行政院长，陈由美回国，被任命为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侨民教育处处长。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前后，陈春圃追随汪精卫，大肆鼓吹“亡国论”，在华侨中散播“抗战没有胜利的希望”等民族投降主义谬论^②。1938年底，汪准备逃出重庆投敌叛国，事先指派陈前往昆明打前站。陈即向侨委会请假，把汪的幼子、幼女连同贵重财物带到昆明。随后将汪的子女送上飞机逃往香港，自己仍留昆明，为汪的叛逃作联络。以后又赶到河内，再转香港，担任联络和交通工作，是汪投敌的一名得力的马前卒。

1939年夏，陈春圃随汪精卫逃到上海，在汪左右处理重要机密。1940年1月，汪精卫集团内部倾轧，高宗武、陶希圣秘密离开上海拆伙而去，并在香港公开披露了1939年冬汪精卫与日本秘密谈判的《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全部内容。这时，汪精卫等人正在青岛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和伪南京维新政府头目王克敏、梁鸿志举行分赃会议，为了稳住阵脚，陈春圃秉承陈璧君的意旨，以汪随从秘书长的名义发表声明辩解说：“高宗武、陶希圣所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间之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冲之结果，而为断章取义之片断记录”，妄图抵赖。同时吹捧汪精卫“本于国民之需要与期望，不避艰险，毅然决然以领导和平运动，凡非中国之自由独立与生存之条件者，皆非汪先生所能接受”。又凭空吹嘘“吾人与日方所商订之和平条件，断不损害我国之生存与自由独立，且信必能因此而奠定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以谋两

国之共存共荣”^③，为汪投敌卖国诡辩。

1940年3月下旬，汪精卫在南京召开汪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筹备组织伪政府，陈春圃任“中政会”副秘书长。汪伪行政院成立后，陈任秘书长，并先后任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副秘书长、伪最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等要职。在此期间，又以汪私人秘书的身份，处理行政院内各种重要文件，编列行政院会议及“中政会”会议之议事日程及各种决议。同年8月，汪日双方签订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使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侵略，披上一袋条约的外衣。其后，又于11月30日发表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公开承认伪满洲国。对于这些卖国条约、协定的签订及所有布告、宣言的发布，陈春圃均“参与谋议”^④。

1943年9月，陈春圃调任伪南京政府建设部长，主管铁路、邮电、航政、都市建设及水利等。同时，兼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伪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掌管人事大权。1944年4月，伪广东省长陈耀祖被刺殒命，陈春圃由陈公博、周佛海推荐，赴粤继任伪广东省省长兼广州“绥靖主任”。其间因陈为强化日伪的统治卖力，曾被派往日本参拜伊势及热田两神宫，公然无耻地为日本“祈祷大东亚战争的胜利”^⑤。

陈春圃是汪精卫集团中所谓“公馆派”的主要成员之一。1944年11月10日，汪在东京病死，陈公博在日本主子的支持下就任“代国府主席”，陈春圃追随陈璧君表示消极。其后，陈公博虽数次委以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文官长及司法院副院长等职，他均予拒绝，而赋闲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

抗战胜利后，陈春圃自知“无所逃避”，于1945年9月17

日在上海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驻沪特派员办事处投案。经军统局解送国民党上海市高等法院，于1946年10月4日，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被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⑥。陈不服，请求复判。1947年12月被判为无期徒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春圃留押于监狱，表示认罪服罪，“确认自己是汉奸，只有服罪认过之一途，此外别无生路”^⑦。1966年3月19日，陈病死于上海市监狱。

注：

- ① 陈春圃：《蒋介石、汪精卫争当“儿皇帝”的内幕和汪精卫傀儡戏班底的拼凑与灭亡》（未刊）。
- ② 陈春圃：《自白书补充材料》（1951年8月18日）。
- ③ 陈春圃：《驳斥高、陶在港造谣》。《中华日报》1940年1月21日。
- ④ 《上海市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1946年度特字第三二〇号。
- ⑤ 同④。
- ⑥ 同④。
- ⑦ 陈春圃：《解放后我思想上转变情况》（1951年8月18日）。

许 鼎 霖

熊尚厚

许鼎霖字九香，祖籍江苏海州，1857年（清咸丰七年）出生于赣榆县。他的父亲许恩普为当地绅士。许鼎霖幼年入私塾读书。十四岁那年，父亲遭当地官吏诬陷下狱。1882年，他去南京参加乡试中举。之后借助于同期参加乡试的友人的力量，替父申冤，使其父得释出狱。

1893年2月，许鼎霖随清政府驻美国兼秘鲁公使杨儒出国，任驻秘鲁领事。1897年回国，在安徽先后任庐州、凤阳等地知县。1900年，他在任大通保甲局委员的时候，侦得自立军党人秦力山等举义，立即分派局勇前往镇压，逮捕党人七名。次年底，聂缉槩任安徽巡抚，对许十分赏识，保荐他得安徽候补道衔，署理芜湖道篆。1902年5月，他会同芜湖巡警局增募警勇三百人，改设巡警总局。年底又与道台吕韵生制定警察章程，试办警察。1903年秋，浙江发生宁海教案，10月聂缉槩调任浙江巡抚，许鼎霖亦随任浙江洋务局总办。11月，他被派办理宁海教案，与法国天主教主教赵保禄磋商解决条件。次年7月，经清政府批准严惩反教首领，将宁海县令充军，并赔偿教堂银十五万两，给被杀教士立碑道歉结案。许办此教案颇为效力。

许鼎霖在皖、浙两省做官期间，在聂缉槩庇护下积储钱财

颇多。在当时新式企业利润的刺激及“设厂自救”的社会舆论激励下，他决定投资实业。1904年8月，他在江苏徐州与张謇等开办耀徐玻璃公司，资本八十万两，他任总理。次年10月，与英商福斯德订合同，开始筹建厂房、购置机器，聘福斯德任工程师。1906年2月，该公司获清政府商部批准专利十年。1908年5月正式生产出货。嗣因发生争执，福斯德突然撕毁合同，私自撤走机器，带走英国工匠，使生产停顿。后虽经英国领事从中调解，派回数人指导开工，终因质量低劣，无法正常生产。许鼎霖只好改聘澳洲人维斯罗为工程师，更换设备。1909年始大规模生产，日产玻璃七千块，品类五十余种，产品曾在南洋劝业会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得奖。其后，因经营管理不善亏蚀，1911年秋破产歇业。

在开办耀徐玻璃公司的同时，许鼎霖与严信厚等在海州创办海丰面粉公司，官商合办，资本三十万元，许任经理。1908年获利四万五千九百余两（官利八厘除外），营业甚为发达。1910年4月，当地发生饥荒，该厂被饥民捣毁。

许鼎霖和严信厚等还于1905年6月集资四十二万元，在赣榆创办赣丰机器油饼厂（榨油），雇英人管理机器，获商部批准专利权五年，许任经理。开办后颇能获利。

此外，在1904年至1907年间，许鼎霖还分别与张謇、严信厚等合伙经营镇江开成铅笔罐厂、赣榆海赣垦牧公司、上海同利机器纺织洋线麻袋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船公司，并投资北京溥利呢革厂、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等企业。

许鼎霖以封建官僚改营工业，受到清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数年间发起创办或投资如上的许多企业，成了清末著名大实

业家。因此，清政府在1908年1月赏给他正二品封典，以奖其创办实业之功。

1905年9月，许鼎霖与恽祖祁、王清穆等联合教育界人士，在上海发起组设江苏学会，他任会董兼经济部干事。次年江苏学会改组，更名江苏教育总会^①，他又任干事员（1909年任副会长）。该组织以教育救国为宗旨，从事于社会改良运动。

1906年9月，清廷宣布欺骗性的预备立宪后，各地立宪派纷纷发起组织立宪团体。许鼎霖在创办工业活动中，与张謇关系密切，二人常在一起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是立宪派的重要活动分子。是年12月，许鼎霖同张謇等一起，联络江苏、浙江、福建的立宪派，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许任本部事务所会董。1907年9月清廷公布将设资政院，10月又通飭各省督抚筹设谘议局，各府县设议事会。许鼎霖和其它立宪派分子一样，对清政府愈加依赖。当时苏浙群众反对清政府借外债筹筑苏杭甬铁路的斗争正在进行，许与王清穆等被指充代表去北京，但他们完全屈从于清政府的旨意，接受御史江春霖提出的部借部还方案（即由邮传部借，邮传部还），翌年春承认沪杭甬铁路借款条约，使苏浙铁路拒款运动受挫。

1908年春，西太后害怕实行立宪，欲将预备立宪的上谕藉故取消。立宪党人纷纷发起请愿运动予以对抗，许鼎霖与张謇等即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致书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公会、广东自治会及豫、皖、直、鲁、川、黔等省立宪派，相约各派代表集合北京，向都察院递交《呈请速开国会书》。同年8月和9月，清政府宣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公布《宪法

大纲》二十三条。许对这次请愿感到自慰，认为总算取得了一定成果。同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先后死去，溥仪嗣位，以醇亲王载沣摄政。1909年3月6日，清政府颁布“重申实行预备立宪谕”，宣示“决心”立宪。同年秋，各省谘议局纷纷成立，许鼎霖与张謇于9月筹办江苏谘议局，许任总会办，10月又任学务特审员及审议会议长。各地立宪党人因得到法定集会机关，更加活跃起来。是年冬，张謇以江苏谘议局名义通电，请求清政府1911年召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张并派人分赴各省游说，联络全国十六省谘议局，各派代表三人在上海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进行请愿运动。许鼎霖积极支持这一运动。

1910年9月，清廷成立资政院，许鼎霖被钦选为议员，任专任股第二股长兼审查各省谘议局关系事件特任股员。当时“国会请愿同志会”及各省商会、海外华侨等代表正在北京举行第三次请愿，向资政院上书提议速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许在资政院内极力支持。11月21日，资政院召开第一次常年会第二十八号会议，立宪派为了缓和人民对清廷的不满，提出所谓“军机弹劾案”，要求组织内阁。部分议员表示如果不达目的便决心解散资政院。许在会上表示异议，说：“现在中国正在危险的时候，若我们对于弹劾军机大臣就存一个解散的决心，于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何以见之？现在一般人民有立宪国的意气，并无立宪国民的程度，一经解散人民的代表，即是弃绝人民，恐怕革命党、哥老会乘此机会煽惑民心，暴动起来就不得了。”^②充分暴露了他害怕革命、热心保皇的立场。

1911年初，许鼎霖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命为本溪湖煤铁公司督办，10月改任盐政监督。武昌首义后，沈阳学生联

合各界于11月2日组织奉天“国民保安会”，推赵尔巽为会长，许任奉天交涉使。奉天“国民保安公会”在赵尔巽把持下，暗中利用张作霖以武力镇压革命党。许顽固地站在赵尔巽等一边，表示与清王朝共生死，大谈“君主立宪是救世良方”，反对革命，谓“共和政体实毒害人心”^③，反对建立民主共和政体。12月17日，他经赵尔巽推荐，随唐绍仪代表清政府到上海议和。在开议中途返回北京向袁世凯报告，力言民军方面枪械不足，可用武力将革命镇压下去；并谓唐绍仪妥协，不足胜任总代表职^④。1912年1月，许鼎霖还担任了几天资政院总裁。南京政府成立后，2月12日，清帝被迫下诏退位，他只好另谋出路。1913年初，许加入国民党，2月在国民党议员的支持下，被举为江苏省议会议长。不久，袁世凯公开镇压革命党人，制造了著名的宋教仁被杀案，国民党人遭到打击，许见势不妙，辞去了江苏省议会议长职。

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篡改民元约法，设政治会议为其御用工具。许鼎霖得张謇的举荐，被袁指定为江苏省特派议员。次年2月，袁下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会，解散各省议会，并打算成立所谓造法机关——约法会议。许被指定为政治会议审查员，参与拟具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3月，约法会议成立，他任该会议员。9月，任江北茆荡营督办，前往主持垦务。1915年改任江苏、安徽赈务督办。

1915年10月15日，许鼎霖病逝于上海。

注:

- ① 江苏学会和江苏教育总会,系教育团体。1905年,初名江苏学会,又称江苏学务总会。次年,按学部颁布的章程改名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先由张謇、唐文治等担任。1912年后由黄炎培、沈恩孚等主持会务。1927年停办。
- ② 宣统二年第一次常年会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二十八至二十九号)第11—12页。
- ③ 《甘肃咨议员张杜森致电袁世凯》。《民立报》1912年1月17日。
- ④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

孙多森 孙多钰

熊尚厚

孙多森，字荫庭，1867年1月23日（清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生，安徽寿州（今寿县）人。他的父亲孙传樾，曾在李鸿章幕下参加镇压太平军，之后转任江苏记名道，在南京任洋务局总办。孙家在长江一带经营盐务，家资巨万，富甲一方。1885年孙多森中秀才，继为贡生，捐得候补同知官衔。1893年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孙氏兄弟在其叔父孙传棉的支持下，决定开办实业。

初始，鉴于面粉业有利可图，且制造较易，孙多森派人去上海筹办面粉厂。经过两年的准备，1898年2月与其兄孙多鑫，在上海创办阜丰面粉公司，是为国内华商第一家机制面粉厂。阜丰资本规银三十万两，获清政府准免税款，向美国购买机器，总公司设上海。1900年建成投产，日产面粉二千五百包（五百桶）。孙多森任总经理，孙多鑫任协理。阜丰开办后营业颇有起色，1904年扩建厂房，增置机器。次年，国内发生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同时因日俄战后东北三省面粉销路很好，阜丰日产增至七千余包，获利甚大。是年，孙多鑫投直隶总督袁世凯幕下，阜丰由孙多森经管。

孙氏兄弟与周学熙是安徽同乡，并是亲戚，他们在天津都先后成了袁世凯的僚属，因而关系日益密切。先是孙多鑫在

直隶同周学熙一起替袁经办启新洋灰公司、直隶滦州矿务局和天津造币厂等企业，并投资于启新洋灰公司。1907年春，孙多鑫病故，袁世凯召孙多森去天津接替孙多鑫的职务。他抵津后，与周学熙共同经营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局，担任两公司协理。次年，周学熙在北京创办自来水公司，孙多森任该公司协理。1909年，直隶全省工艺总局成立，他任总办，并兼南洋劝业协赞会会董。其后直隶总督杨士骧指派孙多森会同周学熙组织直隶出品协会，孙任协理，在天津劝工陈列所举办劝业会。1910年4月，孙任直隶劝业道，不久被人指为“庸人”，遭到直隶省諮议局的弹劾，遂辞劝业道职，仍任启新洋灰公司和直隶滦州矿务公司协理。他在劝业道任内，编有《直隶实业汇编》一书。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12月，孙多森被袁世凯举荐，任清廷内阁和议代表，随总代表唐绍仪去上海议和。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和议陷于停顿，孙回到天津。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他被派往安徽任实业司司长，未及一月被免职。9月，周学熙于北洋政府财政部内筹设“国家银行事务所”，10月派金邦平为总办，孙任会办。12月，周又邀孙管理中国银行，继吴鼎昌任监督。孙多森鉴于中国银行袭用大清银行的旧式管理，甚为陈旧，即提出改革意见：增设分行十九处，以在政界有声望的官吏任分行负责人，而以熟悉银行业务的留学生任副职；派人前往日本考察银行业务；派员在各省调查商情；设置金库及高等银行学堂等^①，很想办好中国银行。1913年4月，孙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裁。他修订《中国银行则例》三十条，得到参议院的通过，由财政部公布施行。其要点

是：（一）中国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二）资本总额六千万元，由政府先认垫一半，缴所认股份的三分之一开业，同时招募商股；（三）经理国库及公债，代政府发行货币；（四）经营买卖金银及各国货币^②。5月，财政总长周学熙下台，交通系头子梁士诒署财政次长代理部务，随即下手攫取中国银行。6月，孙辞去总裁职务。

是月30日，袁世凯下令革除革命党人柏文蔚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职，以“皖人治皖”名义，派孙多森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7月4日，孙由南京乘“建威”号军舰前往安庆接任，遭到安徽省议会议员的反对。不久，国民党人李烈钧、黄兴、陈其美等分别在江西、南京、上海发动反袁斗争，安徽驻军胡万泰（旅长）于15日在安庆响应，发动安徽公民会及省议会要求孙多森辞都督职（仍任民政长），拥柏文蔚复任都督。孙急电袁世凯及陆军部，请求调派第八师即日拔营前来援救，并电请倪嗣冲出任皖北司令。17日，安徽宣告独立，孙被胡万泰软禁于都督府。后经柏文蔚函胡万泰从中说项，谓“孙多森并无实力，杀之无足轻重，如果释之，还将取信于天下”^③。胡遂将孙释放，专轮送往南京。27日，袁世凯下令免孙本兼各职。次日，孙在上海发电声明，谓：自“九江兵变，南京响应，安庆陷入危地”，为了“权宜暂维秩序，环迫宣布独立”，“自十六日起凡有安徽民政长印信及孙多森私印各项文件，均非出自多森，多森不负责任”^④。其后，孙经海路至北京，向袁解释安庆事变，取得袁的谅解。

8月3日，袁世凯宣布孙多森并未参加“叛事”，随即派他为赴日实业调查专使，前往日本考察。1914年5月，顺应日本

的投资要求，孙多森、王克敏、陆宗輿、曹汝霖、杨士琦、李士伟与日人中岛久万吉、仓知铁吉、尾琦敬义等，在北京发起组织“中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一投资公司）。6月，经农商部批准开业，资本五百万日元，中日各半，于东京设本店，北京设总营业所，上海设分所，孙任总裁。

袁世凯为了筹备帝制，于1914年5月设立参政院，指定周学熙、孙多森等人为参政。10月，袁拨官款六十万元在北京创办“通惠实业特种公司”以辟财源，孙多森和周学熙任筹办人，列名发起者还有袁克文、张镇芳、李士伟、梁士诒等三十人，资本定额五百万元，招商股九十万元，实收一百五十万元，由孙任议长（一说任临时总裁）。通惠实业公司经办银行、仓库、保险及其它农工实业，在北京设总公司，上海、汉口设分公司^③。继后，该公司以资本六万元并招商股十四万元，在烟台创办通益精盐公司；集股三十万元于河南新乡开办通丰面粉厂；并创办天津通孚堆栈及上海沪丰堆栈、协孚地产公司等企业。

1916年4月，孙多森筹办中孚银行，作为其企业的金融机关，资本定额二百万元，由通惠实业公司投资六十万元，招商股四十二万元，实收一百零二万元，于11月开业。中孚银行设总行于天津，经营信托、储蓄、汇兑、押汇、贴现及金银买卖等业务，孙自任总经理，聂其炜任协理。次年3月，该行在北京（初设分号）、汉口（初设通汇处）、上海设分行；继后又与广东银行、中国银行定约，于镇江、扬州、徐州、南京、无锡、苏州、广州、香港、绍兴、宁波、杭州等地设立特约通汇处。1918年中孚银行开办国外汇兑，通过美国花旗银行和运通银行、日本第一百银行代办国外汇兑^④，为我国第一家特许经营外汇的商业

银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一个发展的好机会，上海阜丰面粉厂的营业进一步发展，获利更巨。1919年阜丰增资至七十万银两，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在“五四”运动抵制外货的影响下又得到了发展。同年7月6日孙多森患糖尿病于天津病故。

孙多钰字章甫，安徽寿州（今寿县）人，生于1882年2月26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初九），为孙多森的幼弟。

孙多钰六岁入家塾，十二岁在家塾兼学英语。1899年随其胞兄孙多堃（字厚甫）赴美留学，1905年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1909年毕业。

孙多钰毕业后回国，经清政府考试，得工科进士。次年，经他舅父邮传部右侍郎李经楚举荐，任吉长铁路工程局工程师。1911年春，清政府授他为翰林院检讨，吉长铁路工程局升他为工程局总办兼总工程师。1913年，袁世凯撤掉了与国民党关系较深的沪宁、沪杭甬两铁路管理局总办钟文耀之职，调孙至上海接任。1915年，他被调任湘宁铁路工程局总办。1918年，美国停止湘宁铁路借款，该路工程计划被取消，他改任株钦、湘鄂两铁路总办。

1919年夏，孙多森病逝，孙多钰即辞去铁路总办职，接任北京通惠实业公司总裁和中孚银行总经理。1920年10月，孙多钰任督办浦口商埠管理局局长。1923年1月，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吴毓麟推荐他任交通部次长，他将通惠实业公司总裁一职让给孙多森之长子孙震方，但仍兼中孚银行总经理。1924

年11月，辞去交通部次长，专任中孚银行总经理。1929年，他接任阜丰面粉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启新洋灰公司常务董事、直隶滦州矿务公司副董事长。1937年起任开滦矿务局天津局华经理（买办）。他是国内民族工业资本集团中“通孚丰财团”（通惠实业公司、中孚银行和阜丰面粉公司）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声名颇著的大资本家。1946年2月，南京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以《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训令中孚银行停业清理，将中孚银行夺为官僚资本所控制，其后他仅挂名为中孚银行副董事长。

1951年4月26日，孙多钰病逝于天津。

注：

- ① 聂其炜：《我和一九一三年的中国银行》。《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
- ② 姚松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及附录二：《中国银行则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 ③ 孙锡三：《孙多森传》（未刊稿）。
- ④ 上海《时报》1913年7月28日第三版。
- ⑤ 上海《时报》1915年10月22日第三版。
- ⑥ 《汉口银行》杂志第一卷一号第39页。

吴 懋 鼎

熊尚厚

吴懋鼎字调卿，又名荫柏，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生于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他的父亲吴宗禄在苏州经商，1858年举家移居苏州。吴懋鼎读了几年私塾后，入苏州二妙堂笔庄当学徒。后来他父亲常往上海做生意，托人将他介绍去上海充外轮跑仓。吴懋鼎在任跑仓时，常同一些买办打交道，遂与上海汇丰银行买办席立功相识。1864年经席介绍，他进了英商汇丰银行，业余刻苦自学英语，企望将来当上买办。

吴懋鼎工作勤恳，头脑聪敏，颇受汇丰银行主持人的赏识，1871年任上海汇丰银行副买办。1880年，他被派往天津，与汇丰银行代理人博维斯（F.D.Bovis）共同筹设汇丰天津支行。次年天津汇丰银行开业，他任该行第一任买办。其后，又任英商仁记洋行买办。

吴懋鼎在天津任汇丰银行买办时，因清政府在财政窘迫下常向汇丰银行借款，遂和直隶总督李鸿章攀上同乡关系，往来频繁。李在向英商汇丰银行借款兴办铁路和通过英商谦顺洋行替淮军购买军火时，都以吴为中间人，故此吴深得李的赏识。在李的保荐下，他捐得直隶候补道官衔，并充淮军钱粮所总办。其后还经李的引荐，被召至北京觐见了慈禧太后。

1887年，李鸿章在天津、唐山间建造铁路，4月将开平铁

路局改名中国铁路公司，指定天津汇丰银行为收款银行，以吴出任总办。1894年，吴被清政府任命为关内外铁路总局总办，任职三年，被称“办事干练”。

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杨锐等维新派首要分子的推动下，1898年6月，光绪帝颁发《定国是诏》，开始变法，维新派人士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纷纷响应。吴懋鼎在博维斯的支持下，也上书光绪帝，由李鸿章代奏条陈十项，建议在全国各大城市筹设商会。在变法期间，他被任命为京师农工商总局三督理之一，与端方、徐建寅平列。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废除新法，重新听政，谭嗣同等六人被逮捕处死，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吴懋鼎也遭到通缉拿办。由于得到英国公使馆的保护，他躲在北京汇丰银行里。事后经过李鸿章的力保，始免被缉拿，然而却丢了所任的官职，专任买办。他是天津外商银行买办的第一人，与天津怡和洋行买办梁炎青、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王铭槐合称“天津四大买办”。此后，他继续与清室大吏密切往还，投拜军机大臣荣禄为门生，又与邮传部侍郎、路矿督办胡芸楣及北洋新军头子袁世凯等结识。在袁任直隶总督期间，吴曾任天津商务局总办。

吴懋鼎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便开始兴办实业，是天津著名的买办资产阶级。1887年他伙同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杨宗廉、盛军统领周盛波，集资一万八千银两开办天津自来火公司（火柴业），获李鸿章批准，在直隶省境内专利十五年。该公司产品销售京津地区，大获其利。1891年5月，制造厂发生火灾，被焚毁。同年8月，他利用被火焚毁的旧厂址，与司达

赛(A. D. Starsatt)等四名英、俄商人创设华北贸易公司,经营进出口业务,资本银四万五千两,吴任总办,司达赛为稽查。

1888年,在天津的英、美、德、法及丹麦商人共同投资,推吴为发起人,出面开办天津气灯公司。该公司开办后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吴一直任董事。

1897年,吴懋鼎经直隶总督王文韶批准,以资本银三十五万两筹办天津织呢厂。两年后投产,生产上等毛毯、呢绒及其它毛织品,供给天津外国驻军及贵族、官僚享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该厂厂房被毁。

1898年,吴懋鼎独资创设天津北洋织绒硝皮厂,资本额七十六万余银两,获清政府批准专利十年,官督商办,包办清政府禁卫军及新军装备。未及十年,该厂经营不善无形停顿。

1899年,吴懋鼎与德商兴隆洋行合办天津打包公司,他占股二分之一。次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时毁于炮火。由于吴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曾给英国领事馆通风报信,告知清军将炮击英国侨民所在地,为此他的织呢厂和打包厂均从《辛丑条约》赔款中取得赔偿,还被英皇授以维多利亚勋章及金壳表等奖品。

1905年,吴独资创办天津电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开办后营业发达,然不久被英租界工部局强制收买。1907年他又与英商合办宛平通兴煤矿公司,资本银一百万两,中英各半,他任董事长。其后该矿营业不佳,转让给英商麦边经营。

此外,吴懋鼎还投资新记地产公司和中国投资公司,并为上海、香港等地一些英商公司的股东。

吴懋鼎在1905年辞去了天津汇丰银行和仁记洋行买办职

务，居于天津英租界（今和平区）寓所。同年12月，清政府赏给他二品顶戴，任商部三等顾问官。他在晚年虽然仍和清政府官僚及北洋军阀政客密切往来，但却不愿再出山作官。1909年和1913年，清廷和袁世凯曾拟派他任山西巡抚、财政总长，他均推辞未就。

1928年1月，吴懋鼎病逝于天津，遗有财产约四、五百万银两。

主要参考资料：

吴焕之：《关于我父亲吴调卿事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

〔英〕雷穆森著、许逸凡、赵地译译：《天津》第十二章《当代中国名流》。

《天津历史资料》1964年第二期第146—147页。

汪敬虞编：《吴懋鼎》。《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70—971页。

团红石：《天津概述（1919年以前）》。《天津历史资料》1964年第三期。

胡 文 虎

陈 民

胡文虎，原籍福建永定县，1882年1月16日（清光绪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①出生于缅甸仰光。父亲胡子钦是侨居缅甸的中医，在仰光开设永安堂中药铺。胡文虎兄弟三人，长兄名文龙，早年夭折，幼弟名文豹。1892年胡文虎被送回福建老家，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胡文豹则留在缅甸受英国教育。四年后，胡文虎重返仰光，随父亲学中医，并协助料理药铺店务。1908年，父亲病故，胡氏兄弟继承父业，同心协力，永安堂业务日趋发达。1909年，胡文虎周游了祖国以及日本、暹罗（即今泰国）等地，考察中西药业。第二年回仰光，扩充为永安堂虎豹行，聘请医师、药剂师多人，吸收中国传统膏丹丸散的优点，制成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止痛散、清快水等成药。不久，虎标万金油等畅销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亚各地，胡氏兄弟由此发家致富。

1914年，由于业务发展，胡文虎将永安堂总行迁到新加坡，留胡文豹主持仰光业务。他在新加坡兴建新药厂，并先后在新加坡、马来亚、香港各地广设分行。1932年，他又把总行从新加坡迁到香港，并在广州、汕头建制药厂，在厦门、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梧州以及澳门、台湾、菲律宾、越南、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等地设立分行。从此，虎标万金油等

成药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地老少皆知的药品，胡家兄弟也成为东南亚华侨中著名的百万富翁，号称“万金油大王”。

胡文虎自称对政治无兴趣，热心于文化教育和医药慈善事业。他除在新加坡捐建十几所义务学校和中小学外，在国内先后捐助过上海大夏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福建学院以及广州仲恺工业学校、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汕头第一中学、迴澜中学、海口琼崖中学、福建大同中学等院校。在上述院校中，建有诸如“虎豹堂”、“虎豹楼”、“虎豹图书馆”以及“虎豹亭”之类建筑物。抗日战争前夕，胡文虎还捐款三百五十万港币，准备在中国兴建一千所小学。后因战争爆发，学校只建了一部分，但他仍将建校余款二百万元港币存入香港中国银行，指定为战后建校之用。他所捐建的医院，以南京的中央医院最为著名。其它在国内外独资创办或捐助的医院、养老院、孤儿院，有四十多所。香港大学也于1951年初设立“胡文虎妇产科病系奖学金”。他晚年在香港做寿时，常常施舍食品、日用品或赠送现金，济助穷苦老人和孤儿。

早在二十世纪初，胡文虎便开始他的办报活动。1908年，他在仰光集股合办《仰光日报》。他独资兴办的第一家报纸是1929年1月在新加坡发刊的《星洲日报》。两年之后，他又在广东汕头创办《星华日报》。1935年初，他的第三家报纸《星光日报》在厦门出版。同年底，他在新加坡的中文晚报《星中晚报》也正式发行。他还筹备在广州创办一份大型报纸《星粤日报》，并开始修建印刷厂，后因局势动乱，计划拖延了下来。1938年8月1日，他在香港的《星岛日报》正式出版，聘请金仲华为总编辑。报纸编排新颖，内容充实，是胡文虎“星系”报业

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份。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在马来亚檳榔嶼的《星檳日报》出版，但在緬甸的《星仰日报》和在荷属东印度的《星巴日报》，则因战争爆发，半途而废。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在福州创刊《星闽日报》，在上海筹办《星沪日报》。1949年3月在香港创办英文《虎报》(TIGER STAND-ARD)。第二年，又在泰国创办《星暹日报》，在新加坡也增刊英文《虎报》。这样，星系报业便成为华侨界独一无二的托拉斯，在舆论上具有较大的影响。胡文虎认为办报与建立学校、创办医院，都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重要事业。他标榜以商业立场办报，为民众作喉舌，自称“除热忱爱护国家，希望祖国富强，华侨地位提高外，对政党政治，素不参加”^②。

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曾任国民参政会华侨代表。1941年秋，他到重庆出席参政会议，受到蒋介石接见。返回香港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胡文虎被软禁了三天，获释后仍留在香港。1943年，胡文虎以港商身份多次去上海会见南京伪政府的汪精卫；还曾去日本拜会日本首相东条，扬言是向东条陈说日本港督及其财务部长对华侨商人的暴敛^③。1944年，胡文虎被推选为日本统治下的“香港华人协会”主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文虎开始全面恢复他的商业活动，但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恢复和扩充他的报业托拉斯。他战前所办各报，大多先后恢复出版。他还计划在北平、汉口、沈阳和台湾设立报馆，并打算恢复战时被日军拆毁的广州印刷厂，但都未能实现。

广州解放后，1950年当地人民政府接管了胡文虎在广州

的产业。次年7月胡文虎发表谈话，对人民政府拒绝虎标药品在国内行销，表示“费解”。星系报纸，尤其是香港的《星岛日报》开始激烈反共^④。1953年，胡文虎访问台湾，表示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支持。

1954年8月，胡文虎因胃病去美国动手术。他在波士顿接见美国《环球报》记者时说：“对共产党决难妥协，非征服他们，就被他们征服。”^⑤回香港时途经檀香山，因心脏病发作，于9月4日去世。

注：

- ① 胡文虎的出生日期，说法不一。〔美〕包德华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说是“1893年1月16日”（第二卷第177页）；C.M. Turnbull：《新加坡史》也说是1893年（第131页）；Max Peyleberg：《现代中国名人录》记为“1883年”（1954年版，第94页）；香港《星岛日报》1954年9月16日刊登《胡文虎先生生平事略》一文中说是“1882年1月”。“事略”是胡文虎治丧期间发表的，故依此说。
- ② 《星洲日报》1950年4月10日。
- ③ 《胡先生近年言论录》。《星岛日报》1954年9月6日。
- ④ 当时金仲华等已辞职，《星岛日报》为反动分子所把持。美联社曾发电文说：“胡氏所有之报纸，其尚未被共党所封闭者，在东南亚实为反共最有力的报纸。”见《星岛日报》1954年8月11日。
- ⑤ 《星岛日报》1954年9月6日。

刘 国 钧

史全生

刘国钧，1887年4月2日（清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九）出生于江苏靖江县一个塾师家庭。1893年，他父亲刘黻堂因科场失意，患了精神病，不能坐塾，靠他母亲给人家帮佣度日。刘国钧少时因得不到母亲的照管，常常踉跄街头；稍长后以贩卖水果、酒酿和拾柴辅助家计，十岁时曾进私塾读了一年书。1900年，刘到靖江县城一家糟坊当学徒，因不堪繁重的糟坊劳动，一年后即离去。1901年春，他去常州埠头镇谋生，7月入奔牛镇刘吉升京货店当学徒。次年中秋，刘吉升京货店倒闭，他又入元泰京货店当学徒。

常州奔牛镇地处大运河畔，后来沪宁铁路又经过这里，交通便利，商业繁盛。刘国钧在元泰京货店三年满师后继续当伙计，常去附近各地批货，出入各家货栈，逐渐熟悉市场行情，萌发了自己开店的念头。为筹集资本，他一方面在外出批货时广拉生意，获取佣金；同时由其母亲和妻子编织辫须（清时男子扎辫子用的一种丝带），送到店里代销；又搭了一个互助会，筹集起六百元资本。1909年刘与人集资一千二百元，号称二千元，合伙开办了和丰京货店，并附设土染坊印染布匹。两年后合伙者因负债把股份让给了刘国钧。

1911年10月武昌举义，11月，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

相继光复。清廷江南提督张勋盘踞南京，扬言将东下镇压革命，一时人心惶惶，奔牛镇上各店家害怕战祸，纷纷关闭歇业。刘国钧原也准备歇业，但见其他各店歇业后，生意集中到和丰一家，便壮着胆子继续营业。不久，革命党人组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张勋率部退至徐州以北，社会秩序迅即安定，和丰京货店非但没有受到战争破坏，反而赚了一大笔利润，到年底盈余五千余元。次年，刘又接盘了同丰京货店。到1915年，他已拥有二万元资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事，无力东顾。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全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实业救国”呼声甚高。刘国钧见国货畅销，民族工业一时获得迅速发展，遂开始弃商从工，投资一万元，与蒋盘发等共集资九万元，创办了大纶机器织布厂，蒋任经理，刘任协理。

1917年，刘国钧退出大纶织布厂，于次年独资开办了广益织布厂，拥有木机八十台。刘悉心经营，由于熟悉市场，又有经营大纶的经验，头年就盈余三千多元。1922年，刘又创办了广益二厂，拥有木机一百八十台、铁帽子布机三十六台，成为当时常州最大的织布厂。

刘国钧为要在纺织工业上有所成就，于1924年访问了日本。他发现日本厂商的经营管理讲求实效，节减工序，费用少，成本低，回国以后，便不断改进经营管理，首先采用了以筒子纱代替盘头纱的先进方法，节减了工序。同时，他根据市场需要改变经营方向，由原来生产斜纹布和白平布为主，改为以色布为主，生产蓝布、绒布、贡呢、哔叽等等。1927年，刘将设

备陈旧的广益一厂停歇，全力经营广益二厂，淘汰旧式木机和铁帽子布机，购置了一百八十台电动式布机，改进技术，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其“征东牌”和“蝶球牌”色布远销海外，获利甚厚。到1930年，刘国钧除了广益厂固定资产以外，已拥有二十余万元流动资金。

刘国钧退出大纶布厂以后，蒋盘发在1921年集资六十二万元创办了大纶纺织厂^①，拥有纱锭一万枚，布机二百六十台。但是，大纶纺织厂开办伊始，恰值欧洲各国回到亚洲市场，所以“开车未久，纱市败坏，连年亏损甚巨”^②。1925年出盘给沪商顾吉生经营，改名为大纶久记纺织公司，同样连年亏本。1930年，刘国钧投资二十万元，招股二十万元，又向钱庄借款二十万元，以五十万元接盘大纶久记纱厂，以十万元用于修配和更新机器，将大纶久记改名为大成纺织染公司，自任经理，刘靖基为副经理。随后，他又以厂基作抵押，向上海银行借款四十万元作流动资金，开工生产。

就在刘国钧经营大成纺织染公司的前后，欧美各国和日本爆发了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又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商品市场，国产纱、布销路大增。因此，大成公司自1930年夏开工以后，半年即盈利十余万元，第二年又盈余五十余万元。1931年以后，纺纱业由于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开始萧条，而织布、针织和整染各业，则因进口货锐减，反而呈现繁荣景象。刘国钧乃向织染方面发展，1932年将自己独资经营的广益布厂并入大成公司，改名为大成二厂，使大成公司“实行自纺自织自染之一贯工程”，废除封建工头制度，“聘用专家管理，厂

务日有起色”^③，资本从1930年的五十万元（实收四十万元），增加到1931年的一百万元，1932年增为一百四十万元。

刘国钧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两次东渡考察日本纺织工业，参观丝绒和灯芯绒的生产程序。开始时，他以上海协祥批发号董事的名义出现，日本厂商为了招揽生意，争相延请。不久身份暴露，参观受阻，刘就改到盛产灯芯绒和丝绒的滨淞县，深入农村参观割绒技术。回国时，还从日本买回一套丝绒和灯芯绒生产工具设备，聘请一位日本工人来试制。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强化它对中国的侵略，在我国沿海城市大量开办工厂企业，控制了当时我国最大的三个棉纺织中心上海、天津和青岛。刘国钧和其他民族纺织工业资本家纷纷向内地发展。1936年，刘国钧与已经亏本停产三年、急待出租的汉口震寰纱厂股东商定合作办法：大成出资三十六万元，震寰以机器折价二十四万元，由大成公司经营，改为大成三厂，定期六年^④。年底，大成公司增加资本至四百万元，订购了当时最负盛誉的瑞士里特纱锭三万二千枚、布机一千零八台，并将大成三厂改名为大成四厂，另在常州东门外筹建大成三厂^⑤。

1937年夏，大成三厂厂房已经建成，正在按装试车，“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形势险恶。刘国钧将大成三厂纱锭分批运往上海租界贮藏，二百台布机运至汉口。12月，常州沦陷，大成公司遭受严重破坏：一厂所存物资被抢掠一空，二厂被炸成废墟，三厂被日军当作马厩。这时，上海租界成为孤岛，许多未及内迁的工厂纷纷移入租界，刘国钧亦于1938年将贮存在上海的资金设备，以英商名义注册，开办了

安达纺织公司，自任总经理，刘靖基任经理。

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武汉风声日紧，刘国钧提前结束了与震寰纱厂的合作关系，将运至四厂的二百台布机和从四厂分得的二百余万元物资运至四川，与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合作，在重庆北碚创办了大明纺织染公司，月产布七千匹。他并先后在重庆开办了批发字号；在香港开办了经销原料的大孚商行；在重庆、昆明、河内、仰光等地设立了办事机构，经常来往于渝、沪、港之间，组织指挥生产和贸易。

1944年，中国棉纺织学会成立，刘国钧被推举为候补监事。这时，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刘写了一篇《扩充纱锭计划当议》，设想在抗战胜利以后的十五年内，全国纺织工业发展至一千五百万枚纱锭，并对筹集资本、织机制造、人才培养、原料供应、工厂布局和管理经营等等，都一一作了全面规划和设想^⑥。对于自己的企业，他计划十五年内发展至五十万枚纱锭，并向毛、麻纺织发展。为了作好准备，同年夏他赴美国访问，以后又转道加拿大，参观棉、毛纺织厂，向美国订购了二万枚纱锭、三万担棉花。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刘国钧从美国回来，立即投入工厂的修复工作。经过三个月的整修，大成公司基本恢复，三个工厂拥有纱锭三万二千一百枚、线锭四千八百枚、布机七百五十六台，资本为一千五百万元^⑦。他在国外订购的设备，结汇和分期付款需要银行担保，便在自己名下划出五万元给上海银行陈光甫，并聘陈任大成公司董事长，以取得上海银行担保。1946年，又与彭浩徐等创办了中国纺织机械公司。由于刘锐

意经营，大成公司迅速发展，到1949年，已拥有五万余枚纱锭、一千一百八十台布机和日产五千匹（二十万米）布的印染设备。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实行“币制改革”，强迫收兑黄金、银元、外币，大成、安达两公司在上海所存的黄金、美钞被勒逼一空；再加上国民党政府“限价”失败，物价狂涨，两公司损失惨重。刘国钧为了避免国民党政府的继续勒索，将私人存款和大成公司部分现金转移到香港储存。

1948年底，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全国解放在望。由于刘国钧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害怕“共产”，将大成公司二百台布机经台湾运往香港，又以转移到香港的存款购买了六千六百枚纱锭，在香港开办了一个东南纱厂。此外，他还在美国购买了十万美元的公债，储蓄二十万美元，在巴西投资橡胶园，以作退步之计。全国解放前夕，他携眷移居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常州大成公司的生产也蒸蒸日上。刘国钧逐渐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开始把转移到香港的现金逐步汇回，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50年春，他冲破重重阻挠，毅然返回祖国大陆，继任大成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安达公司副经理兼副董事长。1954年6月1日，大成公司在江苏省棉纺织系统中首先实行公私合营，刘任总经理兼副董事长。以后，刘国钧历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江苏省主任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江苏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等职，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1978年3月8日，刘以九十一岁的高龄在南京病逝。

注：

- ① 《新武进报》1922年3月13日。
- ② 《棉业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第597页。
- ③ 同②。
- ④ 刘寿生、刘梅生：《震寰纱厂遭受帝国主义掠夺记》。《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四辑。
- ⑤ 《棉业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 ⑥ 见《中国棉纺织学会会刊》1944年第二期。
- ⑦ 正平：《胜利后全国棉纺织业设备概况》。《纺织工程》1946年第八卷第一期。又见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11月登记表，表存江苏档案馆。

包 达 三

汪仁泽

包达三，字楚，1884年4月28日（清光绪十年四月初四）生于浙江镇海。父亲是杂货店店员。包达三少年时在家乡私塾读书，十六岁到上海一家纸店当学徒，满师后留店任职员。

包达三业余刻苦勤学，1906年考上公费留学，东渡日本，先学商科，后转入民治大学学习法律。他景仰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并结识蒋介石、张群、周佛海、傅筱庵等人。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回国到上海。上海举义时，曾参加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总局。民国初年，又投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等活动。1917年去广州，次年与当地富绅的女儿王文宁结婚，遂弃政从商。

包达三经商目光敏锐，颇具魄力。他先在开封开设开封制蛋厂，经营蛋品出口业务。不久，又在上海创办黄海渔船公司，购置机动渔船数十条，雇员出海捕鱼，获利甚丰。在商业活动中，他结交了沪上知名工商界人士虞洽卿、张澹如、盛丕华、方椒伯等。1920年，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成立，包为创办人之一，当选为常务理事。此后包又在苏北一带办理盐垦，围垦盐碱地数千亩。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利用权势，指使其爪牙、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徐鄂，向包敲诈勒索银元十万元，使

包几乎破产。此后，包达三等人根据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设想上海建立新市区的遗愿，倡议在江湾建设新上海市中心地区，辟引翔港，谋取代上海租界为中心的旧上海。包为此集资开办地产公司，收购附近大量地产，经营房地产业务。在当地筹建引翔港跑马厅，自任董事长；并建造远东新村等住宅区，市面逐渐形成。国民党市政当局亦在该地兴建上海市政府大厦及江湾体育场。该地地价不断上升，包遂成为上海著名的房地产资本家，任上海宁商总会理事等职。

1937年抗战军兴，淞沪战役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汉奸傅筱庵出任伪上海市长，曾通过他的爪牙诱逼包达三出任伪实业部长。包不肯事敌，隐姓改名避居友人处，保持了民族气节。1941年，包先后在沪创办永达药厂、雷石化学公司，制造咖啡因等药品，自任经理职务。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蓄意制造内战。1946年周恩来、董必武率领中共代表团往来于沪、宁间，与蒋介石统治集团进行谈判斗争。周到上海时，经常在思南路中共驻沪办事处会见民主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包达三常参加会见，因而认清了形势，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表示同情和支持。周恩来还曾多次在包的住宅约见陈叔通、马寅初、胡子婴等民主人士。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迫在眉睫。上海各界五十多个人民团体，推举盛丕华、吴耀宗、黄延芳、包达三等十一人，组成和平请愿代表团，去南京呼吁和平。临行前，包曾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警告和恫吓，但他不为所动，表示为和平奔走，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6月23日傍晚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代表团被国民党

特务包围，他和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等人遭到凶殴。后来大批宪兵乘车赶来，将他们抬上卡车，竟要开到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审讯。在包等强烈抗议下，才将他们送往中央医院。不久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代表中共代表团亲来慰问，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南京各界人士也冒了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危险，前来慰问，络绎不绝。在南京的一星期里，包和几名代表虽被殴负伤，但仍然不懈地进行和平请愿活动^①。

从1946年下半年起，包达三和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黄炎培、杨卫玉、盛丕华、胡厥文等人，组织了多种名目的聚餐会。后来中共地下组织巧妙地利用它们作为开展工商界进行民主运动的一种组织形式，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交流情况、交换意见、统一思想认识的经常聚会^②。1947—1948年间，包达三曾利用其子包启寰的同学在国民党空军中任驾驶员的身份，多次将中共地下组织托带的文件和宣传品，成批运往重庆、昆明等地。这时包还曾接济中共的地下工作者，营救被捕的同志。1948年底，平津解放在即，包达三在沪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甚为危急，在共产党组织的帮助下，化名离沪赴香港。1949年3月下旬乘船北上，经山东烟台到达北平，参加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达三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从1950年起，包担任浙江省副省长、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等职。1952年，他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包括房

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③。1957年4月6日包达三因心脏病在杭州去世。

注：

- ① 陈震中：《下关事件》。上海《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4辑，第72—75页。
- ② 金学成：《解放前夕的工商界聚餐会》。上海《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4辑第266—267页。
- ③ 《关怀、爱护、引导——追记周总理登门访问我省几位知名人士》。《浙江日报》1979年3月5日。

梁 墨 缘

伍 锦 张鸣皋

梁墨缘原名源，1893年9月（清光绪十九年）出生于广东顺德县。父亲是当地一个酿酒小作坊主。因兄弟姊妹众多，生活困难，梁墨缘只读了两年私塾。

1910年，梁墨缘离家去三水县源和安布店当学徒，因做事勤奋，能说会道，学徒期满后升为“行街”，开始与当地商人结识。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各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我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发展。而广东又取消了封建势力的轮渡专利经营，实行自由经营。源和安布店老板和当地许多商家都认定航业大有可为，决定集资开办航业，派梁墨缘筹办招股。梁在清远——三水——广州沿途一些布业行家劝说集资，每股五元，开办了一家航业联商公司，自任经理。公司自装了几只蒸汽机动船，航行勒流至西南之间。不到一年，业务大有发展，又开辟广州——三水——清远一线。

当时，联商公司的蒸汽机船比一般民船已有进步，但装备仍很落后。鉴于北江水浅，秋冬以后必须改用“明车”汽轮。所谓“明车”，就是把蒸汽锅炉安装在船头，机器安装在船尾，车叶板（螺旋桨）半露出水面运转。船中间堆放柴煤燃料，一条四、五十吨的船也只能用三分之一的地方载运客货，利用率很低，升火时间又长。为了进一步求得发展，梁墨缘锐意改革。

1917 年间，梁墨缘得悉广州协同和机器厂试制成功柴油内燃机，就到该厂参观。该厂经理陈拔廷介绍柴油机的好处，表示决心装置柴油内燃机电船，行走内河，并请梁参加，梁欣然答允。但联商公司的老板们墨守成规，不同意参加。梁乃退出联商公司，与陈拔廷筹组粤海轮船公司。

为筹建粤海公司，梁墨缘计划集资十万元，陈拔廷等认了三万元，其余由米机行业和其他机器行业的商人认股，也有一小部分是华侨资金。粤海公司自己造机器，自己装船只，又有自己的货运，业务很快获得发展。仅仅 1918—1919 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已拥有柴油内燃机电船十艘，大的一百六十四匹马力，小的四十五匹马力，成为当时航业界一支新兴的力量。梁墨缘经营出色，遂由主管业务升任经理，在同业中亦享有较高威望，1920 年被选为广东内河商船总公会的董事，1928 年被选为广东商船公会副会长。

粤海公司装置的十艘电船，航行于北江及珠江三角洲其他浅水河道，是经营客货运输的定期交通船，燃料省，人员少，成本低，航行快，远非旧式轮渡所能比拟。因此抢去了同业的不少生意，遭到保守势力的嫉忌，十艘电船被咒骂为“十大害”。他们初则勾结省航政局以“从来没有停泊这种船的码头”为借口，不给码头停泊，继则企图用“单行船不能载货”的行规陋习来迫使粤海公司停航。粤海公司的电船虽然被迫停在河中心，要用小艇接驳人客往来，但搭客因为这种新船航速快，座位舒适，仍乐意乘搭。为了增强与同业的竞争力量，打破守旧航商在货运方面的排挤打击，梁墨缘与股东决定扩大对米业的投资。几年间，陆续开设了“公德成”、“晋德成”等

“成”字号的米机（碾米厂）、米行十家之多，时人称为“十大成”。有此“十大成”的货源，粤海公司的船就不愁没有货运，也不受行规陋习的限制了。此外，梁为了保证船上需用的食品什项等供应，于1922年开办了德源行。至此粤海公司自成系统，除石油以外一切不需外求，业务发展得更快，1925年已拥有二十多艘船。梁为缓和同业之间的竞争，向同业公开介绍柴油内燃机电船的燃料成本仅及蒸汽机船烧柴煤费用的四分之一；至于航速快和利用率高这些优点，均属有目共睹。至此，其他航商逐步认识落后的设备是无法与新兴的电船竞争的，才心悦诚服地与梁合作，一部分加入粤海公司共同联营，一部分改装为柴油内燃机新船。粤海公司有了别的航商合作，不但码头和载货等问题得以解决，而且使全行业的面目焕然一新。1925年以后，广东内河上柴油内燃机电船逐步代替了旧式的蒸汽机船，大大促进了广东航业的发展和进步。

但是旧社会的航运业从来都是官厅、土匪、恶霸、关卡、洋行敲榨的对象，为了“自卫”，梁墨缘也想过很多办法，如请防军随船保护，悬挂外国旗帜，自备自卫枪枝等。当时由李福林的军队特别组织一个“保商卫旅营”，专门“保护”船只。但军和匪相通，大股的土匪与李军有勾结，碍于李的情面，没有拦船抢劫；小股的则与驻船李军相勾结，由李军做引线，船只被劫，事后分赃，还诬船家通匪，勒索罚款。至于官厅封船劫掠，就更不是李军所能管辖的了。1923年滇军封了三十多艘内河船，其中包括粤海公司的多艘，内河商船总公会推梁墨缘去见孙中山请求解决，孙当即下令滇军二十天内放船，但滇军并没有切实执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航运界常常找外

国人来“保护”，各船每月用一百五十元港币买一面外国旗帜悬挂在船上。

当时中国的石油都靠外国洋行供应，粤海公司成立后，与亚细亚石油公司定下了供油合同，油价每吨三十元，言明保证供应。待粤海公司有所发展后，亚细亚逐步提高油价，至1925年亚细亚忽片面废约，提出取消供油合同，骤然把油价提到每吨八十元，使燃料成本竟和烧柴煤的旧式蒸汽机船相差无几。这对粤海公司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梁墨缘一气之下转向美孚和德士古两公司请求供应，谁知这两家公司和亚细亚沆瀣一气，借口粤海公司与亚细亚已订合同，他们即使有油也不能供应。为了摆脱亚细亚的控制，梁墨缘于1933年开设“永源行”，代理德国孔士洋行销售机器和机油，后又开设“生源行”代理美孚公司销售柴油。从此购买亚细亚的油就一天天减少了。于是亚细亚也拉拢梁代为销售，梁用提高回佣的办法，油价表面上没有降，但各轮船公司的开支却因而降低。即使如此，航业成本仍高，一般只能维持现状，难以有大的发展。

梁墨缘为了摆脱亚细亚、德士古、美孚三大公司的控制，设法和美国旧金山一家没有参加柴油垄断集团的小公司洽商，另立商号与该公司签订合同，由该公司供应柴油，在香港交货。第一批柴油运到广州后，每吨才三十元。可是当第二批柴油运到广州时，三大公司串通海关，把船扣留起来，硬要这批柴油缴了二万余元税款，这样一来，柴油成本每吨达八十元。而当这批柴油还未起岸入仓之前，亚细亚和美孚竟将他们的柴油价由每吨八十元骤降至四十元，大量抛售。梁遭此打击，深感关税不能自主，是中华民族的大耻辱，更痛恨国民党

腐败无能。梁在同业中以善于经营著称，但在柴油问题上，终归逃不出帝国主义的魔掌。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梁墨缘出于爱国热忱，不愿船只沦落敌手，亲自带领船员把十多艘船沉没江底，其余或被日机炸毁、或支援抗战军用，剩下在日伪时期能航行的已为数不多。他携眷逃难至南海县官山时，又被匪徒掳去幼子，勒索了巨款。最后，他带着几艘船和部分员工逃到北江、清远一带。根据当时的航规，梁参加了撤至西江的轮渡行商召开的会议，组织成立了西江航业战时服务社的联营组织，惨淡经营，维持战时后方交通。

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墨缘返回广州，打捞起沉没江底的十多艘船，加以修复，连行驶中的几艘，粤海公司的总船数不及战前的三分之一。那时，用油厂商要国民党政府配给外汇才得进口柴油，而外汇管理全操在官僚资本之手。因此，内河船多用国产松香油代替柴油，以蓖麻油、茶油代替润滑油。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物价暴涨，百业萧条。为应付反动政府对工商业的横征暴敛，1947年，梁墨缘特意聘请广州市公安局长何彤之弟何桥雨为公司经理，他自任董事长；后又改请前兵站总监、后任省参议员的简作桢继任经理，凭借他们与反动当局的关系，庇护粤海公司的利益。

广州解放前夕，梁墨缘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推动下，先后将全部船只疏散往澳门，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劫掠和毁坏。

解放后，梁墨缘响应人民政府号召，最早把船只由澳门驶回广州。内河航船一时用不上柴油，但人民政府协助航商更

改船机的部件，改用燃料油，梁高兴地同意采用。自此，航运事业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

1954年11月 粤海公司参加公私合营，梁墨缘被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

1976年10月6日梁墨缘病逝于广州，终年八十三岁。

魏 如

李新辉

魏如，原名彙茹，字子拔，浙江诸暨人，生于1897年4月3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二）。他的祖父魏彭年、父亲魏奕圭均系秀才，以教书为生。1910年魏如考入浙江绍兴府中学堂，时鲁迅为该校监学。辛亥革命前夕，该校革命气氛浓厚，魏如参加秘密组织“革命社”。1913年校方无端迫害四名毕业班学生，魏作为三年级级长，领导全校学生罢课，以示抗议。罢课失败，魏被开除出校，并通报全省。1914年魏如改名大刚，进入美国基督教教会在杭州主办的之江大学。半年后，因对基督教持异议而退学，在乡村小学教书谋生。1915年入浙江第三中学读书，1916年考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科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魏如在校担任学生评议会书记，并兼任宣传队长，曾多次上街向市民宣传。

1920年魏如毕业后，先后入上海美商慎昌洋行、华商华昌贸易公司、英商久胜洋行担任练习工程师、工程师。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外商洋行的中国雇员全体罢工。魏出于爱国热忱，与同学支秉渊、吕漠承、朱福骅等每人出资二百五十元，开设新中工程公司，寓意“新中国”。魏如等人白天仍在洋行谋生，利用业余时间代客设计洋行不愿承接的特殊电气和机械装置。半年后，新中公司约请原在慎昌洋行的工人吴梅

生加入，开设工厂，用人力车床等简陋机械，制作抽水机和柴油机。1926年先后仿制5马力和8马力柴油机成功。

1927年，魏如工作的久胜洋行并入英商怡和机器有限公司，魏入该公司动力部门为工程师。虽然报酬优厚，但魏总觉为外人服务于心不甘。1929年魏的同学王崇植被任命为青岛市工务局长，魏遂辞去怡和公司职务，应王之邀赴鲁，任青岛市政府技正兼自来水厂总工程师，先后为青岛市设计和改装全市路灯以利照明，为自来水厂改装设备，使夏季供水无缺。不久，王离任，魏见官场腐败，辞职回上海，专任新中厂工程师。

“一二八”事变，地处闸北的新中厂全部毁于炮火。原任厂长吕漠承转任南通大生纱厂工程师，魏如接任新中厂厂长。在几年中，新中厂逐步恢复了机械制造部门，先后研制、生产36、54、67、90马力新式柴油机，并兼营各种修理装置业务，承包建筑铁路、公路桥梁。在1934年和1935年，先后承包了粤汉、浙赣、苏嘉等铁路桥梁数十座，获利甚丰，工厂由此得到进一步发展。1936年试制成功45马力汽车用高速柴油机，效果好，

1937年“八一三”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魏如和支秉渊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帮助下，将新中厂迁至武昌，购地造厂，准备长期制造汽车发动机。但未及半年，日本侵略军逼近武汉，魏在危急中一面安排工厂撤退，一面组织人员协助汉阳兵工厂拆迁。

魏如等将新中厂迁至长沙，喘息未定，又逢长沙大火，仓卒间再移祁阳，制造专供汽车使用的煤气机，并装成汽车。抗

战时期石油匮乏，这种煤气机汽车在内地发挥了作用。从1938年到1944年几年中，新中厂在祁阳逐步发展，先后开设了锻铁、铸铁、炼钢、轧钢、金工、发电等十一个工场，生产各种煤气机、蒸气机、切削机床、抽水机、鼓风机等。为了保证机器制造的原料需要，魏如又与银行家吕越祥等合办了民生炼铁厂，并招股开设了七里桥煤矿公司，开采烟煤以供发电之用。这时，新中厂不论就人数、业务及生产品种来说，都算是内地私营厂中规模较大的一家。

1944年，日本侵略军进攻湘桂路，逼近祁阳，新中厂又一次受到严重威胁。魏如除给不愿撤退的工人发给少数费用遣散外，将一千多吨机器设备迁往四川，先由湘桂路运往柳州，再经黔桂路辗转运往重庆。由于黔桂路秩序混乱，新中厂的器材几乎散失殆尽。撤退员工与家属沿途忍饥挨饿失散不少，又遇瘟疫，有的死于途中。退到重庆时，工人只剩一百余名，图纸和器材不满一车。新中厂一面由支秉渊带了一笔定金到美国去买旧机器；一面由魏如接受资源委员会的任务，在重庆开设分厂，生产45至240马力煤气机，并制造迫击炮弹的引信，工厂逐渐重新发展起来。不久，新中厂与内迁各厂在重庆举办产品展览会。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莅临参观，大为赞扬，并题词：“供应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的第一要义。”

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魏如由胡厥文介绍入会。这时，国民党政府积极准备进攻解放区，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内迁工厂无事可为，发不出工资，普遍解雇工人，停工停产，引起工人罢工。魏如与马雄冠等人邀集在重庆办厂的一百多位厂主，组成请愿队，先后向国民党政府翁文灏、

宋子文等人请愿，要求建造成渝铁路，以维持内迁工厂的生产。宋子文一心要进口外国设备，坚决不允在建造成渝铁路时使用国货。从这些现实教训中，魏如对国民党政府的媚外卖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资源委员会乘内迁工厂处于困难之机，出面收买各厂机器设备，实际上是要并吞内迁工厂，扼杀民族工业的生机。对此，魏如坚决拒绝。他在1946年春回到上海，购得厂房，买了一部分日本赔偿的机器，加上由支秉渊从美国买回的机器，恢复了上海新中厂。

由于国民党政府大量倾销美国剩余物资，民族工业生产不断缩小，新中厂在极端困难中挣扎。这时，魏如经常参加民主建国会的秘密会议，读到《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秘密材料，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军工生产订货。新中厂紧缩开支，四处筹资金，找货源，勉强维持生存。在发不出工资时，魏宁愿抵押材料、机器去借款，也不为国民党生产内战所需的军火。

解放后，魏如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积极恢复和发展新中厂生产，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评为“完全守法户”，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针，带头将新中厂公私合营。1953年，魏如担任公私合营新中动力机器厂厂长，1956年后任上海农业机械公司（后改为汽车拖拉机工业公司）经理。

魏如从1953年起先后当选为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委员，上海市民建副主委、代理主委等职。

1966年10月18日，魏如在上海病逝。按他生前嘱咐，遗

体捐赠医院解剖。

主要参考资料：

《魏如自传》(未刊稿)。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中华书局 1966 年版。

周继本、金文秋等人的回忆。

李 康 年

汪仁泽

李康年，1898年9月1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浙江宁波。父李国盘，清末秀才。李康年少年时由父教读，有较好的古文和书法基础。十五岁时，进宁波乾大昌纸号当学徒，满师后任该店司帐，使用当时尚属罕见的改良中式帐册，为当地商界所称道。1921年进宁波棉业交易所任秘书。1925年，经人介绍，赴沪进方液仙独资创办的中国化学工业社，任总务科长，逐渐结识方的友好胡厥文、蔡声白、黄延芳、徐永祚等工商界名流。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李康年为爱国心所驱策，亦为谋求推广国货厂商产品的销路，向方液仙建议：集合部分国货工厂，举办联合商场。方欣然采纳，交李主其事。李首先觅得南京路福建路原绮华公司旧址作为场地；复与各厂联系，共有中国化学工业社、美亚织绸厂、五和织造厂、华生电器厂、中华珐琅厂、胜德织造厂、一心牙刷厂、章华毛呢厂、华福帽厂等九家参加，名为“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于1932年“九一八”周年纪念日开幕。商场开办虽仅两个月，但营业一直很好，替各厂推销了不少产品。李康年由此看到长期、固定设置国货销售商场的可能性和发展前景，再次起草了一份筹设中国国货公司的计

划书，又得到方液仙等人的支持。集资十万元后，经李康年的积极筹划，租得南京路大陆商场（后改称慈淑大楼、即现今的东海大楼）铺面和二楼。李亲书“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八个擘窠大字，于1933年2月正式开业。初由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任经理。不久方因忙于本身企业，辞去总经理兼职，由李全权负责经营。

上海的南京路上商店林立，大型百货商店有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公司，还有丽华及洋商惠罗公司，都有较悠久的历史，以推销环球华洋百货相招徕。中国国货公司欲求立足其间，必须具有自己的经营特色。李一面以专销国货、“国人应用国货”相号召，除现进畅销商品外，又吸收国货厂商的寄售商品，售后付款；另方面采用科学管理，建立健全的会计制度，采用复式簿记。百货业商品众多，进出频繁，他支持会计部门设立商品分户帐册，每笔进销都有记录，库存与帐面相符，一目了然。因此即使不盘存货，也能随时编造各种决算书，及时反映经营管理、业务盈亏情况。这样既可防止弊端，加强管理，同时也赢得了寄售厂商的信任，同业也纷来借鉴学习。李还严格要求营业人员熟悉本身业务，热情向顾客介绍商品知识，上柜佩戴编号的公司徽章，衣着整洁，礼貌对待顾客。此外，他还重视广告宣传和灵活的经营方式。专辟橱窗陈列各厂新产品，在报上刊登大幅广告，举办时装展览吸引顾客参观。又设“九九商场”，将几种小商品搭配成扎，售价仅九角九分，其中有的商品虽略有亏蚀，但可搭销一些冷背货，且给人以国货公司售价低廉的印象。后来他还开办一个规模颇大的饮食部，高薪聘请清宫御厨名师指导烹饪技术，售价只求

保本,从而招徕大批顾客。此外,他还以送货上门、货到收款,发行礼券,代送婚丧礼仪等等办法以招顾客。这样,国货公司终于站稳了脚跟,李也成为沪上闻名的百货业巨子之一。抗战前夕,除在上海太平桥及新闻路设两支店外,并在湖南长沙增设分店。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三友实业社杭州织造厂遭日机炸毁,该社出品的“西湖毛巾”一时脱销。李康年看准市场需要,集资开设萃众织造厂,生产钟牌毛巾。他选用优质棉纱、染料,讲究工艺技术,使产品质量好,外型美观。其中“414毛巾”成为畅销国内外的名牌货。

1939年间,生产狗头牌纱袜的鸿兴袜厂,因经营不善而搁浅。李康年应邀集资接办,任董事长,聘其叔李铭荊任经理。经整顿后渐见起色。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日商曾强迫一贯抵制日货的中国国货公司代销日货,李以公司章程规定只售国货而拒之。此后,李为对付日人之步步进逼,在公司三楼辟一密室,约会知友及公司董事等人,聚餐商讨对策。其后约定每周五聚餐一次,遂名“星五聚餐会”(是抗战胜利后李与王性尧等合作,扩大为五百余人的大型“星五聚餐会”的前身)。中国国货公司在惊涛骇浪中勉力维持下来。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来临,大量美国商品涌到上海市场倾销,使国货厂商受到严重威胁。1947年,李康年在继续维持国货公司的同时,另谋出路,与人合资创办中国钟厂。先任董事长,后兼总经理。聘工程师设计制造轴芯细、摩擦力小、上

一次发条能走十五天的三五牌挂钟、台钟。这种钟用活摆装置,可以倒顺拨时,虽挂摆歪斜也能照走不停,李拟了两句广告用语:“挂歪摆歪虽歪不停,倒拨顺拨一拨就准。”三五牌钟问世后,博得社会好评,成为同类产品中的畅销名牌。

解放战争期间,上海各界反蒋民主运动不断高涨,李康年以“在商言商”自我标榜,“不问政治”。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堕,李康年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教育和争取下,思想认识有所提高,对于中国国货公司职工从事反蒋民主活动和出入苏北解放区等情事,曾给予掩护和资助。

上海解放后,李康年主持的中国国货公司因长期以来资金枯竭,经申请批准于1952年夏歇业清理。萃众、鸿兴、中国三厂,经李申请,于1954年被批准为公私合营企业。是年,李经人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7年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3年3月24日因病去世。1979年他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

主要参考资料:

- 上海中国国货公司职工运动回忆史料:《迎接上海解放》(未刊稿)。
- 林炳炜:《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史略》。
- 林炳炜:《钟牌414毛巾是怎样创名牌的——略谈李康年经营思想》。
- 原上海中国国货公司职工胡志甫等人访问记录稿。

余 芝 卿

汪仁泽

余芝卿，号茂芳，浙江宁波人，生于1874年1月24日（清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七）。父母早亡，自幼靠姊抚养。十三岁时由姊夫朱昆山荐入上海德盛成东洋庄^①当学徒。1890年满师后曾到镇江谋生，二十岁时又回沪进德盛成做掮客。不久转入泰生祥东洋庄当跑街，积了些钱后，自己开设永泰祥东洋庄。后经销火油失败，1904年避往日本。

1907年，余芝卿与人合伙，在沪开设和昌盛东洋庄，资金银五千两，分作十股，余仅占一股。此时余在日本另做棉纱投机买卖，又告失败，债主逼债，赖华侨及日本朋友帮助，出兴隆票^②了结。余一时生活无着，乃以给和昌盛在日本办理进货业务，赚取回佣为生。为了保住这一业务，他暗中贴给和昌盛经理1%和有关人员0.5%的进货回佣。余用这种手法，还招来了沪地其他东洋庄和厂商的办货生意，进益日丰，不久不仅还清了兴隆票，还在日本大阪独资开设鸿茂祥进出口商行。初因经营不善，一度亏损，后雇用年轻伙友薛福基精心经营，一年内反亏为盈。余对薛十分赏识，提他为经理，倚为得力助手。由于他们经营得法，鸿茂祥信誉日佳，期票可在市面上贴现使用，余亦成为当地著名侨商。

余芝卿开设的鸿茂祥，一项大宗业务是包销日本武川橡

胶厂生产的地铃牌和A字橡胶厂生产的铁锚牌帆布跑鞋、橡胶套鞋。这时日货跑鞋在华略有销路，而橡胶套鞋则因无夹里布，不透气，易引起烂脚，乏人问津。后来余的亲戚洪念祖在上海将美国制造的套鞋，寄给余芝卿。余委托日本武川橡胶厂仿制，加放夹里布防潮，运回国内试销。由于式样美观，轻便舒适，销路大畅，替代了当时内地笨重的钉鞋雨靴。余因此获得厚利，数年后回国居沪上。他举止阔绰，引起歹徒注意，1925年初遭绑架，出五万元现洋始赎回。不久余再次离国，侨居日本。

“五卅”运动前后，群众爱国热情高涨，日货普遍受到抵制，东洋庄前途黯淡。薛福基鉴于套鞋在国内销路已经打开，销售网亦已形成，又与日本厂商有联系，可以设法引进技术，因此怂恿余芝卿在国内自办橡胶厂。余乃出资六万两，交由薛福基、吴哲生负责筹备。余尽力笼络薛、吴，同时又利用薛、吴间的矛盾，使其相互制约，以便从中操纵。经过薛、吴等人多方努力筹办，1928年10月底橡胶厂正式开工，雇用月薪工八十人、计件工五十人。初拟厂名“上海橡胶厂”，有人认为振兴实业，有利于国家，应有自豪感，遂用“大中华”为厂名。商标取名寓意“名利双全”的“双钱牌”。初期日产千余双，质量较差。后余以重金聘用日本武川厂技师加藤为技术顾问，质量逐步提高，尤以涂油技术见长，光泽良好，不粘不裂，销路逐步打开。此时余芝卿表面上已经退休，实际上对厂控制甚严。

大中华厂的胶鞋产量，1931至1935年间每年保持六百万双左右的水平，1936年达到八百七十四万双。利润率初期约在50%左右。余芝卿以其历年的大量盈余，投入扩大再生产。

大中华逐步以一个厂发展到后来的九个厂（大中华第一、二、三、四、五厂，天津分厂，织布厂，第一、二原料厂——炭酸钙厂和锌氧粉厂）；先后在芜湖开设营业所，在南京、汉口、长沙、广州、温州、重庆、昆明、贵阳等地设立发行所，并在沪特约一些批发商和百货店，委托代做广告，推销商品。

余芝卿在事业上富有进取精神。他看到大中华生产套鞋、跑鞋已站住脚，进而生产人力车胎、自行车胎。1932年又提出试制汽车轮胎，拨出专款二十万元，从日本高价购进机器，聘来熟练工人传授操作技术，1935年试制成功正式投产。1936年产汽车轮胎二万六千余条，人力车胎三十四万余条。抗战前夕余并接受国民党笕桥空军学校委托，试制飞机轮胎。但是国内汽车轮胎市场长期为洋商“邓禄普”、“固特异”等橡胶公司所霸占。他们力图继续霸占我国市场，先以压低售价的手段企图压垮大中华厂，后又由邓禄普出面，借口大中华汽车轮胎与其厂轮胎花纹近似，于1936年提起诉讼，大中华轮胎生产一度被迫中止。

1937年7月抗战军兴。8月14日沪战第二天，国民党飞机的炸弹误落大世界游艺场附近，造成死伤数百人的惨祸，薛福基亦罹难。余芝卿悲痛之余请洪念祖、余本性继其任。余因自己曾长期侨居日本，恐被敌人利用，乃潜去香港暂避，并以大中华橡胶厂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义向香港当局登记注册，在港设总管理处，上海改称办事处，全部企业由余在港遥控。沪地部分工厂，还分向德、美驻沪领事馆注册，悬挂外国国旗，以求庇护。

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日商曾威胁利诱大中华厂与之合

作，遭拒绝。后来日本宪兵队借辞逮捕洪念祖，进行胁迫，诈取钱财。此后重庆方面打算在内地建立橡胶轮胎厂，派人潜至上海联系，征得余芝卿的同意后，吴哲生赴渝筹划在云南设厂，向英国进口机器。后因滇缅公路封锁，机器无法运入而作罢。

1941年冬，余芝卿因病在沪去世。

注：

- ① “东洋庄”是清末民初专营进口日本商品经销业务的批发商。德盛成当时专营日货磁器、料器。
- ② 债务人欠债后无力偿还，向友人借款还债，出给借条，书明待日后兴盛时归还。

主要参考资料：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橡胶工业》。1979年版。
李宝森：《大中华橡胶厂厂史》（未刊稿）。

汤子敬

李本哲

汤子敬，字培，号厚珍，1860年9月19日（清咸丰十年八月初五）生。江西临川县人。其父汤汉高，务农为生，家境贫寒。

汤子敬十四岁时，随叔父汤韵高赴云南谋生，离家时仅带了一把雨伞、一双钉鞋和一吊六百钱的旅费。路过重庆时，同乡谢亿堂（谢亿泰布店老板）见汤子敬勤快伶俐，便留他在布店作学徒。谢亿泰本是一家小店，后来由于英、日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日益深入内地，谢亿泰便由经营土纱、土布逐渐转向经营洋货，业务日趋兴旺。

汤子敬三年学徒期满，谢亿堂借口他身材矮小，不能满师，要他再做了一年。以后，汤留在布店，从帮账到管账、办内事、跑街，步步上升。谢亿堂很赏识他的经营才干，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与他。

1898年，余栋臣起义威震川东一带，一般商人都惊惶失措，唯恐战火蔓延而遭受损失，不敢把货物运到重庆；有的甚至把在重庆的存货倒运沙市、宜昌一带寄存。汤子敬认为“要得富，险中做”，将谢亿泰在上海所进的货全部运来重庆。这时市场布匹奇缺，又正值清政府急需赶制大批军衣，一时之间布匹供不应求，价格暴涨，谢亿泰奇货可居，获利极厚，汤也因此在同业中被誉为“胆大有识”。

汤子敬在谢亿泰布店二十余年，朝夕奔走市廛中，耳濡目染，创业兴家的思想与日俱增，加上他袖笼里的私生意和东家的业务逐渐发生利害冲突，势难在店里长处下去，到1899年便离开了谢亿泰，分得银子八万两。

汤子敬在离开谢亿泰之前，已私下开办了两个企业。一个是聚福厚商号，创立于1894年，主要是做鸦片买卖。他利用江西“土客”来川收买鸦片的机会，在资金周转上支援他们，同时，又作为交换条件，每次都搭上一二挑烟土，请“土客”代购代销，从中赚取厚利。另一个是1896年开设的同生福钱庄。最初只是为了适应当时因银锭和铜钱并行而在商业上的需要，后来发展为代办收交和经营存放汇兑。汤子敬离开谢亿泰后，不数年间又先后开设了源远长、正大昌、德大永、正大永等钱庄，聚福厚、德大昌、德大合、裕生厚、大昌祥等匹头、棉纱字号，以及聚福长山货号、协太厚银朱丹粉作坊等十多个企业，到1909年，所谓“汤十号”在重庆名噪一时。

这时，汤子敬坐镇同生福钱庄，全面指挥和策划十多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他曾利用当时日货大量倾销、价格较低的机会，暗中把日货商标换成国货或英货商标出售，获利极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羊牛皮滞销，产区价格陡跌，他通过由聚福长山货号改组成的聚福洋行，大量收购囤积，大战结束时，一次盈利即达四十余万两。于是，“汤百万”的称号名满全城。这段期间，同业中有要仰仗他这块招牌的，只消他允诺一声，无须拿出分文，便成了某企业的股东，年终照例分红。有的企业一时发生信用危机，只要能请他光临稍坐片刻，或者求他送一条幅挂在墙上，便可转危为安，渡过困难。因此，后来

人们就直呼他为“汤财神”。

在尔后的十来年中，汤子敬经营的商号虽然有起有落，但总的说来业务日益兴旺，经营范围更加扩大。当时，他的经济实力约占重庆资金流转总额的三分之一，匹头棉纱业务在市场上首屈一指。特别是裕生厚，成了各联号的轴心，甚至经营银钱业的人也以此为第二市场。他的房产遍布重庆全市，有些通连成片，由是又有“汤半城”之名。他所经营的大昌祥盐号，以及乘人之危兼并的同亿义盐号，都曾盛极一时，居于重庆四大盐号之列。

汤子敬在经营上的节节胜利和业务上的日益扩充，使他愈来愈感到应接不暇，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于是永美厚银号应运而生。嗣后又在沙市、汉口、上海等地设立分号，对渝申线上各埠汤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起监督作用。

1925年，汤子敬认为在武汉经商的利润较重庆要高，决定转移资金，在汉口另辟市场。加之家庭纠纷时起，他便带现银一百多万两去汉口。汤仍然采用在重庆的办法，将永美厚银号扩充为六、七家，并在进出口业建立据点，还企图进一步染指工业。可是这次故伎不灵，一百万两巨款放出去便陷于呆滞，无法活动。1927年又遇国民党军阀在武汉封锁现金，发行的“国库券”一日数市，不断贬值，兑换现银一千两要补水二、三百两，最后竟跌到对折以下，形势十分严重。其时一般商人深怕亏累过甚，都设法抢先汇出一部分现款，唯独汤子敬仍然株守过去搞投机的经验，一文也不汇出，手握巨额“国库券”，静待市面恢复正常而“出奇制胜”，结果一百八十余万两现银全部化为乌有。

汤子敬在汉口的彻底失败，使他元气大伤，汉口、沙市一带沿途各庄，先后缩小经营或停业。重庆的同生福钱庄也连带损失三、四十万两银子。号称重庆第二市场的裕生厚商号，1932年因受德丰、丰泰两家联号所经营的烟土在汉口遭到火灾的影响，损失达二十多万元，被迫停业。汤经过这一连串打击，情绪悲观，勇气锐减，回到重庆。初时他颇有自责之意，表示要“闭门不再闻问”，然其内心还是念念不忘重振家业。过去的失败教训使他认识到，光有钱而无势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通过其子汤志修、汤壶峤，和四川军阀官僚刘湘、王陵基、刘航琛、范绍增等相勾结，冀图借助地方势力东山再起。

1933年汤子敬伙同范绍增开设四川商业银行，范出资四十万元，汤以“财神”之尊任总经理，汤壶峤一度任经理，其他重要职务亦多由汤家联号中人担任，经营尚称顺利。1934年，汤又和刘航琛的川康殖业银行勾结，并把商业银行并入了川康殖业银行。这时汤氏父子沾沾自喜，满以为往日之鼎盛可以再现。殊不知地方军阀官僚假惺惺地与他携手合作，只是为了利用他在商业场中的联系和作用，不久就把他排挤了出去。

汤子敬遭排斥后，不得不仍寄希望于自己发家的老路，并且迷信他的“财神”招牌还可挽狂澜于既倒。由于经济实力已大不如前，汤到处搭干股，做空头，从而信誉大降，连他的“班底”都渐次对他怀有戒心，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内中有的见势不妙，干脆撤伙另起炉灶，分道扬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法币不断贬值，汤子敬经营连连失利，加以做申汇投机失败和受金融风潮的冲击，遂成强

弩之末，一蹶不振。就是曾为他奠基立业、特别受他珍视的同生福钱庄，到1939年也仅有资金一万二千元，虽经改组增资，也不过徒事挣扎，最后终于将牌号卖与别人经营。其余企业或先后歇业，或招牌换记，至1942年时，所余商号不过两三户而已。

1943年9月24日，汤子敬在重庆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蔡鹤年、陈诗可、蓝襄臣、刘闻非、彭肇维：《汤子敬的发家史》。《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一辑。

曾 俊 臣

曾万石

曾俊臣，名臣勋，号正然，1888年9月6日（清光绪十四年八月初一）出生于四川威远县。祖父曾怀伦，原经营黄荆沟煤炭厂和染房。父曾本灿继承祖业，后破产，家道中落。曾俊臣幼年寄食自流井外祖家，九岁入族叔经营之盐井当学徒，出师后任帮帐、采购，深得东家信任。二十岁左右被派驻泸州作庄客，代井灶采购粮食和代盐商转运盐巴，并与小贩胡绍章合做贩运食糖生意，不几年即赚进数百两银子。

1912年曾俊臣辞去庄客工作，自营荣记粮店，由妻、舅坐柜，自任采购。当时军阀混战，泸州城经常被围，粮食供应紧张，粮价暴涨。他善观风色，每经一场战乱即获一次暴利，不两年即积资万两。1914年，他开设了一家泸州最大的餐馆“大餐楼”，又于1920年与胡绍章等合伙经营复兴荣盐号，并在重庆设分号。这时，曾结识了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税西恒，在税的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下，曾与税一道，联合泸州士绅温小泉、梁云程、申焕荣、龙少文等，创办泸州济和发电厂，由税西恒任工程师，骆景瞻任副工程师，向德国进口一套水力发电设备，成为四川第一个水力发电厂。曾还介绍税、骆二人为自流井盐井改用蒸气机代替牛拉天车，轰动一时。

1920年泸州为滇军控制，曾俊臣开设的“大餐楼”为滇军、

商会经常聚会之所。他遂广交各界名流。泸州诗人朱清长组织“蛱蝶会”诗社，社址也设在大餐楼，半月集会一次。曾不会做诗，却免费供应饭酒。1924年，因重庆复兴荣分号经营不力，他将泸州总号迁往重庆。

盐税历来为军阀筹饷的一项庞大收入，而盐商又要利用军阀保持其专销特权，因此，他们相互利用，狼狈为奸。曾俊臣擅长交际，会巴结逢迎，1925年被同业推举为重庆盐帮公所会长，专办交际。当时刘湘占据重庆，派陈国栋为盐运使。曾对他们百般逢迎，每天在复兴荣盐号以烟（鸦片）酒嫖赌、吃喝玩乐结交。曾与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军需等部门的大小官僚和驻防军阀交往密切，除吃喝玩乐外，为他们筹垫军饷也十分卖力，从而深获有关各方面信任。他曾在同业中自夸说：“在刘甫公（刘湘号甫澄）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到1928年，复兴荣经营楚岸盐额（即食盐由重庆运销湖北），先后已达三百余墩（一墩为九万三千六百斤），一度成为盐业大户。

1930年王缙绪兼任四川盐运使，敲诈盐帮期票十余万元，反咬盐商行贿。刘湘派甘典夔调查，曾俊臣作了如实反映，事虽不了了之，从此王却对曾怀恨在心。王本系西充帮盐商后台，在盐商竞争中，他有意卡住重庆盐帮三百多墩盐巴运不出去，使复兴荣损失惨重，不到半年竟亏损三十几万两银子，以致破产。

1931年曾俊臣担任潘昌猷经营的复楚盐号宜昌、沙市分号经理，并自营糖业，获利甚厚。随后，淮盐与川盐争夺楚岸市场，川盐失利，曾俊臣返渝，开设富丰盐号，经营小量楚岸盐

和糖。

1935年，曾俊臣招引了刘湘的财政大员甘典夔在富丰盐号入股。甘常约一些地方权贵在盐号寻欢作乐。曾从而结识了以后担任四川禁烟总局局长的李春江。曾趁当时国民党政府招商机会，与李春江、石竹轩（万县大烟商）三人合组“鑫记”土行，石竹轩任董事长，曾俊臣为总经理，李春江、甘典夔为后台，专营鸦片外销。该行先在川黔各产区收购鸦片，集中于重庆加工，再运往汉口、宜昌、沙市一带销售，从一年几百担、千把担做到几千担货。由于赚钱顺手，后来一年最多曾达一二万担，帐面资金总额有时扩大到二三千万元，各地存货总额最高时超过一万担，几乎造成了垄断之势。鑫记经营两年多，获暴利达二百万。曾俊臣由是被推举为重庆特业公会会长。刘航琛担任四川省财政厅长期期间，1937年实行鸦片“统收统销”办法，由官方垄断，鑫记随之停业。但官营招致各方反对，曾俊臣复于1938年与川西恶霸地主周云章、江津帮的王政平等十余家土行合并，组成“庆康”，继续扩大经营鸦片。为寻找靠山，曾等进一步笼络各方权贵，每日备办珍馐异饌，伴以娼妓，供他们纵情享乐。当时国民党政府大员贺国光、夏斗寅、何成浚、徐源泉等常为庆康的座上客。由于利用了地方军阀、国民党大员和封建势力的关系，庆康在全国开设四十余处分庄，控制了大部分鸦片内销，获利甚巨。到1939年，最大外销市场汉口已沦陷，加之股东间意见分歧，国民党政府又宣布烟土冻结，不准承运，庆康至此收手。曾前后经营鸦片四、五年，共获暴利五、六百万元。

重庆香烟供应原本由上海各地运进。抗战期间，上海沦

陷，货源中断，由滇缅路运进的英国烟，数量少，价格高。曾俊臣乃与留法学生邓起人、原庆康协理李懋卿等集资十万，开办蜀益烟草公司，聘请上海来川的工程师、技师十余人，到香港购卷烟纸，到许昌购烟叶，以五部卷烟机投入生产。出产的十支装主力舰牌香烟，由于质量较好，曾畅销一时，获利甚丰。不久宋子文官僚资本集团把持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华福烟厂、湖北帮的大汉烟厂、贵州帮的大通烟厂相继迁渝，重庆卷烟业发展日盛，市场竞争激烈。更有甚者，战后美国香烟充斥市场，蜀益势孤力单，终于在1948年倒闭。

1941年由于法币贬值，国民党政府发行“美金公债”、“美金储蓄券”、“黄金储蓄券”。当时美金官价为二十比一，黑市近四百比一。曾俊臣认为有利可图，先后购进美金储蓄券四十万、美金公债二十万、黄金储蓄券数千两。不久，果然市场债券行情上涨，曾获得暴利。

抗战胜利后，重庆胜利银行总经理王政平因投机黄金多头失败破产，曾俊臣以二十万美金储蓄券，用“蜀益”名义顶进胜利银行，自任总经理。以后由于债券投机失败，又逢甘典夔经营的通惠银行倒闭，吃了大笔倒帐；加以货币不断贬值，市场混乱，胜利银行受到影响，难以维持，终于关门歇业。

解放后，曾俊臣参加重庆市工商联活动，并撰述工商史料。1964年7月6日，曾因病在重庆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曾俊臣：《经营“特业”五年述略》。《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一辑。

老 舍

王行之

老舍，原名舒庆春，又名舒舍予，满族（正红旗）人，1899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

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清王朝皇城护军的一名士兵，月饷甚微，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在反抗侵略者的巷战中战死。当时老舍不满两岁。此后，一家数口的衣食用度，全靠母亲为人拆洗缝补的微薄收入来勉强维持，生活极为贫困。苦难的童年，勤劳的母亲，给老舍以很深的影响。他从小就刚强，好学，象母亲那样“楞挨饿也不肯求人”^①，而对穷人则充满了同情。

老舍最早上的是私塾，后来有机会读完了小学；1918年他毕业于供给膳宿的北京师范学校，因“品第特优”，任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长。从此开始了他由小学而中学、大学的将近二十年的教学生涯。

“五四”运动唤起了老舍对新文学的浓厚兴趣，他幼时所喜爱的桐城派和吴梅村等再也拦不住他对白话文学和新事物的喜爱与向往，自学英文和习写小说成为他教学之余的爱好。1923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期间，在《南开季刊》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习作《小铃儿》。同年夏，老舍回到北京，在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当文书，兼任北京—中国文教

员。工作之余，他去燕京大学旁听英文，认识了英籍教授艾温士。

1924年秋，艾温士介绍老舍去英国，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教授中文。在伦敦，老舍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对但丁、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作品尤为喜爱。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社会弊端，引起老舍的强烈共鸣，每每在读小说时忆及自己的过去。异乡孤客的故国之思，好象在眼前呈现出一幅幅清晰的图画。于是，老舍用笔把它们写了出来。1925年底，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伦敦脱稿了。老舍的这部长篇处女作，以幽默、辛辣的文笔，写了一个恶棍办学的故事；“老张”的种种卑劣行为，可作为旧中国学界的黑幕来读。《老张的哲学》写成后，老舍并未想到它可以发表，一直锁在抽屉内。后来，和老舍同住在伦敦的许地山看到了原稿，极为赞赏，鼓励老舍将该稿寄回国内。老舍将原稿投寄给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很快就发表了。此后，老舍在伦敦又接连写出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均刊登在《小说月报》上。这三部长篇的问世，使老舍一跃而为名作家；他那独树一帜的幽默风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夏，老舍离英归国。途中因旅费不足，滞留在新加坡的华侨中学里教国文约半年。新加坡中学生们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意识之强烈，使老舍“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②。为此，他毅然中止了爱情小说《大概如此》的写作，开始创作表现各被压迫民族儿童团结起来的长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春，老舍回到上海，住在郑振铎家里写完《小坡的生日》后，即回到他的故乡北平。

旅居国外的老舍，饱尝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偏见与歧视，他是怀着渴望祖国强盛的激情从海外归来的。不料，踏进国门，看到的却是笼罩全国的一片白色恐怖。中国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中。黑暗中国的苦难现实，使老舍感到痛苦，激起他的义愤，也改变了他的创作风格。从1930年夏到1937年秋，他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课余坚持写作，先后发表、出版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文博士》，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老舍幽默诗文集》和创作经验文集《老牛破车》等。这些作品的题材，绝大部分都是表现中国北方（特别是北平）穷苦人民的苦难，对旧中国提出了血泪的控诉；艺术创造方面也更加严格地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品力求真实生动，语言简洁明快，善于刻画人物个性，形成了具有鲜明独创性的老舍风格。其中，《骆驼祥子》、《离婚》和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为突出。

《骆驼祥子》写于1936年。这部优秀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祥子、虎妞、刘四爷、小福子等异常生动的艺术形象；围绕着洋车夫祥子的坎坷遭遇，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画面，控诉了军阀、特务、财主、恶霸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老舍通过祥子的悲剧，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发起了愤怒的挑战；同时，也向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深刻指出：幻想以个人奋斗来改变苦难命运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揭示社会问题的深刻性和艺术创造上的完整性与独创性，使这部作品不仅成为老舍个人的代表作之一，也为中国的新文学带来了国际声誉。《骆驼祥子》被先后翻译为英、法、德、意、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匈、捷、俄、丹

麦、西班牙、瑞典等近二十种外文译本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秋，日本侵略军逼近济南。当时，老舍因子女幼小、夫人体弱，势难举家流亡。在危急的情势下，他于11月15日忍痛弃家出走，奔赴国难。经徐州、郑州，辗转到达武汉，投身到抗战的伟大斗争中。在武汉，老舍与郭沫若、茅盾、田汉、阳翰笙、郁达夫等作家相识，在筹组全国性的文艺界抗敌组织的工作中，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指导与帮助。

1938年3月27日，文艺界人士数百人集会于汉口，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后迁至重庆）。老舍当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此后连选连任，直至抗战胜利。老舍在“文协”工作的七年间，广泛团结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作家、艺术家，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同年底，《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宣称文艺“与抗战无关”，老舍代表“文协”写了致《中央日报》的公开信，对这种不利抗战的言论提出抗议。公开信被国民党当局扣押而未能发表，却在爱国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老舍拥护、执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义行为，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畏惧和仇恨，屡屡加以迫害，特务盯梢成为常事，同时兼以利诱。国民党的一个要人曾授意老舍写一部为蒋介石“颂圣”的小说，许以很可观的稿酬，老舍断然加以拒绝。1939年秋，老舍以文艺界代表的身份，随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慰问团到前线慰问抗日战士；进入陕甘宁边区后，会见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1944年4月，由邵力子、郭沫若、茅盾等人发起，重庆文化

界集会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年。《新华日报》以《作家的创作生命》为题专门发表短评，称赞老舍“不因利诱而改行，不因困难而搁笔，始终为着发扬与追求真理正义而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总要尽可能说出自己要说的话”^③。

整个抗战期间，老舍的文学创作均以爱国抗日、团结进步为主题，运用各种文艺形式来鼓舞人民的斗志，身体力行地实践“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1939年以前，他编写了许多抗战鼓词和抗战戏曲，大力普及通俗文艺，直接宣传抗战。1939年以后，开始创作话剧，先后写出《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著）、《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著）、《王老虎》（又名《虎啸》，与萧亦五、赵清阁合著）。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与第二部《偷生》，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东海巴山集》，长诗《剑北篇》等，也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完成于美国），全书近百万字，不仅是老舍个人创作生涯中的第一部大书，也是整个抗战文艺中首屈一指的长篇巨制。《四世同堂》以北平小羊圈胡同的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写出了沦陷时期北平人民的苦难与斗争，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民的鼓舞与束缚。这部作品对那些富有民族气节的人物（主要是普通老百姓）寄予了崇敬与同情，而对那些汉奸败类则给以无情的鞭笞和揭露，全书洋溢着感人至深的爱国热情。《四世同堂》的艺术造诣较之《骆驼祥子》，有着大幅度的突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官僚政客们纷纷飞向上海、南

京等地“劫收”，老舍对此十分反感。1945年10月，在重庆举行的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老舍朗诵《阿Q正传》。朗诵前，他致辞说：“阿Q参加了革命，他说革命也好，到大户人家去拿点东西。今天，抗战胜利了，有人说胜利也好，到上海、南京发点胜利财，拿几只板鸭来吃。阿Q式的胜利是惨胜，惨胜比惨败还要惨。拿阿Q的精神来建国，国必会和阿Q一样是会死的。”^④老舍的一生都是这样嫉恶如仇。

1946年3月初，老舍与曹禺应邀赴美讲学。老舍在美国写出了《饥荒》和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并分别帮助郭镜秋和艾达·普鲁伊特将《鼓书艺人》和《四世同堂》译成英文，在美出版。

1949年10月，老舍在纽约收到了周恩来邀请他回国写作的信，他不顾疾病未愈，立即赶到旧金山乘船归国。12月12日，老舍回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

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使贫苦出身的老舍感到欣喜万分。强烈的翻身感，激发了他空前的创作热情，从归国到逝世的十六年间，他在热心从事社会活动、帮助青年作家成长的同时，勤奋写作，创作出大量的优秀文艺作品，被誉为文艺界的劳动模范。他以创作戏剧作品为主，先后发表、出版了剧作《方珍珠》、《柳树井》、《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茶馆》、《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青霞丹雪》、《宝船》、《神拳》等，以及长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正红旗下》（未完）和《过新年》、《福星集》、《小花朵集》、《出口成章》等文集。其中以话剧《龙须沟》、《茶馆》和小说《正红旗下》最为著名。话剧《龙须沟》通过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感人至深地

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劳动人民的关怀。这是解放初期我国话剧创作中的最佳剧作。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51年授予老舍以“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写于1957年的三幕话剧《茶馆》，表现出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前三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运用艺术形式宣判了旧中国的“死刑”，充分显示了他的卓越才华和热爱新中国的深厚感情，被评论界目为三十年间话剧创作中艺术性最为完美的优秀作品。1979年，文化部授予《茶馆》以“建国三十年话剧创作荣誉奖”。1980年秋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应邀赴西欧演出《茶馆》，受到西德、瑞士、法国观众的高度赞誉，开创了我国话剧出国演出的第一页。

老舍的创作劳动及其卓越的成就，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老舍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曾多次赴朝、苏、印、捷、日等国访问。

1966年8月24日，老舍不幸去世。

注：

- ①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宇宙风》创刊号，1935年9月16日。
- ② 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宇宙风》第四期，1935年11月1日。

- ③ 《作家的创作生命—贺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新华日报》1944年4月17日。
- ④ 力扬：《纪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日》。《周报》第九期，1945年11月3日。

郁 达 夫

马蹄疾

郁达夫，名文，字达夫，以字行，浙江富阳人，1896年12月7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出生于一个医家门第。祖父郁圣山是当地名医。父郁企曾早年设塾授课，兼事祖传医业，后曾当过县衙门的户房司事。郁达夫三岁丧父，一家祖孙六口的生计，全仗寡母以缝补洗衣的微薄收入维持。郁达夫从小就受到饥饿生活的折磨，饱经人间的世态炎凉，形成他沉默、孤独的性格，也为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郁达夫七岁入私塾启蒙，九岁已经能写旧体诗。1910年他在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在小学求学时，他就利用课余和假期，阅读唐诗、《史记》、《红楼梦》等许多作品，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同年，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后又到美国教会主办的之江大学预科、蕙兰中学等校念书。这时郁达夫的兴趣，全在阅读“闲书”上，诸如《吴梅村诗集》、《庚子拳匪始末记》、《白香词谱》、《桃花扇》、《西厢记》、《花月痕》等，都读得津津有味。秀丽的杭州西湖景色，激起了郁达夫的诗情，他在课余经常写些旧诗词，投寄当时的《全浙公报》、《之江日报》和《神州日报》。后来因对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不满，决心回乡独居苦学。1911、1912两年，他在故乡家里度过。

1913年9月，郁达夫的长兄郁华被派往日本进行考察，他随兄赴日留学，初在东京神田正则学校补习中学课程，晚间到夜校补习日语。1914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的文科，一度转入医科，与郭沫若结识，开始接触西洋文学。1919年毕业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文科法学部，接着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科。这一时期，郁达夫阅读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并开始小说创作的尝试，先后创作了《沉沦》、《银灰色的死》等短篇小说。

1920年郁达夫回故乡与孙荃结婚后，继续去日留学。1921年7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在东京成立创造社。从此，开始了他以文学活动为主的作家生涯。不久即回国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事务，编辑出版《创造社丛书》，并将自己的《沉沦》等三篇短篇小说合编成集，以《沉沦》为书名，列入《创造社丛书》第三种。为了维持生活，他曾到安庆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2年3月，他编完《创造季刊》创刊号，回日本参加帝国大学毕业考试，4月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7月回国，结束了在日本的将近十年的留学生活。

《沉沦》的出版，向全国喊出了他的“救救祖国”的第一声，立即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东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它既是郁达夫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代表了他一生的总的创作倾向。它表现了郁达夫对封建社会的叛逆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愤怒，对祖国的赤诚和强烈的爱，同时也表现出郁达夫创作中的弱点：严重的感伤颓废情绪，和一些过分的色情、肉欲、

变态性心理的描写。这在某些青年中也产生不良的副作用。

郁达夫回国后，仍在安庆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翌年应聘赴北京大学任经济系讲师，开始与鲁迅交往。在此期间，他除为了维持生活而担任教职外，主要精力都用于文学事业上，先后参加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中华新报·创造日》的编辑工作，并创作了一批小说和散文，辑成《茑萝集》出版。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工人形象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就是他在这期间创作的。

1925年初，郁达夫赴湖北武昌，应聘任国立武昌大学文科教授，约有一年左右的光景。1926年3月他为南方革命形势所鼓动，与郭沫若同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教授。同年11月离职返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事务，先后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和《新消息》周刊。在此期间，因沉溺于和王映霞的热恋之中，一度意志衰退，工作消沉，引起创造社同人对他的不满；加上一些别的原因，使他和创造社的纠纷不能调和，于1927年8月15日声明退出创造社。

1927年10月，鲁迅由广州到上海定居。郁达夫开始与鲁迅密切合作。在鲁迅的鼓励和督促下，他的精神振作起来。他先为鲁迅主编的《语丝》写稿，次年又与鲁迅合编《奔流》文学月刊，后来又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还与阿英合作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济难会”主办的《白华》半月刊。

郁达夫在大革命时期，虽然没有象创造社同人郭沫若、成仿吾那样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但对反革命势力却是深恶痛绝的。这个时期他的《日记九种》，虽然沉溺于个人的

恋爱纠纷,但对国民党右派代表蒋介石的揭露和抨击,还是十分激烈的。他在《钓台的春昼》中称蒋为“中央党帝”,说他是“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②。他在鲁迅的影响和帮助下,不仅共同主编革命文学刊物,还参加了不少革命的进步团体和社会活动。1928年春经阿英介绍,秘密加入太阳社。1930年2月,和鲁迅、柔石、冯雪峰等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由鲁迅提名,他列为发起人之一。1932年2月,他和鲁迅、茅盾等联名发表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一二八”战争的《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是年冬,又和鲁迅、柳亚子等联名发表《中国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政府电》,热烈祝贺中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1933年1月,和鲁迅一起加入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2月,和鲁迅、茅盾等联名发表《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强烈抗议和控诉日本法西斯杀害日本共产党员作家小林多喜二。5月,与蔡元培等联名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逮捕左翼作家丁玲。8月,与鲁迅等联名撰文欢迎参加国际反战会议代表团。这些都表明了郁达夫追求光明、进步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其思想一直处在极为矛盾的错综复杂状态中,他不时表现出消沉、颓废的情绪,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又由于他一味迷恋于醇酒美人和湖光山色,工作也十分疏懒。他不听鲁迅的劝阻,于1933年4月举家离开上海移居杭州,过“隐士”生活。后来并一度由“隐士”而挤入政界,去福建任省府参议。这一时期,他写下不少游记小品之类的作品,表现出乐于天命的思想和悠游闲适的情趣。这是他一生中思想最消

沉的时期。

1927年至1936年这十年间，是郁达夫创作生活的全盛时期，重要的小说、散文和评论，都是这一时期写作和出版的，《达夫全集》共七册也是这个时期出版的。

郁达夫到福建后，由于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使他从消沉中振奋起来，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宣传鼓动工作，发表了不少主张抗日的文章和演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郭沫若在武汉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1938年春末，应郭之邀，郁达夫赴武汉任第三厅设计委员，3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研究部主任，编辑《抗战文艺》。这一时期，他的工作劲头很大，曾到山东、江苏、河南及浙东、皖南前线慰问、采访，写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战地报告。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聘，于年底携妻王映霞和长子郁飞赴新加坡。于翌年1月9日起，开始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繁星》，后又兼编《文艺》周刊、《教育》周刊、《星洲半月刊》和《星槟日报》的《文艺》双周刊。1941年起，又兼任英政府情报部出版的《华侨周报》主编。郁达夫利用这些宣传阵地，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杂文和旧体诗词，号召爱国侨胞支援抗战。他还积极参加当地抗日的社会活动。1941年3月，领衔发表《星华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要求团结抗日。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担任新加坡华侨组织的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及文化界战时干部训练班主任。12月底，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他又担任执行委

员并负责文艺组工作，另兼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

1942年2月，日军逼近新加坡，郁达夫同胡愈之、王任叔、沈兹九等渡海撤退到荷属小岛石叻班让。4月，又辗转到达苏门答腊的小镇巴爷公务(Pajakoem Boeh)。郁达夫化名赵廉，为隐蔽身分和维持生活，在胡愈之等人的资助下，开办了赵豫记酒厂。郁这时生活十分放荡，结交了很多男女朋友，不慎被日本占领军获悉他精通日语，被迫到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部当翻译七、八个月。后设法买通医生，以肺结核为由，离开宪兵部。在这期间，他曾暗中掩护和解救过不少华侨和印尼居民，但也暴露了自己的身分，受到宪兵部的监视。1945年日本投降后，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部因郁达夫知道他们的一些秘密情报，在撤退前夕的9月17日夜里，将他秘密杀害于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荒野中。

郁达夫在隐居苏门答腊的三年中，作为纪事写过不少旧体诗词。胡愈之曾辑录其《乱离杂诗》十一首，附于1946年9月香港咫园书屋出版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郁达夫的著作，1982年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和广州花城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郁达夫文集》十卷，其主要著作均辑集在内。

注

- ① 郭沫若：《论郁达夫》。《人物杂志》第3期（1946年4月1日）。
- ② 据《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3卷第196页。

主要参考资料：

素稚：《郁达夫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12月版。

- 贺玉波：《郁达夫论》。上海光华书局 1932 年 6 月版。
- 邹啸：《郁达夫论》。上海北新书局 1933 年 6 月版。
-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香港题园书屋 1946 年 9 月版。
- 丁易：《郁达夫选集》序。《郁达夫选集》，上海开明书店 1951 年 7 月版。
- 冯雪峰：《郁达夫生平事略》。《新文学史料》，1978 年第一辑。
- 冯雪峰：《郁达夫著作编目》。同上。
- 姜德明：《鲁迅与郁达夫》。《书叶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5 月版。
- 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忆鲁迅》。花城出版社 1982 年 1 月版。
- 于听：《郁达夫简传》。《富阳党史资料简讯》第十三期。

郑振铎

陈福康

郑振铎，常用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县，1898年12月1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生于浙江永嘉（温州）。郑振铎出身贫苦，童年时父亲亡故，依靠母亲针指零活的菲薄收入，勉强读到中学。1917年夏到北京，考进铁路管理学校，为官费生，寄居在叔父家。课余常到附近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阅览室，阅读社会学和文学书籍，接触到新思潮和俄国文学，并在那里先后结识了耿济之、瞿秋白、许地山等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郑振铎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6月，学校因“五四”运动提前放假，他被迫回到温州。在温州，他参与发起了“救国讲演周报社”和“永嘉新学会”，创办《救国讲演周刊》和《新学报》。暑假后回校，11月他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社会实进会”刊行。社会实进会原具有宗教色彩，由于新思潮的冲击，宗教色彩日淡，郑与瞿、耿等人参加进去，逐渐使之成为一个强调“社会改造”的进步团体。他先后任该会编辑部副部长和部长。他在《新社会》发刊词里，提出要创造一个“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社会”。该刊虽然带有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但充满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

1920年5月被北洋军阀政府的京师警察厅以“主张反对政府”^①的罪名查禁。8月，他们又创办《人道》月刊，但仅出一期，因青年会方面胆小而被迫停刊。在此期间，他还与瞿秋白一起，参加过李大钊组织的秘密学习小组的活动^②，并参加过进步社团“曙光社”。他在1919年12月《新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等译文，是我国较早译成中文的列宁著作。1920年夏，他和耿济之一起最早翻译了《国际歌》歌词，后来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号外上。他还参加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1年3月30日团的第四次大会上被选为出版委员，与李大钊等一起负责宣传出版工作^③。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郑振铎对文学的爱好，他阅读了很多英文版的俄国十九世纪文学名著和进步文学理论书籍；在《晨报》副刊、《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创作、评论及译文，并为“共学社”主编了《俄国戏曲集》等丛书。1920年11月，他与沈雁冰、叶圣陶、耿济之、周作人等共十二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最大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他任书记干事，负责经营会务，并为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在北方组稿和审稿。

1921年3月底，郑振铎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被分派到上海火车站任练习生。5月，经沈雁冰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后负责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他还在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编辑《学灯》副刊。5月10日，他负责编辑的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旬刊》，也作为《时事新报》的副刊创刊。同时，他参与创刊了《戏剧》月刊和《诗》月刊。1922

年1月,他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1923年1月起,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文学与革命》、《新文学观的建设》等文章,与封建复旧的“载道派”和庸俗低级的“娱乐派”进行了斗争,成为当时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之一。他积极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提出了一个革命的文学口号——“血与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④。

1923年3月,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同事周予同、顾颉刚等共十人,发起成立“朴社”,集资出版书籍。这以后,他在上海大学讲授文学课。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愤于当时上海各报对于如此惨酷的大残杀不敢说一句公道话,因而于6月3日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主编了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办的《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了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该报发行所就设在他家里。他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街血洗去后》等著名诗文。6月24日,《公理日报》被迫停刊,他愤然写了《停刊宣言》,指出“‘公理’是要实力来帮助的。赤手空拳的高叫着‘公理’,‘公理’是无用的”,表示要继续斗争。8月22日至29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举行大罢工,他被推选为工会代表和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由陈云领导的这一革命斗争。9月,他又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旨在营救被捕革命者及帮助其家属。年底,为抗议反动军阀杀害工人领袖刘华,他与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四十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这一时期,他先后撰写出版了《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等著作,并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

1927年2月,郑振铎与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并积极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的临时革命政权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活动。“四·一二”政变的次日,他参加抗议游行,险遭毒手,得工友掩护才脱险。14日,他与胡愈之等共七人撰写了一封抗议书,谴责蒋介石等人血腥屠杀革命人民,“演此灭绝人道之暴行”^⑤。因为白色恐怖,郑于5月被迫只身远走欧洲,在法、英等国住了一年多。他离开祖国时,写下了激动人心的散文《离别》,表示这是“暂别”,不久即将以更猛烈的力量来加入国内的斗争。他在国外抓紧时间学习、观察和著述,除了钻研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之外,还参观了许多博物馆,编著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以介绍世界重要考古发现,同时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中的大部分作品。

郑振铎于1928年10月回国后,即参加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并任执行委员。他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并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执教。1931年9月,他应郭绍虞的邀请,到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并代理中文系主任;一度兼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33年7月,他提议创刊了继《小说月报》以后全国最大的进步文艺刊物《文学》月刊;次年1月又与章靳以一起在北平创办、主编《文学季刊》,为的是有些进步作家的文章不能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时,可以拿到北平来发表^⑥;10月,又参与创办文学刊物《水星》月刊。在北平期间,他撰写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六十章),图文并茂,史料丰富,很受读者欢迎;还创作了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借希腊神话题材热烈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另外又编

集出版《中国文学论集》、《痾僂集》，还和鲁迅合作编选出版了《北平笈谱》等。

郑振铎在燕京大学因聘请进步教员而遭到顽固势力的忌恨与攻击，被迫辞职，于1935年4月回上海，8月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这期间他编辑综合性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参加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并参加了鲁迅主持的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编辑出版工作。1936年，他出版了历史小说集《桂公塘》、论文集《短剑集》等著作。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郑振铎于1935年12月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次年6月，与周扬、沈雁冰、叶圣陶等共四十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界协会”，并当选为理事。同年10月，和鲁迅、沈雁冰等共二十一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1月，鲁迅逝世，他亲往参加入殓仪式和执绋送殡，并参加“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7月，参加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并于8月和郭沫若、邹韬奋、沈雁冰、胡愈之等共三十人合编该会机关报《救亡日报》。次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

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11月侵占上海后，租界成为孤岛。郑振铎坚持抗日救亡活动，与胡愈之、王任叔、周建人、许广平等共二十人组织“复社”，先后出版了《鲁迅全集》、《列宁选集》、《西行漫记》、《联共党史》等书籍。他并在中国共产党文委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讲课。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租界，他在暨南大学坚持上完“最后一课”，化名为“陈敬夫”，以文具商店职员的身份蛰居起来，继续坚

持抗日救亡地下斗争。他全力收购古书,发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和保护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其中最珍贵的有《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等书。在这期间,他编写出版了《中国俗文学史》,还以“玄览居士”、“纫秋山馆主人”等名影印出版了不少珍贵古籍。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积极投入检举揭发汉奸的斗争和清理文物图书的工作。他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亲美反共政策,因而不断遭到迫害。但他不畏强暴,坚持斗争,成为著名的民主战士。1945年10月,他创办并主编了《民主》周刊,几乎每期都撰写尖锐的政论。他还在《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以及散文《蛰居散记》(连载)。1946年1月,他和李健吾等人创办了大型文学月刊《文艺复兴》。4月又为《联合晚报》主编《文学周刊》副刊。10月,《民主》周刊被反动派禁止,他在“休刊号”上发表《我们的抗议》,表示:“本刊虽然被生生的缢死了,但永不死的是她的精神”,“她会复活的!凤凰从火焰中重生,那光彩是会灿烂辉煌的”。这期间,他与马叙伦、周建人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任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成立,被选为常务理事;他还与郭沫若等人发起组织“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与郭绍虞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语文学会”,为团结文化界做了许多工作。他还编辑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中国版画史图录》、《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表现中华民族光辉历史、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大型图集。

1949年2月,郑振铎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安排下,秘密绕道香港,于3月18日到达刚解放的北平。4月,去

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嗣后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领导全国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工作。他还担任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文化部副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务。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等著作，并主编了《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

郑振铎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多次出国访问和讲学。1958年10月17日，他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取道苏联前往阿富汗和阿联（埃及）进行友好访问，18日飞机在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失事，不幸遇难。

郑振铎不仅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他数十年间节衣缩食，呕心沥血，收藏了将近十万册珍贵的图书。他逝世后，他的家属遵照他生前遗愿，将他全部藏书及其日记、手稿献给了国家。另外，他在解放前收藏的很多古代陶俑，生前即全部献给了国家。

注:

- ① 参见郑振铎致张东荪的信。《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5月25日。
- ② 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文汇报》1949年7月18日。又参见郑振铎1952年日记上的自编年谱。
- ③ 据《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和刘仁静的回忆。
- ④ 西谛:《我们的杂记(一)》。《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3年5月2日。
- ⑤ 郑振铎等:《就“四一二”惨案对国民党的抗议书》。《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
- ⑥ 参见靳以:《和振铎相处的日子》。《人民文学》1958年第十二期。

王 统 照

鲁 海

王统照，字剑三，山东诸城人，1897年2月9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八）生。父亲是大地主。他七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为他延师课读。1907年，王考入县城高小。这时候他已爱读《封神演义》、《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小说。高小毕业后，1913年考入济南育英中学。

同年夏天，王统照用章回体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剑花痕》，描写辛亥革命时期男女青年志士的革命活动。他认为这部小说很不成熟，没有送去发表，但从此引起了创作的欲望。1916年，他的短篇小说《遗发》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这是他最早发表的作品。

1918年夏天，王统照到北京，考入中国大学英文系，开始读到《新青年》等刊物，结识了郑振铎、耿济之等人。“五四”运动时，王曾参加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爱国行动。由于他酷爱文艺，积极投入了新文化运动，热情地写新诗和白话体小说。他最早的白话小说是写一个青年因自由恋爱不遂而牺牲的悲惨故事，发表在他自己负责编辑的《曙光》杂志上。

1920年冬天，王统照与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共十二人，组织了文学研究会。该会的宣言说：“将文艺当做高兴

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一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①

王统照自始至终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他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热情倾泻在作品中。在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上，他发表过《遗音》等短篇小说和《生命的火燃了》、《少年的梦》等新诗。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这两个刊物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②。1922年，王在文学研究会创办的《诗》月刊上，又发表了《未来的阴影》、《烦激的心河》等诗歌。这年他在中国大学毕业，到平民大学任教。

1923年王统照出版了长篇小说《一叶》。1924年又将前几年所写的短篇小说汇集命名《春雨之夜》出版。这些小说多是以青年男女的苦闷、追求人生的意义为题材。他的小说文笔细腻，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内容上虽没有为读者指出一条出路，但却强烈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有一定影响。

1925年，王统照出版了他第一本诗集《童心》，收有1918年到1924年间写的诗歌九十首。他初期的诗，从形式上看，受旧诗的影响较大；从内容上看，有些是讴歌田园的，但更多的是探索人生。他因为找不到答案，对人生感到“玄秘”和“悲哀”，同时也相信人生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前路定有明光，阴影终将退去。”^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当时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彷徨而又怀有希望的情绪。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大批革命党和群众。严酷的现实使他痛苦不安。这年夏天，他从北京回到青岛，在青岛市立中学教课，以后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兼课。“有时一股强烈的悲感冲上心头，无可排遣，又读不到什么书，便写下十篇左右的短篇，类如《搅天风雪梦牢骚》……。”④

1930年，王统照去东北旅行。这时东北正处于“九一八”前夕，他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忧心忡忡，写了报告文学集《北国之春》，描述了东北人民在敌人铁蹄践踏下的痛苦生活。

1933年，王统照出版了诗集《这时代》，收入他1925年到1932年写的诗。序言中说，在这火与血的时代里，他逐渐摆脱了怀疑与伤感，变得坚强起来了。长篇小说《山雨》，也是这个时期写成的，他在跋中说：“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及农民的自觉。”这是王的代表作，也是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小说之一。接着，他又写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春花》，以“五四”运动后的济南为背景，写一群中学生在大革命的浪潮中走向不同的道路，于1936年出版。

这时，王统照已成为著名的诗人、作家，青年慕名请教的很多。他对爱好文学创作的青年竭力培养，当时在青岛的臧克家、王亚平、吴伯箫，在外地的王西彦等，都受过他的教益。他曾与闻一多（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一起，资助臧克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

《山雨》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评论家的好评，但也触

犯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以其“内容颇含阶级斗争意识……予以警告，勒令禁止发行”^⑤。为此，1934年王统照出国去欧洲。他先到伦敦，在大英博物馆里阅读、抄录资料，又去剑桥大学研究文学；以后，从欧洲去非洲，游历了埃及，再回到意大利，凭吊了著名诗人雪莱的墓地，写了《在雪莱墓旁》等诗。后来，他的游记汇编为《欧游散记》，于1937年出版。

王统照1935年春欧游回国，住青岛观海山旧居。这年夏天，老舍、洪深、赵少侯、王亚平、吴伯箫、孟超、臧克家等一批作家聚集于青岛，创办了《避暑录话》文艺周刊。所谓“避暑”，既是避炎热，也是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炎威”，王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诗歌。

1936年秋天，王统照到上海，接任大型文学刊物《文学》的主编。这是三十年代全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发表了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也发表了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同年10月，华北危急，王统照与巴金、茅盾、郭沫若、鲁迅等联合签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吁请“全国的学者、新闻记者、作者与读者，一致起而力争言论自由，以收全国上下一致救国的效果”^⑥。12月，王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7年6月，王自己编辑了《王统照短篇小说集》，收进1915到1932年这十七年间的主要作品，认为“殊觉自惭！不但观察、思想觉得浮薄，文字也无甚气力”^⑦。他以1932年为限，是因为自1933年发表《山雨》以后，他的思想境界前进了一步。

同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租界成了“孤岛”，王统照与许广平、郑振铎、唐弢等人继续从事文学活动。1938年起，王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兼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还为《大英夜报》编副刊《七月》，为《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写稿。由于当时环境恶劣，他除与郑振铎、耿济之、柯灵、唐弢等交往外，很少外出，写作也多用笔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上午，日本军队冲进上海租界，王统照为学生上了最后一课，要求学生“要有志气，要有冲破黑暗的精神”^⑧。从此他化名王恂若，在沪蛰居。

抗战胜利以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王统照应邀在中文系担任教授，同时还为《民言报》主编《艺文》副刊。这时，青岛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山大的校舍被占为军营。国民党“劫收”的情景，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杀害的消息，使王逐渐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1947年山东大学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受到国民党青岛当局的残酷镇压。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王挺身而出，在学生大会上演讲说：“同学们，我支持你们！”王统照的行动影响了一些老教师，也鼓舞了青年学生们的斗志。1948年10月，他在诗中写道：“北国鼓声萦梦寐，平生意想剩华巅。”^⑨表现了对反动派的战斗精神。

1949年7月，王统照到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9月，他出席青岛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选为常委。1950年任山东省文教厅副厅长、省人民政府委员。1951年被选为省文联主席，1952年任山东省文化局局长。他还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联委员、全

国作协理事。

1957年11月29日，王统照病逝于济南。

解放后，出版了王统照的诗集《鹄华小集》、文学评论集《炉边文谈》，还出版了《王统照短篇小说集》、《王统照诗选》，重印了长篇小说《山雨》，编印了七卷本的《王统照文集》。

注：

- ① 《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十二卷一期，1921年1月。
- ② 郑振铎：《〈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8页。
- ③ 王统照：《夜行》。
- ④ 王统照：《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
- ⑤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知》第397号。见王统照《山雨》末页。
- ⑥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上册第183页。
- ⑦ 《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
- ⑧ 徐开垒：《我的“最后一课”老师》。《人物》1981年第3期。
- ⑨ 晦庵：《童心》。《书话》，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18页。

主要参考资料：

- 王统照：《这时代·序》。
- 王统照：《江南曲·序》。
- 田仲济：《王统照文集·序》。
- 王统照墓志铭。
- 臧克家：《情感的彩绳》。《前哨》1978年第2期。
- 王亚平：《忆诗人王统照》。《前哨》1978年第2期。
- 臧克家：《剑三今何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

黎 烈 文

任嘉尧

黎烈文，1904年5月18日（清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四）生，湖南湘潭人。小名六曾，曾用笔名维克、林取、达伍、达六等。祖父曾任台湾知府，父亲也在福建做过官，是一个“世代书香”的封建家庭。

黎烈文小时在家乡读书。十八岁时到上海，经报考录取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助理编辑，旋参加文学研究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26年东渡日本留学。次年又转道法国，进巴黎大学研究院深造四年，得文学硕士学位。黎在法半工半读，课余为上海《申报》特约撰稿，并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法国文学名著。

1932年，黎偕妻子严冰之（蕙影）回国，到达上海。先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翻译法文新闻稿兼编辑，因个性耿直矜持，与主持者意见不合，且对翻译新闻稿缺乏兴趣，乃拂袖而去。

其时，黎的叔母黄渔仙为《申报》馆主持人史量才教授古琴。^①经黄介绍，史获知黎曾留学法国，擅长文学，遂邀请他担任《申报》副刊《自由谈》助理编辑。

《自由谈》原系周瘦鹃主编了十多年的副刊，内容陈旧，与时代潮流大相径庭，而史量才当时意气豪迈，锐意革新《申

报》，对《自由谈》的编辑方针，确定“务以不违时代潮流与大众化为原则”^②。黎烈文参与《自由谈》编辑工作一开始，就在1932年12月1日发表一篇《幕前致辞》，认定“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进步中，都在近代化”，“我们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却是要牢牢站定的”。“我们只认定生活的要素，文艺，是应该而又需进步的，近代化；同时却也不愿离观众太远”^③。当天的《自由谈》，还发表了叶圣陶道破“自由谈”本质的杂文和冰莹祝贺《自由谈》新生的文章，以及严冰之翻译的法国梅里美的小说《托勒得的珍珠》等，面目为之一新。

黎烈文与周瘦鹃之间在编辑方针上立刻产生了矛盾。史量才支持黎的革新行动，改任黎为《自由谈》主编。为照顾老同事起见，史在《申报》上另辟一副刊，名曰《春秋》，由周任主编。

黎烈文主持《自由谈》伊始，即进一步表示：务使《自由谈》的内容“更为充实，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决不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④。基于这一立场，黎在选稿上，往往偏重于描写现实生活而寓意深长的杂文。当时，许多左翼和进步作家欢迎《自由谈》的革新，都纷纷投稿。鲁迅、瞿秋白、茅盾、郑振铎等许多进步作家，都是《自由谈》的撰稿人。

《自由谈》得到进步力量的赞助，在当时白色恐怖弥漫、反革命文化“围剿”猖獗的上海，给广大读者打开了一个呼吸清新空气的窗口。特别是鲁迅（笔名何家干等）、茅盾（笔名玄）等人的文章，象匕首和投枪，针砭时弊，切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帮助读者认识到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于万马齐喑中一新耳目，深受爱国人士及进步青年的欢迎。

另一方面,《自由谈》的革新,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特务机关刊物《社会新闻》的竭力反对。他们不惜恶意诽谤,造谣破坏。^④在黑暗势力的重重压迫下,主持《自由谈》编辑工作半年多之后,黎烈文在报上刊登了一则《编辑室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麓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⑤。字里行间,表达了编者难言的苦衷。此后,《自由谈》在选稿方面,游记、随笔等散文小品较前多了些。但格调不变,左翼和进步作家仍源源投寄稿件,不过斗争策略有所改变,在隐晦曲折的字里行间包含着深刻的内容。

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推行其文化“围剿”政策,对《自由谈》主编视为眼中钉,一再向《申报》当局施加压力。5月9日,《自由谈》上登出了《黎烈文启事》:“烈文现因事忙,对于本刊编辑事务无暇兼顾,自即日起,关于本刊一切事项由张梓生先生主持。”黎主编《自由谈》共一年五个月零八天。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他全力贯注于《自由谈》的编辑工作,连他夫人临蓐也无暇照管,以致她独自死在医院里。^⑥继他之后主编《自由谈》的张梓生,萧规曹随,风格依然,到1935年10月31日也被迫去职。

1935年,黎烈文与鲁迅、茅盾、黄源等组织“译文社”,出版《译文丛刊》,介绍外国文艺作品。

1936年9月,黎烈文在上海创刊并主编《中流》文艺半月刊,着重刊登短篇作品,及时反映当时政治斗争的文章。撰稿人大都是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鲁迅逝世后,1936年11月

5日的《中流》第一卷第五期曾出纪念专号，刊登了许多人的纪念文章，黎以《一个不倦的工作者》为题，追忆鲁迅的忘我劳动。“七七”芦沟桥事变时，《中流》出了抗敌专号。8月《中流》停刊，共出二十二期。

其间，1936年，在中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巴金和黎烈文起草过由鲁迅等签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0月，黎又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了名。

抗战开始后，黎烈文到了福州。由福建省教育厅长郑贞文推荐，于1938年担任福建省教育厅中等学校国文科视导员。1939年到永安，抱着“推重车上峻坡的雄心”，创办“改进出版社”，自任社长，并由杜俊东、陈范予、陈占元、许天虹等协助，编刊了《改进》、《现代文艺》、《现代青年》、《现代儿童》等刊物和《改进文库》，出版了适应抗战需要的青少年学生通俗读物。

抗战胜利后，黎烈文于1946年初到了台湾，应台北《新生报》社长李万居（留法同学）之邀，一度担任台北《新生报》社的副社长，仅二十天即去职。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黎烈文到台湾大学文学院任外文系教授。五十年代初，黎应《中华日报》台南部总编辑兼副刊主编于吉之约，撰写文艺专栏文章，题为《艺文谈片》，每周一篇，内容大抵为欧陆文坛掌故，如《名著的代价》、《华格纳访贝多芬》、《文豪的归宿》等。黎对外国文学研究有素，此时信手拈来，写得逸趣横生，颇为读者爱好。^⑦

1972年10月31日，黎烈文在台湾病逝，身后萧条。

黎烈文一生著作甚多，主要有：小说集《舟中》，散文集《崇高的女性》，《西洋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标点《大唐三藏取经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译著有《冰岛渔夫》、《红与黑》、《脂肪球》等。

注：

- ① 黄渔仙，名松，福建泉州人。与黎烈文叔父结婚，婚后到湘潭，生二女（曾昭、琼昭），丈夫逝世后携女到上海，为其同乡人中南银行总经理黄浴沂聘为家庭教师。史量才因黄浴沂之介绍，请黄渔仙教授操古琴。解放后，黄渔仙曾任上海文史馆馆员，擅绘画、弈棋，通昆曲。晚年归故里，1982年5月30日病逝。黎烈文原为黄渔仙之侄，因其叔无子，遂为黄之嗣子。（以上据原《申报》总经理马荫良口述。）
- ② 《今后本报努力的工作——纪念本报六十周年》。《申报》1932年11月30日。
- ③ 《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1日。
- ④ 《编辑室启事》（一）。《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12日。
- ⑤ 《编辑室启事》。《申报·自由谈》1933年5月25日。
- ⑥ 鲁迅：《仿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 ⑦ 曹聚仁：《我与黎烈文》。见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

周 瘦 鹄

史全生

周瘦鹄，原名国贤，字祖福，号怀兰室主人、紫罗兰盒主人，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1895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八）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六岁丧父，母亲给人家做保姆。由于生活艰难，他妹妹、弟弟送给人家做养女、养子。童年时代的贫苦境遇，使他“虽逢新年，也没有什么兴致，眼瞧着邻家孩子们玩着花花绿绿的耍货，只是眼热”^①。

但是周瘦鹄早年还有机会在私塾读了几年书，1909年以“义务生”（即免费生）考入上海民立中学。1912年毕业后，任民立中学初中英语教员。

周瘦鹄在中学读书时即爱好文学，作文常名列全班之冠。1911年3月，他怀着试探的心情翻译了一篇法国政治小说《百合魔》，以“泣红”的笔名投《小说月报》，被采用。以后，他又翻译了哀情小说《孤星怨》和话剧《爱之花》，均在《小说月报》发表。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②1912年开始用“瘦鹄”笔名。1913年，他经民立中学国文教员孙警僧（一名经笙）介绍，一度加入“南社”。

1916年，周瘦鹄应聘任中华书局编辑。这时，他翻译了一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交中华书局出版。其中不仅收译了英、美、俄、德、法等国的作品，也收译了塞尔维亚等几

个弱小民族的优秀短篇小说，这在我国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得到了鲁迅的赞誉，称他“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当此淫佚文学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犹如“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③。

1920年4月，周瘦鹃应《申报》馆之聘，任该报副刊《自由谈》编辑，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以后，《申报》由日伪接管，他才离开。其间在1932年12月，史量才为革新《自由谈》的内容，改聘黎烈文编辑，另辟《春秋》副刊交周编辑。他编《春秋》是“新旧综合，以有意义有趣味为主旨”^④，吸引了不少读者。

在编辑《申报》副刊的同时，周瘦鹃还先后编辑了各种期刊。1921年3月，他主编复刊后的《礼拜六》周刊。这是一个“供一般社会人士作消闲遣兴之需”^⑤的刊物，所载文章“以哀情及社会性质者居多数”。由于迎合了一般小市民所好，曾经风行一时。四个月后，他因编辑《半月》杂志而辞去《礼拜六》的编务工作。《半月》是继《礼拜六》以后又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刊物，封面印有谢之光所绘时装仕女。1922年夏至1924年夏，他编辑《紫兰花片》出版，这是专辑他个人作品的杂志，每期二十个题目始终不变，也算“是个创举”^⑥。1925年6月，《上海画报》编辑毕倚红生病，他继任编辑，从第七十期起编到第四百三十一期。1925年《半月》停刊，他另编《紫罗兰》。此外，他还与赵苕任合编《游戏世界》杂志，与严独鹤合编《中华》图画杂志，还独自编辑过《紫葡萄》、《良友》、《新家庭》等刊物。所有这些刊物也都和《礼拜六》一样，“以趣味是尚”，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沈雁冰曾指出：“礼拜六”派对于

中国国民的毒害是“抛弃了真实的人生不察不写，只写了些佯啼假笑的不自然的恶札”，“在思想方面说来，毫无价值”^⑦。对此，周有所辩白，说当年《礼拜六》所刊载的小说、杂文等，“大抵是暴露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横暴，家庭的专制，婚姻的不自由等等，不一定是些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⑧

这期间，周瘦鹃除了编辑刊物以外，还写了大量作品，主要有：《紫罗兰集》、《紫罗兰外集》、《紫兰芽》、《我们的情侣》、《滑头世界》、《奇谈大观》、《瘦鹃短篇小说集》等。他的著作也和他所编的刊物一样，大都是宣扬“趣味”和“游戏”的文学。间或也有一些以反侵略斗争为题材的作品，如《亡国奴日记》、《风雨中的国旗》、《爱国歌》等。他的翻译比著作还多，除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以外，还有《福尔摩斯别传》、《犹太灯》、《蛇首》、《鱼雷》、《情案》、《冰天艳影》、《红颜知己》、《翻云复雨录》等多部。

周瘦鹃癖好紫色，不仅他编辑的许多刊物和所著书的名中多带有一个“紫”字，他住的房子叫“紫兰小筑”，他的书房称“紫罗兰斋”，这是因为他早年曾热恋过一个女友，英文名字叫做 Violet（即紫罗兰）的关系。

1922年7、8月间，周瘦鹃参加了旧派小说作家先后成立的两个文艺团体：上海的“青社”和苏州的“星社”，在他们出版的《长青》、《星光》上发表过一些文章。这两个文艺团体都没有章则，也没有什么活动，只是用聚餐的方式互相交往，后来无形中解散。

1936年9月，以鲁迅为首，上海文艺界发表了一个《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文艺界各派联合一

致，宣传抗日。周瘦鹃也列名其中。

“八一三”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入侵上海，《申报》为抗拒日方新闻检查，一度自动宣布停刊，周瘦鹃回到苏州。苏州沦陷后，他又先后流亡到浙江南浔和皖南黟县，备受颠沛流离之苦。后来，《申报》复刊，他才回到上海。

1941年12月，《申报》被汉奸陈彬龢接管，周离开《申报》，在上海开设了一家香雪园盆景店，以卖盆景花卉糊口。

抗战胜利以后，《申报》为国民党政府接收，周瘦鹃欲入报馆而被拒。他一气之下回到苏州，产生了愤世嫉俗的隐退思想，整天以养鱼种花自娱。1947年，他翻译出版了《世界名家短篇小说集》。

周瘦鹃自称是一个“爱美成癖”的“花迷”，工作之余，总是栽花接木，从不间断。即使在抗战期间流亡皖南山村时，也不忘栽插花木。早在1934年时，他以多年稿费的积蓄，在苏州买了一块占地四亩多的园圃，架屋垒石，挖地种植，浇灌剪接，建起了一座美丽的花园。可是，日本侵略军一到，精心修建的花园毁于一旦。抗战胜利后，他虽然努力经营，终未能恢复旧观。

周瘦鹃对于盆景艺术造诣甚深。他的盆景布置得千姿百态，典雅脱俗，给人以一种心旷神怡的艺术感受。早在抗战以前，周就经常参加莳花展览会，颇获好评。抗战时期，他又参加过几次在上海租界举行的“中西莳花展览会”，以他那高超的盆景艺术，压倒了西方人的园艺，连续三次获得锦标杯。

解放后，周瘦鹃重新拿起抛弃多年的笔杆，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先后出版了《花前琐记》、《花花

草草》、《花前新记》、《花前续记》和《云行集》等散文集，并为港、澳中文报刊写了许多介绍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他还发挥盆景艺术的才华，为苏州和外地许多园林设计贡献了力量，同时修复了他那残破的周家花园。1963年，他那些盆景被拍成电影。周先后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文联常务委员，并任省文史馆馆员、苏州市园林管理处副主任等职。

1968年8月12日，周瘦鹃在苏州去世。

注：

- ① 周瘦鹃：《先父的遗像》（1922年）。《半月》杂志第二卷第十一期。
- ② 周瘦鹃：《花前琐记》。第68页。
- ③ 鲁迅：《“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见《文艺百家》1979年第1期。
- ④ 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见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第400—401页。
- ⑤ 同④第290页。
- ⑥ 同④第343页。
- ⑦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第1页。
- ⑧ 周瘦鹃：《花前新记》。第47—48页。

黄 远 庸

钟碧容

黄远庸，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1884年（清光绪十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黄儒藻，在科举上很不得志，屡试不第。其母为名门闺秀，知书识字，习礼明诗。黄远庸多靠母亲教育。黄于1900年举秀才，1902年为家人促迫，应乡试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同榜的有蒲殿俊、谭延闿、汤化龙等。次年，黄远庸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留学期间，他刻苦钻研，勤奋学习；课余学日文、英文，也很留心时事。

1909年秋，黄远庸学成归国，邮传部尚书汪大燮派他在参议厅行走，任员外郎，兼编译局纂修官。此时，他的同乡李盛铎也从欧洲归来，与他同住一处，彼此经常在一起交谈。李见他擅长文学，文笔犀利，就对他说：“吾见欧土之谙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为名记者。”^①黄远庸听后颇为动心，乃想改行当新闻记者，工余时间常给报刊写稿。

1911年5月，清政府组成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6月，各省谏议局联合对“皇族内阁”进行猛烈抨击，同时，决议成立“宪友会”，声明尊重君主立宪政体。黄远庸参与“宪友会”的政治活动，被选为代表，往见“皇族内阁”总

理大臣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与他们协商草拟宪法的事情。

辛亥革命后，黄远庸决心“不作官，不作议员”，在北京开业做律师，并任上海《申报》、《时报》驻北京特约通讯员。他广为交游，自达官贵人以至政客、艺人，莫不结交。这些人实际上是他的新闻来源供给者，常常向他提供一些不可多得的材料。他写的通讯条理清楚，判断明确，有分析，有评论。“行文流畅多趣，开印象派纪事之风，极为读者所喜”^②，有人誉之为“报界之奇才”。中国报纸之有通讯，是从黄远庸开始的。

1912年8月，袁世凯伙同黎元洪杀害了湖北军政府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对这件震惊一时的政治谋杀案，黄远庸接二连三地写报道，把事情的经过和原委一一披露。其后，宋教仁案、中日交涉、大借款等等，他无不尽情报道。他为了揭露袁世凯，写过《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袁世凯此后徘徊之径路》等，说袁“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自以阅历深，气魄伟，平生历史宏富复杂，举世无二，除左右驰驱效死力者外，皆以竖子视之，而不悟今日潮流之不可抗，其左右亦无敢进言者”。他还暗示袁世凯妄图称帝，并逆料其终必归于失败。说袁世凯“不审大局之将不可救”，“特恐其所为，无利于国，并无利于身也”。

民国初年，政党林立。各党为扩张党势，专以利禄诱人入党。黄远庸目睹政党现状，愤慨之极，乃于1913年登报声明：“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与一般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③他虽然表示不偏不倚，好象很超脱的样子，但他的政治态度，仍离不开共和党的观点。他在政治上主张改良，反对使用革命暴力，力求稳健、保守，以免开罪袁世凯。

1915年8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猖獗一时,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公开鼓吹帝制,为袁张目。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在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文章,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袁的亲信爪牙为了虚张声势,想找些社会名流为袁支撑门面,由总统府内史夏寿田出面,要黄远庸撰文赞成帝制。黄大为恐惧,他“不欲为,不敢不为”,一连七、八天拖延不写,而夏寿田天天来信催促,最后被迫写了一篇不痛不痒的文章来敷衍搪塞。袁看了不满意,叫人示意黄另写一篇。黄看推脱不了,又怕招来横祸,于9月3日遁走上海。

黄远庸到上海后,在《时报》上向袁的御用喉舌《亚细亚日报》发表声明:“远以国体问题与贵报主义不合,故于贵报未曾出版之先,即已在京沪各报声明脱离关系。”^④这是他表示与鼓吹帝制者划清界限,也是公开宣布与袁世凯决裂,对袁的帝制活动,无疑是个打击。

黄远庸在上海逗留不久,就东渡日本,又转去美国旧金山游历。1915年12月27日,旧金山康梁宪政党宴请黄远庸于都坂街上海楼菜馆,忽有二人闯入,将黄刺死,^⑤“事后无人知刺客为何许人”^⑥,但无疑是政治暗杀。他生平的著作,由其友人林志钧汇集成册,编辑《远生遗著》共四卷。

注:

-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423页。
- ② 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47页。
- ③ 黄远庸:《远生遗著》。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一卷第132页。
- ④ 《时报》1915年9月14日。

- ⑤ 《远生遗著》，第四卷第190页。
- ⑥ 黄远庸被暗杀，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说是袁世凯派人杀的；另一说是旧金山华侨误认黄为帝制派而杀的。
- ⑦ 冯自由：《革命逸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三集第395页。

严 宝 礼

徐铸成

严宝礼，1900年1月2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二）出生于江苏吴江县。幼年随嗣父严公辅（字佐治，在江海关任文书）至上海就学。1916年秋，进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读书。1920年时，同乡任传榜任沪宁、沪杭甬铁路局局长，严经嗣姐严蔼徵介绍，辍学入路局，在总稽核室工作，经常被派往沿线各车站查对账目。他秉性颖悟，运算敏捷，经多年业务实践，益工于筹计。时路局设有“同仁会”，相当于职工俱乐部，办理储蓄及保险事务，他被推为负责人之一。^①

三十年代初，严宝礼业余创办“上海交通广告公司”，主要经营上海市内及铁路沿线路牌广告。广告设计新颖，深受工商界欢迎，业务日益发展。从此，他和各界人士特别是报纸的记者、编辑有所交往。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北站陷于火线，沪宁、沪杭甬两线铁路交通中断，路局将大部分职工就地遣散，严宝礼亦在被遣散之列。不久，上海、南京先后沦陷，上海租界当局屈从日本侵略者的要求，规定中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刊登的新闻，事先须送日方检查。一时，《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立报》等，纷纷宣布自动停刊，以示抵制；《新闻报》、《时

报》等虽继续出版，或噤若寒蝉，或态度灰色，远不能满足租界三百万爱国居民的要求。严宝礼激于民族义愤，乃与路局同事余鸿翔、孙志衡等商议，与佛学书局经理沈彬翰、《社会日报》主持人胡雄飞、《新闻报》编辑徐耻痕等共同发起，筹集一万元，创刊一宣传抗日救国的报纸。为避免日方检查，决定用洋商名义。经方伯奋联系，征得原上海英文《文汇报》（Mercury）记者英国人克明同意，用《文汇报》旧名，由克明以发行人兼总主笔名义，向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

《文汇报》于1938年1月25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伊始，由于资金短绌，既无机器厂房，又缺排字工人，得原《大公报》（上海版）副经理李子宽的协助，由原《大公报》印刷厂代印，报馆亦设在《大公报》营业部旧址。股东二十余人，互推严宝礼、沈彬翰、胡雄飞、徐耻痕、方伯奋五人为华籍董事，克明、路易·乔治、萨埃门等五人为英籍董事。严兼任经理，实际执行社长职务。他殚精竭虑，全力经营。创刊之初，聘胡惠生为总编辑，柯灵主编副刊，邵伯南为记者，储玉坤主编国际新闻。因资金支绌，《大公报》经理胡政之入股一万元，并介绍徐铸成任主笔，负责言论编辑工作。由于《文汇报》宣传爱国抗日，揭露敌伪罪行及投降派之阴谋，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加以编排新颖，文字生动，副刊《世纪风》等多刊载进步作家作品及反映边区、游击区情况的报道，使青年学生及各界市民耳目为之一新。《文汇报》发行日益扩大，半年间由一万二千份增至六万余份，为当时孤岛影响最大的报纸。嗣后，又发行晚刊及《文汇年刊》，风靡一时。

《文汇报》创刊后，敌伪视为眼中钉。2月10日，敌伪即向

报馆抛掷炸弹，营业员陈桐轩被炸死，还有二人受伤。以后又发生送来死人手臂和毒汁水果以及炸毁机器房等事件。在此重重威胁下，严宝礼毫不畏惧，且与编辑部同事一起通宵达旦地工作，经常留宿在编辑部附近。国民党方面也企图控制《文汇报》，中宣部及孔祥熙、宋子文等先后派其在沪代理人，以投资为名进行收买，严均予拒绝，以保持其民间报纸的本色。

当时，上海租界难民麋集，沦陷区不堪受奴化教育之青年学生亦多问道流亡上海。严宝礼在报上发起募捐寒衣代金，分发给难民；同时设置清寒学生奖，资助流亡青年入学，高初中生各五十名。

《文汇报》的抗日爱国宣传报道，振奋了上海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敌伪施展收买伎俩竭力加以破坏，英国人克明在敌伪利诱下，时时找严宝礼的碴，指摘他账目不清等等，并逼令严撤换负责编辑言论工作的徐铸成。克明还借口扩充《文汇报》，企图撤换一批人员，攫取编辑部大权，改变《文汇报》的抗日爱国立场。严宝礼与编辑部同仁站在一起，严加抵制，揭露克明的诡计，使敌伪的阴谋未能得逞。英国驻沪总领事馆仍借故勒令《文汇报》自1939年5月19日起停刊两星期。由于《文汇报》内部对是否复刊意见不一，两星期后未能复刊。

《文汇报》停刊后，严宝礼以经商为掩护，经常往返于上海、屯溪间，名义上担任国民党中宣部东南专员办事处办事员，实际为《文汇报》复刊作种种准备。1945年4月间，他与高季琳、费彝民、储玉坤、袁鸿庆等突然被敌宪兵队逮捕，受到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后经营救出狱。^③

抗日战争胜利后，严宝礼亟谋复刊《文汇报》，惟原来的馆址及器材，已被国民党“劫收”。严虽获得蒋介石颁发的“胜利勋章”，然而宣传抗日救国的《文汇报》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歧视，复刊要求也被漠然视之。严乃劝说亲友任传榜、虞顺懋等投资，于1945年8月19日重新复刊。《文汇报》复刊之初，任储玉坤、朱云光为总编辑，因内容平平，未能打开局面。1946年1月，经徐铸成推荐，严聘宦乡、陈虞孙任副总主笔，孟秋江任采访主任，高季琳主持副刊，使《文汇报》阵容一新。3月，徐铸成回到《文汇报》。编辑部人员大更动，徐任总主笔，与宦乡、陈虞孙、高季琳、张锡昌、孟秋江共同负责。3月29日起，《文汇报》改版革新，鲜明地举起了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旗帜，并商请郭沫若、杜守素、侯外庐、李平心、吴晗、丁瓚、傅彬然等编辑各种周刊。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文汇报》内容丰富，旗帜鲜明，与国民党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一时成为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因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他们利用控制配发官价外汇作手段，对《文汇报》施加经济压力。严宝礼坚决抵制，宁以高价购得的黑市外汇购买白报纸，坚持出版。国民党有关方面在和谈破裂、召开伪“国大”和公开发动内战之际，曾三次企图以巨款收买《文汇报》，均被严宝礼与徐铸成等严词拒绝。1947年5月25日，国民党反动当局终于悍然下令将《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三报同时封闭，并非法逮捕三报记者。^④

1948年春，严宝礼全力策应徐铸成去香港筹办《文汇报》，并劝说虞顺懋等参与投资，又输送大批职工及印刷设备到香

港，一度还去香港参加筹划。香港《文汇报》乃于是年9月9日创刊。其时，旅居香港的李济深、郭沫若、潘汉年、侯外庐、翦伯赞、柳亚子、茅盾、夏衍、马叙伦以及龙云等人，均对《文汇报》予以精神或物质的赞助。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6月严宝礼率先复刊上海《文汇报》，任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总经理。《文汇报》在私营公助、公私合营以及转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历程中，严均以积极态度接受人民政府的安排。1956年《文汇报》一度停刊，大部职工赴北京参加创办《教师报》，严任管理部主任。不久，《文汇报》再度在上海复刊，严任副社长兼总经理。

严宝礼在解放以后，历任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候补委员及上海市委委员。1960年11月18日严宝礼在上海病逝。

注：

- ① 据严宝礼外甥任嘉尧提供材料。
- ② 同①。
- ③ 据当时同时被捕的柯灵、袁鸿庆等人口述及严生前自述。
- ④ 当时三报停刊原因，“罪名”是“各该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见上海《新闻报》1947年5月26日载：《三报停刊原因，〈铁报〉所刊不确》。

费 巩

玉如 正棠

费巩，原名福熊，字寒铁、香曾，1905年9月1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出生于江苏吴江县。其父费树蔚，曾任北洋政府肃政厅肃政史，后因不满袁世凯称帝，退隐苏州，与其甥柳亚子常一起写诗。^①

费巩七岁在苏州就学，十三岁到上海入南洋模范小学，后进复旦大学附属中学。1923年入复旦大学，以成绩优异，乐于助人，任复旦学生会评议委员会主席和复旦附属义务小学董事长。1925年“五卅”惨案后，费巩发动义务小学师生上街演讲、游行，配合罢工、罢课斗争。是年，他从文学专业改为政治学专业。1926年6月提前取得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科政治学系毕业文凭，为文学士。他自学外语两年后，自费出国求学，先至法国巴黎，翌年转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并研究英国及西欧各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他学习勤奋，整天埋头在图书馆中，1931年以优等成绩获荣誉毕业证书。他的导师方纳劝他在牛津大学继续考博士学位，但费巩自筹的学费已用尽，不能继续学业。

费巩回国后，先任《北平日报》社评委员，继由陈望道推荐进上海中国公学任教。他在沪结识了邹韬奋，常为《生活周报》撰文，并主编《复旦同学会会刊》一年。1932年秋，进复旦

大学任教，讲授英国政治制度。先是，他已写成《英国文官考试制度》一书，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是年，又写成《英国政治组织》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他不愿在经济界、法学界任职或做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决心献身教育事业。1933年秋，他应聘任浙江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兼注册课主任，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同年，著大学用书《比较宪法》，由世界书局出版，列为“世界法学丛书”。他在书中除对英美等西欧各国的宪法进行分析和评价外，还抨击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制度。1935年，他反对浙大校长郭任远以卑劣手法开除胡乔木等人，支持进步学生开展的“驱郭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辗转西迁。费巩经香港转广州湾到达广西宜山，继续在浙大任教。1939年1月，他撰写《施行导师制之商榷》一文，阐述了试行导师制的目的、意义和具体办法。他还对学校的教务行政提出《奏议》，“列举五端：一为健康之应注意，二为功课宜略减轻，三为贷金应宽大，四为行政应改进，五为会议宜自由讨论，勿专寻章摘句”^③，充满了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之情。是年11月费巩随浙大再迁贵州遵义。1940年7月，浙大师生把反动的训导长姜琦赶下台，校长竺可桢邀请费巩继任，费以不加入国民党和不拿训导长薪俸为条件，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拥护。8月12日他发表《就职宣言》，声明：“吾要以德服人，不以力服人，用感化，不用压力”，“是为学生做事，不是为了私利”。他说：“训导长有人称之谓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探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意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④ 费

巩任训导长后，积极推行和改进导师制，支持学生自治会办好《生活壁报》，设法改善学生的伙食、居住和学习条件。他关心贫苦学生，竭力争取扩大贷金，并提倡工读。为解决学生夜间自习的照明问题，他亲自设计，并用节省下来的薪金，到遵义街头白铁铺定制了八百五十盏植物油灯，代替灯光暗弱而又冒浓烟的油盏（以后学生们称之为“费巩灯”以志纪念）。他待人慷慨热情，常倾囊相助，对己则克勤克俭，朴素无华。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加紧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动统治。费巩被指为“纵容共党活动，阻挠（国民党）党务工作”，被迫去职，学生们以明镜作纪念品相赠。费在浙大继续执教，1943年编撰《中国政理》，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他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但仍然不顾自身处境，嫉恶如仇，以笔当戈，于1944年2月起，先后写成《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论政权治权之分配》、《民主政治与吾国固有政制》等文，抨击国民党统治之腐败，要求废止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赞成成立联合政府。3月，他在浙大发表演讲，批评国民党的“五五宪草”，兼及时弊。以后，他又为报刊撰写了《论政治风气之转移》、《论制宪之原则》、《人民自由与国民大会》、《王之反对党——论英国之政党政治》等文章，以对英国和西欧各国政治、法律和“宪政”的阐述，剖析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假施“宪政”。他指出，民主与独裁不两立，取其一必弃其他，不容犹豫两可。“民主国家之当政者以政绩博取人信任，保持政权。盖在民主国家，政权谁属，决于人民，政府不能抑压异己，禁锢舆论，只能以政绩博舆论赞许，以竞选与敌党角逐。”^⑤

1945年1月，费巩因在浙大任教已十年，获得休假一年。他应复旦大学邀请，前往重庆北碚举办“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计划讲授“英国政府”、“现代中国政治问题”和“中国政理”三门课。他决定先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政制和工作效率作一番调查，就人事制度方面作进一步考察，连日进出重庆国民政府的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考试院、教育部。各方特务密报了费巩的行踪，国民党当局十分恼火。2月7日，费巩在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要求国民党召开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惩治贪污。这篇《进言》引起很大反响，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特务们奉命对《进言》签名者进行各种威胁、恐吓、利诱。费巩对反动派的卑鄙行为极为气愤，撰文痛斥。这更引起特务们的恼怒，视之为眼中钉。

3月5日凌晨，费巩前往北碚复旦大学，在重庆千厮门码头突然失踪。“费巩失踪事件”震动了整个重庆，浙大、复旦及社会各界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驻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非常关怀，设法营救。在1946年1月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提出八项要求中，把“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列入第七项。1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迅速释放政治犯》的社论，再次提到要求释放费巩。

费巩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先被关押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随后被关进“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特别监狱。特务们软硬兼施，用尽酷刑，费巩毫不屈服。他天天高声痛骂反动派。社会上反对迫害民主教授、反对特务横行的呼声越来越

越高。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尽快秘密杀害费巩。特务们把费巩杀害后,将他的尸体丢入杨家山附近的硝镪水池里,毁尸灭迹。为追求民主和进步而牺牲的民主教授费巩,那时还只有四十岁。

注:

- ① 费树蔚(1883—1935)生前写有大量诗词,1950年经柳亚子倡议,集三千余首,编印成《费树蔚集》四册。
- ② 费福熊:《英国文官考试制度》。上海民智书局1931年版。
- ③ 《费巩烈士日记摘抄》,1939年6月14日日记。
- ④ 费巩:《就职宣言》(1940年8月12日)。《费巩烈士纪念文集》卷四《费巩烈士论文选》,浙江大学1980年编印。
- ⑤ 费巩:《容忍敌党与开放舆论》(1939年手稿)。转引自《费巩烈士纪念文集》卷二《费巩传》。

王 亚 南

林其泉

王亚南原名际主，号渔村，笔名王真、碧辉，湖北黄冈人，生于1901年10月14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三）。父亲王凤庭是当地的破落地主，母亲早故。王亚南童年在乡里一边读书，一边种地。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他在哥哥支持下到县城学堂读书，1916年毕业后到武昌读中学，1922年考进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王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优秀。课余还到校外兼课任教，以贴补生活费用。

1927年初，王亚南大学毕业后，曾到武昌私立成城中学教了几个月的书，后由其同乡王仲友介绍，转到长沙，入北伐学生军教导团执教。是年国内政治形势剧变，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许多革命者被杀害，大革命失败了。这个现实给王亚南以很大的教育。他开始考虑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问题。1928年初，王离开长沙回到武昌，谋职未果，遇到留法回国的夏康农，同赴上海找工作，也没结果。不久，王从上海转到杭州，借住在古庙大佛寺中，想写小说谋生。适遇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郭大力也在那里，正从事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工作。二人一见如故，朝夕倾谈，商量合作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翻译，先着手翻译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于是两人同去上海，与神州国光社等出版单位订了

译书契约。这是王亚南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的开始。

1928年秋,王亚南东渡日本,得到在日本工业大学学习的同乡方达功的帮助,住在东京郊外一个僻静的小旅馆里。他一边学习日文和德文,一边同留在上海的郭大力合作翻译经济学著作。他们先后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书。他自己还单独翻译了日本学者高田素之的《地租学说史》以及《人类婚姻史》等。此外,他也写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文章。

“九一八”事变后,王亚南离开日本回到上海,以示对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抗议。在上海,他除了继续翻译和校订有关译著之外,开始从事一些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写作并出版了《经济学史》(上册)。1933年,王在上海暨南大学执教。

这前后,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容忍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造成我国严重的民族危机。王亚南对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1933年11月,李济深和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在福州成立人民革命政府。王得知消息后,兴奋异常,放下写作,从上海赶到福州,担任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文化委员兼《人民日报》社长。王利用《人民日报》这个阵地,撰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并阐述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不久,“闽变”失败,王被国民党政府通缉。1934年初王逃亡香港,香港当局令他限期出境。

同年夏,王亚南去德国。他在柏林学习德语,注意搜集西方经济学资料。其间他应上海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之约,翻译了一些西方国家经济学著作,如奈特的《欧洲经济史》等。因为

当时希特勒执政，德国政治空气恶劣，生活费用昂贵，王住不下去，1935年秋离开德国经伦敦去日本，与在明治大学学习的李文泉结为夫妇。年底，同李文泉一起回国。在上海，王先后出版了《德国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纲》等书。不久，他和郭大力应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之约，以1936和1937年两年时间从事翻译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的工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大卷出版于1867年至1894年，“五四”运动后不久已被部分介绍到中国，但十几年中只翻译了第一卷。王亚南同郭大力一起决心进行《资本论》三大卷全书的翻译工作。这期间，王除于1937年担任“上海著作者抗日协会”执行委员，参加一些抗日宣传工作外，几乎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翻译《资本论》工作方面。由于《资本论》中的一些名词概念在中文字典中查找不到，为要忠于原文又要让中国读者看懂，王亚南和郭大力根据德文原本，参考日文译本，也参考当时国内已翻译出版的第一卷部分，尽可能地加以通俗化，以方便中国读者阅读和研究。那时正值中日战争爆发前后，生活条件很差，王又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和胃溃疡病，但他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工作。郭大力则在翻译工作中承担了更多的章节。后来王常谦虚地说，在《资本论》翻译工作方面，他是郭的助手。

《资本论》中译本三大卷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这是我国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引起各方面的注目。这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王亚南于1938年初带病经香港到武汉，参加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同各党派

代表和民主爱国人士一道，参加抗日战争的民众发动工作。10月间武汉沦陷，王从湖南经广西、贵州转到重庆，住在重庆乡下。那里生活艰苦，连报纸也看不到，王又患严重的胃病，以致无法工作。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推行“反共”政策，许多抗日团体和进步书报被摧残和破坏，王亚南在上海出版的《战时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被查禁，他同郭大力合译出版的《资本论》从上海运到重庆时亦被扣留了几千部，连他的住处也受到搜查。王亚南十分愤怒，不愿再在重庆住下去。1940年9月，他应中山大学之聘，到粤北坪石镇，任经济学系主任，先后开设高等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课程，还写了《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中国经济原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总结以往这方面研究，开始形成了他的经济理论体系，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1944年日本侵略军袭击粤北，中山大学西迁。王亚南未跟学校撤退，到赣南南康县郭大力的家乡，与郭同住一村。旋因日本侵略者侵袭赣州，王从江西到福建临时省会永安，担任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在永安，他除出版《中国经济论丛》等书外，还写了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1946年集为《社会科学新论》出版）。其间，他于1945年春到迁设在闽西长汀的厦门大学经济学系讲授经济学说史。

抗战胜利后，王亚南被聘为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学系主任。从此，他专心在厦大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撰写了一些反帝、反封建、反买办官僚的论著，如《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与官僚资本》、《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

究》等，修订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他还曾应邀到台湾大学讲学一个月。在厦大，王亚南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民主进步力量的教育和影响下，不但同情和支持师生们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而且积极参加他们的活动，因而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忌恨。王经常收到特务的恐吓信，有的信里还装了子弹。但是他泰然处之，并不惧怕和动摇。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总崩溃前夕，王亚南接受中共地下组织的劝说，于1949年1月乘飞机到香港，在中共地下组织所倡办的达德学院教经济学，并为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撰写社论。不久，达德学院被香港英国当局封闭，王亚南与郭大力一道，经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从香港到达北平，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并到清华大学教政治经济学。

1950年秋，王亚南任厦门大学校长。1957年5月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春，王率中国大学代表团访问印度，并于这年下半年至翌年初，以教育专家身份到缅甸协助缅甸教育改革委员会工作。1955年到1965年，王先后修订出版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论文集》，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论当前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两种不同经济现象和市场问题》以及《资本论研究》等论著，并组织领导《中国经济问题》、《学术论坛》等学术刊物，组织编写《〈资本论〉通俗讲座》等。1961年，王亚南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会议，承担了编写经济学史方面教材的任务，会后同上海几位经济学教授编选出版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他还协同郭大力修订了《资本论》的中译本，并着手编写《政治经

济学说史》。

从1954年起,王亚南连续三届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福建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等职。王亚南于1969年11月13日因癌症在上海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王亚南:《我的出身、简历及社会关系》(手稿)。

王亚南:《论文、著作登记表》(手稿)。

厦门大学图书馆:《王亚南校长译著系年目录》。

王亚南部分著作、文章及学术报告记录。

佚名:《王亚南言行录》。

刘 仙 洲

黄延复

刘仙洲，原名鹤，又名振华，字付竹，1890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初七）生于河北完县。父刘秉钧务农，懂中医，常为乡人配方施药。刘仙洲七岁时入本村私塾，1906年入县立高小，翌年秋考进保定崇实中学。他勤奋好学，富于爱国热情。

刘仙洲受《民报》、《天讨》、《革命军》等革命书刊的影响，于1908年秘密加入同盟会。同年秋，因发动和领导学潮，被崇实中学开除。后转入同盟会员主办的保定育德中学，曾与进步同学组织“共和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刘仙洲等积极投入保定一带的革命运动，曾先后参加燕晋独立及蠡县、石家庄一带的武装暴动。他带领革命同志试制成一批炸弹，谋炸京汉铁路线上的唐河铁桥，以阻止清军南下镇压革命军，但因炸弹力量太小而未成功。

1913年2月，刘仙洲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翌年夏，考得直隶省官费，入香港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攻读，1918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刘回到天津后，应聘担任直隶工业专门学校的教员；及回到保定后，母校育德中学要求他担任机械学科教员，虽月薪只有工专的三分之一，但刘“因忠于母校，表示接受”^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组织贫苦有志的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育德中学受华法教育会的委托，成立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并附设实习工厂，组织旅法青年学习法文和机械学科。刘仙洲任教三年，讲授机械学、蒸气机、机械制图等课程。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等都曾是这个预备班第二班的学生。

1924年8月，刘仙洲到天津出任北洋大学校长。翌年，他提出扩充学校计划，决心“造就‘东方麻省理工大学’之始基”^②，先后聘请了留学归国的茅以升、石志仁、周承佑、侯德榜来校任教。当时，北洋军阀忙于混战，四年中仅发给两年的经费，学校经常发不出薪金。刘与全体爱国师生惨淡经营，学校取得相当成就。

1928年，刘仙洲辞去北洋大学校长职，去东北大学任机械系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到唐山工学院任总务长兼讲师约两个月。东北大学在北平复校后，他又回到东北大学任教。

1932年，清华大学创办机械系和工学院，刘仙洲应聘至清华大学任教。他每周担负十二小时的讲课任务，总是黎明即起，遇到比较复杂的图，就提前到教室画好。他讲课深入浅出，组织严密，条理分明，板书工整。他认为科学作风是一个工程师必备的基本素质，因而对学生作业的纸张规格、作图比例、中心线位置、诸线条的颜色和粗细等都严格要求。他精湛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受到师生的爱戴和尊敬，被称为“工程界的老前辈”、“中国机械学的老学者”、“中国机械工程界先进”^③。

刘仙洲除了一丝不苟地完成教学任务外，还不知疲倦地致力于学术论著。他编著了我国第一批自编的大学工科教科书。本世纪初，我国大学的工科校、系，多延聘外国教师，采用外文教材，中国教师讲课亦多用外语。刘仙洲认为，这种情况将“使我国工程学术永无独立之期”^④，决心加以改变。1918年，他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任教时，即坚持用汉语讲课，并编出《机械学》、《蒸汽机》、《内燃机》等中文教科书；1928—1931年在东北大学任教时，曾基本完成我国第一本大学工科教科书——《机械原理》的翻译工作。到清华后，他又编著新教材多种，被商务印书馆列为《大学丛书》的有《机械原理》（1935年出版）、《热机学》（1936年11月出版）、《经验计划》（1935年8月出版）等，为中等工业学校采用为教材者有《机械学》、《蒸汽机》、《内燃机》等。

刘仙洲对我国工程界的另一重要贡献是编订《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一书。早年，我国机械工程方面的许多概念、用语、名称多用外文，其中一些汉文译名，则是五花八门，诸如“司不令”（弹簧）、“猪拱嘴”（排障器）、“吊死鬼”（月牙板）等等；又如现今已通用之“泵”（Pump）字，当时有“恒升车”、“运水器”、“邦浦”等十几种译法。1928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曾编印过一本《机械工程名词草案》，但仅两千余词。1932年秋，刘仙洲受中国工程师学会委托，在校内外青年教师的协助下，本着从宜、从熟、从简、从俗的原则，着手编订《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共一万一千余词，初版于1934年7月印行，不数月即告售罄^⑤。1936年5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在杭州开成立大会，把“审定机械工程名词”列为重要会务之一，委托刘再编订

《机械工程名词》一书。他在校内外多人的协助下，当即以暑假前后三个月的时间完成^⑥。新版约有两万词，除对普通机械工程名词有相当之增补与订正外，对于机车及航空两类有关名词增加尤多。

刘仙洲还致力研究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有许多创见。他认为，欲求国家各种事业之独立前进，非先求各种学术之独立发展不可，依靠外国是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因为“‘国之利器’不以示人，能够买与仿造者，已为他国之二三等产品，又何以能与之并驾齐驱”^⑦？他在教学之余，致力于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1933年搜集并研究了大量文献，写出了《中国旧工程书籍述略》。1935年春，又整理发表了《中国机械工程史料》^⑧，指出：早在公元725年，我国唐朝一行等人创造的水力天文仪，已经能够利用水轮转动机械，制造精密复杂的齿轮轮系。1937年6月，刘仙洲又在《清华机工》月刊第一卷发表了《三百年前中国第一位机械工程学家王端公传略》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王征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一文^⑨。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他从未间断过对我国机械工程发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清华与北大、南开南迁，初于长沙合组“临时大学”，后于昆明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刘仙洲初任教于长沙“临大”，1938年春“临大”结束后，他一度去梧州任教于广西大学，后又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昆明，任教于“联大”工学院。当时联大师生过着十分艰苦的物质生活，但“尽筋吹，情弥切”。刘仙洲和大家一样，认真教书，严谨治学，一直坚守岗位。他除完成教学任务并开出“汽阀开关”等新课

外，仍致力于教科书的编著。《热工学》、《画法几何》（与褚世荃合编）、《汽阀开关》（与曹国惠合编）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作。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中国在热机历史上的地位》（发表于1943年《东方杂志》第三十九卷第十八号）和《三十年来的中国机械工程》（与庄前鼎合著，发表于1946年8月出版之《三十年来的中国工程》）。

刘仙洲生长在农村，少年时曾参与农事，因此他非常关心农业的技术改造，长期从事农业机械的研究工作。1920年在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时，曾试制过两种小车。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研究过改良犁、水车和排水机。1942年，他在《中国农器改进问题》一文中，反对一味抄袭外国的大型农业机械，主张结合我国农村经济情况改良畜力机械，使机械部分符合机械学原理。1946年3月，他到美国考察和研究农业机械，回国后曾在中国工程学会上作了题为《农业机械与中国》的学术报告，并写成二十多万字的《农业机械》，在清华大学机械系讲授。当时，国民党政府要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他借口眷恋“清华学术风气浓厚”，力辞不就。他眼看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私心以为在我的一生中，国家是没有改好的希望了，再写五本书就算尽了我一生的责任了”^⑩。

解放以后，刘仙洲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历任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至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机械工程学副理事长和理事长等职。1955年10月，六十五岁的刘仙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仙洲虽然担负了繁重的教学领导重任和众多的社会职务,但仍勤奋不懈地进行我国机械工程史的学术研究,严谨笃实,一丝不苟。1953年和1954年先后发表《中国在原动力方面的发明》、《中国在传动机件方面的发明》等文,论证公元二世纪后汉张衡即开始用水力作为天文仪器的原动力。1956年,他又在《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中指出:当时张衡极可能采用了齿轮系和凸轮等较复杂的机械装置。他的这篇论文同年于意大利举行的第八届世界科学史会议上宣读时,得到与会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的赞同。1961年,他向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十周年年会提出了《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的初稿,并于次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他又完成了专著《中国古代在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整地机械、播种机械、中耕除草机械、灌溉机械、收获及脱粒机械、农村交通运输机械等方面的发明创造。1970年刘仙洲提出一份《对我国工科大学教育改革的初步设想》。在八十诞辰那天,他拟定了一份《我今后的工作计划》,附有《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二编共十章的详细目录,准备尽快完稿。他勤奋不懈,直到逝世前还在医院的病床上,用放大镜一字一句地阅读文件,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修改文章。1975年10月16日,因胰腺癌不治去世。

刘仙洲一生在教育界工作五十七年,教学之余著书二十种,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共约三百多万言,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很大。

注:

- ① 刘仙洲:《自述》(未刊稿)。
- ② 同①。
- ③ 参见庄前鼎为《机械工程名词》一书所作的序言及1935年《清华周刊副刊·教授介绍》。
- ④ 刘仙洲:《中国的工程书籍述略》。《清华周刊》第三十九卷第10期,1933年5月。
- ⑤ 刘仙洲:《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自序。1936年。
- ⑥ 庄前鼎:《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序。1936年。
- ⑦ 转引自黎诣远:《我国现代机械工程学的先驱刘仙洲》。北京《文史资料选编》1980年第八辑。
- ⑧ 本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国立清华大学工程学会会刊》第四卷第一期(1935年4月)和第二期(1935年11月)上,1936年曾以单行本印行。
- ⑨ 刘仙洲写成此文后,原拟在当年8月的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年会上发表,因“七七”事变,年会未开成。1958年9月经过修订,发表在《机械工程学报》第六卷第三期上。
- ⑩ 同⑦。并见《刘仙洲小传》(1959年)(未刊稿)。

主要参考资料:

- 刘仙洲:《辛亥革命前后的片断回忆》。《新清华》1961年10月19日第三版。
- 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国立清华大学工程学会会刊》第四卷第一、二期(1935年4月,11月)。
- 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初稿。清华大学1961年10月版。
- 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63年6月版。
- 《刘仙洲部分论文汇集》。清华大学校史组集订。
- 黎诣远:《我国现代机械工程学的先驱刘仙洲》。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八辑。
- 清华大学校史资料和档案材料。

刘 文 典

张文勋

刘文典，原名文骢，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889年12月（清光绪十五年）生。父亲刘南田，经商。刘文典幼年在教会学校读书，1906年进芜湖安徽公学学习，得到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并受到他们反清革命思想的熏陶。1907年加入同盟会。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激励下，刘文典于1909年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求学，曾追随章太炎听《说文》课。当时，东京是中国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从事反清活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由于接触的师友多具有革命思想，刘文典的革命热情更趋高涨，积极参加反清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刘文典怀着满腔激情，于1912年回到上海，和于右任、邵力子等主办《民立报》，任编辑，并以刘天民的笔名撰写文章，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谋刺时，刘的手臂也中弹受伤。^①同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刘再度赴日，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在孙中山的秘书处任秘书。^②

1916年刘文典回国，他看到袁世凯死后仍然是北洋军阀统治，感到失望、彷徨，决心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经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开始了教学和著述生涯。

刘文典到北大时，正当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校内的学术思想很活跃，学术空气也很浓厚。刘深感自己的学术根底不厚，在这名流萃集、学者成群的学府中从事教学工作，不著书立说、自成一家是不能立足的。于是，他发愤从事我国古籍校勘，重点放在诸子著作，首先集中精力从《淮南子》入手。经数年勤奋钻研，终于在192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为了校勘这部书，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这部著作问世，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胡适为之作序，称赞他治学“最精严有法”；对他的“用力之久而勤与其方法之严而慎”，十分称道。^③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还写了《三余札记》。这是刘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时期。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北大带来了新鲜空气。在这社会激剧变革、新旧思想斗争十分尖锐的时期，刘文典不断地吸取新思想、新文化，曾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学术著作，如叔本华的哲学著作等。

1927年，刘文典应聘出任安徽大学校长。翌年，安徽大学发生罢课事件，蒋介石到安庆亲自召见刘，责令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严办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他不知谁是共产党。蒋大为震怒，命卫士把刘押送公安局关起来，并威胁要枪毙他。此事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安庆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④后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等力保，蒋介石才以刘“即日离皖”为条件，把他释放。^⑤关于此事，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也谈到，他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

易才交保出外。”^⑥刘文典离皖后，曾去拜访章太炎，章对他的气节甚为赞赏，特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相赠：“养生未羨嵇中散，疾恶真推弥正平”。^⑦

不久，刘文典从安徽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陆续校勘古籍，完成《庄子补正》、《说苑校补》等书。陈寅恪在为《庄子补正》作序中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这时，他在学术界已有相当声望，师友都是学者名流，可惜由于地位的变化，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治学不再那么刻苦了，妨碍他在学术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了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曾发起卧轨请愿，刘文典的在辅仁大学读书的儿子也积极参加。他对儿子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那时正是严冬季节，他的儿子因连夜在外受冻，患病死去。刘悲痛万分，同时也更激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1937年芦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刘未能及时转移到后方。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因此，他的住所曾两次遭到搜查。当时，他的处境是很危险的，但是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宁死也不能当汉奸，不能失节。”他的日语本来是很好的，但他在日本宪兵面前，绝口不讲日语，以表示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维护民族尊严。^⑧

1938年，刘文典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取道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那时，国难当头，生活艰苦，面对这严峻的现实，刘表现消沉颓废，除教书之外，就以读旧诗词消磨时日，甚至吸鸦片以图麻醉。1943年刘曾一度离开西

南联大，到磨黑中学（即普洱中学）任校长，引起学术界、教育界的非议。半年后返回昆明，被西南联大解聘。后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文典仍留在云南大学执教。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爱国民主运动席卷全国。刘置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之外，为一些官僚地主写墓志、撰寿序，并为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撰写蒋介石六十生辰贺表。全国解放前夕，胡适想把他送到美国去，已替他找好去讲学的大学，并为他一家三口办好入境签证，买好了飞机票。在这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刘文典拒绝了胡适的“好意”，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虽然他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解放事业还缺乏认识，但爱国感情终于使他留在新生的祖国。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的生活和工作起了根本变化。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精神状态也一天比一天振作起来。他在云南大学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等课程，并着手撰写《杜甫年谱》。刘加入了九三学社，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病逝于昆明。

注：

- ① 何晋：《忆刘文典》。《安徽史志通讯》1982年第三期。
- ② 同注①。并见刘文典自传稿。
- ③ 见《淮南鸿烈集解》。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 ④ 李广涛：《补遗刘文典一事》。《安徽史志通讯》1982年第三期。

- ⑤ 《皖省学潮之内幕》。《教育杂志》，1929年1月12日。
- ⑥ 鲁迅：《二心集》。
- ⑦ 此联现存刘文典次子刘平章处。
- ⑧ 刘文典的学生吴进仁提供。何晋《忆刘文典》中也有类似记载。

罗 常 培

白吉庵

罗常培，满族，姓萨克达氏，初字心田，后改莘田，又署辛田，号恬庵，1899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四）生于北京。其父恩禄为清末宣武门的“城门吏”，是一个七品小官，辛亥革命后，改编为陆军小队官。

罗常培自幼入私塾，1907年进京师公立第二等小学堂，与老舍（舒庆春）同学。辛亥革命后学校停顿，他在家补习功课，兼学蒙语。1913年春入市立第三中学，1915年秋毕业。因家境困难，学习速记六个月，借以谋生。1916年他父亲病故，迫于生计，入众议院秘书厅任速记科二等技士。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

罗常培入学后，对钱玄同教的“音韵学”、刘师培教的“中古文学”较感兴趣，课堂笔记全用速记，回家后翻译成文言保存起来。由于他在学术上崇拜刘师培，曾参加《国故杂志》社，思想倾向保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旧文学论战激烈。他读了蔡元培给林纾的信及《新青年》的文章，思想开始变化，倾向于蔡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主张，后来便以此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1920年夏天，他大学毕业，因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愿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而出国留学又没力量，因此决定在北大哲学系继续深造。当时该系是热门，教授有

胡适、梁漱溟、蒋梦麟等，还有外籍学者杜威、罗素讲学。他开始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1921年暑假，他随梁漱溟到济南讲学。梁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罗常培这次为他编录的。返京后众议院撤销，罗因此失业。为生活所迫，他辍学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

1922年黎元洪在直系军阀的拥戴下重新上台，恢复众议院，罗常培又到众议院秘书厅当速记，并在京师公立第一中学兼课。后来该校校长出国，他被委派为代理校长。他上任后很想干一番事业，遂改革旧制，公开财务，延聘优秀教师，并将自己的薪水捐购图书。这样做了一年代校长，很受学生欢迎，次年原校长回国，罗被辞退。这时，适有陕西西北大学来京聘教师，罗便离京到西安，任该校国文专修科主任兼教授，讲授“文字音韵学”。当时的西安，因军阀混战，交通梗阻，不仅外地报刊进不去，就连书信也难传送到。罗精神上感到苦闷，1924年夏又返回北京，在临时执政府做速记工作。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罗看到无辜的爱国青年被杀害，十分愤慨，想离开北京。恰逢厦门大学在京聘请教授，他便随鲁迅、沈兼士等，于是年秋到厦大，在中文系教“中国音韵学沿革”。在这里他开始阅读外国语言学方面的书籍，并试着用西方的音韵学原理来分析中国的语言问题，重新编写讲义，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课余又对厦门的方言进行调查，后来写成《厦门音系》公开出版，对语言学界研究汉语方言起了促进作用。不到一年，因为校内派系斗争激烈，罗无法继续呆下去，转往浙江民政厅工作。时傅斯年刚由海外回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因过去与罗同学，于1927年秋聘罗到广

州，任中大文学系教授。是年冬，赵元任到广州调查两广方言，罗利用这个机会，和他讨论了一个多星期，收获颇大。

1929年，傅斯年在广州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请罗常培兼任秘书。不久该所迁往南京，罗便辞去中大的工作，专任该所研究员，直至1934年。这期间，他先后写了《唐五代西北方音》、《厦门音系》、《国音字母演进史》、《十韵汇编》四部专著，及《中原音韵声类考》、《知彻澄娘音值考》、《中国方音研究小史》等十四篇论文。此外，他又与赵元任一起调查了徽州地方的方言，编写了汉魏六朝韵谱和经典释文的长编。这些成果为我国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34年秋，罗常培被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请到北大主持文科研究所语言乐律实验室的工作，1936年起兼任中文系主任。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得知罗是满族人，又有一定学术地位，想在教育界培植他作傀儡，特请他去演说、赴宴。罗坚持一切活动须经校方允许，绝不作个人的交往，加以拒绝。是年7月底北平沦陷，北大南迁长沙，他于11月17日离开北平，从海道经香港到长沙。1938年2月26日又随校辗转到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这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已迁到昆明。由于他的建议，该所与北大语音乐律研究所组织人力，从1939年起用五年多的时间，对云南全省方言进行调查。共调查九十八个县和一百二十三个单位，写出报告、论文四十余篇，为后来研究汉藏系语言的工作奠定了基石。罗常培曾先后三次到滇西大理，调查少数民族语言，后来写成《莲山摆彝语文初探》一书。

抗日战争后期,昆明的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罗常培深受教育,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1944年国民党当局要解聘一些进步教授,罗写信给重庆《新华日报》表示抗议。

同年,罗常培应美国朴茂纳(Pomona)大学之聘,以访问教授的名义出国讲学,在该校任教一年半。1946年夏又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并到耶鲁大学任访问教授。次年夏,到密西根大学的语言研究所讲学。

1948年罗常培回国,仍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并兼文科研究所所长。这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比他出国之前更甚。他感到苦闷,于是埋头于学术,整理他过去散失在各地的书籍和稿件,写出了《语言和文化》、《中国人与中国文》,并重订《经典释文中的徐邈音》等书。平津战役打响后,国民党政府要用飞机接一批教授南下,其中有罗常培,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解放后,罗常培历任第一、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等职,并完成了《普通语言学纲要》、《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等著作。1958年12月13日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罗常培自传(未刊稿)。

傅懋勳:《深切怀念罗常培先生》。《中国语文》1979年第一期。

罗常培:《中国音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49年版。

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罗常培:《中国人与中国文》。开明书店1947年版。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

蒋维乔

陈秉仁

蒋维乔，字竹庄，别号因是子，1873年1月30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二）出生于江苏武进县城的一个贫苦家庭。父蒋树德，“年十三弃书习工”^①，一人作工赡养全家九口，生活艰难拮据。

蒋维乔七岁入私塾就读，十六岁因病辍学，在家自学，并教两个弟弟读书，二十岁中秀才。二十一岁时，他在自学中，偶然接触到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方科学书籍，使他“眼界一新”。于是对天文、算学、舆地、物理、化学等书籍“没头没脑乱看一阵，有看得懂的，也有不甚懂的”^②。这时，他不但抛弃了八股文，而且连以往比较喜爱的词章也不大注意了。此后，他曾两次赴南京参加乡试，均未中举。

1895年6月，蒋维乔在岁试中名列第三，入南菁书院肄业。次年春，他又考入刚创办的常州致用精舍。南菁书院设在江阴，是当时江苏的最高学府，专门研究经史、词章等。致用精舍则是甲午战争后，由原常州龙城书院经过改良后的一所书院，学科分经古、致用二门，其中致用包括算学、舆地、时务、策论等课程。蒋维乔在二十三岁至二十九岁的六年中，同时攻读两院课程，按月参加考试，为他的古文及“新学”打下了较深的基础。

1901年，南菁书院改为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开设理化、测绘、英文、日文、体操五门课。新聘的理化教习钟观光于授课之余，在学生中积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蒋维乔“心醉其说”，“思想乃为之剧变”^③。时值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进行革命活动，蒋经钟介绍，参加了中国教育会。1902年9月，因总教习丁立钧生病回乡，南菁高等学堂于无形中停顿。蒋遂随钟到上海，结识了蔡元培，并参加了中国教育会在张园举行的演说活动。不久，他返回家乡武进，与何海樵等人组织了“以变法与兴学为宗旨”的常州藏书阅报所，每周演说，“以期开通风气”^④。此年冬，蒋维乔等人又组织了体育传习所，“提倡尚武精神”，并由他任队长，于第二年春节初一开操，训练后上街游行，“以动社会观感”。这是常州前所未有的举动，致使“人人惊异”，遭守旧者“大肆讥评”^⑤。

1903年2月，蒋维乔应蔡元培之聘，到沪担任“爱国学社”义务教员，与章炳麟分别讲授国文。不久，又转任“爱国女学”义务教员。他于授课之余，为中国教育会的宣传阵地——《苏报》翻译日本新闻，“月得译资十六元，供生活之费”^⑥。在中国教育会当年春季大会上，蒋维乔被选为监察。同年5月，爱国学社积极配合中国留日学生的行动，组织拒俄义勇队（旋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进行军事训练，蒋任分队教练。6月，“苏报案”发生，爱国学社被解散。蔡元培避往青岛前，将爱国女学委托给蒋维乔。8月，蒋与钟观光召集在沪的中国教育会会员十余人开会，决定继续开办爱国女学，由钟任经理，蒋任事务，从而为中国教育会保存了唯一的秘密联络站。次年7月，他们又将爱国女学交回蔡元培办理，蒋仍任该校义务教员。1909

年10月蒋接任该校校长。

“苏报案”发生后，蒋维乔抱着“救国之本还在教育”^⑦，应从编辑教科书着手的宗旨，在恢复爱国女学的同时，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事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前后长达十年之久。蒋维乔与张元济、高凤谦、庄俞三人，以日本人长尾慎太郎、小谷重为顾问，“团坐一桌，互相讨论”，“每成一课，必至无可指摘，始为定稿”^⑧。半年后编成《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销路大畅；接着继续编成十册，风行全国。自此，我国自编“教科书之形式方备”^⑨。嗣后，蒋还编辑出版了《简明初小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多种。

蒋维乔在编辑教科书的同时，始终亲自任教，“以增加经验，扩展思想”，并将“所有心得发挥于教科书”^⑩。当时全国缺乏小学教员，蒋维乔于1905年6月发起并主持开办了商务印书馆的小学师范讲习所，先后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三届师范学生。其后，他还主持了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他于1910年编著的《学校管理法》一书，被清政府学部誉为“颇多经验有得之作”^⑪。

辛亥革命后，蒋维乔经蔡元培介绍，于1912年1月初加入了由章炳麟发起并任会长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此时，孙中山正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任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蒋应蔡之邀同去南京，任教育部秘书长。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自1月14日成立，至3月7日解散，前后不满三个月，蒋协助蔡制定教育部法令，草拟大中小学学制，“上至一切公事，下至琐屑庶务，无一不问”，“日夜操劳，以致二目红肿”^⑫。蒋起草的《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于1月19日

颁行,明文规定“学堂改称学校”、“初小男女同学”、“小学废止读经科”等^⑬。

“南北和议”达成协议后,临时政府迁设北京,蔡元培仍任教育总长,蒋维乔随蔡于5月初北上,任教育部参事,逐日审议学校法令及学校规程。7月初,他提议教育部召集全国教育界著名人士举行临时教育会议,议决要案二十三件,使在南京教育部时草拟的大中小学学制系统等方案,得以陆续公布施行。

1913年10月,熊希龄内阁组成,汪大燮任教育总长,蒋维乔与之意见不合,遂辞职南归,仍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辑)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⑭。这时,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连续发布鼓吹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同年底,蒋维乔以“无始”的笔名,在《教育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教育大政方针私议》、《硬教育与软教育》两篇论文,抨击新内阁教育部篡改民国元年颁行的教育宗旨,指出所谓“尊崇孔学为道德教育之本”的说法,“不过饰一孔学之假面具,以上下相蒙耳!”^⑮同时他还揭露了当时社会上有人以“硬教育”为幌子,企图恢复小学读经。他大声疾呼:“‘硬教育’欲施诸小学则万不能行!”^⑯

1914年8月,蒋维乔根据他长期坚持练气功、治疾病的体会,撰成《因是子静坐法》一书。该书出版后,畅销各地,到1927年6月重版竟达二十一次之多。1917年1月,蒋维乔与黄炎培等五人组成教育考察团,前往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月。回国后,在京、津、沪、宁四地演说考察结果,并由蒋总其成,汇编为《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纪实》一书出版。9月,蒋北上任教育部参事,“掌管教育法令工作”^⑰。自此时起,蒋维

乔沉溺于佛学研究之中。他不但阅读佛经,请居士讲佛学,而且“依照佛法,实行修持”,以至“觉得世间一切学问,均不及佛学高深”^⑧。1918年3月,蒋还建议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在哲学系开设“唯识”课,为我国大学有佛学课之始。1921年10月教育部任命蒋维乔为江西教育厅厅长,蒋不就,辞职而归。旋又北上任教育部编审员。

1922年7月,在“苏人治苏”的风潮下,由黄炎培等人推举,蒋维乔出任江苏教育厅厅长。他在任三年,排除了各派系议员的种种纠缠,先后视察了全省几十所学校,对江苏省教育作了一些整顿。1925年初,“齐卢战争”重启。段祺瑞政府以附齐嫌疑的罪名,将南京所有官吏一概免职,蒋维乔也于2月被解职。他在离任前夕,与黄炎培、江苏财政厅长曾孟朴将江苏省的屠宰税和卷烟税从财政厅中拨出,组织了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使江苏教育经费收支独立。

与蒋维乔被解职的同时,南京东南大学发生了“易长”风潮。该校原任校长郭秉文被解职后去欧洲,全校师生罢课、游行,群起反对新校长胡敦复,风潮半年不息。7月,蒋维乔就任东南大学校长。在军阀混战、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他按照“行政决于教务会议,教学决于教授会议,财政公开”^⑨三条原则,奔波于宁、沪二地^⑩,将东南大学维持了二年。其间曾于1926年4月偕南京校长参观团赴日本考察教育一月。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后,蒋维乔离开东南大学,到上海定居。自此“息影沪上,不问外事”^⑪,每年春秋二季外出游山,后将历年所写的游记整理成《因是子游记》一书出版。

1929年9月,蒋维乔应上海光华大学之聘,任哲学系教

授。其后历任该校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等职达二十年之久。他的许多学术专著多完成于此时，计有《中国佛教史》、《佛教浅测》、《佛学概论》、《佛学纲要》、《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等，并与杨大膺合编《中国哲学史纲要》、《宋明理学纲要》。

自1938年8月起，蒋维乔又兼任上海正风文学院（1940年改名诚明文学院）院长；1941年7月起，他受黄炎培委托，兼任上海鸿英图书馆副馆长、馆长、名誉馆长等职；1946年9月兼任上海人文月刊社社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七十六岁的蒋维乔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苏南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主席及常任副主席。嗣后，他曾两次赴香港疗养，1958年3月16日病逝于上海。

注：

- ① 蒋维乔：《先考少颖府君事状》（稿本）。
- ② 蒋维乔：《我的生平》。《宇宙风·乙刊》第23—25期。
- ③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手稿本）。
- ④ 蒋维乔：《鹤居日记》（手稿本）。
- ⑤ 同④。
- ⑥ 同③。
- ⑦ 同③。
- ⑧ 《庄百俞先生谥议》（1943年石印本）。
- ⑨ 陆费伯鸿：《论中国教科书史书》。
- ⑩ 同③。
- ⑪ 《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店1934年版。
- ⑫ 同③。
- ⑬ 《临时政府公报》第4期。

- ⑭ 同③。
- ⑮ 《教育杂志》第5卷8期。
- ⑯ 《教育杂志》第5卷9期。
- ⑰ 同③。
- ⑱ 同②。
- ⑲ 同③。
- ⑳ 当时东南大学商科学院设于上海。
- ㉑ 同③。

俞 庆 棠

郭 烙

俞庆棠，字凤岐，江苏太仓人，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出生于上海。父亲俞棣云，系邮局职员。她三岁丧母，十岁丧父，由大哥俞凤宾（上海名医）抚养成人。她的仲兄是名记者俞颂华。

俞庆棠1914年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校，1916年入中西女塾，其后又入圣玛利亚女校学习。她自幼活泼、勇敢，娴于辞令，曾获上海学生演说竞赛第三名。“五四”运动时，她代表圣玛利亚女校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工作，并代表上海学联出席过全国学联会议。通过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她认识到对群众进行教育的重要，决心从民众教育入手，振兴中国。从此她始终不渝地献身于民众教育事业。

1919年秋，俞庆棠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台来佛亚(Delaware)女子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当选为中国留学生会主席。1922年，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回国后，与唐庆诒（留美学生，在上海交通部南洋大学任教）结婚，历任无锡中学教师、大夏大学教授。1927年夏起，她担任江苏大学区（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区）扩充教育处处长、江苏省教育厅社会教育科科长等职，负责规划江苏省的社会教育事业。

俞庆棠在美国留学时，一度是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学生。她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口号颠倒过来，变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认为整个社会都是教育环境，整个人生都可以受教育。她把这种教育思想和她的教育救国论的思想结合起来，把民众教育当作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手段，提出一系列改进民众教育的理论和措施。她说：“中国民众教育的运动，是改进现行教育、完成教育理论、经营合理的共同生活的一种教育运动；是根据中国实际社会需要，经过了屡次严重国难的刺激而激发的民族复兴运动。”^① 她认为：“民众教育的最高理想，是全民众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知能道德的前进和向上。”^② 因此，“凡改变群众行为，授予知识技能理想而改进其个人团体生活的工作（如合作社，乡村改进会，保甲会议，农业推广等），都是它有效的方式。”^③ 她还主张，教材与课程设置，应从民众实际生活需要出发，并注意培养民族意识。

俞庆棠为了实践她的教育思想，在江苏省创办和充实民众学校、民教馆、农教馆、图书馆等。1928年创办了以培养民众教育师资为目的的江苏大学民众教育学校（后改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自兼校长。不久，她辞去校长职务，担任该院教授及研究实验部主任。此后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她在该院专心致志地培养民众教育的师资，进行民众教育的实验和推广工作。民众教育首先在江苏全省得到比较普遍的发展，应归功于她的努力倡导，所以她被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抗战前，江苏省经她创办或指导创办的民众教育机关有一百多处，仅在无锡就设有四个民众教育实验区、三十九所民校。她

经常徒步深入农村，指导民校工作。她指导将识字教育与生产教育结合起来，由民校教师向农民推广优良稻麦品种，防治病虫害，传授养蚕技术及改良鸡、猪等家畜品种。她指导民校及民教馆组织民众成立信用、生产及运输合作社，颇受民众欢迎。1931年，她联合全国从事社会教育的人员，成立中国社会教育社，作为研究促进社教事业的机构。她当选为该社的总干事。该社曾创办河南洛阳及广东花县两个民教实验区，其后又在桂林、重庆等地推广社教事业。

1933年俞庆棠赴欧洲，考察丹麦、荷兰、英、德、法、奥、意等国的成人教育与合作事业。她最赞赏丹麦的民众教育。丹麦由民众学校教育农民，当时已经没有文盲了。

1935年，民族危机深重，她积极参加文化界救国会的活动，开始对国民党的统治感到失望和不满。当江苏教育学院当局迫害和开除进步学生（有的是共产党员）时，她常为受迫害的学生辩护，保全了不少学生的学籍。这年冬，她主编《申报》的《农村生活丛谈》专栏，报道各地农民生活的困苦，吏治的腐败，赋税地租的繁重等。该栏文章后来汇编成书出版，她在序言中写道：“编者自己从事农村工作，已有十年的历史，对于农民的疾苦体验得很深，对于农村问题也逐渐有所认识。这是十年前在大学里教书时所意想不到的。”她看到农村“种田的没有地，有地的不种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城市中，民族工业受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摧残、压迫，得不到发展，工人失业问题严重，越来越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失望和不满。但她幻想“以教育的力量来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把一切障碍破除”^④。她对勤劳而聪明的工农子弟不能享受教育权，而富

家的纨绔子弟却有享受高等教育的特权，感到愤愤不平，屡次为工农民众的教育权而大声疾呼。

“一二九”运动中，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火车在无锡被阻。俞庆棠率领无锡学生携带食品热情慰问，并在《大众生活》杂志上发表《写给上海学生请愿团的一封公开的信》，热情洋溢地赞扬学生的爱国精神，谴责宪兵强押学生回沪的反动行径，鼓励学生要“永远站在大众利益的立场上，来从事救国的伟业”^⑤。1936年，她发表《现阶段中国所需的教育》^⑥一文，提出当前所需的教育是国难教育、生产教育和妇女教育。关于国难教育，她说：应“使民众了解个人的生活与民族存亡的密切关系，使民众相信自身力量的伟大，从而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抵御外侮，保护中国主权领土的完整”。关于生产教育，她认为“要将现社会的生产组织所加于受教育者的桎梏解除”，才能使人民受到正常的生产教育，从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她说妇女教育“是培植为民族谋生存而奋斗的新战士的教育，为社会增生产而努力的生力军的教育”。她号召民众教育工作者，做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大众宣传者和组织者”。

抗战爆发后，俞庆棠只身奔赴汉口，参加难童保育及妇女救济工作。1938年3月，她参加庐山妇女谈话会，作了开展后方妇女生产工作的发言。后来她撤退到重庆，担任妇女新生活指导委员会的生产部长，在永川县的松溉创设了一个纺织实验区，以妇女生产学校为中心，招收抗日军人家属及妇女入学（前后达数千人），学习文化与纺织技术，生产军服布、军毯、纱布、药棉等支援前线。她又在乐山设立蚕丝实验区，结合改良蚕种、改进缫丝方法，对农民进行识字教育。在农村工

作中,她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有人想拉她加入国民党,她严加拒绝。1939年3月,她返沪探亲,为照料患病的女儿,留在上海,先后在东吴、沪江、震旦等大学担任教授,讲授“社会学”、“民众教育”等课程。其后又兼任申新纺织厂第二、第五两厂的福利科长,创办工人学校、合作社、医院等福利事业。

抗战胜利后,俞庆棠担任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她领导创办了一百多所市立民众学校,恢复了市立图书馆、民教馆、体育场、博物馆等社教机构,还重点创办了一所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自任校长,作为她的实验园地。该校招收工人、妇女及失学儿童入学,共有学生二千七百多人,所有教室每天从早到晚由四班不同程度的学生轮流上课。还附设有托儿所、缝纫班、电工合作社、诊疗所等福利设施。该校的教职员和学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利用推广民教的方便,办墙报、编歌曲,办巡回文库(即小图书馆)、展览会、演讲会,进行革命宣传。实验民校的民主进步气氛,引起反动当局的嫉恨,他们不断对俞庆棠施加压力。她于1946年愤而辞去教育局职务。1947年,上海市参议会提出要停办实验民校,她说:“谁来停办民校,我和他们拼命!”^⑦她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领导全校师生员工展开了护校运动,使实验民校得以保存。其后,反动当局又迫她辞去实验民校校长职,她说:“我决不辞职,除非撤我的职!”^⑧

从1947年起,俞庆棠担任联合国科学教育及文化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1948年,她又担任联合国远东基本教育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她应邀赴美国考察

战时的难童教育。

1949年5月,她离美返国,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她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1949年12月4日,俞庆棠患脑溢血症在北京病逝。

俞庆棠的著作有《民众教育》。她主编有《农村生活丛谈》、《中国社会问题参考资料索引》、《民众教育概论重要参考书索引》等。她还与孟宪承合译了杜威的《思维与教学》。

注:

- ① 俞庆棠:《民众教育》。1935年版第1页。
- ② 同①,第3页。
- ③ 同②。
- ④ 俞庆棠:《民众教育者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应有的新认识》。《申报周刊》第一卷第二期,1936年1月。
- ⑤ 《大众生活》第一卷第九期。
- ⑥ 《申报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三期,1936年11月1日。
- ⑦ 唐孝纯:《纪念母亲》。《俞庆棠先生纪念集》第141页。
- ⑧ 胡耐秋:《女教育家俞庆棠先生生平》。《俞庆棠先生纪念集》第35页。

孙 本 文

马先阵

孙本文，原名彬甫，别名时哲，江苏吴江县人，1892年1月23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祖父是个秀才，做过乡村塾师。父亲是个贡生，任本乡小学校长，兼事蚕桑。孙本文四岁入家塾，凡十年，1905年始受学校教育，先在吴江县明体学堂就读，继转江震小学堂学习。1909年，孙考入江苏两级师范学堂初级师范科，1915年春毕业，因家庭经济困窘，即去吴江县立小学任教。同年8月，孙考取北京大学哲学门，学习勤奋，成绩优秀。毕业后，在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任国文和哲学教员。

1920年秋，孙本文考取江苏留美公费生，次年4月赴美。先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研究院学习，获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学习社会学二年；1925年在纽约大学研究院得彭德尔(Binder)教授指导，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进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又专门进修社会学理论，1926年回国。孙在美国学习达五年之久，美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对他尔后三十多年的政治、学术思想有着很深的影响。

1926年2月，孙到上海，先在大夏大学任教，不久进复旦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南

京建立国民党政府,孙视此为北伐的成功,幻想通过支持南京政府的一切措施,以谋中国社会之进步。他努力介绍欧美社会学,同时搜集我国社会之材料,致力于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于1927年出版。次年,又出版《社会问题》、《社会学ABC》和《人口论ABC》三书^①。1929年,他到南京任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所著《社会学的领域》、《社会学的文化基础》、《文化与社会》、《社会变迁》四书也于这年出版。

孙本文在教学之余,积极倡导并组织开展社会学方面的学术交流活动。他与游嘉德、吴景超、潘光旦、吴泽霖等于1928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东南社会学会”,作为沪宁各大学教授共同研究社会学的学术团体。1931年在北方各大学教授陈达、陶孟和、许仕廉等建议下,“东南社会学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学社”,作为全国社会学者的团体,孙当选为理事,后被推为理事长。学社的宗旨是研究社会学学理、社会问题及社会行政,主要活动是开年会和办期刊:每二年一次年会,宣读论文,交流心得经验,到1948年共开了九次;期刊名《社会学刊》,孙任主编,经费与印刷均由世界书局承担,自1929年创刊至1936年共出了十五期。1943年,中国社会学社第七届年会在重庆举行,社员们为恢复《社会学刊》,派代表与国民政府社会部接洽,决定社会学社与社会部合作,于1944年创刊《社会建设》月刊,登载社会学、社会行政、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查等类的论文,孙仍任总编辑。此外,他于1933年为《时事月报》社会栏编写有关人口、劳工和灾情救济等类社会资料;于1936年至1937年代编《中央日报》副刊“社会调查与研究”

栏,发表农村调查等方面的材料。

1930年5月,孙本文经北大同学冯友兰和杨振声介绍,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高等教育司司长,部长是他在北大的老师蒋梦麟。不久,蒋梦麟辞职,蒋介石自兼部长,实权掌握在常务次长陈布雷手中。1931年6月孙经陈布雷、陈立夫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此时孙仍兼中央大学教职,并在中央政治学校兼课。他主编的《社会学大纲》上下两册于1931年出版。

1932年初,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孙本文随即辞去司长职,回中央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8月,任中央大学教务长;两年后他又教授社会学并主持系务。1941年,顾孟余任中大校长,孙任中大师范学院院长,兼理附中校务。1944年,蒋介石自兼中大校长,孙辞师范学院院长职,复任社会学系主任。从1935年到1945年间,他相继撰写出版了专著多种,有《社会学原理》(上、下册)、《中国社会问题》、《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四册)、《社会思想》。其中《社会学原理》被当时各大学采用作课本。

抗战胜利后,孙本文在中央大学执教的同时,继续进行社会学的著述和社会调查工作。出版的主要著述有《社会心理学》(上下册)、《近代社会学发展史》、《当代中国社会学》和《现代社会科学趋势》。他还与人合作,根据社会调查资料写成小册子数种,如与陈依兴合著的《湖南长沙崇礼堡农村调查》,与赵二喜合著的《南京的工厂劳工》,与凌楚璇合著的《南京市五十二教员家庭生活费用的分析》,以及《南京市人口的分析》等。

孙本文在社会学界一直居于首位。他的学术思想属于社会学中的文化学派,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偏重于文化分析,并以此代替阶级分析,以改良代替革命。他在《社会学原理》中说:“人类满足需要,解除侵迫,以调适环境而求生存者,其枢纽惟在文化。是故欲求人生之充实,与社会之进行者,惟在发展文化。要而言之,人类共同生活之中心问题,为生存之调适,而共同生活之中心要素,为文化社会学。”他所讲的社会改进,一是要保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另是要吸收欧美优良文化。所以他主张革新社会机构,调整环境状况,提高文化水平。他虽钦佩马克思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精神,但说马克思只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并错误地认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实际,更不足以解决社会问题^②;中国只有像蒋介石那样具有“伟人特质”的人作为“最高领袖”,在他的政府统制之下,方能获得进步。因此孙在论著中,竭力拥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及其政策法规,提倡劳资协作,主张劳工运动应由政府集中指导,推崇保甲制度是农村自治自卫最发达可靠的基本组织,宣扬“新生活运动”是现时调整我国新道德标准的基本社会运动,社会教育应经常不忘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放弃个人党派私见,等等。这些言论,都适应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需要。

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标榜以中间路线自居,力求超脱政治,专心学术工作,但他的社会学研究是直接为国民党统治服务的,每当革命与反革命决斗时刻,他更是明显地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如1933年前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围剿”苏区时,他为《时事月报》编写《一月来之匪患与灾情》中,赞扬

蒋介石的“包围封锁，步步推进”的反革命策略，说对苏区红军“若能严加封锁，使其给养断绝，则可不剿自毙”^③。因此，国民党政府一直很重视他。从1941年起，他一直被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的泰斗”、“文坛的权威”，多次作为名流被请到国民党中央机关所属军政人员训练班作讲演。他在教学生活以外，常常被邀兼任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工作，曾任国立编译馆社会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社会部社会行政计划委员、考试院典试委员等。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使孙本文逐步醒悟到自己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推进中国社会进步是不可能的。后期，他竭力推辞政治活动，倾力于社会学的教学和著述。1949年春，南京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中央大学校长周鸿经逃往上海，学校陷于无政府状态，孙本文被选为校务维持委员会三名常务委员之一，维持校务。4月南京解放，8月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孙代表维持委员会办理校务移交，事毕，被聘为专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大学的社会学系撤销，孙调地理系任统计学教授，开讲“统计学与统计图表”和“国民经济计划”课。1957年，北方一些学者提出恢复社会学，他表示反对，并作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专题发言。1962年孙调政治系（后改哲学系）任教，着重进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介绍与批判，并进行国民经济计划与统计学的研究。自1952年起，孙历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南京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江海学刊》编委，并被推选为江苏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委员。

1979年2月19日，孙本文病逝于南京。

注：

- ① 这是世界书局在1928年编印的“ABC丛书”的一种。这部丛书共有七十种。
- ② 孙本文：《社会思想》。第170—176页、202页。
- ③ 孙本文：《五省严密封锁匪区》。《时事月报》1933年9月号第103页。

杜 定 友

张 洁

杜定友,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出生于上海,原籍广东南海县。祖父是个鞋匠,父亲青年时在上海一家照相馆当学徒,后来开了一家夫妻照相馆。杜定友1907年在上海免费进了敬业小学,后来转入广东同乡会办的广肇公学。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又热心公益,深得学校和同学的好评。

辛亥革命前一二年,杜定友在学校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开始萌发反对清王朝的思想。他十三岁时,不顾祖母和父亲的劝阻,剪去辫子。不久,他随父母离沪赴汉口谋生,进了益智学校。由于成绩优秀,获得免费。他在学校接触到不少革命青年,反清思想进一步增长。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随着一群大学生到李鸿章家的花园,向李的铜像掷石子,并用绳子套在铜像的脖子上拉,想把铜像拉倒。

1912年杜定友小学毕业后,考进了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1918年毕业,因成绩优异,被学校选派到菲律宾大学攻读图书馆学。

杜定友留学期间,担任中国留菲学生会会长,曾出面要求菲律宾当局免除中国留学生的学费。那时学生宿舍都是教会办的,每天早上要祈祷念经。杜不信教,对这种宗教仪式深为不满。有一次,因为三天没有祈祷,被教士赶出宿舍,只好搬

到一家小旅馆去住。为了付房租,他每天省下一餐饭,饿着肚子去上课。这样过了三个月,才在中国领事馆找到一份文书工作,半工半读。

1921年杜定友在菲律宾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士、教育学士和图书馆学士三个学位。当时菲律宾有的部门出高薪聘请他工作,但他立志要为祖国的图书馆事业服务,一一谢绝,毅然回国。9月到广州,初为市民大学教授,继任广州市立师范校长。1922年任广东图书馆馆长兼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曾创办图书馆管理人员养成所,造就了我国第一批图书馆管理人材。他有志于在图书馆事业上进行一些改革,提出新的图书分类法,主张图书馆公开开放等。但他的这些主张得不到支持,还有人认为是糟蹋图书。他提议把孔庙改为图书馆,有人竟扬言要杀他。当时的广东教育厅长刘学洵向省长呈文控告他,要求撤免他的馆长职务。

1923年春,杜定友辞职赴沪,任复旦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曾发起成立全国图书馆学研究会。同年因该校校长李登辉被孙传芳手下的人逼走,他看不起派来的新校长,辞职而去。不久任上海图书馆协会委员长,曾创“图书馆”三字的简字“圖”。1925年7月,应南京东南大学之聘,在全国第一次图书馆学暑期讲习班讲课,协助培养了三百余名图书馆管理人员。9月回上海,与友人创办国民大学,建立图书馆学系,为国内大学有图书馆学系之始。是年底离去。此后至1936年,他两度到母校交通大学工作。他厌恶官场应酬,常与青年学生和爱国进步人士交往,交大校长因此对他不满,曾声色俱厉地说他包庇共产党。

1936年,杜定友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图书馆馆长。他下决心要把这个图书馆建成为南方图书馆的典范。抗日战争开始后,广州空袭频繁,他常冒险觅地藏书。1938年夏秋之间,菲律宾大学聘他赴菲讲学。当时广州正在疏散,但他没有从个人利益和安全出发,毅然拒绝了邀请。他说:“眼见国家多难,如我只身逃避海外,苟存性命于乱世,而同胞在国内吃苦,于心何忍?我爱中大,我爱中国!”同年10月11日,日军在广东大鵬湾登陆,广州危急。学校决定迁往罗定县。图书馆职工在杜的带动下转移图书,迟迟未能启程,因为交通工具没有着落。结果他自行设法雇拖船五只,将妻子的积蓄五百元付了船费,让抢救图书的职工安全撤退。以后学校又数次迁移。杜为了图书的迁运,备尝艰辛。这时,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方针,深恶痛绝,写有《谁在残戕青年?》、《人类应快觉醒》、《低能政治的由来》等文,呼吁改革政治,曾受到政府有关方面的警告。

抗日战争胜利后,杜定友回到广州。为了收回中山大学寄存在各处的图书,他四处奔走。1948年他任广东省图书馆馆长,当时广州一片混乱,无法开展工作。他认识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图书事业的发展没有希望。1949年10月,国民党政府命令他运送珍贵图书前往台湾,他推辞不去。他在香港的亲属也来信要他赴港,他断然表示:“我决不走。”他见各机关团体纷纷疏散逃走,书物狼藉,便通知各单位将图书送省图书馆。一时,各单位送来几百箱图书。他又带领全馆员工到各单位打扫,捡拾到图书数万册。临近解放前夕,他与职工轮流值班守护图书。广州解放后,他喜形于色,欢呼:“我新

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杜定友任广东省人民图书馆馆长，兼广东中山图书馆馆长、广东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广东省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1957年曾参加“中国图书馆工作者代表团”出国访问。

1967年3月13日，杜定友因病在广州逝世。杜的主要著作有《图书分类法问题》和《图书馆建筑设计》。他对汉字有一定的研究，发表过《字根研究》、《中国新形声字母商榷》，赞同文字改革。

主要参考资料：

《杜定友回忆录》（未刊稿）和访问资料。引文均出自回忆录。

傅抱石

倪波 沈道初

傅抱石，字瑞麟，1904年10月5日（清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六日）生于江西南昌，原籍江西新喻。父亲以补伞为生，家境贫苦。七岁时他父亲去世，母亲靠帮人洗衣、补伞，过着清贫的生活。傅抱石少时天资聪敏，在南昌公立模范小学读书时，成绩优异。1919年小学毕业，被保送进了江西第一师范学校。

傅抱石从童年时代起就爱好雕刻、书画。他家附近的街上有雕刻店、裱画店、小书店，他常去观看，增添了对绘画、雕刻的浓厚兴趣，开阔了眼界。小书店的主人看到他刻苦、勤奋，便借书给他看。傅在第一师范上学时，为了求得篆刻上的技艺指导，课余常去刻字店观摩学习。因为生活贫苦，他在上学期间即以刻图章谋生。他刻的数量多，功夫坚实，当时在社会上已有一点声誉。他于1923年在江西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时，已刻成几本《印存》。学校因他篆刻和绘画成绩优秀，留他当美术教师。

此后，傅抱石致力于国画传统技法的学习和探究，对石涛、石谿及宋、元、明、清名家画本反复临摹。但他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分析，有所选择，有所追求。他的艺术才能，很快提高。1932年徐悲鸿到南昌游览时，看到了傅的习作，非常

赞赏，认为他很有艺术才能。从此，他得到了徐的热情鼓励和指导。傅的最早作品创作于1933年，就是钤有“新喻傅瑞麟”印的四幅条屏：《竹下骑驴》、《松崖对饮》、《秋林水阁》、《策杖携琴》。这个阶段是傅广泛学习祖国艺术传统的时期。

在江西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傅抱石在一枚手指头大小的图章上面，刻了一千多字。当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得知此事后，很器重他，1933年以公费送他去日本留学。他进入日本帝国美术学校，刻苦努力，成绩卓著，画法和风格受到日本画家竹内栖凤等人的影响，开始追求画面的气氛，泼墨和烘染的手法也多起来，在他前期钩、划、皴、点为主的画法中融合了新机。他在东京举行过金石书画创作展览，并在创作之余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

1935年傅抱石学成回国，经徐悲鸿推荐，进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随校入川，住重庆郊区歌乐山金刚坡，与郭沫若为邻。由于境变情迁，勤于创作，并受到郭沫若诗词和书法的影响，此时他的山水画艺大进。他于中央大学艺术系授课之余，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举行画展，为国内外人士所推崇。

1937年至1946年这十年，是傅抱石的山水画进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他的风格逐步形成的时期。傅学习石涛技法，力求写生与意境、情与景的结合，追求洒脱苍茫的境界。他十分尊崇石涛，先后发表了《苦瓜和尚年表》、《石涛生卒考》、《石涛丛考》、《石涛再考》、《石涛三考》和《石涛上人年谱》。1942年春，傅在重庆作了一幅《大涤草堂图》，表示对石涛的崇仰。此画受徐悲鸿的影响，并参用新法，带有西洋水彩的影子。徐为

此画题句：“天气淋漓，真宰上诉”。1945年夏，他在金刚坡所作的《潇潇暮雨图》，以乱柴、乱麻二皴为主，钩、擦、揉、点、泼墨、刷、烘染多法并用，使画面效果既洒脱自然又丰富苍茫。他所作的《初夏之雾》、《蜀江烟雨》等写生画，浓重的用墨，挺峭的行笔，使人有触景之感。

1946年，傅抱石随校返回南京，仍执教于中央大学。他在课堂上热心讲解，循循善诱，深得学生敬佩。

新中国成立后，傅抱石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他努力用自己的画笔描绘新时代，作品日趋壮阔，焕发新貌。1957年赴东欧罗马尼亚等国访问，以国画写生。1958年后，他历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江苏分会主席、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等职。他热爱祖国，倡导“行万里路”、“笔墨当随时代”，以传统国画艺术魅力，更高地再现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他与齐白石有“南石”、“北石”之称，蜚声艺苑。他与国画家们合作从事研究与创作，并招收了一批青年，为国家培养了国画的新生力量。1959年傅抱石与关山月合作，为首都人民大会堂创作了《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山水画，毛泽东在画上亲笔题了字。

六十年代初，傅抱石几次赴祖国各地写生实践，使他的山水画造诣达到了新的高峰。他以深厚的国画传统作基础，吸收了日本和西欧的技法，表现了浑穆的气宇。晚年，他的许多山水写生画泼辣奔放，精钩密勒，丝丝入扣；停墨积水，淋漓湿润；干笔枯毫，飞白遒劲；设色沉静，意境浩瀚。

1965年9月27日，傅抱石因脑溢血症于南京去世。

傅抱石已出版的著作和画集主要有：《中国绘画变迁史

纲》、《山水人物技法》、《中国绘画理论》、《傅抱石画集》、《罗马尼亚访问写生画集》、《中国美术年表》、《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石涛上人年谱》等。

主要参考资料：

傅抱石：《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版。

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南京书店 1931 年版。

傅抱石：《中国美术年表》。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日]高岛北海著，傅抱石编译：《写山要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57 年版。

《傅抱石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 年第一版。

《石涛上人年谱》。京沪周刊社 1948 年版。

刘 天 华

严如平

刘天华，原名寿椿，江苏省江阴县人，1895年2月4日（清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十）生。父亲刘宝珊，清末秀才，倡导新学，在本县与人合办翰墨林小学，刘天华幼年与兄刘半农均就读于该校。刘天华1909年入常州府中学堂。他为人朴实厚重，学习勤奋刻苦，为同学所尊重。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闭，他辍学归里。时民主革命浪潮波及江阴，他激于爱国热情，曾加入本邑青年团体，参加抗清活动。

刘天华从小喜爱音乐。他十分爱听当时江阴民间和尚道士吹奏的乐曲，每遇寺院春秋丁祭和僧家佛事活动，或邻家婚丧喜庆演奏笙箫弦笛，他总是听得入神。在常州府中学求学时，他参加校内的军乐队，学习吹奏军笛军号。1912年春，他跟刘半农到上海，入开明剧社，在乐队工作，开始接触钢琴、小提琴和其他西洋乐器。他热情学习，坚毅专心，常常练到深夜，孜孜不倦。

1914年，开明剧社解散，刘天华回到江阴，在华澄小学任教。他买了一把竹筒二胡，爱不释手，苦练不已。翌年春丧父，又失业，贫病交加。他每日拉奏二胡，表述自己内心的忧愤和抱负，逐渐形成《病中吟》的旋律。同年秋，受聘于常州母校（时已改名为省立第五中学）为音乐教师。他组织学生成立

军乐队和丝竹合奏团，热情训练和指导他们学习乐器。在授课之余，他走出学校，虚心向民间艺人求教，学习琵琶、二胡、箫、笛、唢呐等民族乐器。在常州五中执教的历年暑假，他不顾生活颠沛之苦，外出寻师学艺和采风：1917年暑期，他向本地著名的二胡能手周少梅学习二胡；翌年暑期，去南京向崇明派琵琶演奏家沈肇洲学琵琶《瀛洲古调》；1920年暑期，他去河南学古琴。1921年暑期，他回故乡江阴，联络同好和学生，组织暑期国乐研究会，公开演奏，互相切磋，共同研讨江南丝竹和吹打乐。这一时期，他除了精心提高琵琶、二胡的演奏技艺外，并开始创作《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等二胡曲。

刘天华渴求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十分向往北京，曾多次写信给在北京大学执教的刘半农，“羨都中专家荟萃，思欲周旋揖让于其间”^①。1922年，他应北京大学附设音乐研究会之聘，到北京执教。同年秋，北大音乐研究会改组为音乐传习所，刘为琵琶导师，并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1926年又兼教于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他高度评价我国民族音乐，曾说：“声音之纯正与精微，举世当推吾国音乐第一。他日西方乐师，必来吾国研究。吾人从事国乐者，毋自馁也！”^②他把二胡、琵琶纳入高等音乐院校器乐教学之中，引导学生学习掌握民族乐器。他说：“有人以为胡琴上的音乐，大都粗鄙淫荡，不足登大雅之堂。此诚不明音乐之论。要知音乐的粗鄙与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上，七情俱能表演，胡琴又何能例外？”^③他编写二胡练习曲四十七首和琵琶练习曲十五首，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开创了民族器乐的科学的教学体系。他教学认真，严格

以求,指导学生重视器乐的基本功练习。

刘天华在教授国乐的同时,又悉心钻研西洋音乐乐理和和声作曲法,开阔视野,提高音乐理论水平。1923年起他师从俄籍名家托诺夫学习小提琴,直到罹病去世前近十年从未间断。平时利用一切空隙时间练琴,学生、友人去他家访问,常是未进门而先闻琴声。由于他对小提琴的造诣很深,三校除了聘请他为琵琶、二胡导师外,还都聘他授小提琴课。他在音乐会上演奏小提琴,也得到很高的赞誉。

刘天华因受到“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立志改进和发展我国民族音乐。他珍视我国古老的音乐传统,教学之余潜心于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的研究和改革。经过长期的演奏实践,并参考西洋乐器的构造原理,他和北京文兴斋乐器店老乐工合作,设计制作了新型的二胡,调整了琴弦的粗细,明确规定内弦定D调,外弦定A调,使之有固定音高定弦法则。他对已传世一千四五百年之久的四相八品琵琶,大胆进行改革,设计制作了六相十二品的十二平均律琵琶,采用了活动品位装置,既可按传统音律演奏,又可按十二平均律演奏。刘天华富于创造性的改革,为后来二胡、琵琶的定型奠定了基础。1927年,他与友人成立“国乐改进社”,翌年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音乐杂志》,积极倡导民族音乐的革新。

刘天华创作二胡和琵琶乐曲的成就,为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音乐作出了贡献。他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排斥西方文化的国粹主义,主张:“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④他借鉴西洋音乐的理论及作曲法,表现我国音乐旋律

的特征,丰富和发展了民族音乐艺术的表现手法,也表达了他振兴和改革我国民族音乐的实践和理想。1918年创作、1928年定稿的二胡曲《空山鸟语》,既充分发挥了二胡的特性,又在很多地方大胆采用了小提琴的弓法和指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27年春创作的琵琶曲《歌舞引》,吸取了民族歌舞的旋律,借鉴西洋音乐的表现手法,充分表达了人们载歌载舞的生动情景。二胡独奏曲《除夜小唱》(一名《良宵》),是1928年1月22日旧历除夕之夜,他与友人守岁时即兴创作的,乐曲轻快,旋律优美,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在表现手法上,圆阔的长弓和轻快的短弓相间而奏,精巧完美。1931年创作的《光明行》,则是一首冲破黑暗、向往未来、具有蓬勃朝气的进行曲调的二胡独奏曲。此曲旋律铿锵有力,感情热烈充沛,表现了作者勇敢向前的毅力,开创了二胡演奏雄壮乐曲的新路,而大段落的颤音也是首创,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气派,给人强有力的鼓舞,一扫某些外国人说我国民族音乐萎靡不振的陈见。刘天华一生创作的十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和一首民乐合奏曲,出色地表现了二十年代前后中国人民不满现实黑暗、渴求光明进步的思想情感,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

刘天华为了振兴和改革我国民族音乐,对于我国民间音乐、戏剧音乐以及宗教音乐,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热心于民族音乐遗产的发掘和整理。他常常走出书斋虚心向群众求教。到北京大学执教不久,就开始学习北方民间器乐三弦拉戏。在北京艺专兼教后,又与学生一道聘请老师学习昆曲。他还把街头流浪艺人请到家里,向他们学习民间锣鼓等。他曾专门向民间艺人及和尚道士学艺,记录整理了《安次县吵子会

乐谱》和《佛曲谱》。1929年，他听写了梅兰芳演唱的十出皮簧戏和八出南北昆曲的曲谱，印行《梅兰芳曲谱》，开创了用五线谱记录整理戏剧音乐的先河，为梅赴美国演出、传布我国戏剧艺术作出了贡献。

为要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音乐，刘天华主张“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中去”。他说：“我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唱高调，要顾及一般的民众。否则以音乐为贵族们的玩具，岂是艺术家的初愿？”^⑤他不顾军阀混战、学校欠薪、生活无着的困难，为普及民族音乐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倡议举办了暑期音乐学校，尽量少收学费，帮助那些经济困难而又爱好音乐的人学习，并且亲自向青年工人传授二胡演奏技巧。他组织音乐界同人和学生凑集了一笔钱，开设“乐友社”，直接从国外订购乐器和乐谱，平价销售，方便音乐爱好者，不遗余力地推动和普及音乐事业。

刘天华演奏二胡、琵琶的高超技艺，受到人们特殊的赞誉。他纯熟而精巧的拨弄弹挥，深刻地表达了人们病痛中的呻吟、苦难中的悲愤、欢聚时的喜悦以及向往未来的激情；对于月夜的清妙、林中的鸟语、舞姿的婆娑、兵刃的铿锵，也能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他在音乐会上的演奏，常常使中外听众对我国民族音乐获得新的认识。德国音乐家雷兴感叹说：“人们总觉得他这演奏是生疏的但却又这样熟习，是别致的但却又能令我们完全了解。”^⑥有的外国听众说：“今天听了刘天华先生的演奏，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优美动人的音乐，这确实是没有语言文字的世界语，是心的语言。”^⑦1931年，他为高亭唱片公司灌制二胡曲《病中吟》、《空山鸟语》和琵琶曲《歌舞引》、

《飞花点翠》等唱片。并应美国一音乐团体的邀请，准备赴美演出。^⑥

1932年春末夏初，刘天华为了采集民间乐曲，进一步研究我国民族音乐，到天桥一带去搜集说书人、卖唱者的锣鼓点，回家整理编谱，日夜不休。不幸于5月31日染患了猩红热，6月8日即去世，年仅三十七岁。

注：

- ① 刘半农：《书亡弟天华遗影后》。《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300页。
- ② 转引自萧友梅：《闻国乐导师刘天华先生去世有感》（1932年）。《刘天华先生纪念册》，北平1933年版。
- ③ 刘天华：《〈月夜〉及〈除夕小唱〉说明》。《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二期，国乐改进社1928年2月刊行。
- ④ 转引自周宗汉：《国乐泰斗刘天华》。香港《镜报》1980年10月号。
- ⑤ 同④。
- ⑥ [德]雷兴：《纪念刘天华先生》。《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 ⑦ 转引自田柳、李晖：《江阴二刘》。江苏《群众》杂志1981年第1期。
- ⑧ 陈振铎：《南胡说略》。《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谭 鑫 培

白吉庵

谭鑫培原名金福，字鑫培，以字行，湖北江夏县（今武昌）人，生于1847年4月23日（清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九）。其父谭志道，演唱汉剧老旦兼老生，因嗓音尖，类似北方“叫天鸟”之音，故得“叫天”之艺名；谭鑫培因父而得“小叫天”的艺名。谭鑫培从小跟父学艺，十一岁进金奎科班学昆乱老生。七年满科后，在京一时不易搭班，遂走天津。在津也不如意，大约二十岁时，又返回北京，入永胜奎班当配角。后来因“倒仓”（即声带发生生理变化，嗓音变哑），便由老生改演武生兼演武丑。

谭鑫培自“倒仓”后，收入逐渐减少，处境日见艰难，产生了离开北京的念头。这时恰巧有外地科班来京延聘教师，谭氏父子便应聘到京东三河县一个科班去教戏，“大叫天”教老旦及老生；“小叫天”教武生及武老生。后来，谭父因年迈辞去教职返回北京。谭鑫培只身在三河一边教戏，一边在农村巡回演出一年多，直至戏班散伙。之后他又被介绍到丰润县一姓史的财主家，为财主看家护院，在此结交了一些会武术的人。他每天早起练功，并向他们学习拳棒，得益不少。后来他演唱《卖马》中秦琼所要的双铜，之所以那样精到绝伦，就是这时学到的功夫。在丰润史家住了将近两年，嗓音有所恢复，他

考虑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遂离开史家，南下上海，重返舞台生涯。

谭鑫培在上海依然碌碌无奇，不久又回到北京。通过他父亲的关系加入“三庆班”，拜程长庚为师，继续深造老生，获得长足的进步。1872年二十五岁时，他在“三庆班”名列生行第三，但因有程长庚、杨月楼在，他仍以演武生为常。后来程认为他嘴大，扮武小生不好看，不如演武老生，可以用髯口把嘴盖住，谭便改演长靠戏，如《定军山》里的黄忠等。

谭在外数年，颠沛流离，甘苦备尝，入“三庆班”后，学艺更加勤奋。当时，他除向程长庚学习外，又拜余三胜为师，学《卖马》、《桑园寄子》和《捉放曹》等戏。余也是湖北人，因有乡谊之情，戏路也较接近，故谭得到一些真传，后来《卖马》便成为他的看家戏了。谭除向老一辈虚心求教外，又博采众芳，酌取昆曲、汉剧、京韵大鼓，乃至青衣、花脸、老旦的精华，结合本身条件，创造出一种平稳、自然、婉转、细腻的新颖唱腔，对各种人物感情，都能很好地给以表现。这种谭腔，初期在观众里并不怎么受欢迎，有的甚至反对，说他唱的纤巧，没出息。后来人们听多了，又觉得韵味隽永，非寻常可比。同行也热衷学习他的唱腔，于是有所谓“无腔不学谭”之誉。其后以学谭派起家的有王又宸、余叔岩、言菊朋、马连良、周信芳等人；惟其孙谭富英乃正宗无改的谭派。

谭鑫培不仅唱的好，做工也是独树一帜。他的特点是不墨守一招一式的陈规旧套，能够从剧中人物的性格出发，去塑造艺术形象，因此他的演技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有一次，程长庚看过他的演出后，高兴地对他说：唱的有味，做的边式，

继续用功吧，今后老生一席，非你莫属了。谭惊喜地问道：有师兄孙菊仙在，弟子何敢！程道：不然。菊仙之声，虽然宏壮，但其味苦，难适众人之口。你的嗓音润，声甘而且柔，使人听了如饮醇酒，子其勉之^①。自此以后，谭锐意求进，数年之后，舞台声誉渐隆。

1880年程长庚去世，杨月楼继程主持“三庆班”，谭鑫培名列第二。然而，这时正值慈安太后（咸丰帝妻）“国服”之期，“三庆班”没有演出。1882年开戏禁后，谭不动声色地离开了“三庆班”，改搭“四喜班”，与孙菊仙轮流演唱大轴。他俩都是程门弟子，又是盟兄弟，所以表面上还过得去，但暗地里是互不相让的。他们一打对台，观众便得大饱眼福，看一些好戏。他们二人技艺的长短，正如程长庚在世时所评价的那样，因此孙菊仙每每赛不过谭鑫培。再说，孙是票友下海，能文不能武，而唱腔又多尊古调，不能随着京剧的发展而前进，在客观上就棋输一着。这点谭心里有数，所以他不在“三庆班”内与杨争一日之短长，却愿意到“四喜班”来与孙打对台，这就是他悄悄离开“三庆班”的奥秘。

谭鑫培为求得事业上的发展，又离开了“四喜班”，从1887年起自己挑梁组班，另辟蹊径。先后曾与余紫云、张胜奎同组“胜春班”，与迟韵卿组“同春班”。这是他与孙菊仙、汪桂芬争霸梨园的时期，人称他们为“后三鼎甲”^②。

1890年谭鑫培首次奉诏入清宫演出，之后差不多每年都要到宫里演出几次。慈禧太后对他的技艺十分欣赏，曾赏赐四品服。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梨园众芳逐渐星散，孙菊仙

南下上海，汪桂芬“皈依佛门”，京城里老生一席，乃由谭鑫培一人独占鳌头。这期间他组“同庆班”，与王瑶卿合作，琴师是梅雨田。他们的演出十分精彩，时人称为“梨园三绝”。这是他最后一次组班，时达六、七年之久。由于谭鑫培对自己严格要求，刻苦钻研，因此他在京剧表演艺术方面获得了更高的造诣。由他开创的谭派戏，雅俗共赏，风靡一时，被人们誉之为“神品”。他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精湛的表演技巧，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活跃在京剧舞台上：如《卖马》中的秦琼，《定军山》里的黄忠，《空城计》里的诸葛亮，等等。这些戏脍炙人口，成为谭派的传统节目，至今仍为京剧观众所喜爱。

谭鑫培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创造了一个流派，更为重要的是，他继程长庚等人之学，促使徽剧与汉剧结合，与王瑶卿等人一起通力合作，发展了京剧艺术。他改革过的戏是很多的，《失空斩》、《珠帘寨》、《打渔杀家》等戏，可作为他的代表作。其中如《空城计》城楼上的“慢三眼”、“二六”两段唱腔，经他改革后，一波三折，十分动听，这些唱腔至今仍为京剧观众热烈欢迎。据当时的戏剧音乐家陈彦衡说：“谭的唱腔，只有《南阳关》里在城楼上一大段西皮‘叹双亲不由人珠泪双抛’的‘抛’字的行腔，是程长庚的，其余的差不多都是他自己发明的。”^③由此可见，他的革新精神和艺术才能，非寻常可比，因此有“伶界大王”的美名。

1905年秋，谭鑫培受北京琉璃厂丰泰照相馆老闆任景丰之聘，拍摄《定军山》的戏曲片段。这是京剧艺术搬上银幕的最初尝试。

1912年民国建立后，北京戏剧界的组织“精忠庙”改为“正乐育化会”，谭鑫培担任该会首任会长。这期间，他因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不再自己组班，只是在外临时搭班散唱而已。他人虽老了，但演唱艺术仍有很大的魅力。据他晚年的琴师徐兰沅说：老谭的嗓子，到晚年调门反而增高了，唱得十分动听，做派已入化境，演谁象谁。这时，谭的艺术造诣已臻炉火纯青之境。

谭鑫培艺高如此，对京剧的创新卓有贡献，但他晚年的处境却坎坷不幸。1912年秋，他以六十六岁的高龄，受上海新新舞台之聘，偕同金秀山、孙怡云、文亮臣、德珥如等赴沪演出。这是他第五次受聘到上海^④，当时海报上热烈宣传。后来年终演封箱戏时，他反串《盗魂铃》里的猪八戒，那晚他爬上三张高的桌子，拿了个“顶”，做了个几虚拟动作，好象要从上面翻下来似的，接着是向台下摇摇手，表示不行，于是便轻轻地爬了下来。这是以演丑行的身段来演猪八戒，按理是可以的，但台下有位名叫李午初的观众不谅解，以为他不从上面翻下来是偷懒，不卖力，于是喝“倒采”，全场为之哗然。前台“老闆”黄楚九也蛮不讲理，依仗人多势众，把这位观众狠揍了一通，为此引起诉讼。经过半个多月的交涉，由黄楚九与谭鑫培出面，请客赔礼道歉，并答应以后取消“伶界大王”的称号，才算完事。这一意外的打击，使谭非常痛心，春节过后不久就返回北京了。

到京后，谭鑫培也没有碰到好的际遇。1914年，袁世凯总统府举行堂会戏，传谭鑫培去演出。后来因为赏钱给得少，谭的二儿子说：“总统府怎么和皇宫一样，也要传差？可是钱又给

得那么少……。”^⑥这话传到袁府总管王文卿那里，王就嗾使警方不准谭鑫培登台演出。后来，谭四处求人说情。经过一番周折，才找到了曾拜王文卿为“义父”的余叔岩，答应去讲这个人情，余的条件只是要拜谭为师。不久才取消禁令。谭对军阀的擅作威福，颇为愤慨。

1917年春，桂系军阀陆荣廷到北京，黎元洪为了进行笼络，特举办堂会，请谭去唱戏。时谭正有病，不能赴约。黎府三番两次派人来催逼，并威胁说：“要是不去唱这个堂会，明儿就把你抓去关起来。”谭无可奈何地随他们去了。那晚唱的是《洪羊洞》，他以气愤难抑的心情来演这出悲剧，唱到曲中伤心处，凄凉婉转，如泣如诉，催人泪下，时人称之为绝唱。可怜这位老病不堪的艺术宗匠，在唱过《洪羊洞》后回到家里，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就于5月10日怀着悲愤的心绪与世长辞了。

注：

- ① 刘守鹤：《谭鑫培专记》，《剧学月刊》1932年第1卷12期。
- ② 后三鼎甲，即后三杰之意。“前三鼎甲”为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
- ③ 张骥子：《京戏发展略史》第24页。
- ④ 谭先后曾六次到上海演出：1879年为第一次，偕孙彩珠等同行；1884年为第二次，与大奎友等前往；1901年是第三次；1910年是第四次；1912年是第五次；1915年第六次到上海，只演了十天即返。
- ⑤ 梅兰芳：《我和余叔岩合作》，《戏剧论丛》1981年第一期。

阿 炳

倪波 沈道初 沈祖方

阿炳，道名华彦钧，江苏无锡县人，1892年7月9日（清光绪十八年六月十六日）生^①。阿炳是他的乳名，中年双目失明后，大家就称他“瞎子阿炳”。

阿炳的父亲华清和，是无锡雷尊殿道观的当家道士。他擅长音乐，鼓、笛、笙、箫，件件皆能。华清和四十三岁时与寡妇陈五妹同居，生下阿炳。阿炳一岁时，母亲忧郁而死，华清和将他寄乳在东亭弟媳家抚养。五岁后，华清和便将他带回在雷尊殿当小道士。阿炳七至九岁时读了三年私塾。1902年道教正宗江西龙虎山六十三代张天师——张恩溥巡游各地，在无锡时为阿炳题了道名“华彦钧”。

阿炳少时常受富家子弟欺侮，唯有音乐是他的安慰和欢乐。他从父学二胡、琵琶等乐器，晨昏寒暑勤学不辍。为了掌握击鼓的软硬功夫，他用铁筷敲打方砖，练习鼓点和板眼。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每日清晨临风学习吹笛，笛子尾部还挂上一个铁秤砣，以练腕力。由于他勤学苦练，十三岁时已经学会多种乐器，参加拜忏、诵经、奏乐。有一次节日，各殿道士轮流奏乐，恰遇打鼓老道士病倒，阿炳要求代替他，首次演奏成攻，被赞誉为“小天师”。十八岁时，他在无锡道教音乐界中已被公认为技艺超群的人才。他不满足于道家音乐，不拘泥于

陈规旧套，广泛吸取民歌及民间乐曲之长，为后来创作乐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阿炳二十岁时华清和去世，他继为雷尊殿的当家道士。此时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无锡市民请道士镇宅谢土、祭风降雨等迷信活动亦甚少。阿炳百无聊赖，加上他少年当家无拘无束，便染上吸鸦片等恶习，并成了终身之累。1927年阿炳患眼疾无钱医治，左眼视力模糊，右眼失明。在苦闷中，他徬徨徘徊，向往光明，开始酝酿了《二泉映月》的创作。同年3月，无锡工人运动领袖秦起领导全市工人欢迎北伐军，也激励了阿炳，他欣然演奏起“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乐曲。不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很快失败，军阀赖世璜派兵包围了设在崇安寺大雄宝殿的无锡市总工会，秦起壮烈牺牲。阿炳面对这一严酷事实，对反动统治有所认识，从此不肯奉承于权贵之门。后来他左眼也瞎了，成为双目失明的盲人。当雷尊殿中做“法事”时用的“庄严”（装饰用品）变卖完后，阿炳只得身背琵琶、手拉二胡，走街串巷说唱卖艺。他自编唱词，琅琅上口，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小曲小调，讥笑怒骂现实社会的黑暗。他用无锡的民间曲调唱道：“前门送走老虎后门来了狼，齐燮元赶走卢永祥呀，又来了狗肉将军张宗昌，接着又是孙传芳，走马换将，鸡鸭鱼羊一抢光！”“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他经常弹唱《歌颂十九路军》；后来，又经常弹奏《义勇军进行曲》和《松花江上》。他还创作了《寒春风曲》，用音乐告诉人们，严冬寒月过后，风和日丽的春天必然会来临。

阿炳四十岁时，与寡妇董催弟（彩娣）同居，出入相随，互敬互爱。“七七”事变后，上海、无锡先后沦陷，阿炳夫妇一度

到东亭老家避难。不久,阿炳赴上海,在昆曲班“仙霓社”担任琴师,弹奏三弦;并在电影《七重天》中担任表演盲人群众角色。阿炳艺术活动的全盛时期,正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年代。这时他创作的《听松》,是一首气魄豪迈、情感充沛的二胡独奏曲,倾吐着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主义热情。1939年,他的名曲《二泉映月》问世。这是倾诉作者心灵深处感受的一支乐曲,每当万籁俱寂的夜里,这支乐曲发出的悠扬的旋律,给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带来几分慰藉。为了歌颂人民抗日,揭露日伪顽敌,阿炳每天上午去茶馆搜集各种新闻,回来构思创作,下午在崇安寺的听松园茶馆前演唱。他的琴艺十分高超,可将琵琶放置在头顶上弹奏。他可以用二胡模仿男女老少说话、叹息和欢笑以及鸡鸣狗叫声。

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这使阿炳转喜为怒。他在演唱卖艺中,经常一针见血地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黑暗,因而一再受到迫害。有一次被反动警察殴打,并折断了他的二胡和摔坏了他的琵琶。由于穷困潦倒又屡遭迫害,1947年他肺病发作,卧床吐血,三年没上街卖艺,仅以修理胡琴为业,艰难度日。当时有人劝他到南京、上海的舞厅去演奏,他坚决拒绝,表示宁可饿死也不去。

1949年4月无锡解放,阿炳和他的《二泉映月》等乐曲获得新生。1950年暑期,中央音乐学院师生为了发掘、研究和保存民间音乐,专程奔赴无锡为他录制了《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三首二胡曲和《昭君出塞》、《龙船》、《大浪淘沙》三首琵琶曲。正当他的艺术受到人民重视之际,不幸肺病转剧,医治无效,于1950年12月12日^②病逝。

据不完全统计,阿炳创作、改编、承袭的乐曲,有二三百首之多^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印出版有《阿炳曲集》。

注:

- ① 关于阿炳的出生日期,有几种说法:(一)1887年8月25日(清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九),是解放前发的“身份证”上填的;(二)1892年8月30日(清光绪十八年七月初九),是无锡市公安局清查户口的档案;(三)1893年,见《阿炳曲集·阿炳小传》,并见《太湖》1979年第4、5期(记为1893年8月20日);(四)1898年10月3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是无锡市图书馆许忆和查看了阿炳故居的牌位,并调查访问阿炳的亲戚、邻居、旧友后得出的结论。此据无锡市崇安寺派出所1950年登记户口时保存的户口册。
- ② 阿炳去世日期也有不同记载:据无锡市公安局清查户口档案记为1950年12月12日;据阿炳故居的牌位记为庚寅年十月二十五日午时,即1950年12月4日。此据前记。
- ③ 蒋宪基:《我所知道的瞎子阿炳》。《太湖》1978年第5期。

王 少 堂

倪波 沈道初

王少堂，原名德庄，又名熙和，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六月）生于江苏扬州。王家数代说书，名字均带一“堂”字，扬州人称之为“堂门”。他的父亲王玉堂系著名的评话艺人。

童年时代的王少堂，受到王玉堂的直接传授和督促，学练评话技艺。七岁时他开始模仿父亲演说《水浒》。为了记住评话内容，他天天观摩父亲说书，反复背诵，久而久之，便把数十万字的《水浒》刻印在脑海之中，为后来说讲《水浒》打下了基础。他十二岁开始登台表演，演说《武松》、《宋江》、《石秀》、《卢俊义》四部。十六岁时已经获得一定的艺术成就，尤以说《武松》最为成功，在扬州、兴化、镇江一带颇有影响。1908年，二十一岁的王少堂开始离开父亲独自说书。

王少堂在继承其父说书艺术传统的过程中，有所发展。他吸取了专说《三国》的康国华和善于表演的刘春山的精华，使表演与说书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把《水浒》的说书时间从他父亲的延续四个月发展到八个月，仅《武松》一部的说词就长达八十余万字，大大发展了施耐庵的《水浒》有关部分。

王少堂说书有三样道具：扇子、手帕、醒木（惊堂木）；有时还有一把小茶壶。他说书不离桌，边说边演，但基本是靠说来

吸引听众。他说得意境清新，奇巧豪放，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插了很多“噱头”，丝丝入扣，引人入胜，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由于王少堂的技艺高明，常去扬州附近各地演出，使历史悠久的扬州评话一时在苏北、南京及安徽芜湖、合肥一带广为流行。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年青的王少堂受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影响，在说书中增加揭露封建社会的丑恶形态，赞扬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宣传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主张。

1932年“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强占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孤军抗战，得到全国声援。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王少堂义愤填膺，在扬州、盐城等地说书时，常到军队中去作劳军表演。他并把说书收入的一部分捐献给扬州“救国储金会”、镇江“书社联合会”，用以表达抗日救国的心意。

王少堂的爱国行动，受到扬州宜陵镇反动官吏的忌恨，他们有意陷害，于1932年4月，把王抓去坐牢。王身受八个月囹圄之苦，了解到国民党监狱的黑暗情况。此后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说书中借古讽今，抨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警察、监狱的黑暗。

扬州解放后，王少堂的说书艺术得到新的发展。1949年他参加扬州艺人讲习班，认真修改评话《水浒》，删除了许多封建糟粕，提高了思想性。1958年王少堂参加江苏省曲艺会演，获得了荣誉奖。同年，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任扬州曲艺协会主任、江苏省文艺协会执委、省曲艺研究会会长、省曲协主席

和中国曲艺协会副主席。同年7月1日王少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整理了几百万字的《水浒》评话稿,出版了评话《武松》一书,还积极为曲艺团学员讲课,精心培养新人。

1968年1月6日,八十岁的王少堂不幸逝世。

林 可 胜

陈 民

林可胜,英文名 Robert Lim, 1897年 10 月 15 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海澄县(今龙海县)。父亲是新加坡著名医生、社会活动家林文庆,母亲黄端琼是著名老同盟会员黄乃裳之女。林可胜八岁时被送往英国,读完中学后即考进爱丁堡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兵役,被分配在英国南部朴茨茅斯附近的印军医院当外科助理医生。战后复学,1919 年以优异成绩连续获得医学内科学士和外科学士的学位,并留校当生理学讲师。1920 年与 1924 年,又先后获得哲学博士与科学博士的学位。1923 年,曾以美国罗氏基金会研究员之衔,赴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1924年,林可胜回祖国,应聘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兼系主任,为协和第一个华人教授,一直任教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十几年间,他于教学研究之余,殚心著述,多次在英美各国生理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蜚声国内外。1926 年他创建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年又创刊《生理学杂志》并任主编。1928 年至 1930 年,任中华医学会会长。

1937年“七七”事变,林可胜携带子女去新加坡,①安顿后又只身回到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后在贵阳图云关创设救护总站,除办医校及训练示范病房外,还附设药品及

医疗器材制造厂。救护总站先后派遣一百多个救护队分赴各战区，并在五个战区设立分站。抗战初期，前线由于缺医少药，伤兵往往轻伤致重，重伤致死。救护总站在前线设立临时医院后，情况有所改进，伤兵运到后立即医治，轻者医至痊愈，重者经过紧急处置后转移到后方医院。有一年圣诞节傍晚，一大批伤兵转来救护总站。工作人员说病房已满，不予收容。伤兵们只得瑟缩地躺在医院门口。时近半夜，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山探视，命令立即停止圣诞联欢晚会。全体医护及事务人员紧急集合，打开训练示范病房，安置全部伤兵，一直忙到第二天黎明。林的作风及其救死扶伤的责任感，由此可见一斑。爱国华侨陈嘉庚于1940年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视察，对林的专心任职及其“努力之精神”颇为赞许，并自动应承逐月由南侨总会捐助一万元给救护总站。^②

1942年至1944年，林可胜奉命随中国远征军出国到缅甸，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的医药总监，多次得到我国政府的嘉奖和英、美政府的授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出任国防医院院长，创立军医中心教育制度，培训中国自己的军医。

1948年，林可胜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蒋介石拟委任他为国民党政府卫生部部长，他坚辞不就。1949年5月林去美国，先后任伊利诺斯大学客座生理研究教授、克雷顿大学医学院生理学与药理学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后，又受聘于印第安纳州迈尔斯实验所，负责生理、药理研究工作及医学科学研究指导。

林可胜一贯治学勤勉，作风严谨，于生理学与药理学方

面,贡献尤著。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因发现“肠抑胃素”^③而著称于医学界。晚年在海外,对于疼痛及止痛机制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世界各国不少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聘请他为名誉成员。1961年香港大学曾授予他科学博士名誉学位。

1969年8月7日,林可胜因食道癌逝世于牙买加的金斯敦。

注:

- ① 林可胜的第一个夫人玛格丽特(苏格兰人),1936年在北平病故,遗下一子一女。1937年林可胜把子女安置在新加坡林文庆家。一个月后,他只身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他这一爱国行动,在新加坡华侨中颇得好评。1946年,他和张静江的女儿张僖英在上海结婚。
- ②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211至212页。
- ③ 肠抑胃素是一种胃肠激素,是由食进脂肪后在肠内引起的。林可胜发现了这个物质,并为它以英文命名“Enterogastrone”,至今仍被胃肠学家广泛引用。

伍 连 德

陈 民

伍连德,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1879年3月10日(清光绪五年二月十八日)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父亲伍祺学是学徒出身的金店老闆。伍连德七岁时在槟榔屿进英国人办的学校学习,1896年考取英女皇奖学金,进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Emmanuel College)学医。他刻苦用功,成绩优异,曾多次获得奖金和奖章,还获得免费进伦敦圣玛丽医院(St. Mary's Hospital)实习三年的奖励,成为在该医院实习的第一个中国人。通过实习,他的医务技术大有提高,而且由于外出接生,接触到英国平民的生活现状,使他初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不均。^①

伍连德于1902年获得医学士学位,毕业后又得到母校资助,先后去德国哈勒卫生学院和法国巴士特医学院,研究细菌处理和破伤风病症。1903年他以有关破伤风细菌的论文,出色地通过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考试。随后回马来亚,到新成立的吉隆坡医学院研究热带疫病。

1904年底,伍连德完成热带疫病的研究工作,回槟榔屿挂牌行医。由于受著名华侨医生、社会活动家林文庆的影响,医务之余,也注意为社会服务,致力于社会改革,如反对赌博和禁吸鸦片烟,主张男人剪掉辫子,提倡女子教育以及开展体

育运动等。

1907年,伍连德接受清廷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聘请,回到国内。翌年9月到达北京后不久,正值光绪和慈禧相继身亡,袁世凯被黜回原籍。旋由丁士源(时任陆军部法官,与伍在英国认识)引见陆军部尚书铁良,被正式委任为天津帝国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因早年缺少学习中文的机会,回国后深感不便,到天津上任后,即聘请教师学习中文。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便能用普通话讲课。由于与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等人交往,他对中国典籍也逐步入门,后来对历史文物颇有兴趣,曾搜集过不少古文物。

1910年底,哈尔滨发生严重瘟疫(俗称黑死病),疫症迅速蔓延,危及整个东北。当时东北群医束手无策,^②人们想起使中世纪欧洲数百万人丧生的黑死病,惊惶万状。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伍连德奉命前往。他运用多年研究心得,积极探索病源,控制交通,隔离疫区和病人,火化传染病尸体。由于得到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加之他执法认真,严格按科学精神办事,不到四个月的功夫,这场传染病被扑灭了。清政府特赏他为医科进士。一时被国内外被誉为“战胜瘟疫的有力斗士”,“防疫科学的权威”。

1911年4月,伍连德主持在奉天(今沈阳)召开的万国防疫会议。这是一次国际性的科学会议,有十二个国家派遣著名专家出席。会上系统地总结了我国东北防治瘟疫的经验,交流各国研究成果。会后,伍连德被委任为外务部医官,同时仍保留天津帝国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职位,并着手在哈尔滨筹建北满防疫事务所及附属医院。同年8月,他出席在伦敦召

开的国际医学大会，发表了科学论文《蒙古鼠（即土拨鼠）与瘟疫的关系之考察》。年底，出席海牙第二届麻醉药会议。

1914年5月，伍连德在上海与颜福庆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自任秘书，并负责编辑《中华医学杂志》。第二年，他被推选为该会会长，连任两期（1916—1920）。他为发展中国现代医学，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16年6月，黎元洪继袁世凯任总统，委任伍连德为总统特医，兼任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铁路的总医官。1930年7月，伍被任为全国检疫事务所监督。

伍连德因致力于医药行政和研究工作，先后被上海圣约翰大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香港大学等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苏联微生物学会外籍会员等。

伍连德先后主持兴办医院多所，有哈尔滨医院及其防疫医院、奉天东北陆军医院、齐齐哈尔人民医院、北京中央医院以及全国检疫事务所建立的各个医院。他曾在北京中央医院工作四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伍连德举家返回马来亚，定居怡保，开设私人诊所。当地的达官显贵多次劝他出任政府职务，他都以年迈为由谢绝。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主动提出把他在北平的一幢楼房捐赠给中华医学会，表示他对祖国解放的拥护。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病故于槟榔屿。

注：

- ① 伍连德在自传中写到在圣玛丽医院实习期间外出接生的情形：“自从进入几家产妇的房屋，我才认识到十九世纪末英国平民的生活状况，房子狭小而肮脏，很少家具，连放医药用具的桌子也没有，热水也不够用，有几家甚至连床也没有，只在地上铺些干草，产妇就躺在上面等待分娩。见到这样穷苦的英国人，同在殖民地看到的那些养尊处优的英国人形成鲜明的对比，真是令人大开眼界。”见伍著《防疫斗士》(PLAGUE FIGHTER)，1959年版第189—190页。
- ② 当时在东北的法国医生摩赛尼(Dr. Mesny)在检查病人时也被传染上，医治无效而死亡。这件事引起很大的反响，造成极大的恐慌。1911年1月，仅哈尔滨华人区傅家甸，每天因瘟疫死亡的人数总在四十至六十人之间，最多时达一百八十三人。有一天，伍连德到坟地视察，见到二千具棺材和冻僵的尸体(来不及掩埋的无主死尸)，在雪地上排列着，真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当时疫情的严重，可见一斑。见上书第20—21页、第26—29页。

附录:

《中华民国人物志》中的 《民国人物传》选录草案

《中华民国人物志》分三部分:其一为《民国人物传》;其二为《人名辞典》;其三为《人物表》。这个草案是《人物传记》暂订的选录标准。

一、传记选录人物限于:自1905年同盟会创立起,至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灭亡止,这四十五年间的著名人物。

二、传记选录的人物,暂定范围如下:

- (一)清末(1905年后)反动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
- (二)1905年后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同盟会革命活动中牺牲的著名烈士。
- (三)1905年后人民自发反帝反清斗争中著名的领袖和烈士。
- (四)1905年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人物。
- (五)中华民国成立后,各主要党派、政治团体的首领和主要活动分子。
- (六)历届“国会”和相当于“国会”的各种代表会议(如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蒋介石的国民代表大会等)的议长、副议长(或主席、副主席)和重要议员(或代表)。

- (七) 北洋军阀政府首脑及总理全部列入。各部总长、次长最重要者列入,各省、区、地方的都督(或将军、督军、督理、督办)、都统和省长亦择重要者列入。
- (八) 护国、护法和国民政府时期,南方各届政府中的首脑,以及重要的部长、军长、师长。
- (九)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民间自发斗争中的著名人物。
- (十) 国民政府首脑全部列入。院长、部长、各省市的省长、市长之重要者。军人限于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密切关系的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等。特务机关中的主要头目。
- (十一) 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对派政府(如两广政府、福建政府)中的重要人物。
- (十二) 伪“满洲国”等六个傀儡政权中臭名昭著的汉奸。
- (十三) 在中国直接从事侵略活动的重要帝国主义分子。主要的“外国顾问”。
- (十四) 金融界、工商界著名的资本家及其主要代理人。
- (十五) 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各界的知名人士。
- (十六) 少数民族著名人物、华侨知名人士、宗教界知名人士等。
- (十七) 著名的帮会首领、土匪头目、黄色工会头目等。
- 三、著名人物中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党内有相当影响者,以党史记载为宜,此处不列入。
- 四、只为已经去世的人写传。现在还在世的,一律不写传,只积累材料。

五、目前先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分类列名，全部写成后，一律按笔划顺序排列。

（一九八〇年五月修改）

《民国人物传》第一至五卷目录索引

(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中文数字表示
卷数,阿拉伯数字表示页数。)

二画		王尧臣	王禹卿	四217
丁文江	一370	王志莘		四193
		王国维		一366
三画		王金铭		五 30
于学忠	二 99	王宠惠		二139
马占山	三108	王统照		五265
马师曾	二380	王家烈		五130
马约翰	三370	井勿幕		三 80
马宗汉	四 12	太 虚		三381
马相伯	一360	丰子恺		四347
		方声洞		四 7
四画		方声涛		四108
王一亭	四255	方椒伯		四189
王小航	四315	方液仙		四166
王少堂	五360	巴布扎布		二235
王占元	二211	孔伯华		四390
王亚南	五295	邓 铿		三 1
王光祈	三326	邓初民		五100

邓演达	一111	朱自清	一349
		朱志尧	四236
五画		朱家宝	五156
石友三	一248	朱家骅	四129
石筱山	四394	伍廷芳	一101
左舜生	三208	伍连德	五366
龙 云	三137	齐白石	二363
龙鸣剑	五 25	江 庸	五107
卢 汉	三145	江亢虎	一391
卢兴邦	五160	江加走	四357
田 桐	三 53	汤子敬	五233
田耕莘	一399	汤化龙	二 21
史量才	一356	汤用彤	三366
白 朗	二153	许广平	三292
白毓昆	三 21	许雪湫	二 33
包达三	五210	许地山	三346
冯国璋	二170	许冠群	四261
司徒乔	四334	许鼎霖	五183
司徒美堂	二 91	刘天华	五344
		刘文典	五308
六画		刘仙洲	五301
老 舍	五242	刘半农	三333
吕公望	四 76	刘师培	一382
师 复	四397	刘国钧	五203
朱执信	一 62	刘柏森	四205

刘显世	三169	李烈钧	二105
刘桂棠	三215	李康年	五225
刘道一	三 13	李鼎铭	三 75
刘揆一	三 47	杜月笙	一314
刘镇华	三184	杜定友	五336
孙中山	一 5	杜重远	二311
孙本文	五330	杨 杰	五 69
孙多森 孙多钰	五189	杨希闵	五124
孙传芳	一208	杨虎城	一119
孙蔚如	三125	杨笃生	二 53
阮玲玉	二369	杨振鸿	五 18
		杨粲三	一309
		吴 樾	二 46
		吴兆麟	五 53
		吴奇伟	三152
		吴佩孚	二200
		吴禄贞	二 12
		吴鼎昌	二145
		吴蕴初	一274
		吴懋鼎	五195
		岑春煊	二188
		何 键	三199
		何成浚	五135
		何香凝	二 67
		邱菽园	五118
七画			
劳乃宣	三391		
严 复	三286		
严宝礼	五285		
严裕棠	一304		
李 铭	二271		
李 纯	一198		
李士群	五166		
李公朴	二334		
李仪祉	三300		
李叔同	三317		
李厚基	四114		
李根源	四 45		

余日章	一402	陈楚楠	五 42
余芝卿	五229	陈蝶仙	三225
邵元冲	二125	陆征祥	一227
邵飘萍	一335	陆宗輿	三179
邹 容	二 17	陆荣廷	一190
邹 鲁	一377	陆费逵	三230
冷 通	四 62	陆皓东	五 14
沈钧儒	二321	阿 炳	五356
沈联芳	四251	张 勋	一215
宋则久	一295	张 澜	三 66
宋庆龄	五 1	张 继	二114
宋教仁	一 43	张 榕	三 16
陈三立	三323	张 謇	一259
陈万运	四180	张凤翔	三 61
陈天华	一 48	张文光	二 57
陈友仁	五 64	张鸣岐	二194
陈少白	三 41	张作霖	一179
陈光甫	二265	张伯苓	二306
陈其美	一105	张君勱	二409
陈春圃	五179	张国淦	二352
陈炯明	三161	张治中	五 84
陈济棠	三191	张宗昌	一236
陈望道	四288	张振武	四 30
陈焕章	二393	张振勋	三253
陈嘉庚	二241	张培爵	一 76

张辅忠	四382	庞元济	四243
张啸林	四160	郑正秋	四376
张嘉璈	三237	郑孝胥	四148
		郑振铎	五257

八画

林 文	二 50
林 森	二119
林文庆	三387
林可胜	五363
林白水	三310
林述庆	一 89
林砺儒	三360
林觉民	四 1
林语堂	二386
范筑先	三 25
郁达夫	五250
欧阳予倩	三340
罗君强	五173
罗振玉	一387
罗家伦	五149
罗常培	五313
罗福星	五 36
周作民	四230
周瘦鹃	五276
金润庠	四211

九画

赵 声	二 28
赵寿山	三116
赵秉钧	二181
荣宗敬 荣德生	一278
胡文虎	五199
胡汉民	一131
项松茂	四172
俞庆棠	五324
俞佐庭	四247
俞颂华	四302
侯西反	五121
段祺瑞	一162
禹之谟	一 81
秋 瑾	一 52
施今墨	三378
闻一多	三278
洪 深	二344
洪式闾	四386
柔 石	四282

费 巩	五290	唐绍仪	一126
		唐继尧	三152
十画		陶行知	一342
秦德纯	一253	陶成章	二 22
聂云台	二249	陶克陶胡	三220
莫觞清 蔡声白	四223		
袁世凯	一145	十一画	
夏曾佑	四321	曹 锟	一172
夏瑞芳	一291	曹汝霖	一231
都锦生	四185	黄 兴	一 35
倪映典	二 41	黄 郛	一140
徐 润	一266	黄乃裳	三306
徐 谦	五112	黄远庸	五281
徐世昌	一156	黄仲涵	三259
徐志摩	三353	黄明堂	五 47
徐锡麟	一 58	黄宾虹	四342
徐宗汉	四 34	黄琪翔	三100
徐树铮	一204	黄楚九	四268
殷 夫	四275	萧龙友	三375
钱玄同	四307	萨镇冰	四 69
钱新之	三246	梅兰芳	四361
郭 乐	一285	盛宣怀	二256
郭琳爽	四198	虚 云	二357
席尼喇嘛	二 61	章士钊	四 53
唐生智	三 90	章太炎	二276

章伯钧	五 92	傅筱庵	四154
章宗祥	三174	舒新城	四297
梁士诒	一221	鲁 迅	三263
梁启超	二289	曾 朴	二302
梁墨缘	五214	曾 琦	二399
阎宝航	四 39	曾俊臣	五238
阎锡山	四 90	温生才	二 38
康有为	一320	谢晋元	四 17
寇 遐	三 86		
续范亭	二 83		
十二画		十三画	
彭泽民	五 77	简照南 简玉阶	一298
彭家珍	三 7	詹大悲	四 23
韩复榘	一243	詹天佑	四327
董显光	四142		
蒋梦麟	五142	十四画	
蒋维乔	五317	蔡 锷	一 93
蒋鼎文	四135	蔡元培	一328
喻培伦	一 85	蔡楚生	四370
程砚秋	四366	廖仲恺	二 1
程德全	四 82	谭人凤	二 78
程璧光	三 33	谭延闿	二129
焦达峰	一 72	谭鑫培	五350
傅抱石	五340	熊成基	一 68
		十五画	

樊钟秀	五 58	穆藕初	一270
黎元洪	二161		
黎烈文	五271	十七画	
德穆楚克栋鲁普	二222	戴季陶	四121
潘天寿	四352		
		十八画	
十六画		魏 如	五220
薛觉先	二374		

后 记

一、《民国人物传》第三卷的部分初稿，林印同志参加了编辑工作；本卷的部分初稿，李静之同志参加了编辑工作。

二、本卷部分传稿，陆诒同志曾协助审阅，谨此致谢。

三、本书第一卷中《严裕棠》传，近接作者来函称：关于严裕棠的生平，近又收集和访问到一些新资料，原传文中因所据资料考订不周，致有欠准确之处，拟在本书再版时予以订正。对《严裕棠》传勿再引用。